

孙思邈评传

第一章 生卒之谜

一、可以怀疑的史料

关于孙思邈的生卒时间，史料所载，说法不一，其间先后差距竟达百年。纵然至今还在研讨争议，但仍无真正的定论。

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七史商榷》提出孙氏生卒质疑之后，就引起了人们考证的兴趣。在这两百多年中（指1781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9年《十七史商榷》粹行到现在）见仁见智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旧唐书·孙思邈本传》：“永淳元年（682年），卒”的记载，已被史学家、医学家、药学家及有关科技工作者所同意。虽

然还有什么“永淳二年（岁次癸未，683年，本年十二月改元为弘道，在正史上并无永淳二年）者”、有“永徽三年（652年）者，但都已否定了。至于还有永淳九年”者，考永淳仅有一年，并无九年，恐“九”为“元”字之误。

诞生日期，聚讼纷坛，尽管现在似乎以隋·开皇元年（581年）诞生享年101岁作为“定论”，但内中破绽，还是俯拾即是。

此外，还有从记载、碑铭、推算、考证出来的如：梁·天监十年（511年）左右；梁·天监十七年（518年）；梁·大同三年（537年）梁·大同七年（541年）；周·宣帝时（578-579年）；隋·仁寿元年（601年）。与隋·皇泰元年（618年）(11)……等。所以他的享年也除了现在“公认”的101岁之

外，还有171岁左右，164岁、145岁、141岁、一百零四、五岁、80岁及64岁。至于其中上下一岁者，乃虚龄与实龄之差。纵然这样多的差额，还是比较接近141岁的事实。其所以然者，因素固然很多，但误于原始史料者，应置首位。因之，我们不能不先把记载孙氏事迹的文献、碑志，予以讨论。

（一）新旧《唐书》的破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清·纪昀（1724—1805年）总纂。刊于1782年。

《十七史商榷》99卷，清·王鸣盛纂，刊于1787年。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昫等撰，945年完稿。原名《唐书》，因与宋·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相区别而冠以“旧”字。

见陕西省、耀县、孙家源的清·同治十一年“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光莹碑”。

见《续仙传》。

见《玄品录》。

根据《旧唐书》推算。

见《四部总录医药编》转引《通义堂文集》。

根据《大唐新语》推算。

根据《旧唐书》。

见“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莹碑”。

见《旧唐书》。(11)某学者推算。

考《旧唐书》成书于后晋（936—940年）。天福六年（941年）开馆展卷，至开运二年（945年）脱稿。此时正值建都洛阳的后唐（923—936年）、建都扬州的吴（892—937年）亡国不久，建都成都的后蜀（934—965年）、南昌的南唐（937—975年）、广州的南汉（905—971年）、长沙的楚（896—951年）、福州的闽（893—945年）及江陵的南平（907—965）等国，群雄称霸，割据中原的乱世，根本不是坐定下来修史撰志的时候。加之本史仅仅用四、五年间来草率完成。而且正当本书杀青之日，也就是后晋巢覆之时，完成后墨迹未干而江山易主。所以后人对本书的评价是“仓促成书”，“语多支蔓”，信非虚语。它虽有唐皇朝历代“实录”及史馆“国史”可资采摘，但总以战祸连绵，丧乱无法征集而没有过多足以充实利用的正确素材。乃不能不旁采杂说、稗官、传记以补充。更有一个写史惯例，往往专重于国家大事、天灾人祸、君主王室、功臣大将，对目为九流三教的医人医事，视为无挂齿之必要而未加关注着墨。

当然，也还有它有利的一面，如唐之亡（907年）距后晋之兴（936年），时逾不过30年之近。唐都长安至后晋都汴梁路不到六百公里之遥，各种文件不至于全付荡然。所以撰史者尚有一鳞半爪资料可据。不足之处当然再乞灵于稗官小说。唐人的街谈巷语小说本来荒诞不经的特色早就在文坛上享有“盛名”。所以《西阳杂俎》、《宣室志》、《大唐新语》、《谭宾录》、《独异志》、《前定录》、《定命录》……等有孙氏记载的都是借鉴对象。这样而要求很高的准确性，是很困难的。

《新唐书》是宋·仁宗赵祯（1023—1063年在位）认为《旧唐书》浅而陋，乃使宋祁（998—1061年）、欧阳修（1007—1072年）重撰唐史。宋、欧两公俱为一代文豪，而且自庆历四年（1044年）开馆动笔，至嘉祐五年（1060年）历16年之久而书成。诚如《二十二史札记》评谓：“五代纷乱之时，

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

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

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

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

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

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

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

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西阳杂俎》20卷，唐·段成式撰。

《宣室志》10卷，唐·张读撰。

《大唐新语》13卷，唐·刘肃撰。

《谭宾录》8卷，唐·胡璩撰。

《独异志》10卷，唐·李亢撰。

《前定录》10卷，唐·钟籛撰。

《定命录》10卷，唐·赵自勤原著，吕道生增定。

《新唐书》225卷，余见正文。

《二十二史札记》36卷，清·赵翼撰。

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篇古籍，亦无人收藏，虽恳诏购求，而所得无多，故；日唐书根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记载旧事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较多。”但十分遗憾，对孙思邈的史料，非但没有增添，而且反把几处落笔明确的《；日唐书》搞成模棱两可，朦胧其辞。例如《旧唐书》的“太宗即位”，显然是指贞观元年（627年），而《新唐书》改为“太宗初”；《旧唐书》的“显庆四年（659年）”改为“显庆中”；《旧唐书》的“永淳元年（680年）卒”改为“永淳初卒”。其所以然者，显然为难以自圆的乖误柄凿之处，留以斡旋余地。

如《旧唐书》：“癸酉之岁，……思逸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考开皇二十年（581—600年）中，根本没有“辛酉”之岁。

又如《旧唐书》：“周宣帝时，思逸以王室多故，……。”考北周宣帝字文赞，在戊戌年（578年）六月在位，己亥年（579年）二月，即传位于其子宇文阐，也即在陈·宣帝陈硕·太建十年、十一年间。根据史书纪年惯例，应用正统年号，所以该书“陈·太建”才合于理，不该写“周宣帝时”。

（二）稗官小说制造的紊乱

自古以来，稗官小说，都强调趣味性而忽视真实性的细散之言，尤其是唐代文风，小说家更趋向于神仙鬼怪，诚如《备急千金要方·后序》叹谓：“世俗妄人，……以附致为奇。”

1. 《大唐新语》

“高宗拜（孙氏）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这里的时日，在《旧唐书》中早就指出是“贞观元年（627年）”，在事实上这年孙氏为86岁。如以《大唐新语》推算，则孙氏当生于梁·大同三年（537年）之际。

又谓“永徽初卒”，则又把逝卒日期，提早了30多年。

2. 《独异志》

“唐·天后朝（684—704年），处士孙思逸居于嵩山修道”。其实此时，孙氏早已逝世。事实上孙氏也未见隐居过嵩山的记载，很可能将“太白”误作“太室”之故。

“于是思逸归蜀青山城，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升天。”根据此说，则《千金翼方》在何时撰写的？而且四川省无青山城一地名。

3. 《续仙传》《续仙传·隐化》：“孙思逸，……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谓子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将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来往，俄气绝。”

根据此说，孙氏如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年）者，则享年111岁。如于隋·开皇元年（581年）者，仅仅71岁，怎能自圆其说？4. 《玄品录》《玄品录·道品》：“永淳九年卒”。历史上永淳根本没有九年。

嵩山，俗称中岳。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山之东半称太室，山之西半称少室。

太白，即终南山，在陕西省，盩厔县南。以冬夏积雪，故称太白。

太室，即嵩山，在河南登丰县北。

《续仙传》3卷，唐·沈汾撰。记有学道成仙、飞升或隐化的传主36人。

《玄品录》5卷，元·张天雨辑。

（三）碑铭制造的紊乱

树立在陕西省、耀县、孙家源孙氏故居的真人祠中两碑。1.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重修真人词记”碑“（孙氏）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遂隐于蜀之峨嵋山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复至，又隐于秦之太白山十一载……”。

考周宣帝在位自戊戌（578年）年六月至己亥年（579年）二月。而隋文帝征为博士十一事，根据《旧唐书》是在己亥（579年、至庚子年（580年）间，中间仅仅一两年之久，那里有四十年。也可能这里的“隋文帝征为博士”不是《旧唐书》的一回事，那末隋文帝卒于甲子年（604年）7月，578年到604年，也只有27年，何来40年？还有隋文帝征为博士一事在己亥、庚子间（579—580年）到贞观元年（627年）奉诏入京一段时间，长达47年，今也反而为“十二载”，紊乱得从何说起！

2.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孙氏）生于周宣帝时（578—579年）”、“歿于永淳二年”。考年号上永淳仅有元年，无二年。

（四）文学札记制造的紊乱

《通义堂文集》：“上溯二十年前，为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徽君之生，当在此两年之内（518—519年）。”又：“则千金翼方之成，当在永隆元年（680年），徽君时年百六十二三岁。又阅（越）二年，乃为永淳元年（682年），徽君得年一百六十四五岁。”（见《四部总录医药编》）

（五）医学文献的误引

1.《名医类证医书大会》“药上真人孙思逸，……永徽三年（652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俨其衣冠，端坐而化”。

2.《本草蒙签》也是为永徽三年逝世，文章内容与前者相同。

二、谁说的合理

剔除毫无讨论价值的诸说之外，筛选以下几份分析较为合理或同意较多者，再加以商兑。

（一）梁·天监十年（511年）左右

峨嵋山：在四川省，峨嵋县西南。

《通义堂文集》待考，此处引于《四部总录医药编》。

《四部总录医药编》不分卷，近入丁福保、周云青编。

《名医类证医书大全》24卷，明·熊宗立撰，成书于1565年。

《本草蒙签》12卷，明·陈嘉谟撰，成书于1565年。

根据两部《唐书》，洛州总管独孤信曾见（孙氏）而叹曰“此圣童也”。

考独孤氏，原名如颀，后为北周重臣。在魏·正统（520—524年）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形而由此知名。西魏·大统（535—551年）中为陇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当时以其“公私富实，信着遐迩”而赐名为信。所以独孤信见到孙思邈时，当在初露头角之际，孙氏也适在13至14岁之间，所以确是典型的童子。陇右、秦州和孙氏的华原，地连一片，两人的相遇，机会极多。

（二）梁·天监十七年（518年）

《四部总录医药编》转载《通义堂文集》的文章：

孙徽君作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后三十年作千金翼，其说必有所据。核以千金本书自述之词，有言贞观四年旨，有言贞观七年者，有言贞观中者，就贞观中一语绎之，显系追叙之词，此书告成，至早亦在永徽元年，徽君年已百三十二三岁。……若自永徽元年此后，更数三十年，则千金翼方之成，当在永徽元年，徽君时年百六十二三岁。又阅二年，乃为永淳元年，徽君得年百六十四五岁。以享寿之岁推成书之年，亦相符合。

所以以公元518，加享年164，为公元682年，恰恰是永淳元年。

（三）梁·大同七年（541年）

根据《旧唐书》：“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

有人认为孙氏所谓的“开皇”，是隋文帝杨坚（581—604年）的同义词。犹之呼“顺治”即指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而言；呼“康熙”即指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而言一样。所以孙氏所称的“开皇”，可以指隋文帝从生到死而言。那末隋文帝从梁·大同七年（541年）的出生到仁寿四年（604年）的逝世63年中，有两个“辛酉”。前者在梁·大同七年，后者在隋·仁寿元年。以后者而言，孙氏卒年91岁，那末对《新唐书》的“卒年百余岁”如何统一？只能提前了。

独孤信自正光（520—524年）末才发迹，经历西魏文帝·大统（535—551年）中的煊赫时期到北周·宇文觉，孝愍时（557年）进封卫国公。当年即因坐赵贵谋反案而被宇文觉逼至自杀。以此推算，与孙氏会晤而叹称圣童时，独孤信已接近死期。当时孙氏尚在14至16岁间，称为圣童也十分得体。如为开皇元年诞生，则商未升而参已没，两人是无法有见面之缘的。

此说一成立，则孙氏享年为141岁。既和“隋文帝辅政，……称疾不起”、“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十分符合，盖此时孙氏适在30到39岁之间。更和晚年与两部《千金方》的关系也衔接得天衣无缝。更可证之于叶梦得《避

陇右：指陕西省、六盘山以西至黄河以东一带区域。

大都督：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司令员。

秦州：今陕西省，南郑县。

华原：今在陕西省、耀县东南。

商、参、两垦名，参在西升于凌晨，商在东升于黄昏，两垦永不相遇，故称参商。

暑录话》：“思逸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后三十年作千金翼方”而益信。

（四）隋·开皇元年（581年）

根据《新唐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考永淳只有一年（682年），上推一百年，则为隋文帝·开皇二年（580年），在“余”字上再加一些即开皇元年了。而且与《旧唐书》的“开皇辛酉岁生”的“辛酉”，许多史学家认为是“辛丑”之误。辛丑适为开皇元年岁次，于是合拍得天衣无缝。

再则孙氏93岁时遇卢照邻于长安光德坊的鄱阳公主官舍时，为癸酉年（673年），更是如持左券。

照此说法，孙氏享年为101岁。在晚年的撰写两部《千金方》方面即有问题了。这样则完成《千金要方》时为71岁而非百余岁。完成《千金翼方》时为101岁，那末他的研究《伤寒杂病论》是在写成《千金翼方》之后，讲得通吗？再以年岁推算，独孤信早于孙氏出生之前24年就死去，怎样来解释？

（五）隋·仁寿元年（601年）

《旧唐书》“思逸自云，开皇辛酉岁生”。有些学者，把“辛酉”之生的辛酉，退后一个花甲。理由是隋文帝·杨坚在位执政二十四年，一至二十年（581—600年）称开皇，二十一至二十四年（601—604年）改元为仁寿。仁寿的元年恰恰是辛酉。从古以来凡年号的更换，多数是在位者的驾崩、禅让或被篡而更易新主之际才改新年号的。现在开皇改元为仁寿，文帝杨坚健在安康，所以未被世人注意，因之容易把第21年的新年号仁寿惯性地顺口仍称开皇。因之，孙氏是仁寿元年诞生了。这些理由似乎也充足，但惜乎《旧唐书》紧接下去一句“今年九十三矣”不能视而不见。如确系仁寿元年，则仅仅72岁。即使有人容貌苍老一些，但绝对不至于“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问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

三、比较合理的诞生之日

统观上述，对孙氏诞生于梁·天监十年（511年）左右与隋·仁寿元年（601年）之说，以享年方面前者太长、后者太短而赞同者乏人。可以使人接受者，厥唯梁·大同七年（541年）与隋·开皇元年（581年）。但内以隋·开皇元年的赞同者占有绝大多数，现在所有的辞书、教材、医史等都是采用隋·开皇元年。

但笔者始终感到诞生于梁·大同七年要比隋·开皇元年的说法，更具有充份理由。

且看解放之后各种纪念孙思逸活动，都是用“纪念孙思逸逝世×××周年”的名称。唯1960年12月7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由北京市中医学会、医

叶梦得（1077—1148年），字少蕴，宋·吴县人，绍兴进士。著有《避暑录话》2卷。

卢照邻，唐·范阳人，字升之。与王勃、杨炯、骆宾王称为初唐四杰。以病手足挛废而自沉于颍水。

史学会主持的“纪念孙思邈诞生一千三百八十年系统报告会”用诞生的。但同时在会上提出“不涉及于孙思邈生卒岁月的争论”，作为肯定后有人反对而注射预防针，也即证明主张101岁的主持人自己也没有过硬的信心。

拥护开皇元年诞生者，纵然人数占绝对优势，但最大的破绽是“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和“独孤信见而叹曰”三大事的年代，都在孙氏出生之前，又作何解释。

这一点张路玉在《千金方衍义》中提出过“如果生于隋，周宣帝时便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那”。

孙氏亲笔写的“治蚊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其人病发似癩痢，面色青黄。因食寒食锡过多，便吐出蚊龙，有头及尾。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锡三斗，大验”（见《千金要方·肝脏·坚症积聚》）。假定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孙氏此时仅五岁，怎能临床治病？

这样天大的漏洞，尽管用再多的细纱细丝去织补，也无济于事。

现在将笔者认为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年）的史据旁证，作一番客观的分析：

考隋·文帝杨坚出生于梁·大同七年（541年）六月癸丑夜间，恰为辛酉，与《旧唐书》引证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的“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完全符合。

陈·永定元年（557年）之前，为孙氏15、16岁，正是这个时期。此时也正值独孤信位极人间、权倾朝野的黄金时代。以一个大人物而遇到聪明的孩子，当然脱口而出地“叹曰，此圣童也”。时间如果提早些，则孙氏仅仅为黄发垂髻，天资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如果退后一些，则独孤信也从地球上消失。

接下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独孤信又谓“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一语。考自《老子·四十一》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之后，《吕氏春秋·乐成》也有“大智不形，大器晚成”，直到三百年后的王充《论衡·状留》还在说“大器晚成，宝货难售也”。同时古人文章更有一个惯例，对某人说的每一句预言，都要在以后配上后果来证实其灵验。《旧唐书》此言，也正是为孙氏86岁奉诏入京、百岁以后写成两部《千金方》的鸿运与才能脱颖而出作出的伏笔。

《新唐书》：“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考隋文帝辅政，是指杨坚仕于北周，位至相国，袭封隋国公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废静帝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581年）的前数年。此时孙氏在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出仕的适当年龄。“不拜”，是描写孙氏的傲慢骨气，不屑为官，正淋漓尽致地烘托出孙氏的个性高尚。《旧唐书》写作“称疾不起”的“起”乃“赴”字之讹。盖病而致死，才称不起，君不

见胡昭衡“纪念孙思邈、开拓新局面”《中华医史杂志》第13卷，第1期，1983年。

张路玉（1617—1698年），名璐，号顽石老人，清·吴江人。著有《千金方

老子：即老聃，春秋战国时·苦县·万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所著之书也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上下两篇，为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26卷，战国时吕不韦使门客各著所闻，集论而成。

《论衡》30卷，汉·王充（约27—97年）撰。

见《战国策·秦策一》有“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乎。当时孙氏正隐居太白山，故称“不赴”。此时年未四十，无法言老，所以只能称疾。“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也和“但为其器大而难为用也”一样，是为50年之后孙氏86岁时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入京作伏笔。

《旧唐书》：“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新唐书》：“及长，居太白山。”其实当时有陈、北周、北齐三国并存，而且书史习惯应以陈为正统，为何独言周宣帝？因为孙氏为北周子民，属北周人，家乡在华原，隐居之处在太白山，都在北周京畿长安附近，所以唯有北周对孙氏有直接的影响。考周宣帝宇文资在位仅从戊戌6月到己亥2月的半年中，恰为孙氏三十七、八岁。在此前后数年中，周家王室本身的确纷坛多事；例如癸巳年（573年），扩充军备，征及夏人；甲午年（574年）五月，清洗道教佛教，在宗教界中造成一片紊乱，和尚道士纷纷勒令还俗遣散；七月份大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来冲击市场；文宣太后卒；乙未年（575年）2月1日出现了当时认为国家灾难的日蚀；七月又禁止五行大布钱的通用而又在市场

上引起了（第二度）紊乱；八月份出兵侵略北齐，失败而归；九月再度侵犯北齐，攻克30余城；丙申年（576年）3月，周宣帝出征吐谷浑；10月又侵略北齐的平阳；12月再攻打晋阳；丁酉年（577年）元月，北周灭北齐，得50个州、162个郡、380个县，并没收了北齐境内所有寺庙观院以赏给王公们为宅第，僧道300万人勒令解散还俗；戊戌年（578年）2月，攻伐彭

城；4月份突厥入侵，宇文邕负伤，6月份宇文赧死；11月突厥再度入侵，大肆杀掠；己亥年（579年）2月，以洛阳为东京，强逼4万多民工来建造宫殿；6月份，征役山东人民来修

筑长城；12月，侵略江北、淮南；庚子年（580年）2月，周宣帝宇文赧传位于其子静帝·宇文阐，五月宇文赧卒，于是杨坚拔扈专政；10月1日又一次认为国难家灾的日蚀。

至于宫闱琐事，尚未列入其内。从陈·大建五年至大建十二年间（573—580年）八年中，的确是“王室多难”。当时孙氏在32岁到39岁之间。如其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根本不可能遇到。

根据思邈自称93岁那年与卢照邻会晤于部阳公主废宅的癸酉之岁，似乎铁笔铸案无疑了。但是如其出生于梁·大同七年的话，那末93岁与卢照邻会晤，当在贞观七年（633年），但岁次不是癸酉而是癸巳。既然可以怀疑《旧唐书》的辛酉为辛丑之误，那末更有理由来认为癸酉为癸巳之误。而且这两

《战国策》又称《国策》，共33篇，述当时十二国大事。汉·刘向编撰。

太白山，即陕西省终南山，为秦岭主峰。

吐谷浑，为鲜卑族所建立的王朝。今在青海省北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地区。

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

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以西与铜山县以东一带地区。

突厥，为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后为蒙古所灭。

江北，长江以北的总称。

淮南，今湖北大江北汉水以东，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

个“误”，是无法避免去其其中之一的，如其是“辛酉为辛丑”之误，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无法吻合。只有“癸酉为癸巳之误”，才能完全符合。

但问题又来了，这位“约”生于635年的卢照邻，尚未出世，作何讲？其实卢氏的生卒时日至今还没有考证出来，这635年出生，事难可靠。考卢照邻和王勃（648—675年）、杨炯（650—？年）、骆宾王（640—？年）四人称为初唐四杰，因之有人认为贞观七年（633年）王、杨、骆三人都没有出生，卢氏当然也未必入世。其实这个简单的想法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汉末竹林七贤的阮籍（210—263年）、稽康（224—262年）、山涛（205—283年）、向秀（227—272年）、王戎（234—305年）、阮咸（？）和刘伶（？）七人，他们年龄山涛与王戎之间就相距29年，山涛与阮籍也有24岁。再看明代吴门四家的沈周（1427—1509年）、文征明（1470—1559年）、唐寅（1470—1552年）和仇英（？—1552年）四人，沈周和文、唐两人年龄高出43岁之多。而且七贤、四家还是聚集在一起，而初唐四杰则分处幽州范阳（卢）、绛州龙门（王）、婺州义乌（骆）和华阴（杨）四地，他们之间是否相聚过一堂尚且难说。所以卢照邻的出生日，可以尽量上移30年。如此则在鄱阳公主废宅晤孙氏时，为年30多岁。与三杰中年龄相差最大的杨炯也仅45岁，与沈周和文、唐之差相等。

也有人认为，孙氏寓鄱阳公主生前官邪是在上元元年（674年）特赐的，而早在40年前，就在这里会晤卢照邻，作何解释？其实道理很简单，“赐”与“住”根本是两回事，《旧唐书》不云乎“有孙思逸处士居之”。“居之”是寄寓，是谁都可以寄寓的，只要主人允许，不一定要“赐”，卢照邻不是也寄寓了吗？所以是孙氏早就居住在此，上元元年疾辞请归之际，唐高宗李治才明确地追赐于他。

再一个有力证明，孙氏在76岁之前，处在隋王朝时代，过他的隐居生涯，主要是修道、炼丹、读书、行医，还书撰包括疏注《老子》、《庄子》在内的许多道家著作，都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77岁之后已步入唐朝，从此即活跃于临床医务。且看《千金要方》中注明日期的医事活动，都在武德、贞观（有时作正观）时代，只有一例为“开皇六年”（见《千金要方·肝脏·坚疮积聚》）在隋朝。这又是提供了一个是梁·大同七年诞生而非隋·开皇元年诞生的铁证。

《旧唐书》：“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考太宗即位于贞观元年（627年），当时孙氏为86岁，如其诞生于开皇元年，则仅仅四十六岁，理应“容色甚少”而何“嗟”之有。《新唐书》：“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其当时为46岁的话，则怎能说“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只有86岁的老者，才是应该耳不听聪而目不视瞭。

《旧唐书》：“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新唐书》：“魏征等修齐、梁、

范阳，今河北省·涿县。

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

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

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

庄子，即庄周，战国蒙人，曾为漆园吏。其所著之书也称《庄子》，唐代天宝元年，诏号其书为《南华真经》，凡33篇，与《道德经》同列为道家经典。

陈、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考魏征（580—643年）修的是《隋书》，并非五代。参与共事撰写者还有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许敬宗（592—672年）……等人。考贞观三年（629年）魏征等奉诏修史，于当年开馆动笔，历八年而成书，至贞观十年（636年）完稿杀青。所以“屡访之”、“屡咨所遗”，当在贞观三年到八年间（629—636年）的事。如以贞观十年（636年）而论，孙思邈当年95岁，魏征56岁、颜师古55岁、孔颖达62岁、许敬宗44岁。这样年龄的一付高水平写作班子，对前朝的遗闻佚事而“屡访”“屡咨”一位95岁老人，是人情合理的。如其开皇元年诞生，则此时孙氏年龄比许敬宗大11岁，与颜师古同龄，比魏征反而小一岁，比孔颖达小七岁。如其咨询医学专业方面的尚有可能，而现在这一批高水平的文史专业者向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医家咨询文史，似乎谁都不敢相信的。

《千金要方》于永徽三年（652年）脱稿完成，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孙氏很少谈到《伤寒杂病论》，即使引用几处“张仲景曰”，也不是真正是仲景精神（后有详论）。第九、十两卷《伤寒论上、下》里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¹¹个无实质性的字眼（见《千金要方·伤寒上·发汗吐下后》）。有人提出两篇“伤寒”中不是有桂枝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等方吗？其实这许多方剂并非张仲景手订的，乃当时或前些时期在临床上的常用处方（详后第七章·思想背景的总分析）。故李梴在《医学入门》中直言“孙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脉经一卷，独于

伤寒不及”。为什么？用孙氏自己的回答，在《千金翼方·取孔穴法》篇中引李袭兴转述甄权论医“甄权曰，‘……非有圣智，孰能辨之者乎’”之后，接下去孙氏即谓“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推研孔穴，所疑更多矣”。原来孙氏研究仲景学说，是在100岁以后才开始的，此言出于《千金翼方》。可知在写成于永徽三年（652年）的《千金要方》后，也就是110岁之后。如其为开皇年诞生，则此时不过71岁，怎能自称“今年过百岁”？退一步讲，生于开皇元年，则到永淳元年（682年）恰巧也是“今年过百岁”，但他101岁即羽化，如何有时间来研综经文？如何有时间来撰写研综经文之后的《千金翼方》？《避暑录话》早就说得很清楚，谓：“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因此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最后，还是系铃人再作解铃人，再去乞灵于《旧唐书》：

……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郑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

考开皇中无辛酉，惟在它之前的梁·大同七年（541年）和在它之后一年的仁寿元年（601年）。所以孙氏应生于梁·大同七年。

李梴，明·江右南丰人，字文清，号健斋，因病而致力于医。撰有《医学入门》9卷。体裁仿刘纯的《医经小学》，以韵语写成，加以注解，成书于1575年。

甄权（约540—643年），唐代大名医，许州扶沟人。与弟甄立言，齐名于世。

在梁·大同七年时，中原有三国骄存，尚有孙氏出生之处的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后为北周）与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二年。在卢照邻面前很可能孙氏是说“文帝辛酉”，而纪史执笔者把西魏的文帝误为隋·杨坚的文帝，所以未写“大统辛酉”而写“开皇辛酉”。那未当时三国并立，孙氏为什么不言梁武帝或东魏孝静帝而独言西魏文帝？理由也很简单，梁建都于金陵、东魏建都于邺、西魏建都于长安，所以孙氏故乡属于西魏，系西魏子民。而且长安与华原近在咫尺，孙氏心中当然只有西魏，也应该是西魏。

孙氏既然诞生于西魏·大统辛酉，92岁的那年适在唐·贞观七年（633年）。孙氏之所谓“九十三”者，古人习惯上取用虚龄计算的剪刀差。至于该年岁次应为“癸巳”而《旧唐书》书“癸酉”者，当然为“癸巳”之误。

总之，孙氏诞生，以梁·大同七年，即西魏·大统七年（541年）最为合情入理，所以享年为141岁（虚龄142岁）。但不少学者，认为人生寿命，不可能有这样的高龄遐寿。其实高出百岁以上者尽多哩。如：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两百余岁。”

《汉书·艺文志·注》：“魏文侯最为好古，……襄公年百八十岁。”

《后汉书·甘始东郭延年传》：“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后汉书·冷寿光传》：“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

《后汉书·郡国志·注》：“荆州记曰，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余，七十者犹以为夭。”

《魏书·明帝纪·注》：“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

《辽史·圣宗本纪》：“霸州民李在有，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月给羊酒。”

除了正史之外，还有可靠的如：

《论衡》：“老子二百余岁，邵公百八十，……。”

唐诗人白居易九友中的李元爽，享年一百三十六岁。

《偃曝谈余》：“赵文监，平凉人，言共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言山中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岁，发白返黑，齿落复生。”

《洞微志》“太平兴国李守忠，为丞旨奉使南方，至琼。道逢一翁，自称杨震举，年八十一。邀守忠诣其所居，见其父，曰叔达，年一百二十二岁。又见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

1982年8月8日《参考消息》报道“一百五十岁老人达乌德逝世”。

1989年8月25日南京《扬子晚报》转载《中国妇女报》谓：“一百五十二岁的老寿星含笑而逝”，题下有“夏菊英，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五月五日生，今年六月十五日十时正，寿终内寝，享年一百五十三岁。”

就以《千金要方》来说，书中就有两位百岁以上老人；其一“魏武与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东郊、江宁县西部。

邺，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

《偃曝谈余》12卷，明·陈继儒撰。

《洞微志》6卷，明·钱希白撰。

琼，今海南岛。

皇甫隆令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其二“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壮”（俱见《千金要方·养性·养性序》）。

还有一个有趣而无人注意的旁证，凡人言语写作，往往在无意中把自己的内心毫无遮盖地反映出来，如穷啊、病啊、失意啊、含冤啊、丧失亲人啊……等等。那末再读《千金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恣一时之浮意，为百年之瘤疾”，以一般而论，寿都不及百年，那有病缠百年之理。《又》：“神鞠丸，主明目，百岁可读注书方”，一般常人早就一如韩文正公的“年未四十，而视茫茫”了。从以上两个“百年”、“百岁”来体会，作者定已百岁以上的人了。况且孙氏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懂得修道养生者，享年 141 岁，事在情理之中，毫无足怪。

四、小 结

以上种种，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 年）比隋·开皇元年（581 年），要合理得多。1982 年 12 月 30 日第 1841 期的《健康报》也是同意这个看法。当然，细小的破绽，还是难免的。

所以笔者颇欣赏余嘉锡“思逸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后人亦惟付之存疑，无庸考辨矣”（见《四库提要辩证》）的主张。可是写这样一部书，殿后的年谱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订制年谱，则又不允许把这个问题回避过去，因之不能不选择一个比较数据充分一些的说法来定框架，最低限度也要精选一个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时日。

《四库提要辩证》24 卷，为近人余嘉锡（1883—1955 年）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语文研究所专门委员等）湖南省常德人。

第二章 神 仙

孙思邈既然在《续仙传》中榜上有名，《太平广记》更把他列入“神仙”里，而且《东医宝鉴》又称为“地仙”。如此则孙氏理所当然地名登传篆、身列仙班了。加之《续仙传》绘形绘色地描述他临终时对子孙的嘱咐“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

炼，将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这“无何之乡”是仙境；“臣于金阙”是在玉帝处为臣僚。不是神仙是什么？

既然是神仙，那末容颜不能不具有仙姿，躯体不能不具有仙骨，生活不能不具有仙气，工作不能不具有仙法，尤其是一切的一切更不能不仙乎仙乎了。所以在孙氏身上强加各种神话，也毫不足怪，此其一。

明代文豪、万历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谓：“人寿不过百岁，数之终也。故过百二十不死，谓之失归之妖。”现在孙氏已超过“失归”之期20多年，当然可以称“妖”。但他毕竟是一代鸿儒，杏林国手，而且两个皇朝几度蒙诏入宫的天子贵客，如何可以莽然称“妖”。除“妖”以外的“失归客”，阙唯神仙，于是不能不以“神仙”尊之，此其二。

老实说，请举几位最有名的神仙，那一个不老不死、羽化而升天登仙，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尽管《素问》第一篇、第一节、第一句就是“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询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那末为什么现在陕西省钢川市黄陵县西北桥山有这样一个黄帝的坟墓？那末孙氏的一切又和所有有名的神仙，有何区别？就以年龄而论，除老子之外，比庄周（公元前369—前286年）多58岁；比张天师一世（34—156年）多19岁；比葛洪（281—341年）多81岁；比李淳风（602—670年）多73岁……。此其三。

明·嘉靖二十二年版《千金要方》（以后作《要方》）“乔序”：“史称公，道洽古今，学殫术数，今考其书，信然。自华佗以后一人而已。世以其遗书神验，遂传为龙宫所授。”此其四。林亿等《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世俗妄人，……以附致为奇。”此其五。

因此种种，在孙氏身上装贴了不少神话故事，即不可避免了。以下还罗列一些关于神仙的故事，不过必需仿效赵翼《瓠北诗集·自对》诗中的“姑妄言之供一笑，几时谒选到长安”。好罢，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之下谈谈

《太平广记》宋·李昉编纂。全书分为92大类，附150余小类，内搜集从汉到宋初的小说500种。

《东医宝鉴》23卷。朝鲜·许浚编著，成书于1611年。

《五杂俎》16卷，明·谢肇淛撰。

张天师一世，即张道陵，东汉沛人。为张天师第一代祖师。

葛洪（284—364年），字雅川，晋·丹阳句容人。祖葛云（164—244年），父葛佛。为晋代名医及炼丹家，现全世界奉为化学鼻祖。

（281—341年）多81岁；李淳风（602—670年），唐·岐州雍人。幼通群书，精步天历算，相传“推背图”系他所作。

林亿，宋·熙宁间（1068—1077年），为光禄卿直秘阁。同高保衡著校许多中医古籍文献，《千金要方》是其中之一。

赵翼（1727—1814年），字云松，清·阳湖人。著有《瓠北诗集》10卷，又《续集》2卷。

这位长安寓公。

一、救 蛇

《续仙传·隐化》：

（孙氏）偶出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已伤出血。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固，放于草间。后月余，复出行，见一白衣少年，仆马甚盛，下马迎拜思邈。谢言小弟弟道蒙君所救，父母欲见。而思邈每以药救人极广，闻之不以为意。少年复恳拜请，以别马载思邈，偕行如飞。到一城廓，花木正春色和媚，门庭焕赫，人物繁盛，伊若王者之居。少年孙思邈入，见一人端美，白帽绿衣，侍从甚众。欣喜接谢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儿相迎。前者小儿偶出，忽为愚人所伤，赖脱衣赎救，获全其命。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荣幸足矣。俄顷，延思邈入，若官闲。内见中年女子，领一青衣小儿出，再三拜谢思邈。言，此儿痴骆，为人伤损，赖救免害。思邈省记，尝救青蛇，即帽此无所也。又见左右，皆阍人宫伎，呼中合帽为君王，呼女子为妃子。思邈心异之，潜问左右，曰此泾阳水府也。帽帽乃命宾僚设酒饌伎乐以宴，思邈辞以辟俗服气，唯饮酒耳。留连三日，问思邈所欲？对曰，居山乐道，思真炼神，目虽所窥，心固无欲。乃以轻销珠金，赠于思邈，坚辞不受。曰、不以此为意耶？何以相报，遂命其子取龙宫所颁药方三十首与思邈。谓曰，此真道者，可以济世救人。俄又命仆马，送思邈归山。深自为异，历试诸方，皆若神效。

古代中医书，经常托之神话来烘托其灵验，也有固有奇验而认为神授，这是古人惯用的手段。不是谓来之洞府，就称得之龙宫，或是仙人手授。比《要方》早 169 年写成的《刘涓子鬼遗方》就是托词于得之丹阳 郊外黄父鬼的所遗。而且此风一直到明、清之际，君不见陈士铎 的《石室秘篆》、《洞天奥旨》书中的一方一法，都说成是黄帝、天师、歧伯、张机、华伦……等在晚上或梦中赠予的。至于救蛇获报的故事，在小说、戏剧、曲艺中早就屡见不鲜，更其是在唐代。

所以乔世字认为“世以其遗书（指《要方》）神验，遂传为龙宫所授”（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版《要方·乔世宁序》），真是一言破的。

指居于长安的孙思邈。

丹阳，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清·山阴人。著有《百病辩证策》14 卷，成书于 1687 年；《石室秘篆》6 卷，成书于 1687 年；《洞天奥旨》16 卷，成书

黄帝，姓公孙，为少典氏子，长于姬水，居于轩辕，故称轩辕氏；年十五受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故又称黄帝。约生活于公元前 10000—4000 年。为道教始祖，因《内经》托名于他，故医家也认作鼻祖。

天师，其一，指黄帝。其二，黄帝称歧伯为天师。其三，《庄子》认为“以天为师，非天为师”。故而并非人名。

歧伯，黄帝时臣，与黄帝共研医学。

张机（约 145—203 年），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为《伤寒杂病论》作者，此书至今奉为医家圭臬。至于是否曾在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至今还是“存疑”。

华佗（141—208 年），字元华，东汉·谯人。精于外科，是最早使用腹腔手术、麻醉的医家。

二、祈 雨

《独异志》：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发眉皓白。讲僧昙林，遗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过小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其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音。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这显然是决非事实的神话。其一，孙思邈羽化之前，虽然武则天（624—705年）很有见面机会，但她毕竟无权召孙氏，只有在执政期间（684—704年）才有权召唤，可是则天的执政在孙氏羽化之后两年。其二，当时高僧中法号“昙”字为首的有昙迁、昙旷、昙鹫与昙暝四人，并无昙林其人者。其三，孙氏自贞观元年（627年）寄寓京畿之后，直到逝世，从来没有再度退隐山野生涯，何来“发使嵩阳，召思邈”。其四，根据《独异志》所述，孙氏的写《要方》，是经过伊洛二水龙王指迷的结果，那末为什么在《要方》无一字提及此事？其五，根据此说，《要方》的成书是在玄宗·开元（713—741年）之初（根据在武后执政时即开写，再加30年的撰写而得出的答案），但已铁证如山的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的定论，能否推翻？其六，“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那末《千金翼方》（以下简称《翼方》）是谁写的？所以对《独异志》的描述，只能引用《尚书·大禹谟》一句，是“无稽之言，勿听”！

三、拯 龙

《西阳杂俎》：

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几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逸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官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特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志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

《读书敏求记》

千金方三十卷，孙思邈雍州之华原人。救昆明池龙，得仙方三十首，收入此书中，逐卷一方。

宣律和尚，为孙氏外方之交，后有详注。

《读书敏求记》4卷，钱曾撰。

以上两书，故事一个，而且《读书敏求记》显然是抄录于《西阳杂俎》的。都是为了要拔高两部《千金方》的身价而虚设的神话。

而且内中还有三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其一，孙氏终生以厚道敦德处世，决不肯乘人之厄而要 30 方。“尔传与予，予将救汝”，绝非孙氏口气。其二，以一般常识来说，龙王的法木总要比胡僧要大得多，怎样会受欺于胡僧之手。其三，“上帝不许妄传”，可知龙王与上帝有关系的，那末为何不去乞求于上帝而去乞求一个和尚——宣律？

当然，任何一个故事，更其是虚构的故事，必然有其模特的，龙官方传授的模特，很可能是《翼方·辟谷·服水》的“武德中，龙责此一卷服水经授余”一言。这个神话，殊不高明，难置一信，所以《读书敏求记》作者钱曾（1629—1701 年）不愧饱学之士，客观明智，在最后一节里，写上“后人无从辨之，新刻本搀改伪谬”。

四、伏 虎

1954 年第四号《中华医史杂志》“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

祠前殿供着孙思邈的塑像，约有一丈高，全身镀金，像貌端正严肃，令人一看便起敬畏之心。像两旁各立着一个侍童，一个捧着药包，一个捧着药钵，像右前下方伏着一只雕塑的虎。据说孙思邈山居时，他的一只驴，出外驮药被虎吃掉了。他用符召群虎来，说道，吃驴的留下，没吃的散去，结果就有一只虎伏在地上不去。此后便伴随着孙思邈，为他驮药。故此孙思邈的像右侧，永远有一只老虎。

这完全和吴承恩笔下小白马的情况相同（见《西游记》）。也相似于慧皎《高僧传·伏虎禅师》中居于拾宝岩的和尚故事。都属小说家言。再要为之考证吗？不必，写“调查记”的作者早就声明在前，曰“据说”。

五、羽 化

《旧唐书·本传》：

永淳元年，卒。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入木，犹若空衣。

《续仙传·隐化·孙思邈》：

一旦，无疾而化，颜色不变，及入棺后，唯存空衣。

《本草蒙筌·历代名医图姓氏》：

晨起沐浴，俨然衣冠，端坐而化。经月余而颜色不变。后举尸入棺，既葬，举棺如空。

发棺视之，唯衣衾在而尸已解矣。

《旧唐书》毕竟属于正史而严肃认真，不作如此记载而出格越范。除陈尸月余而不殓，多少有些费解之外，至于“犹若空衣”，则孙氏毕竟 140 余

吴承恩（1500—1582 年），明·淮安府·山阳县人，字汝忠。著有《西游记》及《禹鼎志》两小说，憎乎后者已失传。

慧皎（497—554 年），南朝·梁时高僧，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著有《高僧传》14 卷，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佛教史书。

岁老人，肌瘦肉削，事在意中，尚属可信。

但到了《续仙传》中，把“犹若空衣”轻轻一改为“唯存空衣”，这则“唯存”代替了“犹若”，就把事实成了神话。隔了七八百年后的《本草蒙签》，竟然“发棺视之”，那真是骇人听闻。不要说事实本身不可置信，而且这个“发棺”是在“礼义”之邦的古代中国，在习俗上法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时“开棺曝尸”罪，比越货、纵火、杀人罪还严重，要坐“大辟”的。在毫无特殊情况下开棺材来看看尸体，真是荒谬之至，比西方夜谭还要西方夜谭。伍子胥（？—公元前484年）“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见《史记·伍子胥传》）一事，就已震动了上下数千年。

《史记·殷本纪》的比干剖心，可能确有其事。但《封神榜演义》说他捧了心，还能行走出门，那是笑话了。其实这是文人用浪漫的形象化来说明比干的“披露内心，开诚相见”来

渲染他的“忠”。《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注引《楚国先贤传》的孟宗哭竹生笋，也不过是烘托其“孝”。《同窗记》的梁、祝死后化蝶，更是无稽之谈，但我们听起来一无反感而且乐于

接受，因为他的目的是强化地形容两人真诚的“爱情”。像这样旁敲侧击，借助于比拟、隐射、浪漫、夸张的笔法来强化加深某一个事物的文章，比比皆是，所以孙氏身后的“举尸入木，犹如空衣”、“及人棺木，唯存空衣”、“举棺如空”、“唯存空衣”……等，也不过是像上面几个故事一样，文人采取浪漫的笔法来烘托孙氏身后的空空两手、罄室羞囊，一无遗物以作陪葬之品的“廉洁”。

六、显 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至唐明皇（712—756 在位）幸蜀，梦思逸乞雄黄。乃命中使赍十斤送峨嵋山顶上。中使上山，见老人幅巾，被二青衣童夹侍。日，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硃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录随灭。须臾，白气漫起，忽不见。后成都有一僧诵法华经甚专，虽经兵乱，卒不能害。一日，有山仆至，云先生请师诵经。遂引行，过溪岭数重，烟岚中入一山居。仆日，先生老病起晚，请诵经，至“宝塔品”欲一听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藜杖，两耳垂肩，焚香听经罢，入，不复出。遂供僧以藤盘竹筷，秣饭一盂，把菊数瓯。僧食之无盐，酥味美若甘露，并得赂钱一钗。仆送出路口，僧因问日，先生何姓？日，姓孙。问何名？仆于僧掌中手书思邈两字。僧大骇，回视仆，遽然不见。僧乃于山中寻求，竟迷归路。归，视 资乃金钱一百文也。由兹一饭，身轻无疾。至宋·真宗·天信中（1017—1021年），僧已一百余岁。后隐去，莫知所之。

《史记》130篇，汉·司马迁著，原名《太史公书》。

《封神榜演义》100回，明·许仲琳著。

《三国志》65卷，晋·陈寿撰，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它绝对不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同窗记》不分卷，作者待考。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53卷，续篇2卷、后集6卷。明·浮云道士赵道一编。

“宝塔品”为佛经篇名，在《法华经》中，为28品中的第11品。

道教中历史文献如《列仙传》、《续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书，好像有一个模式，凡是神仙、真人之类人物，在逝世之后，近则数十年，远则数百年，而这位神仙或真人还要在人间出现，所以孙氏的显圣，也不过是小说家的一套惯技而已，不足为信。

七、出现在《千金方》中的一鬼一龙

纵然关于孙思邈神话故事很多，但他两部《千金方》中仅仅一个“鬼王”与一个“龙”而已。

《要方·伤寒上·辟温》的“乃有鬼王见书生”故事。实乃孙氏转述一下400年前在汉·建宁二年（169年）的民间故事，仅仅未加批判而转述一下而已，根本未有渲染而神其事。

《翼方·辟谷·服水》的“武德中，龙资此一卷服水经授余”。很多人误解为龙是一条鳞介的龙，其实他不过是姓龙的或名龙的人。在这一误会中，就产生了以上救蛇、祈雨、拯龙三个神话故事。在这里有三个理由来证实是人而非鳞介之龙：其一，真的鳞介之龙而能出现在人间，在今天说来是绝无其事的迷信，我们尽管倒退1300多年到唐代，那末此龙必然是龙王。龙王是深居简出的，决不涉足尘世。其二，姓龙的人多得很，在孙氏之前的有战国时代大名鼎鼎的龙阳君、秦汉时项羽麾下猛将龙且、东汉敦厚周慎的龙伯高、三国时受诸葛孔明封为酋长的龙佑那……。至于名龙的更多得不胜枚举。其三，古人用字很讲究，更其是饱学的孙思邈，在两部《千金方》中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琢磨的。这里用“赍”字，几乎级同辈人物之间的礼品授受称“赍”，长者或君王的赠予称“赐”。孙氏这里不用“赐”而用“赍”，就证明这个龙，仅仅是平级同辈的人。

八、小结

以上种种，所以许多人俱不同意孙氏真是神仙，但笔者则承认他是神仙。

考“神”字涵义，除了一般人心目中修炼辟谷、变化神通、长生不死、得道升天的神仙之外，还有如其人精神焕发者称“神气”，形态潇洒者称“神韵”，风度翩翩者称“神姿”，学问深厚者称“神智”，精通百技者称“神工”，事物观察能力强而作事很少失败者称“神奇”，办事精明，预计准确者称“神算”，儿童聪明才智超人者称“神童”，事业大有成就者称“神器”，邃于医者“神医”，工于绣者“神针”，精于文者“神笔”，擅于画者“神物”……。

“仙”也是如此，对某一种学问具有非凡造诣或出人头地者，都可称“仙”。如李白的“诗仙”、“刘伶的“酒仙”、陆羽的“茶仙”等等。

《列仙传》2卷，旧题汉·刘向撰。

龙阳君，春秋时魏国幸臣。

龙且，项羽麾下猛将，后被韩信所杀。

龙伯高，汉·京兆人，名述。

龙佑那，三国时人，诸葛亮赐姓为张。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陇西成纪人，后迁居蜀中绵州，曾寓居山东。

刘伶（？），晋沛国人，与阮籍、稽康等称为竹林七贤。嗜酒，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随身带

杜甫诗“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大吠白云间”（见《杜部草堂诗笺·滕王亭子》），竟然把世外桃源式的人间环境也称为神仙居处。

那末我们现在再把孙氏各方面事迹来对照一下：

《旧唐书》：“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

《旧唐书》：“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

《旧唐书》：“道合古今，学殫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请。及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阓安期先生之侑也。”

《续仙传》：“洞晓天文推步，精究医学，审察声色，过蕴仁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

除了以上才能之外，对孙氏风度方面，也有如《旧唐书》“神采甚盛”的描写。

至于道德风格，在两部《千金方》中，更如实地反映出来（详后第六章大医·九医德·十孙氏医学思想初讨）。

又有言而有验的如《旧唐书》谓孙氏年未四十前，尝“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的确在50年之后唐太宗执政，即“召诣京师”。

因之，尊孙氏不论为“神”为“仙”，都可受之无愧。不过这个“神仙”，应该引用《汉书·艺文志》中的一句话来解释，是：“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也就是《世说新语·企羡》中谓孟昶：“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是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的神仙。”

酒，使人荷锺相随，曰：“死便埋我”。

陆羽（733—804年），唐·复州竟陵人，字鸿渐，或名疾，著有《茶经》三篇。晚年自号桑苎翁。

杜甫（712—770年），唐·河南巩县人，祖籍为湖北襄阳，字子美，自称杜陵布衣或少陵野史。著有《杜工部集》60卷，小集6卷，散佚。

《汉书》后人分为120卷，东汉·班固继父亲班彪写成。

《世说新语》，不分卷，有36门，原名《世说》。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孟昶，（919—965年）五代时后蜀主。虽为君主，但对医学十分精通。后人有时也作为名医论及。

第三章 鸿儒

一、孔孟之道

《汉书 贾山传》：“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汉书·扬雄传》：“于是乎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后汉书·左周黄传论》：“宏儒远知，高心洁行。”《后汉书·班固传》：“宿儒盛

名，冠德乡里。”《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方今宿生巨儒。”《文中子世家》：“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以上的醇儒、钜儒、宏儒、宿儒、巨儒、洪儒，都不及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的鸿儒人尽皆知。其实都是饱学之士的大儒。《（新）辞源》解释鸿儒谓：“泛指博学之士。”

不过博学之士，不等于儒家。先秦的庄周、墨翟、杨朱、孟柯、荀卿、韩非……等，也都是饱学之士，但除孟柯外，谁都不是儒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追随儒教开

山鼻祖孔子走的。

所以孔孟之道再加博学，才是儒家，也就是儒教中人物。以孙思邈而言，那是两者俱备。

在儒家方面，我们把孙氏的思想与文学水平，加以爬梳对照。现在先谈文学修养，“涉百家，破万卷”的赞美词，古来儒家中人物能受之而无愧者不多，但孙氏则可以无愧的接受。2000年来医学著作中文学气息最浓郁的首推两部《千金方》。

可能也有会提出，《理瀹骈文》、《医道還元》更是雕龙绣凤、横锦散珠之作，比两部《千金方》更显示出旖旎风采，整个篇幅完全是骈体四

《汉书》又称《前汉书》，120卷，东汉·班固（32—92年）撰。

《后汉书》130卷，南朝·宋·范曄（398—446年）撰。

《文中子》又称《中说》，10卷，隋·王通（584—618）撰。王通私谥文中子。

《（新）辞源》，《辞源》的编辑开始于1908年，1915年出版，主任编辑为陆尔奎，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下，用3年多时间，整修重订了一部新的《辞源》。共搜辞目10万余条，约1000多万字。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的创始人。鲁国人，他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杨朱，字子居，战国·魏人。他的活动，后于墨翟而早于孟轲。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与墨翟的“兼爱”相反。

孟轲（约公元前372—289年），字子舆，战国时邹人，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全部继承孔子的学说，故而后人称为“孔孟”，尊为“亚圣”。

荀卿（公元313—前238年），战国时·赵人。名况，荀卿乃后人对他的尊称。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他认为“人性皆恶”。

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时韩诸公子，为荀卿弟子。后人称为法家。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人。传说弟子3000人，精通六艺者72人，学说以“仁”为核心，“礼”为手段。尊称“至圣”。

《理瀹骈文》不分卷，清·吴尚先撰，刊于1870年，内容专谈外治法。

《医道還元》9卷，归题唐·叶洞宾著，清·李时品校印，出版期无考。属于道教的医学著作。

六，在医学文献中至今还没有找到与此可以媲美的著作。但我们更要与两部《千金方》对比一下。《理瀹骈文》《医道还元》的文词，都是堆砌斧凿，为修词而修词，远不及两部《千金方》的信手拿来。而且理、医两书的口气，仅仅是青钱应选、黄绢题碑的小家气魄，远远不及两部《千金方》的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的气势磅礴。还有《理瀹骈文》仅仅局限于外治，《医道还元》重玄谈而鲜实用，更难匹敌两部《千金方》集医药之大成迹耦经典。以下，再把孙氏手笔细细地精读深析。

青钱应选，典出《新唐书·张荐传》：“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现在用这个典故来譬喻文才的好。

黄绢题碑，典出《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常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齏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这也是比喻用词结构的佳品。

二、《要方·自序》

我们只要展开《要方》扉页，映入眼帘第一篇文章——序的开始 17 个字，就使你惊叹孙氏文学的造诣而足以折服。

下笔第一个字“夫”，他用万钧之力来揭开全书的序幕，涤讪了这拥有 232 种疾病、5003 首药方的《要方》基础。科学的论说，有效的成方，精湛的治疗和秀色可餐的文笔，都是在这个“夫”字之下，舒展于读者面前。这个发声的慨叹词，犹如奇峰突起地出现。能使中医学术的承前启后、发扬广大的功绩，都在这顶华盖之下倾泻出来。

接下去“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16 个字，已经把六朝文的韵味天籁、华藻丰姿显示得墨酣笔畅。而且入声的“十药”来收尾叶脚，戛然而止，更感到有力有劲，精神百倍。加之声律的和谐，格式的协调，组织的严谨，诵读起来，真的铿锵作金石之声。更其是仗对，也是工而且巧，得来天衣无缝。你看“清浊”对“上下”、“剖判”对“攸分”，天地人“三才”对金木水火土“五行”，更是天作地设。唯“肇基”对“俶落”欠缺骈耦而成“羊角对”，美中不足。取用单字，也幽雅朴实。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用来影射天地，隐而不露不晦，使人都能心领神会。更取用动词的“剖”“判”两字，使本来呆板沉闷的气氛活跃而形象化起来，确可引人入胜。

道家唯一医书《医道還元》的“洪濛未判，一气混元。太极初分，五行列位。阴阳贯乎万象，水火运于两间。天气轻清，常充盈而流转。地气重浊，实凝固而安贞。人禀三才之末，身具百脉之关。上则符天，下则符地。……”的学术思想和语气，全部从孙氏这 16 字孕育出来的。

“肇基”不过较为现存的引用《书·武成》的“至于大王，肇基王迹”。“俶落”两字的用来，自有一番工力与技巧。考《书·胤征》：“畔官离次，俶扰天妃”，《诗·大雅》：“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前者是开始发轫进展之谓，后者是开拓创造向荣之意，所以这个俶字，是含有开始、创造到向荣的意思，也就是事物由茁壮到茂盛的阶段。《礼·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出林”，所以落字是代表盛极趋衰到凋零的意思。全句“五行俶落”，就是说五行间的循环交替，总是在开始向荣—衰退没落—再开始向荣的起伏此起循环消长不息。五行生克，早已众所周知，而孙氏独取“俶落”两字来描写，那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特别烘托出它的规律，也就是法则。“生”与“克”多少有其刻板呆木之感，而“俶”与“落”，就显示出它的生趣盎然，跃然纸上了。

文章从“燧人氏出”至“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的仅仅 101 个字，就把从传说中的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到秦汉的几万年中医学事业成就叙述得一览无遗，简而不漏地溯述一遍。文章除了精练之外，仗对排句也俯拾即是，为一般水平的写作者所难以做到。

自“春秋之际”到“而疾无不愈者”一节，是伏笔。用以为下文“晋宋以来”到“有阙摄养所致耳”的反调作陪衬。文章的波澜起伏，就是依靠几

十药，诗韵有“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者”，“十药”韵为入声中第十位，故称“十药”。羊角对，指仗对不工的联，俗称羊角对。

《诗》即《诗经》，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成书于先秦，有 305 篇，分风、小雅、大雅、颂四类。

个高潮。要使高潮的奔腾澎湃，奇峰迭起，那末就少不了几个低潮的幽谷，文法上称为“欲扬先抑”。这一节，正是为了下节制造高潮而设。

自“余緬寻圣人设教”至“深乖圣贤之本意”一节，是向反调反击的反反调。从“春秋之际”到“深乖圣贤之本意”的仅仅190个字，就有三个起伏。这样狂澜迭起，跌宕有致，既有韩荆公（768—824年）的“潮”，更有苏东坡（1036—1101年）的“海”，就是孙氏写作水平的反映。

从“吾幼遭风冷”到“多所济益”为叙事体笔调。其前半如吹洞箫于赤壁，余音袅袅。后半如击舷中流，壮志昂昂。

最后用警惕的措辞，既激励了医生，更唤醒了病人，纸短情长，不能不使人感触万分。殿后“夫何荣势之云哉，此之谓也”，用慨叹口气。虽然好像没有说什么，但内涵之深反而使人回味。也正是这条神龙之尾，更赢了读者以绕樑的悬念。

附《备急千金要方·序》（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全文：

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痼瘵萌起，大圣神农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歧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伦，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问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泰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阙摄养所致耳。

余緬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给，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乎！深乖圣贤之本意。

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吾见诸方部秩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

张仲景曰，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但兢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进不能爱人知物，退不能爱躬知己。卒然遇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后震慄，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慧若游魂。降志屈

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诸庸医，恣其所措。咄嗟暗鸣，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此之谓也。

一般人所知道的“韩潮苏海”，是指文章的波澜壮阔。比喻韩愈之文高于高峰，东坡之文阔如大海。

三、《翼方·序》

30年之后的《翼方·序》文，孙氏真的已届垂暮之年，涉世更深，见闻更广，所以他的行文走笔也更形苍劲老练，用词取字，拈来趋于深奥。在思维方面，当然也更成视邛达到了炉火纯青境界。藏龙化石、顽枝虬根的文章，以致使人更加难懂费解。同时他的恬澹无为，超尘脱俗的思想，真的已步入了道家的虚无之域，所以把抱一含元、步虚控景道教真理，不知不觉中融贯于全篇序文中。

文章开首“原夫”两字，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过仅仅是开场的起首词，但用在这里则另有一番情景。“原”的许多解释中内有一个是作“再”字来讲的，如《易·比》的“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中的“原筮”即“再筮”之意。《礼记·文王世子》的“未有原”，郑玄注谓：“未犹勿也。原、再也。”因为《翼方》是《要方》的续集，唯有“原夫”两字可以表达出本书是另一本书的继续。因之可以将30年的空间，把它接连到一起。但一个承上还嫌不够，更必需启后来把《翼方》的开展，“原夫”两字也就完成了这个使命。

之后“神医秘术，至喷贻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决于真珍”，此四句为一小段落，属典型的骈四俪六体文章。其平仄之叶，仗对之工，四六四六，平稳规矩。这种文章，虽然遭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荆州大力反对，但依然在文坛上披靡无阻地占有重要座位。柳宗元就十分欣赏，曾在他《乞巧文》赞为“锦心绣口”。事实上也的确是“乃典章之果实，亦翰墨之弥文”（引赵鼎臣《竹隐畸士集·谢宏词启》句）。前两句论医，后两句谈药。贻，《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意思是精微深奥。参，《庄子·大宗师》：“玄冥闻之参寥”，是比喻高不可攀的意思。道枢，《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意思是关键之处，在于道枢。连贯起来解释，是说一个出神入化的高明医生业务水平，要达到（至）高深而奥妙的医学理论，必须掌握关键。

第三、四句如其没有第一、二句同时存在，是使人无法理解的。第三句，药食同源，所以古人都称为饵。如何上面加一个“宝”字？有两个原因：第一，形容药饵的珍贵如宝，同时也运用道家称好的东西为宝。第二，用以与第一“神医”的“神”作匹对。前者平平，后者仄仄。把所有的钟灵毓秀凝聚在一起，称“凝灵”。“真畛”，畛是田间的阡陌，意会着纵横贯通。“真”是真正或真实。两字连起来，就是在理论上真正像阡陌纵横的贯通通达。宏，《书·盘庚下》：“用宏兹责”，广博之意。功，《国语·齐语》“相陈以功”，成效的意思。决，《荀子·解蔽》“已不足以决万物之变”，贯通的意思。那末这第三、四句的意思是：宝贵的方药，犹如灵气所宗的神效，也要有赖于广博的知识来融会贯通于这个像阡陌纵横的知识海洋中。

下文“知关仑玄牝，驻历之效已深；譬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第一

《易》即《易经》，古卜筮之书。当时有《连山》、《归藏》《周易》三者，称《三易》。现仅存《周易》。故《易》《易经》《周易》，乃一书三称。

柳宗元（773—819年），唐·河东人，任过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国语》21篇，又称《春秋外传》，相传也是左丘明所撰。

《荀子》为荀卿之作。

个“知”字，虽然也含有必需知道的意思，但用在这里，一半已作为发声的助语词，犹如“夫”“盖”一样，不必多费笔墨去讨论。

玄牝，道教指衍生万物的本源而言。玄，是玄妙，牝是母体。因为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都是从玄妙的母体中孕育及生长出来。关仑为横支门户的木撑，《国语·楚语》：“为之关仑藩篱而远备闭之”，即现代所称的门闩。用在这里则借用名词来权作为动词，即掌握门闩的开关作用。也就是说掌握万物衍生的权力。驻，是停止。历，是行走或行动。连贯起来讲，是能够掌握万物衍生的权力，那末不论或动或静的功效有其深远意义。

辔，马缰绳。策，马鞭子。放松马缰使马停蹄，抽以马鞭则疾驰。一般造化的秘奥，道家称为天机，用在这里是作为高深的医学理论来讲。全句意思，是说把天机样的高深医学理论驾驭得得心应手，为的是施用恩德使人们健康长寿。“全德之德为大”，即《易·系辞下》的“大德曰生”。为什么不把《易经》原文照录？因为要和“驻历之效已深”六个字作匹对之故。

之后“稽炎农于记篆，资太一而反营魂；镜轩后于遗编，事歧伯而宣药力。故能尝味之绩，郁腾天壤；诊体之教，播在神寰”一节，是歌颂黄帝、神农对医药事业的伟大贡献。因于深奥，使人读来相当费力。其中难解之字，有“反”，意思是互相证实，见《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全文的意思是在说，全计一下黄帝‘神农的书籍，可以知道凭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太一），互相证实人的心灵或精神的关系“营魂”，再借镜于轩辕后的遗书，有了歧伯才能把本草的作用宣扬广大。“天壤”，《战国策·齐策》“故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敝也”；“神寰”，泛指一切广大的境域。言其医药恩泽，扬溢于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

之后，“医道由是滥觞”，典出《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意思是在开始之际江水很少，只能浮起酒杯。愈到后来江水愈大，可以载舟。用以譬喻事物的开始、发展而到壮大。

之后，“亦有志其大者，高密问紫文之术”至“以持身抑斯之谓也”一节，是介绍高密读道教书来学养生法与老子留下道教著作的故事。并强调人而要求健康长寿，必须首先除去疾病。我们更要注意“伯阳流玉册之经”的“流”字，非孙氏的文学功力是无法引用的。因为这个“流”字，是作寻求、寻觅的意思，典出《诗·周南》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原注“流，求也”。

之后，介绍了扁鹊、医和、张仲景、华佗四人，在精湛的医术中还有其各自的特长。

之后，“酌华公之录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第一、三句在表面上以乎仅仅说明在华佗或葛洪的书中取吸精华，其实真正的重点放在第二、四句。孙氏郑重叮咛我们要对各家学说应该广搜并蓄，没有门户之见，更不能党同伐异！这四句是前六后四的骈体文，仗对之工，平仄之叶，也是属上品之作。

之后，“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泐斯义”，

《论语》20篇，为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所集孔子言行、思想的纪录。

后，古代天子或诸侯皆称为后。此处后字，作帝字的同义词。

医和，一说为春秋时秦国良医。一说为所有良医都可称医和。

孔宣，即孔子。因唐·开元27年追谥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追谥为“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

又作出第二个声明。就是以孔子、陆绩对《易经》的整理和阐发来比喻自己两部《千金方》情况，也是一方面整理前人的遗产而一方面推出自己的心得、经验来发扬丰富中医学的内容。这两小节八句的比喻，基本上是孙氏对两部《千金方》的自我评价。评语精神可用八个字来总结，在横的方面是“兼收并蓄”，在纵的方面是“推陈出新”。

最后的“贻阙子孙，永为家训”，是用画龙点睛笔法来突出写书宗旨。附《千金翼方·序》（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全文：

原夫神医秘术，至隋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决于真眇。知关仑玄牝，驻历之效已深。警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嵇炎农于纪篆，资太一而反营魂；镜轩后于遗编，事歧伯而宣药力。故能尝味之绩，郁腾天壤；诊体之教，播在神寰；医道由是滥觞，时义肇基于此。亦有志其大者，高密问紫文之术；先其远者，伯阳流玉册之经。拟斯寿于乾坤，岂伊难老，侍厥龄于龟鹤，讵可躄痾。兹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谓也。

若其业济含灵，命悬兹乎，则有越人_下视于腑脏，奏和洞达于膏肓，仲景候色而验眉，元化剖肠而泻胃。斯皆方轨叠迹，思辘入神之妙；极变探幽，精超绝代之巧。晋宋方技既其无继，齐梁_下医术曾何是云。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然则三部九候，乃经络之枢机；气少神余，亦针刺之钩轴。况乎良医则贵察声色，神工则深究萌芽。心考锱铢，安假悬衡之验；敏同机骇，曾无挂发之淹。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是故先王之于玉版，往圣藏之以金匱，岂不以营叠至道括囊真颐者欤。

余幼智蔑闻，老成无已。才非公干，夙婴沉疾；德异士安，早缠痾瘵。所以志学之岁，驰百金而询经方；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酌华公之录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每以为生者两仪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气。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而存；德合则生成，是生曰德而立。既知生不再于我，人处物为灵，可幸蕴灵心阙，颐我性源者，由检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号曰千金。可以济物摄生，可以穷微尽性。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学譬輶軌之相济，运转无涯；等羽翼之交飞，博摇不测。蚍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徼斯义，述此方名矣。贻阙子孙，永为家训。虽未能譬言中庶，比润上池；亦足以慕远测深，稽门叩键者哉。倘经目于君子，庶知余之所志焉。

我们再进一步推敲细品两个序文，前序用神龙之尾来结束全文，使人悬念遐思来留下后一部著作的衔接余地；后序也用承上启下的“原夫”来呼应。而文一气呵成的笔法，更是难能可贵的，在时间上跨越了30年之久。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后人评价极高，认为前后赋“同一机轴，而无一笔相似，读此两赋，胜读南华一部”（引《古文观止》注文）。而《千金方》两序，未始也不是这样。而且更要知道两篇“赤壁赋”前后仅隔三个月，而《千金

年追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故又称孔宣。孙氏生前当然不可能知道以后的封与谥，但很可能在隋、唐时早已有了民间的私谥。

陆绩（187—219年），三国·吴郡人，字公纪。

秦和，即战国时名医医和与医缓的合称。

晋宋，泛指西晋、东晋（265—420年）与南朝的宋（420—479年）

齐梁，指南朝的齐（479—502年）与南朝的梁（502—557年）。

方》两序，是遥隔半个甲子。

四、对史乘的熟悉

古来文与史，好像孪生兄弟，熟于史者必工于文，工于文者必熟于史。在两部《千金方》中，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掌故，而且还有些是鲜为人知的，这是所有中医古今文献中所未见。《新唐书》谓孙氏“通百家说”，信非虚语。如：

《要方·序》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画八卦，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歧伯、雷公始创医学药学；之后医和、医缓、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的继承发扬等等，在现代看起来，这些医史不过是一般常识，只要有水平的医生们都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但在1300多年前是鲜为人知的，非精文通史的学者莫能为言，孙氏这个总结并非易易。而且从此以后的医史，也就在这个基础上定说立论的。

“孔宣系十翼之辞”（见《要方·序》）。指的是孔子整理及撰述部分《易经》的事。有人把《易》的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封称为十翼。所以十翼与《易经》是同义词。孔宣指孔子，孔子文宣王的追谥虽在孔子去世1218年之后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也就是孙思邈羽化后57年，但文宣王的尊称肯定早就被人叫开了，到了开元二十七年，不过是通过合法仪式来承认下来而已。所以孙氏称孔宣。为什么不称孔丘？为了避讳。为什么不称孔子？因为下联陆绩的绩是名，字子对不上去，而且绩的仄声，子也仄声，仅有宣为平声，才合式。

“陆绩增玄翼之说”（见《翼方·序》）。指三国时人陆绩，整理了《易经》，并写有《陆氏易解》一书。

“才非公干”（见《翼方·序》）。考唐之前号公干者仅两人，一为汉末刘楨（？—217年），为建安七君子之一，以五言诗闻名。一为晋王祯之（？），历任大司马长吏，善于辞令。孙氏指刘指王？无法考证，但以才华而论，则刘胜于王。

“德异士安”（见《翼方·序》），在历史上号士安者四人，但在孙氏之前仅为晋之皇甫谧。而且接下去为“早缠疔瘵”，又与皇甫谧在曹魏·甘露（256—259年）中，也患有风痹，所以肯定是元晏先生（皇甫自号）了。

“竟三余而勤药饵”（见《翼方·序》）。考三余两字初见于《陶渊明集·感士不遇赋序》“余尝以三余之日”，即冬为岁之余，夜为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扁鹊为秦太医令李醯所害”（见《要方·治病略例》），事见《史记·扁鹊传》：“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

“项托颜回”（见《要方·少小婴方上》）。项托应作项橐（？），在出智齿时，孔子曾问道于他，但少年早死。颜回（公元前521—前490年）为孔子弟子，享年仅31岁。这两人，一为孔子老师，一为孔子弟子，俱目为夭折短命者。

“杨修孔融”（见《要方·少小婴方上》）。杨修（175—219年），三

皇甫谧（215—282年），东汉至西晋时甘肃平凉西北人。字士安，晚年自号元晏先生，著有《甲乙经》12卷。

国时人，为曹操主簿，年 44 岁，为曹操所杀。孔融（153—208 年），也被曹操所害，时年 55 岁。以上两人也目为不寿者。

“骥驥而不遇伯乐”（见《要方·风毒脚气》），典出《楚辞·怀沙》：“伯乐已没，骥马程兮。”“怀颖阳之风”（见《要方·痔漏·恶疾大风》）。考古高士巢父许由隐居于颖河之北。所以后人称不问世事、隐居的高士为颖阳遗风。

“亦如积橘所生土地随变”（见《要方·食治》）。战国时齐相晏婴（？—公元前 500 年）出使楚国，设宴饮酒时，捉来一盗，是齐国人。这时晏相十分难堪，但他用外交词令来解释，说：“生在淮南的橘子，一旦移植到淮北，就可变成枳了。”

“亦犹咎繇创律，但述五刑，岂卒其事”（见《翼方·药录纂要》）。咎繇一名皋陶，传说为舜之臣，掌管刑狱事务。他为舜订立包括五刑在内的法律。《书·舜典》的“五刑有服”，即指此事。现在接受法律制裁者称“服刑”，典出于斯。

“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见《翼方·中风下》）。华佗治曹操头风，诊脉后谓：“大将军头上虽无伤痕，但必然受过创伤”。曹操一加回忆，确在讨伐吕布时，为擗木撞击，佗乃为之针灸。

历代医学文献中，例喻史乘掌故，没有过一部比两部《千金方》的多。因为在文章中采用些故事来陪衬、烘托或譬喻要比挺笔直书来得内涵深、神韵足、回味隲，而且更能说明问题。这也可以显示出孙氏的文学根基。

《楚辞》16 篇，东汉·刘向辑战国时楚人屈原、宋玉、景差……等人的著作而成。

颖河，在河南省登封县西南。

凡山的南称阳、北称阴。江河的南称阴、北称阳。

五刑，五种不同的刑法：一面上刺字、二割去鼻子、三截去腿、四割去生殖器、五杀头。

五、用文取字的巧妙达意而俱有根据出典

我们每读古人包括医学书在内的文献，常常感到十分费解，这是因为时代的不同而用词的迥异。而两部《千金方》更突出，这是因为孙氏广悉古典、精于文墨，在不知不觉中信手拿来的。例如：

《要方·序》“万物淳朴”的淳朴，是诚恳朴实。典出《晋书·刘弘传》“顷者多难，淳朴弥凋”。

《又》“大圣神农氏 愍黎元之多疾”。愍，忧虑的意思，典出《左传·昭公二年》：“吾代二子愍矣。”黎元的元，通玄，黑色。黎元的出典在《诗·大雅·云汉》：“周有黎民，靡有子遗。”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民曰黔首”，黔就是黑，也即玄或元。

《又》“立心不常”，立心根据《孝经·开宗明义》的“立身行道”伸展出来。常为伦常，取意于《管子·幼官》的“明法胜数，立常备能，则治”。

《又》“青衿之岁”，典出《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指青年学子而言。

《又》“蒙蒙昧昧”。典出《楚辞·宋玉九辩》的“云蒙蒙而蔽之”与《楚辞·屈原九章》的“日昧昧其将暮”。

《要方·大医习业》中“吉凶拘忌”。典出《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的“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拘束畏忌之意。

《又》“尽善尽美”一词，典出《论语·入佞》的“尽美矣又尽善也”

《要方·大医精诚》的精诚。典出在《庄子·渔父》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动人，是叩动人心，能及思想深处。

《又》：“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含灵包涵内蕴，灵是道德真诚。动物之中只有人类是能够涵蕴着道德真诚的，所以人类称为含灵。典出《晋书·桓玄传论》：“夫帝王者，功高宇内，道济含灵。”贼，是危害之意，巨贼当然是大害，典出《论语·先进》有：“贼害夫人之子。”

《又》“惟当审谛覃思”。审谛典出《尚书·大传略说》的“言其能行天道，举错审谛也”，为详审周密之意。覃思典出《汉书·叙传》的“辍而覃思”，深思。

《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会通玄冥幽微。”玄冥典出《庄子·秋水》的“始于玄冥，反于大通”，暗昧的意思。幽微典出《后汉书·崔骃传》的“穷至赜于幽微”。赜，幽深微妙的道理。

《要方·求子》：“付母之徒。”典出《公羊传·襄公三十年》的“不见付母不下堂”。是指贵族雇佣教育子弟的高级乳娘。

《又》“随情逐物”，典出《国语·晋语》的“厌述逐远”，意思为追逐以求。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撰。

神农氏，传说古帝名，古史又称炎帝、烈山氏。

《左传》又称《左氏春秋》，作者春秋时鲁人左丘明。

《孝经》18章，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各说不一，以孔门后学所作一说，最为合理。

《管子》24卷，旧题战国时齐人管仲所撰。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公羊春秋》，原30卷，今改为28卷。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著。

《又》：“染著坚牢”。引用汉·王符《潜夫论·务本》的“物以伍用为要，以坚牢为资”。意思即坚固扎实。

《又》“妄徇虚声”，典出《韩非子·六反》的“布衣循和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也徒有其名的虚名。

《要方·风毒脚气》：“自聘了了”。典出《南史·戴法兴传》：“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了了为聪明伶俐，明白事理。

《要方·七窍病下》：“药入肌肤中淫淫”。典出《楚辞·九章》的“望长楸而叹息兮，涕淫淫其若霏”。水在流淌，称淫淫。

《要方·诸风》“口欹”。典出《荀子·宥坐》的“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敬，中则正，满则覆”。歪斜不正称“欹”。

《又》“虽有补天立极之德”。典出《淮南子·览冥训》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要方·伤寒下》“嘿嘿欲眠，目不得闭”。典出《汉书·匡衡传》的“嘿嘿不自安”。言心烦意躁而不得安眠。

《要方·肝脏》“役用非宜”。典出《国语·晋语》的“国有大役”的役字，作“事”字来解释。

《要方·小肠》“多言而谩说”。典出《楚辞·九章》的“或谗谩而不疑”。谩，乱说乱道。

《要方·脾脏上》“肉极者主脾也”。典出《汉书·王褒传》的“人极马倦”。极是极度疲困。

《要方·肺脏下》“兴言于此”。这里的“兴”字应作“举”字来解释。典出《周礼·夏官》的“进贤兴功”。

《要方·肺脏》“微使淖”。典出《仪礼·少宰馈食礼》的“嘉荐普淖”。柔软。

《又》“剧荏便悁”。典出《论语·阳货》的“色属而内荏”。荏，虚弱内怯。悁，典出《战国策·赵》的“秦虽僻远，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忿怒。

《要方·大肠腑》“吸吸气上欲欬”。典出《楚辞·九章》的“云吸吸气上”。吸吸是描写浮动、飘荡。

《要方·膀胱腑》“名玉海”。典出《梁书·朱异传》的“玉海千寻，窥映不测”。是譬喻海水碧澄如玉。

《要方·丁肿痛疽》“忽起如蚊蚋啄”。典出《大戴礼·夏小正》的“白鸟者，谓蚊蚋也”。

《又》“堤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典出《管子·度地》的“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留”。

《要方·痔疮·恶疾大风》中称麻风病为“斯疾”。典出《论语·雍也》孔子称患有麻风病的伯牛谓“斯人也而有斯疾”。

《潜夫论》10卷，35篇，另叙录一篇。东汉时王符（85—163年）撰。

《南史》80卷，唐·李延寿等撰。

《淮南子》54篇，汉·淮南王刘安撰。

《仪礼》为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古称“礼”，对记言则称“礼经”，合称《礼记》。

《梁书》56卷，唐·姚思廉撰。

《大戴礼》，即经书。

《要方·解毒并杂治》“岂非在横也”。枉字典出《礼·月令》的“斩杀必当，毋或枉桡”。凡冤死称枉。横字典出《汉书·扬雄传》的“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是中间截断。故世人称冤屈不寿而死为横死。

《又》“大悬绝不及甘草”。典出《论衡·知宝》的“未必才相悬绝”。意为相差极远。

《又》“闲解”。典出《诗·秦风》的“驷马既闲”。意即熟练，或熟悉了解。

《又》“精华消歇”。典出《史记·天官书》的“车服畜座精华”。

《要方·食治》“含气之类”。典出《汉书·贾捐之传》的“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指赖空气以生存的动植物，持别是指人而言。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养性之都契也”的都契，新《辞源》解释为，“要义、要领”。但又谓典出《云笈七签》，则误矣。《云笈七签》是抄录于《要方》的。

《翼方·序》“安假悬衡之验”。按悬衡即天平称，典出《淮南子·说林》的“循绳而 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

《又》“检押神秘”。典出《汉书·扬雄传》：“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即规矩和法度。这里的意思是即使深奥的知识，也是在规矩和法度中产生，因之古今一切都可探讨得之。

《又》“譬輶輶之相济，运转无涯”一语，完全来之于《论语·为政》的“大车无輶，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一词。这里移植得十分巧妙。

《翼方·叙虚损论》“凡人不终眉寿……”。典出《诗·豳风》的“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老人常有超长的眉毛，俗称寿眉。故老年长寿称眉寿。

《又》“不异举沧波以注燭火，颓华岳而断涓流”。沧波，指大海。燭火是《庄子·逍遥游》的“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火炬的别名。颓是崩塌，见《礼·檀弓上》的“泰山其颓乎”。华岳虽然是泰山的别称，但在这里是泛指所有的大山。典出《礼·中庸》的“戴华岳而不重”。涓流指小溪，孙氏的意思是火炬经不起大海的水来灌淹，势必扑灭。小溪而用大山的泥土去覆盖，必然中断水流。

《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大膏药摩之，一日三四度，七日徹，或二三日徹，乃至七七日四十九日，名曰大徹。……不过两大徹、三大徹”的徹字，作剥去敷药的意思。典出《诗·豳风》的“徹彼桑土”。

《翼方·禁经·受禁法》“众人浩浩”。典出《书·尧典》的“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为形容水的波澜起伏地大动特动。

《又》“而我独嘿”。典出《史记·荆轲传》的“荆轲嘿而逃去”。嘿是无声无影的意思。

《翼方·退居》“役役随物”。典出《庄子·齐物》的“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言工作勤恳、不偷懒。《庄子·齐物》“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此之谓物化”。总之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徒然劳碌一场，到后来仅仅是一场幻境。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深奥的或出典一时没有找到的文字或辞目，如下：

“夺索”（见《要方·肾脏》）。

“生视邛脏”（见《要方·妇人方上》）。

“翻诈”（见《要方肾脏》）。

“秘秘”（见《要方·备急》）。

“挂发”（见《翼方·序》）。

“渴饮武都”（见《翼方·禁经上》）。

“营叠”（见《翼方·序》）。

“王相”（见《翼方·杂病下》）。

“趣”（见《翼方·杂病下》）。

孙思邈文学造诣极深，所以两部《千金方》中取词用字，绝非一般人士所能出之。我们要把两部《千金方》的文章风格细细咀嚼一下，可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完全以华丽的文藻写成，工力淳厚来取胜，以两篇序文作代表。

第二，论述方面的，并没有加以润琢，都系信手取来，一挥而就的。但文学的结构精练，更其是取用单字、词目都相当贴切，往往常在有意无意中插入古典或古人警句来更好地表达其所言。而且这种穿插，非但不使人感到累赘，相反地更感到有红花绿叶、烘云托月的作用。包括两篇“大医”（即“大医习业”及“大医精诚”）在内的所有“论曰”及各节大小弁言，都属于此型。

第三，为叙述性的介绍方药、制法、用法及适应症。当然，这是不能在文字上用功夫而只能说得清楚、言得明确为要务。所以所占比率最多。

第四，为后人争议的道家之言，包括术语、符咒、符篆……等，所以文字内容也难免有无法理解的部分。

最后，感到孙氏这样的精于文字，却没有一诗一词留在人间，流传后世，是十分遗憾的，而且诗在唐代最为盛行的时代。是否当时的医家都不写诗词？并不。在孙氏之前的陶弘景有“胡笳曲”等五绝四首、“告逝篇”五古一首和“寒夜怨”词一首。在他之后的陆贽有“禁中春松”等三首五古。林亿有“题招提院静照堂”五律一首。苏颂有“阳关图”七绝一首、“赠同事阁使”五律一首及“献文潞公”等七律三首。我敢这样说，孙氏不可能不写诗，不过失传而已。

陶弘景（452—536年），字通明，梁·丹阳旌陵（今南京市江宁县陶家诸）人。曾在茅山隐居修道，后人尊称为贞白先生。撰有《神农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补阙肘后方》……等。

胡笳曲等五绝四首，为“胡笳曲”“和约法师临友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及“题所居壁”四首。

告逝篇，为五古，共10句。

寒夜怨，共11句。

陆贽（754—805年），唐·浙江嘉兴人，乃儒而精医者，著有《陆氏集验方》50篇。

禁中春松等三首，为“禁中春松”、“赋得御园芳草”及“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三首。

题招提院静照堂金诗，为：携李湖山外，招提烟霭中，静由诸漏尺，照觉万绿空，马祖传怀海，牛头住法融，谁来访宗旨？现定即家风。

苏颂（1017—1101年），字子容，原籍晋江，后徙居丹阳。著有《图经本草》21卷。

献文潞公等七律三首，为“即席献文潞公”、“次韵葛大卿留题寒光阁”和“和右仆射刘公莘大夜直中书省见寄之什”三首。

六、儒家思想

（一）掌握要领，本立道生

上面谈的都是在文学修养方面，这里探讨的是思想。

孙氏在医、儒、道、释四家中，当然以医家为主，三者为宾。在思想方面，以道为主，儒居其次，释家方面仅仅有方外之交而已。

他在《要方·大医习业》中就谓“不谈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考《诗》《书》是孔子删的，《礼》《乐》是孔子定的，《春秋》是孔子作的，所以五经是儒家经典，这说明孙氏对儒家之教已掌握要领，抓住核心。

“大医习业”，是培养和造就医学人才，而且还要求具有德才兼备的合格医生。很显然全文中强调读《内经》，旁及“周易六王”，是解决业务技术问题。“不读五经”就“不知有仁义之道”，这是解决思想品德问题。也就是孙氏以“医”和“道”为体，以“儒”为用的中心思想。有了医技与医德，然后培养出来的医生，就可以“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了。孙氏所以把这个问题置之于全书第一篇中，说明他的重要性。

《翼方·本草上·论曰》：“使忠臣孝子忿遽之际”。（见卷二）在方技医书中出现“忠臣孝子”，是少见的。这就证明孙氏对儒教事君以忠、事亲以孝的思想深铭五中的流露。

《要方·大医精诚》：“自衡功能，谅非忠恕之道。”除了忠孝之外，恕也是儒教核心之一。同时也反映出《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儒家思想。

又如“夫四德者，女子立身之枢机”（见《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四德，为儒家强调女子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终身克守、不可违叛的礼教。

考儒教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以忠孝节义信为具体行动，强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在他们心中一切仁义忠信的化身，就是尧舜文武。现在《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的“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斯盖文王胎教者也”。很显明地提示孙氏对儒教深入的信仰，不知不觉中在“为心声”的语“言”中流露出来。

《要方·妇人方上》屡屡提到“以贻后嗣”、“有绝嗣之殃”、“断绪”等语。从语气中看出孙氏对绵延后代的思想，远远超过了祛病保健之上。这显而易见，是接受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见《孟子·离娄上》）孔孟之教的必然后果。他对无后的儒家思想，就从这几句话中，即曝露无遗，谓：“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代之基，圣人设教，备论阙旨”（见《要方·妇人方上·教子》）。

（二）一步一趋

孙氏毕竟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泡浸在儒家怀抱里，纵然以道教为主要信仰，但他的一言一语，基本上都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或执行者。且看：

《乐》即乐经，六经之一。今文家谓乐本无经，只是附于诗经的一种乐谱。

《春秋》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为编年体史书，六经之一。

尧舜，指远在部落联盟的首领唐尧与虞舜，孔孟儒家认为是圣明之君。

文武，为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合称，儒教也把这两人奉为圣人。

“白首之年，未尚释卷”（见《要方·序》），“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论曰》）。这都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见《论语·里仁》）的具体执行。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见《要方·序》），这是完全无缺的反映出孔孟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见《孟子·尽心下》）的思想。

“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见《要方·序》），又是儒家“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见《孟子·梁惠王》）的思想。

“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忽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见《要方·大医精诚》）这又与《论语·颜渊》的“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出于一辙。

“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见《要方·大医精诚》）。这完全是《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也。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同一思想。孙氏的用死不用生，更是十足的“远庖厨也”。

“但发惭愧悽怜优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见《要方·大医精诚》），孙氏用一个“发”字与“念”字，落在一个“意”与“心”字之上，把儒家的“内省不疚”（见《论语·颜渊》）思想描写得入木三分。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见《要方·妇人方上·养胎》）。完全照录于《论语·乡党》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见《要方·治病略例》），“各承家伎，便为洞达”（见《翼方·禁经上》），孙氏不嫌其烦地屡屡批判那些医生，不想博采众长，仅仅抱残守缺地坚持一己之得。这种思想的根源，来之于孔子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见《论语·为政》）。周是普遍，比是偏向。纵然一为学术，一为行动，但其原理则

《要方·序》：“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孙氏认为医生治病，不论亲近的、疏远的、亲戚、路人甚至国外人士，都要一视同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过是前后次序问题，与这一视同仁并不矛盾）。与“子曰，有教无类”（见《论语·季氏》）的思想完全一致。总之，孔子的教育人才，是“有教无类”，孙氏治疗病人，也是“有治无类”，是同一个思想。

“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要方·大医精诚》），就是《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

孙氏提到天人合一方面，两部《千金方》各有一处：其一是《要方·治病略例》的“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其二是《翼方·养性》的“人生天地气中，动作喘息，皆应于天，为善为恶，天皆鉴之。人有修善积德而遭凶祸者，先世之余殃也。为恶犯禁而遇吉祥者，先世之余福也”。这两个天人合一，前者为不折不扣的以《内经》作中心思想的医家天人合一学说，就是把人体本身的五脏六腑、

皮肉筋骨统一之外，还要把人与人周围环境也统一起来，为医学所利用。例如“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见《要方·治病略例》），可以证实是唯物的。后者为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学中封建神学体系的天人合一学说。自《易经》开始，就孕蕴着这个思想，之后在不知不觉之中与儒学接触而互渗，子贡也说过这样含有天人合一思想的话，谓“固天纵之将圣”（见《论语·子罕》）。直到董仲舒而开始完整了这个体系。董仲舒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气”与“天人一也”之间的关系，认为是：

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见《对贤良策》）。

所以孙氏后面的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唯心主义思想。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非评议唯心与唯物，不过用以证实孙氏的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

在《孟子·离娄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之下，所以孙氏在两部《千金方》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像“以貽后嗣”、“绝嗣之殃”、“断绪”、“妇人绝嗣不生”（以上见《要方·妇人方上》）、“况乎身灭覆宗之祸”（见《翼方·退居》）等咒咀无后绝嗣的口气。

《要方·养性》“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已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则道德之枯也”一节，与《孟子·尽心》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完全同一个思想。也可以这样说，孟子是“人性本善”思想的创导者，孙氏则利用这个“人性本善”学说来引进到养生保健领域里来。

孙氏除了对宫禄毫无兴趣，对钱财也十分漠然，这是《孟子·梁惠王》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思想的体现。

从来在纸上写写、嘴上说说是方便得很，慷慨陈词，也何难之有，主要是实际行动。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淳熙秘阁续帖》有“芎藭不宜滋补，下白，纳下，粟米一石，资饮啜也。思邈”。这20字有力地证明孙氏把小米一石，赠予贫苦病人作饮料或煮粥充饥。虽然仅仅一石的粟米，能值几文钱，但以清贫的孙氏来说，却并非一个小事了。这也完全是“仁”的表现。他有这样的事实，但在自己写作中一言未及，更显示出真的是《论语·学而》的“不患人之不己知”。

《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赴（原误作起）”。又“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前者孙氏在乱世时隐居太白山，后者为治世时进京称臣于太宗，完全符合《论语·泰伯》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而且孙氏还把这种思想引进到医学方面来，谓：“又须审候与死人同状者，不可为医。与亡国同政者，不可为谋。虽圣智神人，不能活死人、存亡国也。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凡愚人贪利，不晓于治乱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汉广川人。他讲学著书，推尊儒教，仰黜百家，著有《春秋繁露》等书。

子贡，孔子得意弟子，姓端木，名赐。

存亡，危身灭族，彼此俱丧，亡国破家，亦医之道也”（见《要方·针灸上·用针略例》）。

倍受后人指责的《要方》中没有仲景学说的伤寒。只有叶梦得体谅他的“独伤寒未之尽，以未尽通仲景之言，故而不敢深论”（见《避暑录话》），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在撰写《要方》时没有见到《伤寒杂病论》而无法研究，从他的“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一语中完全可以证实。待《要方》脱稿后孙氏已111岁时，才得到《伤寒杂病论》而开始研究，所以在《翼方》中把伤寒发挥阐明得淋漓尽致。其《要方》中不予深谈，就是孙氏不敢把没有发言权的理论强加发言，这是孙氏“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见《论语·为政》）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他对发展多种方法的综合性治疗，也正是接受了孔子“君子不器”（见《论语·为政》）的启迪。

（三）无意中流露出的儒家思想

两部《千金方》中引用或受影响于孔孟的，除明白指出的“孔子曰，思无邪”（见《要方·养性·道林养性》）之外，还有不少是儒家的。如：

“降志屈节”（见《要方·序》），乃引之于《论语·柳下惠》的“降志尊身矣”。

“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见《要方·平脉》），就是把《论语·里仁》的“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是”改为“医”。

“剧荏例便愒欲死”（见《要方·肺脏》），乃引之于《论语·阳货》的“色厉而内荏”。

“此皆入人四体”（见《要方·丁肿痛疽·丁肿》）、“四体无令自安”（见《要方·丁肿痛疽·发背》），皆引之于《论语·微子》的“四体不勤”。因为中医术语中始终没有“四体”之名。

以上罗列的都似乎仅仅在文字方面，未必涉及思想。但思想而不是儒家，他也不会青睐于一部《论语》而读之熟透熟透的。

儒家教育内容，就是《五经》或《六经》。在两部《千金方》中除了明确指出“礼云”、“易曰”、“诗云”、“传（指《春秋》）云”之外，更有未加指名的引用《六经》者，比指名的还要多。如来之于《易》的，有：

《要方·序》的“探赜索隐”，就来之于《系辞上》里原封不动地照录。

《要方·序例·药藏》的“安不忘危”，直接取于《系辞下》的“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的“夫四德者”，就是《易》经以元亨利贞为四德的四德。

《又》“立身之枢机”，就是来之于《系辞上》的“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要方·丁肿痛疽·凛疽》“多恻恻然痛”，来之于《易·井》的“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要方·食治》的“然后命药”的“命”字，用得很神。考上级（包括

《伤寒杂病论》16各。东汉·张仲景撰。

《六经》，即《诗》、《书》、《易》、《乐》、《礼》、《春秋》六部古典文献。但以《乐》是附在《诗》中，不独立成书，故改称《五经》。

古代的上帝或帝王)给予下级东西者称“命”。来于《易·师》的“王三锡命”。

《翼方·序》的“全生之德为大”。来之于《系辞下》的“天地大德曰生”。

《翼方·禁经上》的“玄黄肇判”。来之于《易·坤》的“天玄而地黄”。

《又》“穷神极智”。来之于《系辞下》的“穷神知化”。

此外,还有“易曰,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

“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

“易称,积山以成大”(见《要方·序例》)。

引之于《书经》的有:

《要方·序》的“三才肇基”。来之于《书·武成》的“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又》“钦望巫祝”。来之于《书·盘庚上》的“不匿厥指,王用丕钦”。

《要方·热痢》的“弘之在人”。来之于《书·君牙》的“弘敷五典”。

《又》“但使药与病源,的相主对,虽剧但服”,它的意思完全与《书·说命上》的“若药弗瞑眩,厥疾弗廖”相同。

还有引之于《礼记》的,有:

《要方·序》的“孜孜汲汲”。来之于《礼·问丧》的“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勿谓暗昧,神见我形,勿谓小语,鬼闻我声,……为善为恶,天皆鉴之”的一节,是在阐明《礼·大学》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还有来之于《诗经》者,如:

《要方·序》的“德逾于此”。来之于《郑风》的“无逾我墙”。

《要方·序例》的“诗有、厥初生民”。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的“断绪”。考绪字常常借用为世业或宗祧来解释。来之于《鲁颂》的“玉于文武,缵太王之绪”。

《要方·肝脏·脉论》的“招招如揭竿”。来之于《邶风》的“招招舟子,人涉邛否”。

《要方·胃腑·痼冷积热》的“有声泱泱然”。来之于《小雅》的“维水泱泱”。

《要方·肺脏·肺脏脉论》的“任物之精也”。此任字作胜任负担讲,来之于《小雅》的“我任我辇”。

《又》“萋萋枝条”。来之于《召南》的“维叶萋萋”。

《要方·肺脏·肺痿》的“三焦踟蹰”。考踟蹰用在这里,作为逗留或徘徊不前的意思,来之于《邶风》的“受而不见,搔首踟蹰”。

七、小 结

孙氏儒家思想，纵然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的反映，其实还没有道家那样的突出。因为历来你要学医业医，势必读书识字（一技之长的医生，不在此例），你要读书识字，就是《四书》《五经》，所以你读书博学了，学医也成就了，而孔孟之道的思想也就捷足先登地领占了你的脑子里每一个空隙，而且是根深而抵固。即使此人以后还要学道学释、学庄学墨，但早已先入的东西总难泯灭。孙思邈既然是“七岁就学，日诵千言”的《四书》《五经》，“通百家说”的学者，当然应该有儒家的思想，此其一。纵然孙氏著作字里行间，儒家气息十分浓厚；但始终没有能力来插手于医学理论里来。再说得肯切一些，儒教思想没有渗透到技术性中间来，充其量仅仅使用于医德等不是医学技术的核心圈里。而道教方面呢？不论是生理的、病理的和更重要的治疗手段，这道教思想像影子一样地伴随传统医学理论而并驾齐趋，此其二。《要方·大医习业》中，先“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后“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以儒家来说《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而孙氏把“易”拿出来独立门户，与“六壬”为伍，把《五经》改为诗、书、礼、春秋，这是独尊《易经》，因为《易经》是偏向于道。而且文字的先后次序也是先道而后儒，此其三。

医者，技术是才，作风是德，德才必需并茂。儒教思想能在医德方面可以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有了德，就可以纯洁思想，指导出纯洁的医疗作风，谁谓这个儒家思想，在孙氏身上不是重要的。所以孙氏在思想方面，还是当之无愧的是鸿儒。

至于在文学方面来称为鸿儒，肯定也没有人来否定、异议或反对的。

《四书》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读物。都为儒教的经典著作。

第四章 居士

一、佛教

佛教，在佛门应称为佛法。法是一切事物的意思，也就是宇宙万有。创始者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王太子释迦牟尼（约公元前 565—前 486 年），与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老子（？）同时。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创始、基本上在同一时代里。

他们是各立门户，各有宗旨。但在隋、唐之际，除了儒与道本来就有血统关系——主要在《易》之外，道竟然也与佛相互渗透（后有详述），儒与佛也趋向容洽起来。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是当 12 世纪到 19 世纪一段时间里，佛教在它的发祥地印度，竟然销声匿迹到消失的地步。幸而斯里兰卡将它保存下来，经过漫长的 700 年之后，再反馈于印度。还有传入中国的一支，确也一直绵延到今天，更其是

西藏。

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 272—前 226 年）同一时期

的秦始皇（公元前 259—210 年）时代，已有天竺（即印度）的沙

门 室利房等 18 人来到我国咸阳 传教。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支国 国王使伊存来长沙，口授佛经给博士弟子景卢。

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者 12 人，前往天竺访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迦叶摩腾 与竺法兰 两位高僧应邀来洛阳，并携来佛

经与佛像。翌年（68 年），在洛阳雍门外三里御道南建立起中

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并在此把带来的佛经翻译为中文，内有《四十二章经》等。这是第一部由梵文直译中文的佛经，为中国早期佛教基本经典著作之一。佛教的传入，虽早在秦王朝，但作为一个宗教并得到政府承认崇信者，乃从东汉明帝（58—75 年在位）时算起。张衡 在《西京赋》

阿育王，又译阿迦迦或阿输迦。意译为“无忧王”或“天爱喜见王”。印度 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他主持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事务，特别扶植佛教，甚至奉为国教。

沙门，为梵文音译“沙门那”的简称。意译为静态、息恶、修道。原为古印度反婆罗门教思潮各个派别出家者的通称。在中国别统称和尚。

咸阳，古秦地，今陕西省长安东之谓城故址。

大月支国，为古代月氏族建立的王国，今在伊犁河上流。

迦叶摩腾，为中印度人，当时是一位有道行的西域高僧。

竺法兰，也是中印度高僧，他与迦叶摩腾同来中国。在白马寺与迦合译《四十二章经》。迦死后，他又单独译了《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华藏经》、《佛本行经》……等佛经。

白马寺，建于河南省、洛阳市东 10 公里，因当时用白马把西域佛经驮来，故称白马寺。保存了 1900 年之久。山门东西两侧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的坟墓。现设有“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衡（78—139 年），东汉·南阳西鄂人，字子平。精通五经、天文、历算、机械、制作，为一名大科学家。

中已谈及到“桑门”（即沙门），可以证实在那时的佛教已渗入了儒家大门。的确，佛学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博大精深，义理幽玄，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更其是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钟爱。也有被纯粹地为着文学目的而研读者，例如古代有名人物陶渊明、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丁福保、梁启超……等，都与释氏有缘，甚至鲁迅也在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了印度僧伽斯那的《百喻经》。所以孙思邈的研究佛学，毫无奇怪之处。但总觉得孙氏对佛学的研究和造诣，远远不及道教。且看孙氏在道教方面的一言一语，都可分析出是出于那一宗那一派的，而在佛教方面，就无法追究其出处。不过凭旁证观察，可能还是接近于律宗三大派之一的南山宗。

从此起，佛教在中国，就迅速兴旺起来。主要反映在中国本土的为高僧辈出、西域番僧也不断地频来传教以及佛经的输入、翻译及著作。当时中国高僧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门领袖。他曾派遣

《维摩诘经》，为维摩诘的说经，由秦罗什译成中文。维为辅释迦教化的菩萨。唐王维，就以他的摩诘为字。名与字联起来即维摩诘。

《法华经》为《妙法莲华经》的简称。经中“法师品”谓“是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经中“同安乐行品”谓“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佛经的“品”，相当于我们的“篇”或“章”。

《楞严经》全名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由唐般刺密帝译成中文。内中精神是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萨妙明元心。心精偏因，含里十方。众生不明性净妙体，故而流转生死。通过由低至高的修行阶次，达到方尽妙觉，成无上道。

陶渊明（365—427年），名潜，字无亮，晋·寻阳人。曾为彭泽令，因不能“为丑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

王维（701—761年）。唐·太原祁人，字摩诘。人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晚年茹素长斋。

白居易（772—846年），唐·太原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唐代大诗人。

柳宗元（773—819年），唐·河东人，号子厚，曾任柳州刺史，故人称柳柳州。诗文皆工，尤擅长散文。

苏东坡（1036—1101年），宋·眉州眉山人，名轼，字子瞻。贬谪黄州，筑室于东坡，固自号东坡居士。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丁福保（1874—1952年），字仲祐，江苏无锡人。除著有不少医学书籍外，尚著有《佛学大辞典》《文选类诂》等。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与师康有人称“康梁”。

鲁迅（1881—1936年），中国现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百喻经》全名为《百句譬喻经》，共四卷。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求那毗地译。全经采用寓言譬喻形式，用100个（实为98个）事例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一部佛经中的文艺作品。

道安（314—385年），东晋高僧，为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主要代表。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12岁出家，著名弟子有慧远、僧睿、昙翼、法遇、慧持、慧永、道立……等。

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法。也是我国第一个制订佛门的清规戒律者。由他整理了已译的经典，总结出一套翻译佛经的工作经验。并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佛经涤讪了良好的基础。

西晋·惠帝时（291—306年）僧人帛远译出《惟逮菩萨经》，疏注了《道楞严经》。当时有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论》以贬低佛教，帛即予以还击，争论十分激烈，也是一场佛与道两教论战斗争之一。

东晋，高僧慧持，当时西域们伽罗叉译的《中阿含经》，就是经过他审阅的。

孝武帝·大元三年（378年），道安和尚进长安，从此在佛门贡献了伟大的事业。太元九年（384年），认为善人死后可往生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说的慧远和尚，转辗而居庐山的龙泉精舍，创立“白莲社”，弘扬这个“净土”学说，故而后人尊他为“净土宗”的始祖。安帝·隆安元年刘义熙九年（397—413年），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大规模的全面系统翻译了包括《十诵经》在内的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经典。同时克什尔高僧佛陀那舍又译出了法藏部的《四分律》。斯里兰卡高僧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娑》……等。还有中国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鬼……等从长安出发经西藏至天竺，历14年遍游30余国，搜集大量梵文佛经，于义熙九年（413年）归来，后又与天竺僧跋陀罗禅师共译出经、律、论六部，24卷，百余万字，撰成《佛国记》。安帝义熙十四年至刘宋·武帝永初二年（418—421年）佛陀跋陀罗译出《大般涅槃经》。

刘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昙无微译出了《大集经》等十部佛经。

以“博事名师，广求经诂”有名于佛门的智严和尚在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与宝云共同译出《华严经》。宝云又个人译出了《新无量寿经》等名

鸠摩罗什（344—413年），父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翻译大量佛经，有弟子3000多人，其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称为“什门四圣”。

帛远，又作白远，字法祖，俗姓万。当时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以攻击佛教，帛远与之辩论佛道邪正以捍卫佛教。

王浮，为西晋时有名道士之一。他认为老子与关尹喜西出流沙，化为佛，佛教即由此而兴起。该说当时有一定影响，为道教攻击佛教和贬低佛教的主要根据。

慧持（337—412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附近）人。18岁出家，有弟子道弘、昙兰……等九人。

伽罗叉，一作伽提婆。

慧远（334—416年），东晋高僧，俗姓贾。

克什尔，现在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杰卢姆河流贯境内。

佛陀那舍。（待考）

佛陀跋陀罗，（359—429年），中国名觉贤。

法显（337—422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人，3岁出家，20岁受大戒。

《佛国记》一卷，又名《历游天竺记》或《高们法显传》。内容为记述历游西域的情况。

昙无讖（385—433年），中印度高僧。初学小乘，后学大乘，西域人尊为大咒师。

智严，生卒日无考。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人，为晋宋间高僧。

宝云（376—449年），与智严同乡。少年出家，勤于治学。从东晋隆安初年（397年），云游西域诸国，瞻礼佛迹，遍读梵书，精于天竺诸国的音字古训。

经。

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罗来中国，到广州。文帝派人迎至建康，历住祇园寺、东安寺。在此期间译出《楞严经》。北魏·皇兴元年（467后），起造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造释迦立像，高43尺，用铜10万斤、黄金600斤。正兴三年（473年），沙门慧隐和尚造反。

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即北魏·永平元年，菩提流支来华，住洛阳永宁寺，用四年时间到天监十一年，也即魏永平五年（512年），译出了《十地经论》、《金刚般若经论》等39部佛经。

鸠摩罗什弟子道生，撰有《二谛论》……等五部佛经著作，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己写的佛经。

当时还有一位高僧道流，撰写《河西经录》等四部佛学著作，未成而卒。后由道祖续写完成。

梁，以面壁九年悟道而名闻于世的达摩禅师，从天竺经广州到嵩山少林寺，带来了“禅宗”。

智藏、法云、与僧旻，并称为梁代三大法师，在佛教上都起到极大的影响。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在京都洛阳普查，当时有寺庙1367所。各地有三万余，僧尼200万人。

以上都是孙氏出生的前夕佛教动态，所以孙氏一入尘世，就有与佛门接触的广泛条件，更其是大量佛经著作是供孙的例览、诵读与研究。

《华严经》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该经认为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一微尘映世界，一瞬含永远。宣扬“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

《新无量寿经》，考《无量寿经》为净土三部经之一，或谓为三国·魏康僧凯译，这是原梵文的第二次译本。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高僧，属婆罗门种姓，翻译佛经达100余卷。

《楞严经》全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近代有人疑为汉人所作。

菩提流支，天竺高僧，来中国后，备受朝庭礼遇，尊为“地论师”。为相州北派祖师。

道生，为“什门四圣”之一。巨鹿人（今河北省平乡县）人，俗姓魏。

《二谛论》，全书讨论“俗谛”与“真谛”。前者为“迷情所见世间之事相也”；后者为“圣智所见真实之理相也”。

道流。（待考）

道祖（347—419年），东晋高僧，苏州人。

达摩禅师（？—528年），全名为菩提达摩，南天竺高僧。后遇慧可，授以《楞伽经》。

禅宗，以禅那为宗，故称禅宗。禅那又名思维修，内容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原为三学六度之一，其特点是静坐默思，发明佛心。禅宗初祖即达摩。

智藏（458—522年），南朝·梁高僧，俗姓顾，苏州人。为定林寺僧远弟子，精于佛教的经论及戒律。

法云（467—529年），俗姓周，宜兴阳羨人，七岁出家。曾撰有《成实论义疏》42卷，故后人奉为成实宗论师。

僧（467—527年），俗姓孙，吴郡富春人。以能言善辩著称。

二、孙思邈时代的佛教动态

凭着这股趋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繁荣昌盛,在孙思邈从出生(541年)到羽化(682年)的141年中,还是如此在发展。虽然在佛教史上有四次毁灭佛法号称“三武一宗灭法”(446年北魏武帝灭法、574年北周武帝灭法、845年唐武宗灭法、955年后周世宗灭法)的毁佛事件,孙氏亲身遇到了一次(574年北周武帝灭法)。

当孙氏在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出生后翌年(542年),一位《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渴》作者并在梁大通年间(527—528年)曾向道家名医陶弘景讨教过道教真谛的高僧昙鸾 圆寂。

当西魏·恭帝元年、二年(554—555年)孙氏13、14岁时,又有两位高僧解脱。其一为中国第一部佛教史《高僧传》作者,并撰有《涅槃义疏》、《梵岗经疏》的慧皎。其一为《大乘广五蕴经》、《大乘中观论译》等五部佛经作者安慧。

当北周武成二年(560年)孙氏19岁时,高僧僧稠 逝世。他在佛门中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撰有《止观法》讨论“系心缘级谓之止,分别深达谓之观”的禅理之作。

当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孙氏26岁时,武帝宇文邕,开始还是崇佛尚道。时有还俗沙门卫元嵩其人者,上书建议“省寺减僧”,意即裁减寺庙和僧侣。书中有:“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治”等语。武帝十分赞赏这个建议,从此直到建德二年(573年)的七年中朝庭七次召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争议三教的益害。今后第二次“毁灭佛法”之祸,即伏于此时之萧墙。

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孙氏33岁的5月,朝庭召集僧道于京师,当众痛斥佛教邪佞不净。同月15日下诏禁止佛道两教,捣毁佛像,焚烧佛经,强迫沙门、道士200万人还俗遣散。并下旨告于天下,谓:“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建德六年(577年)当孙氏36岁时,为陈·太建九年,北周灭北齐。周把北齐境内所有四万座寺庙观院没收,尽赐贵族王公们作宅第,勒令两教信徒还俗遣散。

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当孙氏37岁时,佛门历史上“周武帝灭法”事件,终以周武帝的崩卒而宣告结束。

隋·开皇元年(581年)孙氏40岁时,隋文帝杨坚(569—618年)定都长安,统一大业。召高僧信行入京,主持真寂寺(又名化度寺)。这样,佛

昙鸾(476—542年)又名昙鸾,为南北朝时高僧,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东魏孝武帝尊之为“神鸾”,时人称“肉身菩萨”。

慧皎(497—554年),南北朝时高僧,为浙江上虞县人。以“学通内外,博训经律”又精于史乘而被人尊为佛教史学家。

安慧(475—555年),为南印度罗罗国人,音译为悉耻罗末底。为唯识十大论师之一。系德慧的弟子,真谛的老师。

僧稠(480—560年),北齐高僧,昌黎(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人,俗姓孙,曾出任大学博士,28岁出家。《续高僧传》对他评价极高。

信行(540—594年),隋初高僧,三阶教创立者。魏都(今河南安阳市)人,俗姓王。《三阶位别录集》

教又从厄运中转向光明。

当开皇三年（583年）孙氏42岁时，高僧灌顶到天台山修禅寺拜智凯为师，直到智凯去世，未离左右。著有《法华玄义》等七部经书。

当开皇七年（587年）孙氏46岁时，朝廷把尚未竣工的大皇寺及其七级浮图，摧毁烧掉，但其原因，史册上没有说明，至今成为一“谜”。同年，避北周武帝灭法之难而隐居于江南建康、彭城的高僧昙迁，受文帝召而偕十位弟子入京，主持大兴善寺，开讲《摄论宗》道理，介绍印度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说，受业者达千余人。

开皇十年（590年）孙氏49岁时，文帝又召智正和尚进京，住胜光寺。并著《华严疏》。对华严宗的创立及发展，有很大影响。

开皇十二年（592年）孙氏51岁时，高僧慧远圆寂。考慧远和尚同名者有两人，另一为东晋时人，俗姓贾，早在孙氏出世前125年谢世。曾在庐山东林寺传法，并迎请伽毗罗卫僧佛陀跋陀罗从长安来庐山，共译《达摩多陀禅经》。在宣扬大乘般若学的同时，又提倡小乘禅数。这里谈的慧远是北周、隋初高僧，俗姓李，在开皇七年（587年）与昙迁同时被文帝召进京畿，住兴善寺，后移居净影寺。同年，彦琼禅师也被召进京，住大兴寺，掌译经事务。

开皇十三年（593年）孙氏52岁时，慧可和尚卒，享年106岁。隋文帝赐谥“正宗普觉大师”。

隋·仁寿二年（602年）孙氏60岁时，客岁（601年），诏全国建造舍利塔30座。命令慧远同时进京，住在兴善寺的昙迁至岐州，监造凤泉寺及其舍利塔。

隋·大业三年（607年）孙氏66岁时，高僧昙迁圆寂。

大业六年（610年）孙氏69岁时，有自称弥勒者匪徒数十人，入建国门闹事，夺取卫士武器，作乱。齐王暕路过，诛之。同年，日本和尚惠日、居士倭汉真福田来华留学，研究佛教经论。

大业八年（612年）孙氏71岁时，结识了道宣和尚。考道宣为律师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因常住终南山研究、宏传戒律，世称南

作者。

灌顶（561—632年），为隋·唐时高僧，原籍常州义兴（江苏宜兴）人，俗姓吴。后居章安，故又称“章安尊者”。

智凯（538—597年），天台宗四祖之一，实为创始人，故人称“天台大师”。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市）。

昙迁（542—607年）博陵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俗姓王。13岁时已视测《六经》，尤精《易经》，21岁出家，精研佛家诸经，隐居林虑山的净国寺。后应召入京。

智正（559—639年），俗姓白，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人，11岁出家。

慧远（523—592年）北周、隋初高僧，俗姓李。

彦琼（557—610年），赵群柏（今河北省、隆尧县西南）人，俗姓李。10岁出家，21岁入北周武帝内殿，陪侍讲《易经》、《老子》、《庄子》，任通道观学士。

慧可（487—593年）俗姓姬，初名僧可。洛阳武牢（今河南洛阳市东）人。

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南。

道宣（596—667年），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15岁受业，16岁落发。为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

山律师。后进京，一度主持长安西明寺，参加玄奘译场（专门翻译玄奘常用的佛经机构），负责润文。当时道宣方从智首 律师受具足戒后。之后道宣与孙氏同进京畿，又得相聚，成为孙氏唯一的方外之交、忘年之友。

当唐高宗·武德元年（618年）孙氏 77 岁时，高僧吉藏 被选为长安十大德统领僧众之一，住延兴寺。著有《中论疏》

《二谛义》等七部佛学文献。

武德四年（621年）孙氏 80 岁时，以捍卫佛教尊严出名的法琳 禅师，从此开始，展开了强烈的斗争以护法。就是这年，太史令傅奕（555—639年）上书请废佛教，指斥佛教是妄言轮回功德，愚民骗钱，且僧多寺奢，大量耗费国家财富，诱使军民逃役而“害政祸国破家，未闻益世”，“请胡僧佛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琳乃著《破邪论》以反驳。后有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来污蔑佛教，又有刘进喜者，著《显正论》以贬斥佛教，琳再撰《辨正论》予以有力还击。后贞观十三年（639年），道士秦世英，向朝廷诬告法琳的《辨正论》是“谤讪皇宗”。唐太宗大怒，下敕“沙汰僧尼”。并召琳辩对，判处死刑。

因《辨正论》中有“有念观音者，临刀不伤”一语，所以缓刑七天，令法琳念七天的观音，然后问斩，观察念观音者，真否临刀不伤？至七天后临刑，法琳谓“这七天中，不念观音，惟念陛

下”，唐太宗为法琳的才智折服，免去死刑。改为流放，到益州。但在发配途中病逝。

唐·武德六年（623年）孙氏 82 岁时，日本僧惠济、惠光来中国留学。同时留学在中国已 13 年的日僧惠日与居士倭汉真福田学成回国。

当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孙氏 86 岁时，华严宗初祖法顺，被召来京师，赐号“帝心”，从而后人尊为“帝心尊者”。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及《华严法界观门》。

同年，天竺波罗颇迎罗密多罗三藏法师，携梵文本佛经来华译为汉文。凡涉及律者，皆咨询于智首。

也是这年，孙氏以学者、医家和道家的身份，唐太宗也召请入京。并赐以爵位，孙氏坚辞不受，但从此即脱离了隐居而寄寓长安，直至羽化。

当贞观三年（629年）孙氏 88 岁时，玄奘法师 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新疆、中亚，到中印度摩揭陀国西域取经。

当贞观九年（635年）孙氏 94 岁，高僧智首圆寂，享年 68 岁。唐太宗敕令国葬。身前著有《五部区分钞》及《四分律疏》。

弟子有道宣、道世、慧满、道兴……等。

贞观十一年（641年）孙氏 100 岁时，高僧善导（613—681年），赴西

智首（567—635年），祖籍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人，俗姓皇甫。幼年在相州云门寺出家，22岁受具足戒。贞观八年，为太穆皇后在长安建立弘福寺。歿后，唐太宗敕令国葬。

吉藏（549—623年），俗姓安，祖先为安息（伊朗高原古国）人，故人称“胡吉藏”。为三论宗创始人。

法琳（572—640年），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捍卫佛教，不遗余力。

法顺（557—640年），俗姓杜，又称“杜顺和尚”，祖籍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18岁出家。

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本姓陈，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即以玄奘为模特。

姑藏，今甘肃省武威市。

河玄中寺，拜道绰（562—645年）为师。

当贞观十六年（643年），太宗派使者迎道信（580—651年）和尚入宫。信以年老不应召。后又派使者以暴力威胁，仍不肯应召，太宗为之奈何。其实道信此时仅仅为71岁，比孙氏还小31岁。

当贞观十九年（645年）孙氏104岁时，净土宗创始人之一道绰圆寂。同年，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历17年，行五万里，“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520卷，657部，胜利归来。住长安弘福寺，后迁大慈恩寺。从此即开始于20年间，开译场从事译经。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大般若经》、《俱舍论》等75部，1335卷。参与翻译工作者，有道宣、日本僧道昭（628—700年）、道世（？）、窥基（632—682年）……等许多高僧。同时律宗三派之一东塔宗创始人怀素也参予了译经工作。

唐·永徽元年（650年）孙氏107岁时，朝鲜僧义湘（625—702年）与元晓（617—686年）结伴来中国。半途遇雨，元晓陡然产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的魔障想法而携囊返国。义湘则一人来华。回国后，高丽王朝肃宗赐谥“圆寂国师”。享年77岁圆寂。

当永徽二年（651年）孙氏110岁时，禅宗四祖之一道绰圆寂。当圆寂之前，告弟子们谓“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言讫而逝。唐高宗赐谥“大医禅师”。当永徽三年（652年）孙氏111岁时，禅宗牛头宗鼻祖法融禅师，在建初寺，宣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世称其宗派为“牛头禅”。

当永徽四年（653年）孙氏112岁时，日本孝谦天皇白雉四年，日本元兴寺高僧道昭奉天皇命来华深造。

当永徽六年（655年）孙氏114岁时，日本僧惠日，再度来华。

当唐·显庆元年（656年）孙氏115岁时，西域僧那提三藏，经昆仑国来中国。

当显庆元年（657年）孙氏116岁时，高僧法融圆寂，有遗著《心铭》，弟子有智岩、道纂、道凭……等。

当显庆五年（660年）孙氏119岁时，留学八年的日本僧人道昭回国。以元兴寺为中心弘布法相宗，为日本传布法相宗之始。死后据其遗嘱火葬，为日本火葬的始创者。

当唐·龙朔元年（661年）孙氏120岁时，唐开国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奉敕为玄奘弟子的窥基和尚，在青年参加译场，负责主译《阿毗达摩界身足论》等几部重点经论。

当唐·麟德元年（664年）孙氏123岁时，玄奘法师坐化，享年62岁。

当唐·乾封二年（667年）孙氏126岁时，孙氏知友道宣律师圆寂。

当唐·咸亨二年（671年）孙氏130岁时，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义

怀素（624—697年），当时名怀素者有两，前者（624—697年），后者（725—785年），这里是前者的怀素。俗姓范，祖籍南阳，后迁长安。10岁出家，21岁时玄奘回国，即从玄奘学佛。从咸亨元年至永淳元年（670—682年）12年中写成了《四分律开宗记》等八部名著。

法融（594—657年），俗姓韦，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县西南）人。19岁即博通经史，入茅山依三论宗灵法师出家。曾于南京牛头山幽栖寺北岩立茅茨禅室，终日坐于石室中谈经参禅。因他住于牛头山，故换他的一派称为牛头禅。

昆仑国，今泰国。

净禅师 由海道往印度求法，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只林精舍等佛教圣迹后，到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佛教。历时 20 多年，游历 30 余国，于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 年）回国，那时孙氏已逝世了 13 年。

当唐高宗·上元元年（674 年）孙氏 133 岁时，智威和尚 在轩辕炼丹山的法华寺传教。手写藏典，昼讲夜禅。一时从者很多，内参禅者三百，听讲者 700 余人。他写的《桃岩寺碑》与《头陀寺碑》，文藻华丽，传诵一时。

当凤仪元年（676 年）孙氏 135 岁时，在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的慧能上人，在南海法性寺遇印宗 法师，智光 律师临台为授满分戒。翌年（677 年）挂锡韶州 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

当永隆元年（681 年）孙氏 139 岁时，高僧智威圆寂，享年 80 余岁。

当开耀元年（681 年）孙氏 140 岁时，高僧善导 圆寂。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 年）御驾西河玄中寺，拜善导为师，听聆讲经。生前著有《观无量寿经疏》……等五部著作。

以上佛教的乍盛乍衰，经常“晨为座上客，暮作阶下囚”者飘摇无定，苍狗白云，更其是“灭法”之灾，在孙氏的思想上无可避免地产生巨大影响，但孙氏从未卷入旋涡。可能他早已淡泊忘情，同时也证明他仅仅是研究而非归宗释门，当然不会挺身而出作卫佛的勇士。至于在孙氏羽化前的几年中事，对孙氏思想的影响已经无多大的激惹了。

义净（635—713 岁），俗姓张，原籍齐州（今山东省历城）人。

智威（？—680 年），俗姓蒋，祖籍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因久居法华寺，故人称“法华尊者”。

慧能（638—713 年），为禅宗南宗创始人，尊长“禅宗六祖”。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市西南）人。卒后，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曾为其撰写碑铭。

印宗，待考。

智光，待考。

韶州，今广东韶关。

善导（613—681 年），唐代高僧，净土宗实际创始人，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弟子不可胜数，被称为“弥陀化身”。

三、方外之交

根据文史记载中看到孙氏所接触过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他是末世避俗的隐逸之士一流人物，本来就是野鹤闲鸥、看云听瀑置身于尘世之外，既不是倜傥风流、诗歌酬唱的墨客骚人，更非周仁行义、燕赵悲歌的游侠之士，所以不可能有较多的朋友结交。

有案可稽的，只有一位，为道宣和尚，而且还是十分莫逆的。

《西阳杂俎》：“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但遍查佛门史书，未见有宣律者，据《宋高僧传》卷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谓：“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又查《中国人名大辞典》：“道宣，唐高僧，丹徒钱氏子。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居京师西明寺。与处士孙思

邈结交。持律坚定，号为南山律。乾封问圆寂。”再查《佛学大辞典》：“十六岁落发，隋大业中(605—617年)，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唐武德中(618—626年)，充西明寺上座。乾封二年(667年)十月三日寂，寿七十二。”

据以上文献所载，道宣的职称是律师。考当时佛门根据《涅槃经·金刚身品》的“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三德指归》再予以解释，谓“三师，谓律师、禅师、法师也。明练持犯曰律师”的精神，所以把能精通戒律的高僧称律师。至于和尚，乃泛指受戒过的佛门男弟子而称，也即所谓比丘。叶梦得把“道宣律师和尚”写作“宣律和尚”者实误，或抄写时鱼鲁虎帝所致。因之这里的宣律，应该是道宣律师。

道宣，比孙氏小55岁，为唐代高僧。隋·大业八年(612年)16岁时，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在唐·武德中(618—626年)驻锡长安西明寺。玄奘法师从天竺归来后，奉旨参加翻译梵文经书的译场工作。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

孙氏与道宣的交谊极为深厚，可从“议论终夕”一言中体会出来，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不同于一般之交。史书更以“林下之交”来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到了闲雅、旷逸与越脱的最高境界。

《西阳杂俎》又谓：“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从字里行间去咀嚼，他们之间没有深厚交谊，道宣是不会介绍推荐的。即使介绍，孙氏也不会接受的。

道宣在佛学与医学之间的瓜葛，是没法分清的。他奉敕参予玄奘法师翻译梵文佛经工作，鉴真和尚又是他一。脉嫡传的门弟子。关系是道宣弟子文

《宋高僧传》30卷，宋·赞宁撰。

《佛祖历代通载》22卷，元·临济宗沙门念常撰，广载佛教历史。

《中国人名大辞典》，陆尔奎等23人编著，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纂，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涅槃经》有大乘的和小乘的两种。属同本异译。

《三德指归》10卷，宋·孤山智园撰。

鉴真(688—763年)，为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俗姓淳于。14岁出家，天宝元年应日本邀请，东渡至日本，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台，传授戒法，为日本律宗始祖，卒于日本。

纲，文纲弟子道岸，而鉴真正是道岸的弟子。所以鉴真和尚的业务细胞里肯定含有道宣的生命现象中基本结构和功能的成分。

考道宣在唐武德间（618—626年）由终南山移居长安西明寺。孙氏在贞观元年（627年）比道宣后一步到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废宅寄寓，两处有多少距离，现在当然已无法考证得之，但两人再度相逢而近在咫尺是不容否认的。

他两人友谊的缔结，当然在道宣受具足戒之后挂锡白泉寺开始。两人年龄距55岁，这样忘年之交，在古代是常见不鲜的。开始两人都在终南山，可以朝夕相见。自贞观元年到乾封二年的41年中，两人同寓京师，当然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所以“议论终夕”，是完全可以的。

道宣既称一代宗师的高僧，禅理真缔与道德文章必然清高脱俗，加之医学知识，更是孙氏切磋问难的对象，有这种基础，才可以涤讪了他们之间真诚友谊。正因为这样深交，才相互作用的影响，也不属于一般了。总之，孙氏的朋友不多，或许仅仅只有这一位，但对他的业务、品德及思想的影响可不小。

文纲（636—727年），俗姓孔，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12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25岁开始讲经，30岁登台。弟子有道岸等50余人。

道岸（654—717年），俗姓唐，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少年好学，后即出家，拜文纲为师，坚修律义，深入禅慧，时称“大和尚”。

四、流露在两部《千金方》中的佛学思想

孙思邈与佛教，在正史中仅仅有《旧唐书》“兼好释典”及佛学史中道宣传记里提到的“与孙思邈处士，结林下之交”外，就没有可靠的资料，所以两部《千金方》才是可以反映出孙氏佛学思想的最好证据。也有人认为两部《千金方》吸收了“四百四病”学说，采纳了天竺国传入的方药、迦瑜功，不断地接受青婆治病方法，就作为是孙氏崇佛的依据，其实错了，这不过是在医学学术上的流交渗透，与佛学思想毫不相干。而且天竺是天竺，佛学是佛学，犹如用“中国”两字决不可以代表道教一样，天竺怎能等于佛学。而且耆婆是男性医师而绝非和尚。

考佛学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见《涅槃经》的“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幻炎”）、“无我”（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的实在自体。内又有“人空”，即“人无我”。说人的称为“色蕴”的物质世界与称为“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的精神世界，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与称为“法空”的“法无我”。说是一切法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主体）和“苦”（《佛地经》“遍恼身心名苦”，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凡是一切境界，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凡不合或不满足自己意趣感受，就能引起痛苦，这乃是苦。因为要合适或满足自己意趣的毕竟不多，而且今逃说这个事物合适或满足了自己的意趣，但明天这个合适或满足的要求又提高了，那末苦又来了。所以这个苦任何人都有，永远也不能不苦，所以称为“人生是苦”）。这种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全在于自身的“惑”和“业”所致。“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是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与“业”是因，是造成“苦”的果。因而也进一步必然的“善恶行为，轮回报应”。《要方·大医精诚》的“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无得似有所娱”。“食如无味”、“看有若无”等语，都是浸透了禅理这个思想。

《翼方·退居》的“若知进不知退，知得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于外。其于过份内热（热中之热）之损，胡可胜言。况乎身灭覆宗之祸，……”就是具体而形象化地描述和分析“苦”的种种。

要解脱“苦”，唯有依赖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字，用来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畴。这里的“经”是佛说的教法，“律”是佛法，“论”是佛门弟子论佛语、议法相，与佛相应者，用现代语来说是学习心得的记录。以上三者，合称“三藏”。“戒”是要学习如来佛能自我制身、口、意“三业”，称为戒法身，属“五分法身”中“一戒”。“定”是要学习如来佛的真心寂静，远离一切妄念，称为定法身，属“五分法身”中“二定”。“慧”是学习如来佛的真智圆明，观达法性，称为慧法身，属“五分法身”中“三慧”。在《翼方·退居·养性》的“以香沾之，身数沐浴，务令洁净，则神安道胜也，……自然事闲，无物相恼”，就是体现了这“一戒、二定、三慧”几个解脱一

切束缚来获得涅槃的精神思想。

在这里我们更不应该对孙氏“以香沾之”一语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见而不加深究。考“香”在佛门中号称“佛使”。因为焚了香、献了花在以“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及十小咒为内容的朝课与以“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阿弥陀经”、“礼佛大忏悔文”、“三皈依”等

为内容的暮课中不可缺少的礼节仪式。在《金刚经·持经功德分》中就强调：

“在在处处，若有些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花香，而敬其处。”理由是“香”可以通过一缕缭绕、碧篆青烟，把人的灵性通达佛的面前，使佛与人灵犀相通，一如使者一样。从这里的焚香以及把前后文章连贯起来细咀，更证实孙氏与佛学的紧密联系。

内“无物相恼”，在习惯上多为“相烦”。现在孙氏不写惯用的“相烦”而独取冷癖的“相恼”，正是因为袭用《佛地经》的“逼恼身心名苦”而得。

“定法身”是“五分法身”中主要的成佛功德法之一。《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中“无喜怒，无极视，无极听，无大用意，无大思虑，无吁嗟，无叫唤，无吟吃，无歌哨，无啼啼，无悲愁，无哀恻，无庆吊，……可无病长寿，斯必不惑也”，就是定法身中的全部思想。更必需一提的是“斯必不惑也”的“惑”字，已非儒之“惑”而是佛家之“惑”。因为儒家之“惑”的解释，是迷惑，例如《论语·为政》的“四十而不惑”。佛家之“惑”是烦恼，例如《百法明门论·忠疏》的“惑谓根本及随烦恼”。这里如其以儒家之惑来解释，则是无法说得通的。

六道轮回，也是佛教教义重心之一，而且即使教外人也大多知道。意思是众生在三界、六道中的去处，要凭你生前为善为恶的程度来支配。《法华经·方便品》“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总的一句话，是生前善行者升天为人，恶行者入地狱、饿鬼、畜生三道中去。孙思邈就把这个“六道轮回”学说贯彻到医书中来，如《要方·大医精诚》的“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有阳恶，人自报之，人有阴恶，鬼神害之。寻此贰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及《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示之以影，地不欺人，示之以响”。更其是两文最后两句话，完全是释家口气。

不少人把华严宗所立十宗之一的“一切皆空宗”，错误的认为佛教就是“一切皆空”，错了。假如真的一切皆空，那末在这样也空、那样也空、什么都是空的世界就什么也都没有了。什么也都没有了，势必干好事也可，干坏事也可，在糊糊涂涂中混生活，佛教的本身也没有了，还成什么世界！其实佛学中“空”的意义是有着最高深的哲学在内。诸佛菩萨，就是悟到空的真理而成为诸佛菩萨的。佛家的“空”字，绝非不是“虚无”。而是指事物的变幻莫测，指机理的空寂明净。所谓世界一切现象皆是因缘所生。乍生乍灭，俱在刹那之间，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独立实体。所以佛教的“空”，并非什么都虚无没有，相反、样样都有，非但不是消极而是相当积极的。且看他们的割肉烧臂的舍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为了拯救芸芸扰扰如在海中受苦的众生，本慈悲之旨，施宏大力来引渡到彼岸。为了别人甚至禽鲁的摆脱苦难，竟然还有过摩河萨埵舍身饲虎不可思议的故事，谁说是消极的。孙氏在《要方·大医精诚》中的“精勤不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就是这个精神。也正是为了这个积极因素的鼓励而孙氏更奋发图强的学习、读书、行医、著书立说来拯救与普渡众生。

《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内典（注：原文作经，是错误的。因为下

《金刚经》1卷，即《金刚般若密陀经》的简称。内容是讨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认为应该“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意思是对现实世界不应该执着或留恋。

文为‘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内经》没有这慈悲喜舍之说。《典》是佛门称佛学文献的总称，在佛门才有慈悲喜舍学说，而且还是重点所在。佛门也有《外典》一词，指的是不属于佛教的文献），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考“慈悲”为佛教常用术语，意思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喜舍”也是佛家术语，指用钱财或自己身上的活组织来救济他人的灾难，称“喜舍”，又称“净舍”、“净施”。其中“慈悲”一言，人尽皆知，而“喜舍”一词，鲜为人知，今孙氏信手拿来，可知孙氏对佛教的研究，已不是一般性的泛泛涉猎而已。

《要方·大医精诚》：“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佛学认为凡人做事，必须专心注一境而不散乱其神，然后可以取得准确的认识和作出准确的判断。“安”字，在佛学上的定义是“谓心，期待于某一点而安住于此，确乎不动也”。“定”字，为“定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所以他经常和“禅”联在一起而称为“禅定”。孙氏的“安神定志”，即佛家的“心一境性”。

《又》“不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思想。古天竺把人民分为四级，称四姓。一婆罗门、最高贵；二刹帝利、相当于中

国的绅士；三吠舍、为一般老百姓；四戍陀罗、为农奴、贱民。四姓之间，身价悬殊，地位绝对不同，相当不公平，更其是戍陀罗，最为下层低贱。所以佛教就提出“四姓平等”口号，孙氏的“普同一等”十分符合于“四姓平等”思想。

《又》：“……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畜贱人贵，……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考佛教有“五戒”、“八戒”、“十戒”，其中第一戒，就是戒杀生。

《又》：“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因果学说，也是佛教中主要理论之一。《观无量寿经》：“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佛门认为“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是为果而预设，果是由因而产生。它的特色，就是《瑜珈师地论》谓之：“已作不失，未作不得。”这种报应，是无法逃避的。孙氏这节文章，正是为因果学说再加一个肯定。

《又》：“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里的善，是指不违叛佛教教理而言，与恶相对。笼统地说，即《大乘义章》的“顺名为善，违名为恶”，顺理为善，逆理为恶”。再具体一些说，是指法相宗心所法之一，内有：信、惭、愧、无贪、无瞋、无痴、精进、轻妄、不放逸、行舍、不害。的确，人

《大智度论》100卷，天竺龙树菩萨撰，秦罗什译成汉文。

五戒：一不杀生戒，二不偷盗戒，三不邪淫戒，四不妄语戒，五不饮酒戒。

八戒：一不杀生、杀有情之生命也，二不与取、取他人不与之物，三非梵行、男女媾合也，四虚妄语、与心相逆之言说也，五饮诸酒、饮酒也，六涂饰鬘舞歌观听、身涂香饰花鬘、观舞蹈、听歌曲也，七眠坐高广严丽床上、坐卧于高广严丽之床上也，八食非时食、食非时之食。

十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华鬘好香涂身，七不歌舞娼妓、亦不往观听，八不得高坐广大床上，九不得非时食，十不得捉钱金银宝物。

《观无量寿经》又名《观无量寿佛经》或《观经》1卷，为净土三部经之一。弘扬西方阿弥陀极乐净土，无限美妙庄严。

《瑜珈师地论》100卷，弥勒菩萨说，玄奘译。

《大乘义章》20卷。隋·净影寺慧远撰。分义为五聚：一教聚，二义聚，三梁聚。四净聚，五杂聚。

们能够这样实行其善，是可以养性而健康。

且看《要方·大医精诚》中警句，不少是“十戒”的具体行动。例如：“杀生求生，去生更远”（一戒杀生）；“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四戒妄语）；“醞醖兼陈，看有若无”（五戒饮酒）；“纵绩罗满目，勿左右顾的”（六戒涂香饰鬢）；“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七戒不视听歌舞）“珍羞迭荐，食如无味”（九戒非时食）；“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十戒不得捉钱金银财物）……等等。

《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今有病者，有受人性依法”，完全是佛门语。佛有“法四依”学说，内容为“一行四依、二法四依、三人四依，四说四依”，这是第四款的“依法不依人”。

《要方·序例·合和》的“六根不具足人”。按《俱舍论》：“五根者，所谓眼、耳、鼻、舌、身根。”就是说眼为视根、耳为听根、鼻为嗅根、舌为味根、人为触根。再加上《大乘义章》“六根者对色名眼，乃至第六对法名意”的意根，也即是念虑根。考“根”乃罪孽根源，六根者六种孽根。孙氏这里的“六根”是代表着眼、耳、鼻、舌、身、意（思维）。“不具足”就是不完全。意指四肢、七窍甚至精神上残缺不全的人。所以此言，也完全出之于佛家。

《要方·养性》“百年之内，斯须之间”，是《俱舍论》“极微字刹那，色名时极少”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是《庄子·知北游》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当然也可以。至于他毕竟引用的是佛是道？只能起孙氏于地下，才能清楚。更有人说，这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翻版，笔者认为不然。因为《庄子》在战国，《俱舍论》的传入亦在孙氏在世之年，所以以上两书，孙氏当然读到。《春夜宴桃李园序》，孙氏怎能看到。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是之勿外缘”。外缘为佛家语，意指外面的各种刺激，与内因相对而言。典出《起信论》，谓：“用重习者，即是众生外缘力，如是外缘有无量义。”

《翼方·养性·正禅方》：“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怀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考四禅定，是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而成的四禅定。用佛家的话来说，是“一心考物为禅，一境静念为定”。也称四禅四定。总的意思是通过四禅定后，好的坏的都能了如指掌，自己也感到有接近于成佛的境界。考佛性的含意，《华严经·三十九》：“佛性甚深真法性，寂灭无相同虚空。”孙氏借用过来，是说明，使心境里归真反朴，心无邪念。

《翼方·辟谷·服水》“先发广大心，仍救三涂大苦，普渡法界含生”。在佛经里称“广大”者，意思是大的美德，广大心即美的心灵。三涂，即三途：其一为火途，为火所烧的地狱；其二为血途，为相互残杀之途；三为刀途，为饿鬼趣以刀剑杖逼迫之厄，这都属“苦境”。“法界”一，辞，在佛教里有很多的解释，用在这里则为泛指一切事物。例如《俱舍论》的“能持

《俱舍论》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30卷，为阿毗达摩的论说汇集而成的一部佛学著作。

《俱舍论》为玄奘所译，孙氏完全可以读到。

《起信论》全称为《大乘起信论》，天竺马鸣菩萨作。在中国有两种译本：一为梁·真谛和尚译本，作一卷。一为唐·实叉难陀译本，作二卷。

自相，故名为界，或种族义”。“含生”佛教指具有生命的东西，都称含生，这里当然是专指人而言。这一句佛学气息十分严重的句子，用现代语来翻译，是：首先发出美的心灵，拯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大众。

《又》“烧香礼十方诸佛”。这是禅门礼拜仪式之一，就是向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及上、下十个方向膜拜。这种膜拜仪式，只有佛教所特有。

《又》“上根之人，一服如甘露；中根之人，再服如甘露；下根之人，四服如甘露；极下根者，六服如甘露”。考“根”字在佛教里的解释，《俱舍论》上“根者是何义？最胜自在光显名根，由此总成根增上义”。就是说，根的意义是“能生”，具有促进增生、增殖作用的“增上”。如眼根生眼识，耳根能生耳识。又人性有生善恶作业之力，故也称为根性。所以上根、中根、下根、极下根者，是指根的厚薄、深浅之谓。

《翼方·退居·择地》：“……便可构居，若有人功，可至二十亩。更不得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在字面上看，似乎除了“烦”字之外，未感有佛教气息，但实质上完全是佛门语。盖佛家最忌“惑”“业”两字，惑中之“贪”，更为严重。孙氏极力主张不贪不惑。如其对身外物一加关心，已经开始不知不觉中坠入惑壑贪欲谷而不能自拔。因为“心迷前境，目为之惑”（引《探玄记》原文），如无身外之物，心当然不为之迷了。孙氏这节文章，实实在在饱含着《法华经》“诸苦所困，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的真谛。

《要方·养性》：“故患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考“修行”两字，即世间人专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意思。原出《庄子·太宗师》的“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之后，儒家也用，如《淮南子·诠言》“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但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此即为出家当和尚或比丘为修行了，《晋书·鸠摩罗什传》“为性率达，不拘小节，修行者颇共疑之”可证。但同与做好事不做坏事之说并行者，还有佛门的认为从因到果的功德，有“五转”阶段，第一转为发心；第三转为菩提；第四转为涅槃；第五转为方便究竟，这个“修行”，是第二转。

《翼方·退居·杂忌》：“诵言紧沙迦罗。”考紧沙迦罗，是佛经中人物，为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介乎人神两者之间的头上生角的人形怪物。孙氏而不精佛经，那能知道。

《要方·诸风·风痲》：“寻之即用。”考“寻”字，佛教小乘俱舍宗立一切法的第七十五，内“六不定地法”的第一，即为“寻”。它的意思是寻求事理，粗糙莽撞而不深入。

除此以外，两部《千金方》中引用的佛家言语也不少，如：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不能施化，施化无成”。典出《法华玄义》的“如来施化之意”。

《又》“阳施阴化”。与上同义。

《要方·小肠腑》“种种形相”。形，典出《无量寿经》的“国中人无，形色不同”。相，典出《华严经》的“无边色相，圆满光明”。形相用在—

《探玄记》全名《华严经探玄记》20卷，唐·法藏和尚撰。

《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18卷，为高僧鸠摩罗什译。

《法华玄义》全名为《妙法莲华经玄义》20卷，为法华三大经书之一。

起，即形体与色采。这里的形相，是说病人的精神状态与机体表现。其实中医方面对此的形容词也不少，而孙氏独独采用佛家语来表达，证明孙氏对禅门语言是十分熟悉的。

《要方·脾脏·脾脏脉论》“万物众色不同”。即众生色相。

总之，孙氏在医学方面的吸收佛教精神，最主要而又有益的思想是“舍身渡众”！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思想，更促使其工作的踏实与医德的崇高。

五、孙氏在三教中佛教思想最少

如其根据以上种种，认为孙氏是佛教中的虔诚信徒，那就错了。事实上孙氏对三教的信仰、研究与造诣，佛教所占的比例为最少。如其要加以说明，首先要观察、分析孙氏时代及其稍前一个阶段的儒、释、道三者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且看两部《千金》中言语，最多的当然为医学，次为道学，再次为儒学，佛学最少。如其没有印度医学的输入，则关于佛学方面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因为印度医就是建筑在佛学上的，犹如中医的建筑在道教上一样。孙氏的佛学气息，就在印度医学身上带了过来。或谓孙氏对因果学说言之殊多。但更知道因果学说固然如佛教中心思想中一个重要部分，但唐代民间也早已有因果学说了。在这里我们固然不可能说孙氏的因果学说来之民间，但也不能武断地说是直接吸收于佛教。

（一）来之以渐的三教互渗

三国时（221—280年），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来炫耀的名士，同开玄学风气。如何晏的《道德论》，王弼所疏注的《易经》、《老子》，都提倡“贵无”。认为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执政者“无为而治”，虽然如稽康等人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人还是维护着儒家伦理观念。所谓玄学，就是在虚无玄远的“清淡”中用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以代替式微滑坡的两汉经学。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援老入儒”。

东晋（317—420年），张湛在玄学中渗入了佛学，形成了佛学与玄学趋向于合流。也就是儒、道、释三者一体的学风。且看张湛的《列子注》，就是用玄学的语言来解释佛经。所以那时，儒、道、释三道已和平共处、相互渗透而合作起来。这种痕迹，不论在道家书或佛家书中的反映，都可俯拾即是（详见下节）。

南朝（420—589年）·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在学宫中正式设置了玄学一科。直到唐代，称为“崇玄学”。用以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称为道举。当然，到那个时候“崇玄学”的实质，又不全同于三国之际。

其实这种现象，时断时续，若接若离地一直到清代。清·道光（1821—1850年）时人陈众喜，他著的《众喜宝卷》，就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提出“忠孝节义，五伦和合”的口号。

这样学风的全盛时代，孙思逸的确十分有幸的“躬逢盛世”。当时有好

何晏（190—249年），字张平，三国时魏人。少年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与夏侯玄、王弼，倡导玄学。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三国时魏·山阳人。以“有皆始于无，无为万物之根本”的思想来开辟玄学的先声。

夏侯玄（209—254年），字太初，少年知名。

稽康（224—263年），字叔夜，三国时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为有名的文学家、音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

张湛（？）字处度，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东晋学者，他的哲学观点是“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

多通儒入道宗佛的学者，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洪元先生王玄览，他的思想就是渊源于道家而崇佛学，手撰《玄珠录》、《混成奥藏图》、《真人菩萨观门》等书，都是宗道参佛的作品。直到民国初（1912—1922年），托名魏真人的《一贯天机直讲》，还是以儒、释、道三教同观的思想，精辟地论述、解释养生、修炼、保健的功理与功法。

（二）三教学说的三角互训

因为玄学的创立，从而也连锁性地诱发了儒、道、释学说的互相渗透的学风。孙思逸两部《千金方》，可以说是这个“三角互训”的缩影样板。

这三教学说的三角互训，是儒、道、释三者学说相互渗透的终产物。当然，以白纸黑字的文献著作是有力的证据。

1. 儒中道的文献以何晏的《道德论》和王弼疏注的《易经》、《老子》，最有代表性。

2. 儒中佛的文献以张湛的《列子注》，最有代表性。

3. 道中佛的文献《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中“开度品第一”第一句就是“大慈大悲善济真人”佛道合璧的称呼就已使你洞察其内容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全书中佛家言语在这部道家著作中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太上老君戒经》第一篇“戒上”，第一句就是“老君西游，将至天竺”。又“持戒制六情”的疏注，完全采用禅门六根学说来解释，谓“六情者六欲也，眼欲淫色，耳欲淫声，鼻欲芬芳，舌欲脂味，身欲柔滑，意欲放决”。

《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中完全用禅理来叙述“言鬼”。

《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二中，有“月君七缚咒：唵咐明啰哄娑娑萨诃。日君七煞咒：唵咐阳鰈军拿利婆诃”的梵文佛家决咒。

《搜神记》第三卷，全部传主不是道家的神而是佛，如观世音、天王、地藏王、金刚、十大明王、十殿阎王、十八罗汉、达摩、普庵……等佛门的人与事。

《翼方·禁经下·护身禁法》中，都是道教符宗派的符咒，但内中“禁令家和法”的内容则是：“南无伽帝伽帝膩，伽帝收溜避，阿乾陀罗呵，弥陀罗灌陀要婆呵”。竟与佛教的“往生咒”形同一辙。更令人惊奇的此咒与“往生咒”都是开首用“南无”（读那母），尾语结束用“娑婆呵”。

4. 佛中道的书和人

以“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著名于世的净土宗初祖慧远，他讲的经和写的书，都取用《庄子》学说来阐明和发挥佛学。

曹洞宗祖师良价禅师，为广接上中下三根来开五位，名为“曹洞五位”，方法就是用道家八卦来解释佛理。

以下再谈一下几位又僧又道、亦僧亦道的人物：

鸠摩罗什弟子东晋高僧僧肇（384—414年），本为崇信老庄的道士。后读到《维摩诘经》而豁然大悟，因而削发为僧。

王玄览（626—697年），字晖法，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

良价（809—869年）俗姓俞，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市）人。幼年出家，20岁在嵩山受具足戒。卒后，谥悟本禅师。

昙鸞，受戒进入禅门后，同时又学习“长生不老”道家方术，在陶弘景获得十六卷《仙经》。晚年尊道，魏孝武帝尊之为“神鸾和尚”。

彦琼十岁出家为僧，法名僧边。21岁入北周武帝内殿，陪侍讲论《易经》、《老子》、《庄子》，即改业道士，任通道观（道院）学士。25岁，又改道为僧，法号彦琼。

5. 医中道、道中医

以“三洞”、“四辅”、“十二类”作为内容，5305卷，480函的道教文献大丛书《道藏》中还搜集了吴普除《吴普本草》之外的另一部著作《太上老君养生诀》。内有五禽第一、服气吐纳六气第二、养生真诀第三及服气诀。

《道藏》训还有蒲虔贯撰《保生要录》。内中也涉及医学与药学。

《道藏》中还有符度庆纂《修真秘录》。内有与医学有关的养生保健。

《黄帝内经》和孙氏《十金方》，也被《道藏》搜集在内。

此外更有医钦道钦难以分划的道教的医书、医学的道教文献，如：

梁丘子著的《黄庭内景王经注》，专谈五脏六腑。

扶名的《灵宝众真丹诀》，谈医与药。

京里先生著的《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重点为服丹保健。

陶弘景著的《登真隐诀》，宗医参道的谈养生大法。

胡愔著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外泻图》，有医有药。

至于隋、唐以后的，也有不少这型的写作，清代李时品校印的《医道还元》，更是文质并茂中的一部佳著。

（三）权测孙氏在道学上佛学上造诣的深浅

根据上述，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更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三教学问的同时涉猎、熟悉、研究、精通，都是并不希罕的事，尤其像那样“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的上智者，更是势所必然。

他对儒学的精博而深，是无容置咏的。一切包括老在、释典的百家言，更需赖通过儒家学者的文化而获得。“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所以儒未深入，道释更无从入门。再谈孙氏对道与释的造诣，孰深孰浅？则必须加以客观的科学分析而后作出答案。

先检查一下孙氏在两教文献方面贡献，则在道教方面，就疏注过《老子》、

三洞，《道藏》分洞：一洞真部，为元始天尊所流演者；二洞玄部，为太上道君所流演者；三洞神部，为太上老君所出者。

四辅，以太玄、太平、太清与正一为辅。

十二类，十二个归类。为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戒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表奏类12个。

《道藏》为道家诸书汇刻之总称。入藏者有5485册。从南北朝开始到金·明昌元年（即南宋绍熙元年）止，多次增修扩大丰富而成。

吴普（136？—250？年），东汉·广陵人为华陀弟子。

《吴普本草》，约成书于三世纪上半叶，亡佚于唐宋之间，流转数百年。由于具有实用价值，故曾被历代医家所推崇。

《庄子》，而且后人对他作品评价很高。并撰有《枕中素书》、《龙虎论》、《龟上五兆动摇经诀》、《福寿镜》、《太清真人炼云母诀卜...》等 10 多部道教书。而在佛教方面呢？阙如。

再分析从孙氏一言一语中对道教辞令的反映，都能分别出是属于道教的那一宗那一派，而且每个宗派的特点都很鲜明。考道教有五大派：一为经典派，鼻祖为老子、庄子，形成最早，因当时尚无第二、第三派的产生，所以当时无所谓流派，凡研究经籍典奥，深求哲学玄理者属之。其主要特点，为参研经义哲理，考究典籍奥秘，以穷研道学玄理为目的。古今驰骋于文坛、哲学领域的道家学说，就是这一派，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有水平的道教中一技独秀的正宗队伍。至于老子也是一个非神非仙与孔子一样的大学者，可惜被东汉·张道陵奉为道教祖师，尊为“太上道德真君”之后，就丑化为一个牛鼻子道士了。二为符篆派，始祖即张道陵，为最早与经典派分庭抗礼分门立户的一个支流，事实上也是借道教的招牌而吸收了古代巫术演化而来，是植符咒篆，禁咒祝由，斋醮祈攘，用以遣神役鬼，驱邪治病。甚至在天灾人祸方面，也可以呼风唤雨，抗旱防涝，平疫治病。之后，唐·太医署的祝禁科、明·太医院的祝由科及清代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都是符篆派的旁枝蔓叶。道教五派中此派与人民接触最密切，换一句话，他们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所以一般概念中遣神役鬼、求雨打酪的道士，就是这一派。

三为丹鼎派，代表人物为葛玄、葛洪，凡修炼内功，烧炼外丹者，皆属之。主要特点为习静服气，修性摄生，烧炼丹石，以超凡人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长生不老为目的。为医学药学界能接受而欢迎，现在全世界奉为化学的开拓者，就是这一派。四占验派，代表人物为与李淳风同一时代的袁天罡。凡卜筮、星相、阴阳、五行、术数、堪舆、风鉴……等属之。其主要特点是，推究五行术数，占卜起卦，星相讖纬，用以预占祸福休咎来趋吉避凶为目的。但到明末清初之际，已沦落为江湖中的“中”“皮”“李”“瓜”四大行中的“中”行，从此即巡街踏巷去卖卜、起卦、算命、相面、看手、拆字。五积善派，以吕洞宾、汉钟离为代表人物。凡积善行仁，修桥铺路，积功累德，以安民利人，自己也籍此以成仙为目的。因为这一派不要像经典派的高深学问，也没有丹鼎派的要有特殊技术（炼丹），更不要符篆派、占验派的怀有一技之长，所以最为一般市厘小民所欢迎、乐道与向往，且看八仙过海的故事，至今还是脍炙人口而不衰。

现在接下去我们再爬梳检阅一下两部《千金方》中涉及道教中某一派、

张道陵（34—156年），东汉·沛国丰人。即龙虎山天师府第一代张天师。

葛玄（164—244年），三国时吴人，出身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称葛仙翁，为葛洪之祖。

李淳风（602—670年），唐歧州人，精于天文历算。贞观初，造浑天仪。唐高宗时与梁述等校注《五曹孙子》等 10 部算经，撰《麟德历》。

袁天罡（？），是《推背图》的创作者，但史料极少，所以有人认为即唐时成都人彭天纲。因天纲也精于风鉴，熟六王五行。

巾皮李瓜，为江湖四大帮的名称。巾，是算命、测字、踏青、观枚、相面、看手等。皮，为铃医、卖药音。李，杂技、曲艺、演戏等。瓜，要饭、乞丐、扒偷、诈骗等。

吕洞宾（798—？），汉·河中府人，名岩，号纯阳子，故人称吕纯阳。唐武后时两考进士落第。在 46 岁那年，遇汉钟离于长安酒肆，经汉钟离点化而成仙。

汉钟离（？），汉钟为姓，离为名。汉时咸阳人，从师东华子学道，隐居正阳洞，故号正阳子。

某一派的痕迹：

如《要方》卷二十六的“养性序”、“道林养性”，《翼方》的“序”、卷十二的“养性”等，都是经典派，加之《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的画龙点睛之笔而更形彰彰。如《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调气法”、“养性·服食法”与《翼方》卷十三“辟谷”等，都是丹鼎派的内丹系；《要方》卷十二“太一神丹”与《翼方》卷二十二“飞炼”等，都是丹鼎派的外丹系。又如《要方·大医习业》的“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的龟五兆，周易六王，并须精熟”和《翼方》卷十四“退居、择地”“退居·缔耑”等，都是典型的占验派。更如《翼方》卷二十九、三十“禁经”上下两篇，更不折不扣的是符篆派。唯积善派的反映，没有见到，可能积善派的形成在孙氏逝世之后一百数十年而孙氏尚未见到之故。

再对比孙氏文中对佛学思想流露程度，从始至终非徒没法分析出属于那一宗那一派的鸿爪，是连大乘、小乘也看不出来，都属一般共同性的语言。因之可以说明孙氏对佛学的造诣远远不及道学。

六、只能称为居士

我们进一步可作这样的推想，孙氏文中的佛教部分，当然不能排除他从直接研究中吸收获得，但也很可能是由儒学、道学更其是道学中间接转引的。因为当时的道教文献中有不少参有禅理，而且还是较为深入精湛的。

我们再根据《要方·大医精诚》第一句就是“张湛曰”，《翼方·养性禁忌》第一句也就是“论曰，张湛称养性缮写经方……”的多处引用那位以玄学来解释佛学的张湛，所以这个推想，并非毫无道理的。

再一个可怀疑孙氏的佛学，可能由道教中转过来的，且看《要方·论风毒状》“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法存”一句，僧道并提，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更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要方·大医精诚》最后一段“人得阳德，人自报之。……阴阳报施，岂诬也哉”一节明显的是出于佛经《瑜伽师地论》因果学说，但上面却张冠李戴地大书“老君曰”。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名方类证医书大全》：“思邈以辟谷服气，惟饮酒耳。”考佛教的戒酒列为诸戒之首的第一戒，现在孙氏并不遵守，例如《要方·丁肿·丹毒》：“余以正观七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可知孙氏对佛门的清规戒律视若无睹，则多少有些大不虔诚。

或谓，我不相信孙氏对佛学方面造诣的不深，且看他与高僧道宣的交深谊厚吗？其实古来儒士与佛门弟子深交结友的还多哩，如王羲之与支遁、谢安与支遁、苏东坡与佛印、黄庭坚与佛印……等，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方外之交。这种方外之交，比比皆是，所以不能以孙氏有了方外之交而就认为佛学造诣必然粗深的根据。

最后，可以这样说，孙思逸绝对不是佛门弟子，至多为一介居士而已。

王羲之（303—361年），晋时大书法家，字逸少。曾仕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性好爱白鹅。

支遁（314—366年），东晋高僧，俗姓关，谥籍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人。25岁出家，为“六家七宗”之一。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晋书法家，官大保，赠太傅。

佛印（？），宋·名僧，名了元，能诗善文。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宋·分宁人。与苏东坡齐名，后人称为苏黄。

七、小 结

孙氏在儒·释·道三家中，比重释家最轻，因为他毕竟是医生。医之体本乎道，因为非儒难以成医，无道难精于医。

而且在士大夫阶级，大多却有研究、玉少是涉猎释氏之学。孙氏是儒者，其所研究也事属必然。佛教的“舍身渡众”思想，更是在孙氏医德方面，大大增强其深度与厚度。

第五章 真人

提到孙思逸，在医、药学界里可称户晓，谁都知道是唐代大名医，但界外人士则恐难家喻。如提孙真人，则谁都熟悉，当然还包括着医界和药界。

真人两字在字面上讲，是修真得道的人，甚至可以升天登仙。《庄子·太宗师》：“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漠士”。所以真人一称，除了使人景仰与羡慕之外，还多少带有些神秘色彩。

医学界中也有真人，《素问·上古天真论》：“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也。”王冰注释真人谓：“成道之人也。夫真人之身，隐见莫测。其为小也，入于无间。其为大也，偏于空境。其变化也，出入天地内外，莫见其迹。”马

荷注谓：“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浑然全具，故谓之真人”。张志聪也认为：“上古真人者，言所生之来，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真之人也，天真完固。”其玄虚飘渺，不逊于道家，可以说是与道家的真人实一而二二而一。毋怪乎有人认为道、医出于同源，甚至更认为医出于道。

佛教中只有菩萨而无真人，姑不论。儒教中也有真人，不过是指有德才兼备者而言，如《世说新语·德行》的“太史奏真人东行”。原注：“陈仲弓从诸子侄荀父子，于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那末孙氏的真人衔，由儒家来授予，也未为不可。

虽然孙氏的真人一衔，不论儒释道三家都有其资格。但从各方面证实，还是属于道家的。

《管子·心术上》：“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直人之言，不义不顾”的“直人”和《吕氏春秋·审分》“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的“莫人”，都是真人，不过把“真”字误书为“直”或“莫”，前者笔误于下，后者笔误于上。

素以文章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充盈，在文学、哲学上占有很高地位奉为道教经典著作《南华真经》的《庄子》里，对真人的描写，在神秘色彩浓度方面又提高了一筹，如讲呼吸，普通人都在咽喉鼻子，而真人则在脚跟上。真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热。还有一位冲虚真人列御寇，能腾空行走，可以很舒服地御风驾雾。更有藐姑射山上的真人，“肌肤若冰雪，淖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因之，孙思邈既称真人，就不可以没有神乎仙乎的奇迹来陪衬烘托，于是也理所当然地和老子、庄子、列子、天师、吕洞宾……等仙人同日而语矣。

王冰（约710—804年），唐·宝应中（762年）为大仆令。好道善医，号启玄子。除注《素问》外，还著有《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等道家书。

马芮（？），字仲化，一字玄台，明·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张志聪（1610—1695年），字隐庵。清·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学医于张卿子。除注《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匱要略》外，并撰有《侣山堂类辨》等书。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列御寇，战国时郑人，与庄周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著有《列子》8卷。

藐姑射山，相传为人居住之处。《山海经》《庄子》《山海经地理今释》都有记述。

一、道教、医学是否同源

医、道是否同源的问题？一直在争议着，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其充份的理由，所以至今尚无定论。唯《素问》则确是两者浑然并存。此外清·西昌人李时品的八卷《医道还原》而言，那肯定是同源的了。

《旧唐书·孙思邈本传》中既有“善谈庄老”一言，那末就以庄周谈起。庄周，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

他撷取黄帝、老子及稷下集团三者思想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道教思想家及创始人，建立了道家。稷下，是齐桓公（？—公元前643年）、齐威王（？—公元前320年）、齐宣王（？—公元前301年）在齐都临淄、稷门（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设置学宫，广招

揽聘文学、哲学、杂家及游说之士，展开对各种学术的探讨与争议。内有有名人物如邹衍、慎到、尹文、荀卿……等76人。他们的特点是“不治事”而专尚“议论”。所以毁之者认为纸上谈兵，毫无实用，不过空论一番而已。誉之者认为这是百家争鸣，对繁荣当时学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直到今天，这个作用还有它的影响。例如邹衍的五行终始56篇，对中医阴阳五行最有影响。慎到的黄老道德学说、尹文的出于黄老申韩这间的学说也与《内经》思想有其相似之处。

黄帝，姓公孙，又姓姬，以居住之处而名轩辕。老伴嫫祖发明蚕桑丝绸。黄帝曾命大挠作甲子，使容成造纪历，请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臯区占星，着伶伦作律吕，委隸首演算术，令苍颉(11)造文字，问答歧伯、雷公(12)而制医学，此外还有舟车、宫室……等等，都由他领导下的臣人们所发明创造。因为对人民的贡献大大而受到大众的爱戴与崇拜，也由于崇拜的过分而神化。即使实事求是的《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这样说“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询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云笈七签》更谓当时的王母遣玄女，将兵符图策赐于黄帝，助他消灭蚩尤。之后，广游名山，到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至青丘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

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年），即驺衍，战国末哲学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所撰的《邹子》《邹子终始》，俱失传。

慎到（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人，宗黄老道德学说，著有《慎子》42篇。

尹文，战国时齐人，属名家。他的学派出于黄老申韩之间。撰有《尹文子》1卷。但现在看到的《尹文子》恐系后人依托之作。

大挠，黄帝时官史。

容成，道家的采阳补阳术，相传出于容成。撰成《容成阴道》26卷，今佚。

羲和，因居住于羲和，以地作人姓名。

常仪，黄帝臣。

臯区，即鬼臯区，又称大鸿。

伶伦，即冷伦，黄帝臣。

隸首，或作隸算。

《内经》全称《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合《素问》《灵枢》两书而成。实则为秦汉之际，历代积累的集体著作。

《云笈七签》122卷，宋·张君房撰，为道教中有名佳作。

广成子，上古仙人，居崆峒山石室。“无劳汝形，无淫汝精，乃可长生”为广成子语。

入青城山谒中黄丈人，登云台山见宁先生受《龙蹠经》。炼彩石于缙云，合神符于釜山。升天登仙之后，为五个天帝之一，居中央戊巳土位，故称黄帝。因之道家即奉为始祖，故道教称黄（帝）老（子）。但医家也尊为医家之祖，故称医术为岐（伯）黄（帝）术。后世道家、医家，一则出于尊敬崇拜，再则叨光福荫，大家都把自己一套学说，拼命向黄帝身上装贴，什么都是黄帝传下来的，如《黄帝内经》、《黄帝脉诀》、《黄帝五脏论》、《黄帝明堂论》、《黄帝女胎》、《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秘宝》、《黄帝房中术》、《黄帝玄女经》、《黄帝虾蟆经》、《黄帝阴符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等，都是黄帝写的，好一个多产作者。总之，岐黄的医家，说黄帝是医家之祖。黄老的道家，说黄帝是道家之祖。究竟是谁家之祖？虽然无法判断，但这一点可以肯定，这两家都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用以充实自己学说的内容，并藉以扩大其影响。最后出现了唯物与唯心的两途，而且这个剪刀差的距离愈拉愈大。老子，司马谈在六家中就称之为道德家。庄周就把黄帝、老子与稷下集团三家学说综合而成为以庄周为核心的道教，但他把老子还是放在最重要位置上。

以《黄帝虾蟆经》来说，从“日斗者”第一幅画（黑乌为三足、展翅，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黑乌两足，有所不同）黑乌图开始到“月毁三十日”图止的31帧图画，全是道教的。“左腋”到“大冲左右”九帧图，也很难看出是属于医的。“六甲日神游舍图”的60天日神所在之处，假定没有注明“宜避针灸，不避致害”八字，也难与医学联系。看起来也是似医非医、似道非道的医与道合璧的“天书”而已。

如河图洛书，都是道教奉为核心的东西。但经过《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洪范》：“天乃赐禹洪范（即洛书）九畴，彝伦攸叙”之后，儒家才轻而易举地拿了过来。当然，道家也不会甘心拱手送人的，于是他们即认为河图洛书是道家固有的经典篆籍。《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赵明经法》引《遁甲开山图》谓：“名山石室，藏道经有三十所，……其一室有奇经妙图，黄帝发命，河（图）洛（书）之文，不可称计。”此外，道教文献中不少以河图题名者，如《上清河图内玄经》、《上清河图宝篆》等。他们更运用河图来指导炼丹，如《悟真篇》的“三五—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共四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图入圣基”。考东三乃指河图中的东方为三属木，是三（震）；南二是南方为二属火，是三（离）；戊己是中央为五属土，是三（坤）；北一即天一生水的北方为一，是三（坎）；西四三（兑）

紫府先生，身居紫府，故名。他的《三皇内文》，可以劾召万神。

中黄丈人，无考。又谓《刘涓子鬼遗方》中的黄父，即中黄丈人。

宁先生，为黄帝时的宁封子，又名宁封。相传为陶器的发明者。

《龙经》无考。

司马谈，汉·司马迁父，曾为太史令。

六家，春秋战国时的学术流派，计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及道德家六者。

《黄帝虾蟆经》1卷，不著撰人。此书在国内版本已失佚不传，现仅存日本文政六年（1823年）敬业乐群楼刻本。

《上清河图内玄经》、《上清河图宝篆》两书，见《道藏》。

《悟真编》8卷，张紫阳真人撰。内容为讨论修性长寿之术及炼丹石方法。

卦属金；东三南二同五，即三（木）三（火）同宫；北一西四也是五，即三（金）三（水）同宫；与中央土五，进行三者结后，即可结胎成丹。古代炼丹的指导，就是依靠河图、洛书和八卦，可以炼丹炉正式名称为八卦炉。中医制药，有时也借用八卦，此风直到鸦片战争（1840—1842年）。

例如写成于1834年的《外科图说》的九转大降丹、八仙降、八卦大降等也还是用八卦来指导。“合药诸法”一节中有：“放于八卦炉中，然后举火，合五九·四根半香为度。结胎时，至香三根六寸，合四九之数……。”所以又是道与医药的溶合。即以《易经》而说，儒家说是儒家的，道家说是道家的。就是在《要方·大医习业》中也已反映得十分明白，孙氏谓：“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他把《易经》从五经中拿出来与六壬并驾齐驱而作为道教文献。又谓“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而把《易经》排斥出儒家文献之外，更证明孙氏是赞成《易经》归属于道家。

我们再谈一下《难经》卷一的“天地阴阳升降始终之图”、“手足阴阳流注始终之图”、“尺寸阴阳呼吸出入上下始终图”、“四季阴阳始终图”四图定位，都是阴阳与八卦。《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索性全部以含元抱一、控景步虚来解释医学，使医与道混为一体。

直到现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学者研究探讨以《易经》为指导思想的《唯象中医学》。因之医之与道，看来的确是箕豆的同出一根。

如上述，医之与道的支支蔓蔓，的确难以分割清楚，所以孙氏的著作把道教思想渗透溶解于医学中来，也是毫不足怪的。即使出版于1987年第三版《中医学概论》第三章中就有许多道家学说，所明白指出的“古代哲学家认为……”的哲学家一望而知是道家。不过必需加以指出的是孙氏在医学方面中道教色彩的浓厚，在医学文献中是罕见的，连飞霞子的《韩氏医通》、生生子的《赤水玄珠》也远远望尘莫及。如其一定要找几部道教气息浓厚的书，那末只有道家的医书《医道还元》和医家的道书《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可以相伯仲。

成文于历史出现以前，早就孕蕴着宗教的胚胎，因为它本来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初是作为原始人群的自然信仰所产生，图腾就是最好的说明。

例如从殷墟甲骨文中发现的，都是史前宗教，在中国则都是不成文的道教的前身。有了文字，当然更有案可稽了。

明明写在儒家之书上的《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并讨论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但实际上都是道家在使用。

《外科图说》4卷，清·高文晋撰。梓行于鸦片战争之前的1834年。

《难经》全名《黄帝八十一难经》，81篇。旧题秦越人撰，实则为东汉之前的集体创作。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明·熊宗立撰，梓行于1436年。

唯象中医学，是以《易经》模式所综合而成为以《易经》模型思维为特点的中医理论。根据他们所谓可以从而摆脱了经验医学的形态。

《中医学概论》，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孟景春、周仲英主编的一部中医学教材的辅助读本。第一版在1958年，修正再版于1959年，这第三版出版于1987年。

飞霞子即明·韩，字天爵。所撰《韩氏医通》2卷。梓刊于1522年。

生生子，即明·孙一奎，字文垣。所撰《赤水玄珠》30卷。梓行于1584年。

例如《周礼·天官·大宰》的“把五帝”。它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纪。到了医家手里，便成了《素问·金匱真言论》的“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到了道家手里，也成了《珠宫宝历》的“东方苍帝、东海君也；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西方白帝、西海君也；北方黑帝、北海君也；中央黄帝君也”。为了把五帝更靠拢道教；所以《太上飞行九神玉经》进一步指出太上大道君是“行太清之道，出则五帝持卫”。

中医理论之源的《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作指导思想。有了阴阳，中医才能解释生理、病理的机制和变化。有了五行，凭它的生治、承制、亢乘、胜侮来解释五脏的病变及处理病变。凭五运六气来指导脏气法时和天人合一。同时再观察一下道教的运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他们认为太极就是由阴阳组合而成，即太极生两仪、四象到八卦。只要一阅宋代濂溪先生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图，用“以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的思路来推演出阴阳五行。成书于公元100至170年间的《周易参同契》更把阴阳、五行、八卦进一步在炼丹中发挥作用。如“河上姤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尘埃。……”

欲将制之，黄芽为根。……龙呼于虎，虎呼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并”等等。就是凭了这一点，创了全世界最早的化学。

我们再读一遍《内经·素问》的“金匱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五运行大论”、“……”等许多文章，都是饱浸着浓厚的道教气息。这种气息似乎很抽象，其实十分具体。君不见其中最主要的五脏学说，就是扎根于阴阳。其脏象之间的能够统一，完全依赖于五行。即使八十一篇的篇数，不多不少，也正是根据河图、洛书而出。《周髀》不云乎“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周髀经解》：“河图者，方之象也。洛书者，圆之象也。”

道家的太岁与医家的运气，更是一脉相通。无可否认的中医学有两个精髓——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辨证论治为临床技术手段问题，这里不谈。整体观念有两：一为人体本身的统一性，二为人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不论那一个统一性的能够使它统一，全赖于阴阳五行。用五行来使人体本身统一起来。用运气来使人和周围环境统一起来。假如道家没有太岁，则60年一轮、

《珠宫宝历》不分卷，作者佚名。

《太上飞行九神玉卷》，见《道藏》。

周敦颐（1017—1073年），宋·道州人，字茂叔。居庐山，筑室名“濂溪书堂”。著有《太极图说》1卷及《通书》40篇。采用道家学说，以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对宋·明理学影响极大，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

《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3卷，东汉·魏伯阳撰。书中借用乾坤、坎离、龙虎、铅汞等法象，以解释炼丹之术。大旨是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理法而会归于一。

《周髀》、《周髀经解》，其内容都是讨论我国古代一种天体学说。属天体三家中的一家，三家为一昼夜、二浑天、三周髀。相传成书于周，故称《周髀》。

12 年一周的推算，就无法进行。因为太岁是假设的星名，与星相应。凡 12 年为一周天，因将黄道分为 12 等分，以岁星所在的部分，作为岁名。但岁星运行的方向为自西而东，与将黄道分为 12 支的方向正相反，为避免这种不方便，就假设太岁作与岁星实际运行相反的方向运动，以每年大岁所在的部分来纪年。后来更配以十岁阳，组成 60 干支，用以纪年。后来方士术数以大岁所在之处为凶方，应用到忌兴土木建筑或迁徙房屋甚至出行、合药、针灸及外科开刀方面。针灸的“子午流注”，外科的“尻神图”。

这样道中有医、医中有道，我们如何来评价？那未不妨用张介宾 的见解来作参考，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中谓：“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在这里不能不加以声明，此处的阴阳是指统帅“十纲”的阴阳。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阴阳是指阴阳五行的阴阳，那未势所必然，医与道更形接近到浑然一体了。

尻神图，最有代表性的在《医宗金鉴》卷七十六，最后一节。

张介宾（1563—1640 年），字景岳，明末名医，浙江绍兴人。由于仕途无就，遂致力于医。著有《景岳全书》64 卷，梓行于 1624 年。

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孙思邈的思想，是以道教为主体的。即使他的事业为医，但是他的医学思想基本上也是由道教作主导。且看《要方·序》文，所谓序文，是陈述作者的趣意，明确他说起来，是全书内容与中心思想的简介。他一开始即谓：“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画八卦，立庖厨。”斗极即道教视为星宿中至尊的北斗。《云笈七签》谓：“丹元星天之斗君，主命禄籍，上法九天谱策，中统鬼神部目，下领荣真兆民命籍”。《太清玉册》更谓：“拜礼北斗七星君，奉为消灾解厄，保命延生也。”至于八卦，更是道教的主要符号，孙氏用斗极与八卦来作全书的楔引缘起，不是偶然的。说得明白一点，全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在这斗极与八卦学说中展示出来的。

道教宗派虽然比佛教要少得多，但派与派之间的相互交错，也难以一言而尽。因之不能不由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上来分析探讨孙氏的道教思想。

（一）经典派中的登堂入室者

如其单单凭《旧唐书》的“弱冠善谈庄老”，《新唐书》的“善言老子庄周”及《独异志》的“居于嵩山修道”，《续仙传》的“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甚至孙氏在《三洞群仙录》卷十二中名登仙人榜，但都属泛泛之词，无法探悉出孙氏道教思想及造诣的深浅程度。虽然还有不少道教著作，可惜佚者多而存者少，而且也多俚言庸俗者，很明显地不是孙氏手笔，远远不及两部《千金方》在有意无意中反映的真实可靠，因之我们就再细细咀嚼探讨于两部《千金方》，就可一目了然。

《要方·大医习业》：“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考任真的意思是听其自然的生长与发展。体运是体察领悟宇宙间一切命运气数。孙氏更明白地提出：我们想身体的自然生长、生存、发展，思维的洞悉一切，只有依靠庄老经书来解决的口号。也就是孙氏包括医学在内的一切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的总纲领。

《又》“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于此，乃得为大医”。考阴阳禄命，是星相家指“食禄盛衰兴废，命运富贵贫贱”。相法，观察人的形貌或面部、手掌，可以预言未来命运；相面者，以面部分为“命”“田宅”“福德”等十二个宫，相手者，在掌中分为“景”、“开”、“杜”、“休”等八个区域，然后根据《相书》来判断福禄枯荣。所谓诸家者，因其中还有麻衣、青城、青羊……等诸多派别。灼龟是古人焚龟壳来代蓍草。五兆，为古代另一种占卜方法，其方法是“折竹长寸余者三，以手弹于几，以占吉凶”。周易中八卦的阳爻(—)阴爻(---)，凑成六个以占卜；六壬，利用每甲子中有六个“壬”来占卜。这样可以看出孙氏在道教中经典一派思想与技术吸收到医学里之外，还旁及占验派一知半识也要为医学服务。

《又》“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

《太清玉册》8卷，全称《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记述道门仪制、文物、衣冠、礼乐……等事。作者无考。

《三洞群仙录》20卷，宋·陈葆光撰。书内集历代真仙事迹1000人。

道无所滞碍，尽美尽美矣”。这篇要求为医之本的文章，已有道教思想占领一半，也就是说医学的基础，就是依靠道家与医学组合而成。如其再读《要方·大医精诚》中“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一言，更证明孙氏对道学与医学的并重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再回过头来，温习一遍《要方·序》第一句“清浊剖判”，就是《三五历》的“天地开劈，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的翻版。

《又》“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竞逐荣势，企踵权豪，……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这节的指导思想，就是道家核心的“无为”与“知足寡欲”两条要旨，具体执行了《老子》的“知止不殆”。

《要方·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这是道家炼法之一，即“收摄精神，使之凝聚”，因为非此凝神摄志，呼吸冲和，一切脑力工作是无法做到深入的。

《又》“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严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疾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刺针药，无得参差”。本文前五句，是道教修养法之一的“坐忘”。能使人遗形忘我，内外清澄，即《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而去，同于大通”。《天隐子》也谓：“何谓坐忘，曰，遗形忘我。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凡人通过坐忘，“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引郭象注《庄子》的坐忘原文）。之后可以获得后六句的提高医疗质量。

《要方·治病略例》“明堂闭庭”。道家语，指眉心。

《又》“宁可不服其药，以任天真”。《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以任天真的思意即“任真”，也是道家“听任自然”的修炼方法之一。

《又》“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共为攻击，变为疾病”一节，创立了道家对人身机体的生理、病理学说。《医道还元》接受了这个思想，阐发了以下一段论说：

洪濛未判，一气混元。太极初分，五行列位。阴阳贯乎万象，水火运于两间。人禀三才之未，自具百脉之关。上则符天，下则符地。天有暑度、人之脉窍同其源，地有山河、人之经络合其妙。三百六十、无非脉之贯通，八万四千、尽是脉之穿透。同源异用，合一分三。内景和谐，诸灾不作。本真耗散，百病俱生（录《医道还元·脉理奥旨》）。

这样道教思想在医学方面的影响，既广且深，《理渝骈文·序》：“人身八万四千毫孔，皆气之所由出入”，显然也来之于道。

《要方·诊候》：“而与魂魄飞扬。”这里显然不是“肝藏魂，肺藏魄”的魂魄。理由是上、下文并没有涉及肝、肺两脏。相反，文中中有“及淫于藏”“与荣卫俱行”，所以可认为是指整个人身精气而言。那末既称“飞扬”，只有道家所谓的三魂七魄才能这样。属于三魂的：爽灵、胎元、幽精和属于七魄的：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陈藏、臭肺，它是道教想象中人的精神离开形体而存在。所以在精神状态极度失常时，就能导致飞扬。魂魄

《三五历》，作者名佚，本书专论玄阳之数。玄阳为二辰（日、月、星）五星（岁星、荧惑星、太白星、辰星、镇星），故称三五。

《天隐子》1卷，计8篇，搜入《道藏》不署作者姓名。专言道家神仙等子。

不飞扬，就能做到，《云笈七签》的“神气常坚，精神不散，则人不衰不去”。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百想经心，内伤五脏”的“经心”，为道家语。《抱朴子·崇教》有“忧惧之劳，未常经心”，是烦心之意。

《又》“及与德合，并本命……”，都是道家语。典出《庄子·德充符》的“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本命是指人出生所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其干支即为本命。所以“德合”“本命”两字，为医书中所没有的。

《又》“并遇福德者”的福德，为福德宫。道家以流年推算，吉凶神煞，列为十二命宫，其第十为福德宫。

孙氏为什么第一篇为“妇人”？因为女性属坤，《易》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之故。那末为什么“少小婴孺”排列第二？道理也很清楚，孙氏早就予以解释，谓“易称积小以成大”（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的思想而作出的安排。

《要方·肝脏·肝藏脉论》“左目甲，右目乙，循环紫宫”。考紫宫又称紫府，根据《神异经》所言，座落在青丘山，为神仙居住之所。用在这里，隐射心或脑子。此外，这里的“左目甲、右目乙”，也是道家学说，虽谓受到《内经》影响，但欲知《内经》亦来之于道家。《素问·刺禁论》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王冰注谓“肝象干，旺于春，春阳发生，故生于左也。肺象金，旺于秋，秋阴收杀，故藏于右也”，显然是从五行八卦而来。即使这个学说在临床上有其指导意义，但他采用的是演绎法而非归纳法，多少是有问题的。

《又》“有六童子三王女守之”。王女即玉女，道家称为王华之女。童子即金童，道家称为金晨之童。《灵宝大法》谓：“伏愿侍者金童，传言玉女，为臣奏启，上闻天前”。考王华及金晨，都是仙宫名称，所以金童、玉女，是仙人身边未成年的男女儿童。

《要方·心脏·心脏脉论》“号五神居，随节应会”。典出《道德真经》“谷神不死”，河上公注谓“神谓五脏之神也，……五脏尽伤，则五神去焉”。

《要方·小肠腑·风眩》“忌食十二属肉”。道家把地支十二个时辰支配十二种禽畜配耦，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蜥蜴、午马、未羊、申猴、酉蛙、戌狗、亥猪。

《要方·脾脏·脾脏脉论》“土有一子，名之曰金。环挟抱之，不离其身。金乃畏火，恐热来薰，遂弃其母，逃于水中。水为金子，而藏火神，闭门塞户，内外不通”。以上为方士炼外丹的秘诀术语，出于《周易参同契》，孙氏借用于此。这种笔法，大量在1000年后陈士铎的《百病辨证录》中出现，都是受到孙氏的影响。

《抱朴子》2篇，晋葛洪撰。内篇为论神仙、吐纳、符篆、克治之术，有20卷，外篇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等，有50卷。收入《道藏》。

《神异经》1卷，汉·东方朔撰，晋·张华疏注。

《灵宝大法》66卷，金允中改编为44卷。宋高士宁全真授，道士王契真纂。

河上公，汉初人，佶茅屋于河上，攻黄老术，修炼成仙，人不知其姓氏。

陈士铎，字远公，自号朱华子，清·山阴人，也是道教中人物。著有《百病辨证录》14卷，约书成于1687年左右。陈氏书中，不是说此方为雷公、仲景、纯阳在梦中甚至显圣时授予，即谓黄帝、岐伯夜间面赠的，所以后人对此，很有匪议。不过全书水平还是较高，在临床上可以起到些指导作用。

《要方·脾脏上·脾虚实》“胃管太仓”。《黄庭内景经·脾长》：“脾长一尺，掩太仓。”梁丘子注谓：“太仓、胃也。”道家称胃为太仓，但《灵枢·胀论》也有“胃者，太仓也”。因之又可证明医、道是有共同语言的。

《要方·肾脏·肾脏脉论》：“生来精灵之本也。”考精灵有两种解释：一为道家谓神与人之间的超自然体，地位低于神而高于人，一般也可以长生不老，并具有种种神通，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不像神仙那样都是善良而无邪恶，善者可有益于人类，恶者则会危害人类。一为是宇宙间，精神物质的本源。用在这里的是属于后者，如《抱朴子·道意》的“若乃精灵，困于烦忧，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不过不论这前者的后者的，都是道家语。《又》“左肾王，右肾癸，循环玄宫”。这里与上述的“左目甲，右目乙，循环紫宫”为同一笔法同一思想。这里孙氏是接受

《难经》“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的学说而以道家言语出之。考玄宫典出《庄子·大宗师》“天道颀頊得之，以处玄宫”。它是为帝王帝用以运筹帷幄，退思补过的地方。这种宫室大多建筑于建筑群的北方，北为玄武，故称玄宫。用在这里，作为大脑来解释。

《要方·肾脏》“容成子羔服而羽化”。考容成为黄帝时人，即为替黄帝创造纪历的人，同时也是黄帝的老师。羽化，为仙人飞升成仙。有时对道士之死，也可称为羽化。

《要方·膀胱腑·脉论》“号水曹椽名玉海”。曹椽，为最卑职的小官吏，有人认为即皂隶的转音。水曹椽是指专门管理水的小官。海水往往是澄清如玉，故称玉海。以上两个词目，都出于道家术语。

《要方·膀胱腑·三焦虚实》“阳明之别号曰丰隆”。道家认为司管理云的神，名丰隆。典出《淮南子·天文》：“丰隆乃出，以将其雨。”

《要方·水肿》：“名玄水。”道家以北方属坎，有玄武，故称水为玄水。

《要方·养性序》“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守内，病安从来”。这是道家“导一”、“守寸”、“守默”的全部思想。

《又》“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澹之味，能纵欲快意，得虚无之守”。考无为是道教思想中最高境界之一，故《淮南子·精神》总结一句话“虚无者，道之所居也”。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是“有”与“无”的统一，但更以“无”为基本。故而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孙氏首先谈到恬澹，完全是《庄子·刻意》“夫恬澹寂漠，虚无无为，此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思想。这里的纵欲，并非常谈的对人心身有害的纵欲，乃是解释思想尽情思考之意。在词义上讲，是奔放雄健之纵。有了奔放雄健之想，当然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畅快的情志了。这种深奥的思想，太史公倒替我们总结出几句词简意赅的话，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精辟地阐明了这个精神。

《又》“然后真一存焉，三一守焉”。道家指保持本性，自然无为称为真一。《鬼谷子·本经·阴符》：“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至于“三一”，有五种解释：一为天一、地一、太一三位神名；二为《道德真经》的“道生

《黄庭内景经》1卷，为大道玉宸君所传，搜入《道藏》。

鬼谷子，战国时楚人，传说为苏秦、张仪之师。籍贯姓名不详，因其所居鬼谷，即称鬼谷子。著有《鬼谷子》3卷，21篇。

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简称；三为太一、真一与玄一的简称；四为精、气、神三者合一的总称，《云笈七签》的、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云，气包神、神包精，故曰，白包黄、黄包赤、赤包三、三包一，三一混合，名曰混饨”；五为道教修炼方法之一，守虚无空者为大乘，守炼炼形为中乘，守气含和为小乘。这里所指者，当然为第五种解释。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胎息守五脏。”胎息，为道家修炼方法之一。方法是用最最微弱的呼吸来把极小量的空气吸入及呼出。动作过程中必需鼻中没有声音，胸前无起伏。《抱朴子·释滞》的“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又称“服气”，因为关键在于肺的吸气、呼气在内服之中。道家以气为形之本，故而以服气作为修炼养生手段。胎息守五脏，意思是进行胎息，可以把五脏真气牢牢守住。

北宋·张君房，奉宋真宗赵恒(998—1022年在位)敕命，校修《道藏》，同时又辑成122卷《云笈七签》。他把《要方·养性·道林养性》中的12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12少者，养性之都契也”一节，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照录转抄下来，收入《云笈七签·杂修摄·自慎》篇中。惟把“性”字改为“生”字。

《要方·养性》中道教学说很多，其实并不奇怪，孙氏早就公开的把篇名称为道教之林的“道林”。

《翼方·养性·养性禁忌》“淡然无为，神气自满”。说的是每个人能做到清静、寂寞、恬淡、虚无，不忧精神不会丰满充沛。也就是《庄子·天道》的“夫虚净恬淡，寂寞无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矣”。

《又》“一体之盈虚消息”，乃照录《庄子·秋水》的“消息盈虚”。唯为了叶平仄，所以有意倒置了两个字。

《翼方·养性·服饵》：“学道断谷。”断谷即辟谷，为修炼成仙手段之一。其法详载于《神仙绝谷食气论》、《道藏·洞玄部》、《枕中书》、《抱朴子·杂应论》……等道教文献中。据谓张良就是通过辟谷而成仙的。

《翼方·退居·养性》“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易·《易经》，老·《道德真经》，庄子·《南华经》，三者都是道教重要经典著作。学海搜珊富、文林味蔗甜的孙思貌，连在解闷消遣之际的手头书籍，旁的不取，独阅道家，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出他对道教的感情与真诚了。

《翼方·禁经上》“玄黄肇判”。道教以天为玄，认为天者阳，始于东北，其色玄。以地为黄，认为地者阴，始于西南而终中土，其色黄。此说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有矛盾，这是难得见到的医学与道学上的枘凿。如以《淮南子·览冥》“女娲炼五石以补苍天”，原注“天不足西北”来互参，则还是《素问》有其根据的。

《又》：“‘我所以有大患者，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何患’，由此

《神仙绝谷食气论》，作者佚名，1卷。专事讨论辟谷的书。

《枕中书》1卷，旧题晋·葛洪撰。

张良(公元前?—前189年)，字子房，汉·韩人。佐汉有功，封留侯。道家以其晚年崇道，于是作为仙人而搜入《历世真仙通鉴》中。

观之，形质既著，则痾瘵兴焉。静言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此文本身就是引用老子的话，而孙氏加以发挥的。这是“无已”、“无生”、“无我”，也就是“无”与“有”的辩证。证实道中有医、医中有道，以及孙氏以道学思想来指导医学的实质，更一览无遗了。

我们在这里回过头来再好好地学习和研究《翼方·序》文，全文虽然仅仅 672 个字，但在两部《千金方》中最能突出道教思想的文章。虽然孙氏还有其他著作，可是都没有此序一言一语发之于天籁和内心。

起首二句“原夫神医秘术，至策参于道枢。”这道枢两字，当然不可能是宋代、曾纂集历代神仙修道故事而辑成的《道枢》，而确是《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的道枢，所以作为道教学说的轴心来解释，是无可非议的。那末孙氏把道教学说作为医术的基础是十分明确的。再互参《要方·大医习业》的“不谈庄老，不能任真体运”、《翼方·退居·养性》的强调用道教经典著作来消闲等等，即可证此言非偶然的、孤立的。

“宝饵凝灵，宏功决于真眇”。饵是药饵，宝是为道家喜用的常用字，不管什么东西，都以冠之以宝字。灵也是道家特别擅用的字眼，凡美、善、好及至高无上的都称为灵。真字也同宝、灵两字一样，对最纯净无上的事物或人物都称为真。所以这仅仅 10 个字的两句话，真、宝、灵三个道家字都用上，你想道家气息浓不浓？

“知关南玄牝，驻历之效已深”。玄牝为道家衍生万物的本源，典出《老子》的“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是幽玄微妙，牝、是指雌性事物。意思是“道”像微妙的母亲一样，孕育和生化宇宙的一切。《南齐书·顾欢传·正一论》作过如此的解释：“空玄绝于有景，神化瞻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为实相，在道曰玄牝。”

“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天机指造化的奥秘。道家认为在宇宙间有一种天然的机神，一般人所难以知道的，称为“天机”。《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道家斗宿学说中，有天机星。不过不管那一个解释，都是道教的。

“稽炎农于纪策，资太一而反营魂”。文中的“策”字写有竹头而不写“录”，是孙氏有意写出道教的手法。因为“录”，仅仅是一般性的书本册籍而已，而“策”字则是道家对上至天书策命、下至道学著作的专用名词。古籍医书中仅仅有一部《石室秘策》用“策”字（现在新的排印本已改作“录”了，这是失真），因为作者自称朱华子的陈士锋本身就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内容不言可喻都是道家气息。太一，道家认为就是大道，《庄子·天地》：“主之以大一。”营魂，为道家在医学方面的专用词。营，是营房或宿舍，作动词来使用，即是容纳或接受别人来寄宿的意思。肝藏魂，故肝有营魂的功能。肺藏魄，故肺有营魄的功能。不论魂或魄而不能寄寓于肝或肺，人就要死亡。所以《老子》认为“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不过这里的营魂，并非狭义的仅指为肝，而且泛指人身的五脏六腑。或谓营魄两字用之有典，而营魂很冷僻，为何孙氏舍熟悉而取冷僻？因为这里要叶平仄，魄为仄声而魂恰恰是平声。

《南齐书》59卷，南朝·梁·萧子显撰。

《石室秘策》6卷，清·陈士锋撰，刊行于1687年。内有128种治法，理论、用方、取药，都很奇特。

“播在神寰”。寰是宇宙，佛家称尘寰，道家称神寰。

“医道由是而滥觞”。由“是”的“是”，承接上文，乃指道枢而言。因为从开始两句至“医道由是滥觞”之前的一段文章，都是谈道教在医学上的影响。所以这句是“应”第一、二两句的“呼”而写的。在古文文法上第一、二两句是“起”，中间一段是“承”，此句是“合”。因之这一句，是画龙点睛的笔法，用来更突出道教学说的重要性。重要程度大有“没有道教就不可能有医学”的地步。

“高密问紫文之术”。紫文，为道教的书，因为道教书册常用紫色的硃墨来写成。典出《云笈七签》：“紫书，紫笔缮文也”。

“伯阳流玉册之经”。考道家的经书，常常储藏于玉函中，以示其珍贵，所以被藏的道教书称为玉书、玉册。证见《黄庭内景经》“是曰玉书可精读”及《南岳记》“禹治水祭南岳，梦获金简玉字之书”。

“乃大道之真”。道家对“道”与“真”的看法，是“虚极静至，精自然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还虚”（引《真诠》原文），而这个“虚”又恰恰是《道德指归论》所谓“静为虚户，虚为道门”的以真合道辩证法。

“采葛生之玉函”。葛生指葛洪，玉函指葛氏所著的除医书《肘后方》之外的《抱朴子》、《神仙传》、《集异传》……等书。就是托名汉·刘歆（？—23年）的《西京杂记》，后人考证证明也是葛氏手笔。

“两仪之大德”，道家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为生化之源，故而称大德，盖“大德曰生”。

“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而存。德合则生成，是生曰德曰立。既知生不再于我，人处物为灵”。道家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的东西。而道的成形，更是气之化，流传于民间“老子一气化三清”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通俗易懂的形象化说法。如其再加上（合）道德恩施，即可得到大德之“生”。这里虽然不过三言两语，但言简意赅的道破道教思想基本信仰和教义。“矧夫易道深矣”。易、道两字，不管你作《易经》和道教来解释，或作《易经》中的道理来领会，孙氏的中心思想，还是深深索系乎道教。

我们如其再合参孙氏在《老子》、《庄子》两书的疏注，及其他几部道教著作，更不难证实孙氏对道教经典理论的造诣，不能不惊叹他的登堂入室了。

（二）丹鼎派中也有一席之地

孙思邈除在《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等道教著作中系统论述研究烧炼丹石术之外，很少见到在正史里直接介绍。但在旁证方面倒有不少俯拾即是资料。例如：

《南岳记》不分卷，作者无考，为记录南岳传说、事迹专书。

《真诠》3卷。丘处机五传弟子阳道生传，彭定求校刻，全书讨论内丹修炼之道。

《道德指归论》15卷，唐·杜光庭撰。

《肘后方》8卷。初名《肘后急救方》。晋·葛洪原著。经陶弘景增补为101方，改称《补阙肘后百一方》。又经杨道南增补后，又改为《附广肘后方》。

《西京杂记》6卷。书中所记，皆东汉遗闻轶事，间也有怪诞不经者。

“在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鸟玄武大获曾青，蜀人不识曾青。……遂于蜀县魏家合成一釜”（见《要方·胆腑》）。

“至唐明皇幸蜀，梦思邈乞雄黄，乃命中使，赍十斤送峨嵋山顶上”（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29卷，《续仙传》也有同样记载）。

“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见《名医类证医书大全·医学源流》及《本草蒙筌·历代名医图姓氏》）。所谓炼气，在习惯上都指包括内丹与外丹两者的修炼。内丹相当于吐纳、导引，外丹即炼丹。

“隐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所谓修道，也经常把炼丹术包括在内。

“至思邈石室”（见《酉阳杂俎》）。石室正是一般炼丹家用以烧炼铅丹而筑的工作室。

陕西省、耀县城东三里的药王山，昔为孙氏隐居之处，内有孙氏在当时接受“真人”敕封称号的拜真台。台前山门上有一付对联，上为“铁杆铜条耸云霄、千年不朽”，下为“铜烧汞炼点丹药、一匕回春”此联更是炼丹的证据。“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考乳为石灰岩洞顶部下垂的檐状冰柱样松脆的石质矿物，《本草纲目》称为石钟乳。但在唐、宋之际，大多作为丹石的同义词。既然自己服用，势必自己烧炼。

以上旁证，可能还有臆测想象之嫌，但最最可以信赖无疑的是两部《千金方》中有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有关炼丹的笔墨，更其是《翼方·飞炼》一卷。

所以孙氏对炼丹一门技术，自继葛玄、葛洪、陶弘景之后的又一位精于此道并有名于世的炼丹家。除了炼外丹之外的内丹，在两部《千金方》里更是不胜枚举。例如《要方·养性·养性序》中的“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啄齿二七遍”，《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常以鼻引气，口吐气，小微吐之，不得开口，复欲得出气少、入气多”……等等，都是最低级的内丹修炼入门基本动作。

（三）符篆派的入幕之宾

相传黄帝之所以能战胜蚩尤，就是依赖了九天玄女赐他的六壬、遁甲、兵符、印剑和图策。其中图策，就是最早的符篆，当然这种符篆已非后世所见到的那样。

巫，纵然和道教无关，是专门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念咒并使用少数的药物来替人法邪治病，在殷商（公元前16世纪—前1066年）之际，正是他们最活跃的黄金时代。但与九天玄女的一套，多少有些血统关系。

还有一个和道教风马牛不相及而后再又莫名其妙地携手起来的，是为讖纬。它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的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和学说，其起源可能是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后期，因统治者要利用它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这种讖纬符命，当时称为“图

见1954年、第四号《中华医史杂志》253页“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

《本草纲目》52卷，明·李时珍撰。成书于1578年，收罗药品1892味，内347种为李氏所新增者。

书”，《汉书·王莽传下》“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目遣邑”。《后汉书·桓谭传》“增益图书，矫和讖记”。讖纬学说的独盛于新莽（9—23年）、西汉之际，也完全反映出来。

东汉（25—220年）前半阶段，沛国丰人（今江苏省、徐州市），自称张良第八代裔孙张道陵，在顺帝（126—143年在位）时，与弟子前往四川鹤鸣山修道，自封天师，把过去的图策、巫术、讖纬，用老庄学说联贯起来，手创了符咒符篆，并在永和六年（141年），撰成24卷《道书》，总结了她的学说、教义。在道教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独特的流派——符篆派。把老子奉为祖师、尊为“道德天尊”。从此把老子一介书生的青衿强行剥去，把连老子生前梦都想不到的道袍黄冠强加于身。之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也就是在孙思邈125岁那年，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再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又加封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一位通经达理的学者，一变再变而成牛鼻子道士，老子而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作如何想法！称新兴的这个流派为“正一宗”，正、是中正不偏，一是寓天水生一为治。张道陵自称天师一世，所以第四代孙张盛即张天师四世，在晋·永嘉年间（307—312年），由鹤鸣山迁到龙虎山，并建造了上清宫，又名天师府，作为道教符篆派活动中心。经历了1600多年，至今龙虎山天师府的知名度，一直不衰。

也就是这位张道陵，开创订制了道教第一部规仪科范，从此道教在形式上宣告正式成立。他的教规，道士可以成婚及生育子女，所以天师一职，也一如帝王的世袭，在嫡庶长幼之间也仿照帝王的模式，在位者即主持正一宗的大小事务。符篆派在道教五派之中，可以说形成得最早，经典派虽然更早、但以没有另外一个派的并存，就也无派可言。所以符篆派在五派中声势最庞大、组织最严密、信徒最众多，因之世泽也最绵长。第63世张天师张恩溥（1904—1969年），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袭职掌教时的典礼，十分隆重。东汉有张角其人者（？—184年），利用其与天师同姓，于是也树起道教旗帜，以五斗米教自居，并用符篆禁咒为人治病，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之后组织了黄巾军，于张道陵死后40年，天师三世张鲁主正一宗道教时的中平元年（184年）揭竿起义。不过道教中人，始终没有予以承认，相反地排斥为“道教之贼”。

用禁咒符篆或类禁咒符篆的方法来治病，可以说自殷商到隋唐，一直存在着。《后汉书·皇甫嵩传》的“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确属实证。

为了使玄妙、神秘的符篆派的真相，使读者得知一二便于讨论计，这里不能不作些必要的介绍：

符：也称神符“硃篆、丹书”。为一种笔划屈曲、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图形，也有其中夹入一两个可辨认的熟悉汉文，写在黄纸（低级的）或黄绫（高级的）上的东西。道教符篆派中人谓之可以用它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保健祛病、延年益寿。它是起于西汉、盛于隋唐，据《隋书·经籍志》

吕，古以字。

鹤鸣山，又称鸡鸣山，今在四川省崇庆县内。

龙虎山，今江西省、贵溪县西南部。该处左右后三面皆悬崖，前面有小山，天师府即在这山岩中。龙虎山至今虽仍风光旖旎，但有名的道观，今仅存残垣。

称“符箓共十七部，一百零三卷”。

搢符：搢，读如嘘(x)，指指划划的意思。内有两种形式：一为以毛笔酪墨或箓砂，在黄纸或黄绫上书写。一为空手向空中或水面上挥挥划划。不论那种形式，在搢的时候，必须配合念咒。用笔的，其执笔及书写，一如平常的写字或作画。空手的有单手或双手；单手的用右手，伸直中指，将食指指头，叠在中指第二节伸侧桡侧，同时将无名指、小指与拇指三提端接触于一起，形成环状。然后将中指指头作为笔尖使用。用双手的，先将两手合十，两食指伸直，拇指、中指、无名指及小指环屈，左手四指紧贴右手手背，右手四指紧贴左手手背，以两个合并而直伸的食指指头权当笔尖来挥挥划划。一般惯例，向空搢的多用双手，向水搢的多用单手。不论笔搢或指搢，都有一定规格的图象。经过搢过符的清水，即符水。

箓：为道家内部资料写成的书册，《隋书·经籍志》作过这样的介绍，谓：“道经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箓皆素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故又称素书，所以多少有些神秘色彩。如其符篆两字连在一起的，则箓仅仅是符的助语词，不作什么解释的。

符箓：连在一起的即成为一体的东西，虽然箓似乎是属于助语词，但严格地区别起来，符是随搢随毁（火焚）的。箓则用以保存及收藏的。在东汉至隋唐（581—907年），道教鼎盛时期，都要把它虔诚供奉。每在国家大典时，必有符箓受授仪式。如《魏书·显祖记》：“辛亥（日），帝幸道坛，亲受符篆箓。”《隋书·经籍志》：“（北魏）太武（拓跋焘），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篆，……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

符咒：在搢符时，不论用笔用指，必须配合念诵咒诀。每一种符，配合某一种咒，有一定的规定。这种咒诀词义，都无法理解，因佛教的传入与道佛互渗，所以有时还杂以梵语，使已经难懂的内容更加难懂，在《翼方·禁经》上下两篇中有许多这样的符咒。念咒时大多以低声出之，也有不出声的默念。但在最后一个字则大声高喊。施术者认为符咒可以驱鬼遣神来实现人的各种愿望。

符法：即念咒诀和搢符进行的过程与方法方式，一般常用的有：三光符、真武符、天罡大圣符、三官搜鬼符、铁扇符、九岳符、安胎符、催生符与斩邪符九个符法。

符水：道士们称之为神水。有两种形式的神水：其一，即在清水上面用指头搢上了符的神水；其二，用搢在黄纸上（此处不用黄绫）的符箓，用火烧成灰，将灰溶入（事实上无法溶解的，仅仅是泡浸而已）清水中即成。《云笈七签》有“符水论”，用以专门讨论符水的。

禁：又称禁咒、禁架、禁术、禁气，《翼方》最后两卷“禁经”，就是禁咒之经。它的作用和符咒相似，唯有不同者，前者仅仅口中念念，后者在念咒的同时还要植符，但总的说来，还是一而二二而一。《抱朴子·至理》：“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服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顿止，又能续骨连伤。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当然也有人认为《抱朴子》本来就是侈谈神仙怪奇，是否可

信？那末再证之于正史，《后汉书·方术·徐登传》：“（徐）登年长，（赵）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又“（徐）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赵）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黄”。

《太平广记·异苑》：“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可知禁这个法术可以制止流水、使枯树回春、清水中出现鱼龙，不过上述几则，与医学无直接关系。再看与医学有密切关系的，如《南史·陈显达传》：“显达出杜姥宅，大战于宜阳津阳门，大破贼，矢中左目，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姬善禁，先以钉钉住，姬禹步作气，钉即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此外，还有祝由科、辰州符、魔胜、越方……等神秘奇术，基本上都是类似甚至相同的一套。上述符、篆、符咒、符水……等，可能人们要说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迷信。殊不知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科学、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环境。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些方法都是中医治疗方法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况且《历代名医蒙求》中的“伯宗移树”、“村姬禁毒”、“陈寨换心”、“……”等医疗故事，都是属于禁法范畴。

关于祝由科，早在《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就有“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情变气，可祝由而已”。还有辰州符，揲符需要用硃砂，硃砂以出于辰州者为上品，故符就称为辰州符。此外精于祝由者，以辰州人为多，此名为辰州符的另一个说法。关于魔胜，上海在解放前夕，还在盛行着，上海方言称魔祷，在文献上很难找到正确的解释。例如新婚的大床，工木在某一个接榫之处，暗藏了一个小泥人或纸人，穿上红袍或染以红色，则必生贵子，如暗藏一个棺材，则生子必夭；如暗藏一把纸的或木的镰刀，则必然绝子绝孙而无后。新建筑的房屋，工人在某处暗藏了一条火柴，则此屋必遭火灾；暗藏一个纸剪的或泥制的小泥人，颈子上套了一个木械，则后代就有牢狱之灾……等等。暗藏的时候不能给第二人知道或目睹，有效与否？有谁可知。

还有越方，《后汉书·徐登传》：“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原注：“善禁咒也。”可能为祝由的另一名称。

现在我们对朦胧、玄妙、神秘而不可思议的符、篆、禁、咒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末不妨再对照一下孙氏两部《千金方》。《翼方·禁经·论曰》：“……其文零叠，不成卷轴，纵令有者，不过三章二章，既不专精，探其至赜，终为难备。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能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辑，将恐零落。今编为二卷（即《翼方》卷二十九、卷三十），凡二十二篇，名曰禁经。”可以看出，孙氏化了大量精力从许多文献中蜂采沙聚而成的。更其是内中貌不惊人的“不过三章二章”一句，不是他读万卷书亲身的经历，是无法说得出的。因为数千部道教文献之库《道藏》中关于符、篆、咒、禁等书，有好几部名为“部”而仅仅一页两页而已。

从两卷“禁经”而言，也至少是从《上清修行经诀》、《上清众经诸真圣秘》、《太上赤文洞神三篆》、《黄帝太一入门入式秘诀》、《太上洞神

《历代名医蒙求》2卷，宋·周守忠撰，梓于1220年。

薛宗伯用禁法，把公孙泰的背疽，移在树上。事见《历代名医蒙求》。

一村姬用禁法，将一军人在途中中毒待毙，予以拯救而愈。事见《历代名医蒙求》。

泉州巫医陈寨，善禁祝，有漳州旅馆主人儿子病狂，陈用禁法，把心更换而愈。事见《历代名医蒙求》。

玄妙白猿真经》、《太上六王明鉴符阴经》……等数十部隋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撷取、筛拣、精选、整理而成的。并非孙氏毫无根据随心所欲而信手涂鸦得来，一字一言，甚至符篆的龙飞凤舞走笔中一招一式，也俱有来历根据。

从这两篇“禁经”来推测孙氏对道教五派之一的符宗派的造诣，也早已为入幕之宾。

（四）精通占验

占验派中人物，亦称阴阳家，他的主要修养是：推研五行术数，占卜星相讖纬，用以趋吉避凶为目的。代表人物袁天罡，与唐代数学家李淳风为同一时代人物。袁氏很神秘，所以在文献上很少他的材料，因之有人认为即唐代成都人袁天纲。他在隋朝任监官令。善风鉴，精占验。入唐，太宗召见时对他：“古有君平，朕今得尔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固胜之。”《四库总目》中的《九天玄女六壬课》一卷，是他许多著作中唯一保存到现在的遗作。也像张道陵奉老子为祖师而尊为“道德天尊”一样，占验派也把李淳风奉为他们的祖师，一代术数宗师、科学大家也成了道士。《太平广记》也有过这样一节记载：“（李淳风）尝与袁天罡共为图讖，预言历代兴亡变革之事，名为推背图”。也很可能为了这件事，占验派就请他登上这个宝座的。

根据《名医类证医书大全·医学源流》及《本草蒙荃·历代名医图姓氏》有“孙思邈，……洞晓天文推步”。《医学入门·历代医学姓氏》“洞晓天文”的记载，说明孙氏对天文推步的晓而且洞，是十分精明的。大家都知道，天文是星相占卜的基础。推步是研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节气之差”的专业学问者，这种专业就是属之于占验派。

现在就把两部《千金方》予以对照。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论曰》“当先知夫妻本命”。考本命两字为占验派常用词。凡人出生所属六十甲干支之年，其干支即为本命。如甲子年生，即以甲子为本命；乙丑年生，即以乙丑为本命；以下类推。

《又》“五行相克，及与刑、杀、冲、破”。考刑杀与冲破，也是道教占验派的常用词。前者为地支三刑，内容是：子刑卯、卯刑子、为无礼之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为恃势之刑；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为无恩之刑；辰午酉亥为自刑之刑。后者即地支六冲，内容是：子与午相冲、丑与未相冲、寅与申相冲、卯与酉相冲、辰与戌相冲及巳与亥相冲。它的规律是前面六者与后面六者，两遇而冲。常主的“三刑六冲”，即指此而言。

《要方·风毒脚气·膏》“凡作膏，常以破除日”，《要方·胆腑·万病丸散》“破除日平旦，空腹酒服三丸”，《翼方·辟谷·服云母》“择取四时王相甲子，开除满之日”，《翼方·针灸·杂法》“须看破开日”。这四处中的“破”、“除”、“满”、“开”四个字，是使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道教占验派中“斗建十二值

日星”学说内容是：开、建、危、破、平、定、收、执、闭、满、除、成 12 个星名。在 12 天中有一星值日，但它并不像甲子那样的有次序地轮值，而是不规则的值日。但也有另一套方法来推算安排，不过引以为遗恨者，笔者没有知道这个秘诀。在此 12 星名可以算出黄道日与黑道日。黄道是吉日，

《医学入门》9卷，明·李梴编著，是一部较有影响的习医启蒙书。

黑道是凶日。计算法是用这个口诀，是：

建满平收黑，
除危定执黄，
成开皆可用，
闭破不相当。

意思是建、满、平、收四星值日为黑道日，诸事不宜。除、危、定、执四星值日为黄道日，大吉大利。成和开两星值日，为不凶不吉。闭和破两星值日，虽非凶日，但什么事也不宜去做。

《要方·小肠腑》“丁酉日，自至市，买远志，裹着衣中角头，还，未服之”。《要方，备急·火疮》“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各于五里内，采一方单木茎叶，……至九月九日午时

取出”。《翼方·禁方上》：“在无人清净之处，着鲜净衣，不得令人辄见，烧众名香，正面向东，禹步三匝，勿回转。”以上都是占验派中关于“趋吉”的事。

《要方·丁肿痛疽·天灶火丹》“小儿未满百日，犯行路灶君”。行路灶君是占验派七十二个儿童关煞之一。七十二关煞全名“小儿冲犯七十二关煞”。其中如“百日关”，是一月寅、巳时出生的儿童，在出生后百日内不能走出家门；如“将军关”，是凡辰、酉、戌年末时出生的儿童，在两岁内不得看见弓和箭；……。这里的犯有行路灶君关的，所以得患这型的丹毒。

《翼方·禁经上·持禁斋戒法》中的“五戒”“十善”“八忌”“四归”，都是道教趋吉避凶的戒条，原出于《太清玉册》。

《翼方·受禁法》的“圣人闭口，……闭口藏身之禁法”一节，全部照录于《神仙经》，也是道教趋吉避凶的预卜之言。

《翼方·辟谷·服水》“六甲之精”，《翼方·禁经上·禁鬼客忤气》“六甲、六丁、六丙……”，《翼方·禁经上·禁温疫时行》“六甲六乙鬼疫自出，六丙六丁知鬼始名，六戊六己疫鬼自死，六庚六辛知鬼东西，六壬六癸疫鬼自死”。这是占验派最实用的计算法，俗称“六丁六甲”。六丁是把六十甲子中的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六个逢丁的称为六丁。六甲是把六十甲子中的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称为六甲。为什么十个天干中独独取甲丁作纲领？甲居首位，尚说得通。而丁在四位，为什么？《无上九霄雷霆玉经》就解答了这个问题，谓：“六丁玉女，六甲将军。”占验派认为六丁是女神，属阴。六甲是男神，属阳。至于它的作用，则《云笈七签》解答为“若辟除恶鬼神者，书六甲六乙符持行，并呼甲寅，神鬼皆散走。六庚六辛，皆符消九虫”。

《翼方·养性·养性禁忌》：“八星者：室、参、井、鬼、柳、张、房、心”。考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黄道（太阳与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为28个星座。计东方有角、亢、氏、房、心、尾、箕；南方有井、鬼、柳、星、张、翼、转；西方有奎、娄、胃、昂、毕、觜、参；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共四个六、成为28星座，俗称二十八宿。《三辅黄图》把东方的称为东方苍龙七宿，南方的称为南方赤雀七宿，西方的称为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的称为北方玄武七宿，于是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纱幛。孙氏提到八星，是选择东方四个、南方两个、西方与北方各一个。

《神仙经》，为《神仙传》的另一个名称。计9卷，晋·葛洪辑撰，记载94名神仙事迹。

《翼方·退居、杂忌》“屋宇宅院成后，不因崩损，辄有修造。及妄动土，二尺以下，即有土气”的“土气”，至今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疏注。大家都以金木水火土五气中土气来解释，是错误的。假如是五行之气中的土气来讲，它是坤德中州之气，为生育万物之气，人得之即生，失之即死，怎样说不能妄动，其一。凡大地表面，即有土气，即使不加挖掘只要见到泥土，就有土气，毋须掘地二尺才有，其二。

孙氏这里的“土气”，是道教中两个凶煞恶神的名氏，一个名“土”，一个名“气”。这个说法，起于南北朝（386—589年）而盛行于隋唐（581—907年），证之《北齐书·颜之推传》的“偏旁之书，死有归煞，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魔胜”。清·卢文弨（1717—1796年）补注谓：“偏旁之书，谓非正书。俗本杀作煞，道家多用之。”

土煞，即名为土。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中“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的“土”，就是指土煞，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流行。土的形态，为男性儿童型，身長仅一尺二寸。现在舞台上的土地爷都是侏儒，恐怕也由此而来。甚至《封神榜演义》里的土行孙，也是“却是个矮子，身不过四尺，面色如土”（见第52回）。据道家说法，土是最凶煞神之一，常可致你满门死亡。

气煞，又名管（从生从目，读信），是人身，独腿鸡脚。凡人一死，他即破土而出，伴死者灵魂外出。到了“回阳日”，它与死者灵魂，一同回来，任何人一遇了管，即有灾难，非死即病。所以《北齐书》有“死有归煞，子孙逃窜”的避管之举。管与死者灵魂回来之后，气煞即在死者死去的地方，钻入地下。所以“回阳日”也称“接管日”，是不固定的，道士们用甲子来推算，那末家人知道日期而可以出外逃避，俗称“避管”。推算方法是把死者死的这天甲子，用以下口诀来求得。诀为：“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相凑四”。然后根据口诀推算出的数字，天干加地支，从死的那天算起的第几天，就是回阳日。例如死于甲子日，那末天干的甲是九，加地支的子也是九，共18天，则死后第18天之日为回阳日。又如死于己巳，己为四，加巳之九，共13，则死后第13天之日为回阳日。就在这个回阳日，家人逃避，挂上了道士的符篆，即可平安无事。故《北齐书》谓之“画瓦书符，作诸魔胜”。

至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非是者管也”的“管”，并非气煞的管，应作灾字来解释。

我们再参阅一下《新唐书·本传》“密语人曰，后五十年圣人出，吾且助之”。果然后50年左右，太宗李世民执政而孙氏应召入京。《旧唐书·本传》“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佺、徹、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旧唐书·本传》“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天伦之事，思邈曰，汝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傅，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予知其事”后，更不能不惊服孙氏对占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撰。

施耐庵（1296—1370年？），元末明初·钱塘（一说苏州）人，名子安，后迁居江苏兴化，终身不仕，矢志著作。《水浒传》100回，是他不之朽之作。

《封神榜演义》，明道士陆长庚所作，100回。

验术的出神入化。

再看孙氏把占验派的东西，能移花接木的运用到医学方面，不能不认承他的熟练与研究之深。

（五）以医德而言很接近积善派

孙氏在积善派中的修养，究竟如何？殊难回答，因为积善的形成是在他身后。

其一，两部《千金方》中固然有很多行善积德的反映。以及《名方类证医书大全》等书载有孙氏途中救护受伤的小青蛇故事。宋·淳熙十二年《淳熙秘阁续帖》中的孙氏用小米来赠予贫病交迫的人事迹，这都是孙氏积善的具体行动。但欲知行善积德问题，向为儒、释、道的共同教义，很难排除孙氏的指导思想是来之于儒家、佛家的而一定强指为道教。

其二，道家五派，在理论上固然是泾渭分清，但一涉到实际具体问题面前，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法划清了。最显著的是符宗派的基础理论，就来之于经典与占验。而占验派也需要用经典来指导与符篆的配合。丹鼎派不论内丹或外丹，他的理论全赖经典，而且有时还有仗于占验来补充。归根揭底他们本来就是豆子豆箕姓“道”的一家人，所以难以肯定孙氏的善行一定出之于积善派。

其三，除积善一派之外的其余四派，都形成于孙氏时代或更早一些，而积善的形成在孙氏身后。

所以在这问题上，我们的结语，还是用一个“存疑”为妥。

三、道教著作

孙氏在道教方面的著作很多，但伪託者也不少，而且保存到现在更是近乎全佚。现在根据有查考的资料所记载的，有以下几种：

(1) 《千金丹令》三卷。

《宋志》作《齐人月令》三卷。

《通志·艺文略》作《千金养生论》。

(2) 《三教论》一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序》。

《旧唐书》作《会三教论》。

(3) 《太清真入炼云母诀》二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4) 《枕中书》又名《枕中素书》一卷。

晋·葛洪有《枕中书》一卷，又名《原始上真众仙记》。孙氏是否也有这同名一书？

(5) 《马阴内传》一卷。

见《千金要方》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乔序。

(6) 《马阴两君内传》一卷。疑即《马阴内传》。

以原书告佚，无法查阅。唯知东汉时、新野人阴长生，隐居避世，专务道术。闻有马明生者有度世之法，乃求见于秦和山中，从事以师礼，历二十年不懈。后同入青城山，炼太清金液神丹，丹成，双双成仙。

(7) 《幽传福寿论》一卷。

《宋史·艺文略》作《九幽福寿论》。(8) 《福寿论》三卷。

疑即《幽传福寿论》。

(9) 《气诀》一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10) 《炼云母诀》二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11) 《烧炼秘诀》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12) 《龙虎论》一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13) 《龙虎乱日论》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14) 《龙虎通元诀》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考以上以“龙虎”为名的共三书，是否一书三名或确是三书，难考。书的内容仍然是炼丹专著。道家内丹功夫，以龙属木，木生火，同心神之火，乃以龙为火。虎属金，金生水，同身肾之水，乃以虎为水。所以称水火为龙虎。这也是“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龙虎相亲，坎离交济”之理。炼丹家藉之以炼丹，养生家用之以保幢，医学家也引之以来解释人的生理与病理。现在临床上常用术语“龙雷之火”，和以石膏、知母为主的重剂填坎益水、

生津养液之剂称为白虎汤的的出典，都从此而来。或许有人质问“你既然说张仲景著作中没有五行八卦，为何有白虎一名”？因为我也早就说过，《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不是张氏裁制而大多为当时的通用方。

(15)《龟上五兆动摇经诀》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16)《龟经》一卷。

疑即《龟上五兆动摇经诀》。

考“龟上五兆”，系古人占卜时，烧的龟壳所见的拆裂纹痕，用以分析吉凶的一种占术。事见《左传·昭公五年》：“龟兆告吉。”及《尉繚子·武议》：“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所以此书是属于道教中占验派的著作。

(17)《摄养录》二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18)《老子疏注》

(19)《庄子疏注》

孙氏在道教方面的著作毕竟有多少？实难准确的考核、无法考核。至于上列 19 种，也已散佚殆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道教中的经典、丹鼎、符篆、占验四派都有所涉及而留下鸿爪，独独积善方面已和儒教佛教融洽成一体而难以明辨，这也与两部《千金方》中分析的完全相符。

尉繚，战国时魏人，其人始未未详。著有古兵书一部，名《尉繚子》，计 29 篇。1972 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有尉繚子竹简 36 枚。

四、小 结

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孙氏身上的比重，无可争辩的肯定，以道教为重为主。以一个“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兼好释典”（引《旧唐书》）学者的风格与志趣来说，理应置身于经典派中，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考孙思逸垂髫上学，弱冠成才，号称圣童，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称为“上智之材”，毫不夸张。

再据《独异志》“居于嵩山修道”，则可以知道在精通文学之后而再研究道教，而且进级为“修”。欲知道家中做到一个“修”字，颇非易易，《抱朴子·自叙》曾解释这个修字谓：“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兼济，自非绝弃世务，则易缘修习玄静哉。”

再检点一下孙氏的道家著作（当然还有不少后人的伪托），包括疏注《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在内，当在《要方》动笔之前。《要方》杀青于永徽三年（652年），上溯三年为孙氏于贞观元年（637年）之前的武德年间（618—626年）。可以推测出孙氏写作、疏注道教书辍笔之后接下去开始撰写医书的，在时间上的衔接十分符合。

这个时期里研修道教，可能以丹鼎为重点，且看《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的“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要方·胆腑·太一精神丹》的“余以大业年（605—617年），

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鸟玄武大获曾青。”就有力的足以证实。

又《翼方·辟谷·服水》的“武德中（618—626年），龙贲此一卷服水经授余，乃披玩无不舍昼夜”。我们知道服水术乃与服气相伯仲的炼内丹中一个方法。如其孙氏平素不在炼丹，当然没有人送去这本风马牛不及的书册。现在非但有人作红粉宝剑之赠，而孙氏更为之“披玩无不舍昼夜”。所以更证明孙氏此时正在炼丹修道。

而且孙氏这个阶段在修道中还旁及符篆与占验两派，且看《西阳杂俎》一段记载（见前第二章“神仙”、第三节拯龙与第四章居士、第三节方外之交），此言虽似神话，未可置信，但孙思邈与道宣的同时隐居山野，总是事实。而且孙氏还居住在号称石室的烧丹炼药房中，更不可否认的。这里虽然未言时日，但根据事实推求，当在贞观元年（627年）孙氏入京之前上推的八九年。因为太早，则孙氏与道宣尚未结交。太迟，则贞观元年之后，两人俱弃野入京同寓长安。而且他两人一进长安，都没有再度出京野隐的事迹可寻。另外一说，道宣先于孙氏入京，在武德九年（626年），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贞观元年（627年），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贞观六年（632年），向法砺咨问律学；贞观十六年（642年），又出京到终南山丰德寺；又25年而圆寂。孙氏则一直居京，所以还是不可能有老人求救、道律介绍、水溢昆明的事。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两部《千金方》的反映。

因之可以作这样的结语，孙氏是“职业属医，思想在道”的高逸之士。证之王肯堂在明·万历三十三年王刊本《千金翼方·序》的“真人以化

王肯堂（1549—1613年），明·金坛人，字字泰。万历中进士。生平好著作，尤精于医。喜藏书及擅书

圣贤，现神仙身，行良医事”一言，说明这个结语不致于有所不妥。

小楷，所以别署郁罔斋主的知名度，在文学界很有影响。
为现存最早的明版珍本书。

第六章 大 医（一）

一、“此医道之一大变也”

《医学入门》引《朱子小学笺注》谓：“思逸为名进士，因知医而见贬为技流，惜哉”。古时有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为九流说法。进士属儒列一流，医为杂家而居八位。还有一说古有上、中、下三个九流，中九流第一句便是“一流举子二流医”。前者孙氏由第一流下降到八流，后者也由第一降到第二，毋怪乎要憾叹一声“惜哉”了。

其实孙氏的确是医生，何贬之有。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孙氏在人们心中，是形象高大，道德文章，受人爱戴尊敬之深。我国古时，除圣贤之外，则推隐士为最受人尊敬推崇，故而有些史书把孙氏归属于“隐逸”一类中去，《病梨树赋·序》尊称处士。《医学入门》把历代名医分成儒医、名医、世医与德医四级，

把孙氏则列于第一流的儒医。

“医之门户，肇自金元”，所以在宋、金以前根本没有什么门户流派之别，如其一定要说派别的话，则有一个“遵经派”

（遵守《内经》），诚如徐大椿所谓：“其论脏腑经络，病情传受，悉用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见《医学源流论·书论·千金外台论》）所以对孙氏“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循旧”（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批评不求古训、只凭狭隘的家技思想，是欣赏的。应该在“思求经旨”之下再加“演”才是。所谓“演”，就是推陈出新。那末孙氏是怎样来“演”的呢？他也早已告诉我们，谓：“善用心者，所以触类长之”（见《翼方·药录纂要·用药处方》），“故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亦犹咎繇创律，但述五刑，岂卒其事。且今后学者用事典法，触类长之无穷竭，则神农之意从可知矣”（见《翼方·药录纂要·药名》）。孙氏就认识到事物是在不断运动与发展的，所以始终要求我们适应这个规律而又不断地推陈出新。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凭他的聪明才智、视野广阔、知识渊博、目光远大而在遵经派中潜行性地从事改革与推进。纵然这场革命，韬光隐耀地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但还是瞒不了徐大椿。所以徐氏说完了上文之后马上接下去就流露着慨叹系之的口吻说：“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方：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见《医学源流论·论书·千金外台论》）徐大椿用保守的眼光来看，势所必然地有这番议论。但也正是这

《病梨树赋·序》，唐·卢照邻撰。

徐大椿（1693—1771年），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于诸子百家、星经、地志、音律、武技等无不研究，尤精医学，为清代大名医。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为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约成书于秦汉时期，采药365味。

《医学源流论》2卷，徐大椿撰。内分经络脏腑、脉、病、方药、治法、书论、古今等七门。

番议论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句蕴藏着中医理论之中的没有现形显示出来的“辨证论治”确由“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一语中揭露出来，从此这个中医视为精髓和灵魂的“辨证论治”，把中医数千年香火，瓜瓞绵绵不绝，过去、今朝直到以后。虽然徐氏多少沾上了一些静止论的唯心主义思想，可是他的客观洞察能力还是令人佩服的。所以徐氏一方面固然大叹其“此医道之一大变也”，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家”（见《医学源流论·书论·千金外台论》）。

传奇式的人物孙思邈，在肤浅貌视之下，多少有给人一个迷离扑朔，医欤儒欤、佛耶道那？从何定断，更其是他的思想。为弄清楚他，所以非从各个不同角度与多方面来探讨不可，否则你就无法获得发言权。

最主要的是他的著作，但虽多的道教著作，除了两部疏注的《道德尊经》与《南华尊经》之外，其他的都属于记述、应用性的写作，思想性几乎没有。而且是否为孙氏的手笔？至今还是问号。即使两部确属孙氏手笔的疏注，也不作字面的补充、解释、阐明，和老子、庄子一步一趋地唱着同一个曲调而已。因之唯一有研究价值的是医学著作，谈到医学著作，也仅仅是两部《千金方》。

二、两部《千金方》

在中医界的印象中，两部《千金方》与孙思邈，似乎是一个同义词。的确，两部《千金方》是孙氏的整个医药学术和思想的反映，孙氏的医药学术和思想也是两部《千金方》的灵魂。假定没有孙思邈，当然不会有两部《千金方》，如其两部《千金方》而散佚失传，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孙思邈其人，充其量只知道他是一个神仙或道士而已。的确是一而二二而一。

考《要方》写成于唐·永徽二年（652年），时年111岁。写成此书，时历三十度春秋，约在唐·武德五年（622年）、时年81岁的前后，差不多还未入京而尚在隐居之际。

他写书的动机，是“吾见诸方部秩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见《要方·序》）。此外，他的从小即多疾病，困于二竖，当然也是促使他想到习医、写书的动力。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见《要方·序》）而称《千金要方》。凡30卷，230门，合方、论5300首。

《翼方》是继《要方》之后所写的，认为《要方》“犹恐岱山临目，必肤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见《翼方·序》）的挂一漏万，不能完全，所以撰续集来“譬輶輶之相济，运转无涯。等习翼之交飞，搏摇不测”以辅之翼之而称《翼方》。

成书于写成《要方》之后30年的唐·永淳元年（682年），也即羽化的那年。共30卷，凡189门，合方、论、法2900余首。其中添增了800种药物、大量关于张仲景《伤寒论》的阐明发挥和符篆禁咒。

现在再在两部《千金方》中从各个方面来探讨孙氏对医学、药学、保健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分析出他的思想。

（一）运用系统论来归类病种

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系统论，虽然似乎为现代的治学方法，其实很早在中国就“古已有之”。例如八卦、阴阳五行、甚至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等等。但并未引起刮目的注意。

人的疾病，林林总总，在《内经》时代还不多，《伤寒》时代多了，之后更日形繁多。《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可惜仅仅在内科中一个小小部分，无法包罗着所有病种。再看写成于南北朝的《鬼遗方》，他的外科病而且仅仅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一小部份疾病，归类还是十分紊乱。所以只有有赖乎系统论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孙氏做到了。他在《要方》中就用五脏六腑来分类，比较过去的分类不清、无纲无目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同时也给后人开辟了分类方法。直到明、清时代，还有许多医学书籍的分类，私淑于《要方》。明代如楼全善的《医学纲目》，清代如蒋宝素的《问斋医案》，他们的安

《鬼遗方》5卷，龚宣庆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外科学专著，其中更以军陈外科学为重点，成书于483年。

楼全善（1332—1401年），名英，号全斋，明初浙江萧山长山乡人，与金华名医戴原礼友善。著有《医学纲目》40卷，为明代医学巨著之一，粹刊于1565年。

排一如《要方》。

(二) 对《伤寒论》研究的贡献

《要方》的过份略于伤寒，虽然自有其种种因素，但后人总难以谅解而对此颇多蜚言。宋·晁公武第一个在对《要方》赞颂声中提出没有伤寒的缺点，谓：“后世或能窥其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然议者颇恨其独不及伤寒之数云。”（见《郡斋读书志》）之后又有张杲批评谓：“但是经方无，不该览”（见《医说·三皇历代名医》）。还有李梴责之谓“独于伤寒不及”（见《医学入门》）。叶梦得也在《避暑录话》里以“独伤寒未尽”而引为遗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责备中予以谅解，谓“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

那末孙氏在写《要方》之际或前，是否读到《伤寒论》的问题，也与年龄生歿之争一样，至今还没有定论。认为没有读过的根据：第一，孙氏自谓：“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第二，《要方》中的确找不到张仲景的气息。认为读过的，也提出两个更有力的根据，因为《要方·序》、《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中，俱有大段《伤寒论·序》的原文。这事实客观存在的，不妨予以对照。

《伤寒论·原序》引重庆中医学会编注。重庆市人民出版社版《新辑宋本·伤寒论》1955年版。《备急千金要方》引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江户医学影北宋本1955年版。

《伤寒论·原序》：

《千金要方·序》：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曰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淬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进不能爱人，卒然遭邪风之气知物，退不能爱躬知己。卒然遇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身降志屈节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恣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自育轻身，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轻身，夫何荣势之云哉。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

蒋宝素（1795—1873年），字问垒，号帝书，清，江苏丹徒人。著有《问垒医案》不分卷，唯分心、脾、肺、肾、肝五个部门，此书编入于《蒋氏七略》中，故又称《蒋氏医略》。

晁公武，宋·矩野人，字子止。家富藏书，博学多才，时人尊为昭德先生。撰有《郡斋读书志》20卷。

张杲，字季明，宋·新安（今安徽歙县）人。撰有《医说》10卷，梓行于1224年。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以有五脏；经络府俞，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幽微，变化难极。易曰，非天下之至赜，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 其孰能与于此。

理致哉。……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循旧。省疾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菜。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便处汤菜。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别生，实亦难矣。

这样铁证如山，孙氏一定读到《伤寒论》的。但我们更要冷静地思索一下，两者之序肯定是“一篇”，关键是在谁抄谁的。《伤寒论》之序出现于宋，显然《伤寒》抄袭于《要方》。此其一。有人提出《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大小青龙汤……许多方剂，都在《要方》中出现，孙氏而未读《伤寒论》，怎能搜集到自己的著作中？其实这些方剂，都是当时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常用方。张仲景仅仅用六经辨证学说来予以集成、连贯起来。孙氏的这几首方剂不一定从《伤寒论》中得到的。此其二。

所以此两者而作为孙氏在撰写《要方》之前曾读过《伤寒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考当时印刷术尚未发达，各种文献传播困难，而且孙氏又野居山林，没有读到《伤寒论》也毫不奇怪。印刷术虽在隋代早已有之，在敦煌也发现过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到了11世纪才普及起来而被医学所利用。孙氏直到《要方》写成或接近写成时的111岁左右，才获得并刻苦钻研。其所以能获得者，良以进寓京畿而可以遍览天下所有的书之故，终至由深入而精通。他的“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见《要方·序》）、“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都是说明他在完成《要方》之后，开写《翼方》之前方才得到《伤寒论》而苦读精研的纪录。

孙氏得《伤寒论》后，通过研究及深入领会后，然后写入《翼方》卷九、卷十，非但阐明和发展了它，而且更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

他把《伤寒论》所有条文，分别按方凭证、比附归类，使用归纳法来整理。把太阳篇分为桂枝汤法、麻黄汤法、青龙汤法、柴胡汤法、承气汤法、陷胸汤法和杂疗法等。在桂枝汤之下，又列桂枝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这样以按方凭证的归纳，除了条理分清，便于检索之外，更切合于临床实用。

更有意识地突出了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三方的作用，启迪了后世研究伤寒的思路与途径。

还有顺序地叙述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和厥阴。再次综合、归纳伤寒治疗的宜忌，列举忌汗、宜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忌温、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等条文加以说明。然后，再叙述汗、吐、下后病状等等。使学者易于按图索骥，得其要领。

自《伤寒杂病论》面世以后，西晋·王叔和 第一个研究和整理它之后第二人便是孙思邈的《翼方·伤寒门》。

（三）对针灸的贡献

中医许多治法中，以针灸术为最早最久而使用也最广，所以到了唐代，基本上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也为以后宋代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除了《神农明堂图》、《黄帝流注脉经》……等有名无书与《涪翁针经》、《子午经》……等失传的著作之外，当时就能看到的有《黄帝虾蟆经》、《灵枢经》、皇甫温《甲乙经》、杨玄操《黄帝明堂经》……等及孙氏参与审阅的甄权《明堂经图》。再加上临床上世代相传的实际操作，可以说是基本上已粗具规模了。即使宋代又有一个推进与提高的高潮，但依然不能雷越出这个框框。孙氏在针灸方面的贡献，是把针灸术在临床上使用加深加细。在他的一深一细之下，疗效也就明显地提高。

第一定量，艾灸在过去仅仅谈几壮几壮，粗糙得很。而两部《于金方》中，就有了定量，如“苍耳子大”、“小指大”、“小豆大”、“雀屎大”、“如黍米”、“如簪头大”、“……”，这样大小分档，药力也显然恰到好处。

第二指导精确的取穴方法，不同体位，在某种肌肉的弛张与某种肌肉的紧张之下，往往使穴位可以走穴移位。这一点孙

氏之前，很少注意及之，如《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风痒赤病，灸人中近鼻柱三壮，仰卧灸之”，《要方·针灸中·肝病》的“针客主人，一名上关，……侧卧张口取之”，《翼方·针灸下·脱肛》的“又颈衡，在两伸手直向前，令臂着头对鼻所在处”，《翼方·针灸下·杂法》的“正仰卧，屈一膝，伸一膝”……等，都是提高取穴的准确率。所以从此之后，现在的在头面侧部取穴，往往取侧伏位或侧卧位。后头部取穴取俯伏位或侧卧位。后颈、肩胛及背部取穴，取坐位、伏卧位或侧卧位。四肢、臂部，或坐、或卧、或仰卧、或捏拳，或屈时屈膝等等，都是在孙氏这个启发之下取得的方法。

第三发现阿是穴，《要方·针灸上·灸例》：“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有处，不间孔穴，即得便快，或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

第四孙氏开辟了各种灸法的新天地。我们当然也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灸法，不一定是孙氏所发明，但他能集其大成于一书，也非易易，非数十年

王叔和（170—255年），名熙，晋·高平（今山东省金乡西）人。最精咏理）撰有《脉经》10卷，医家奉为枕秘。不过传授不一，互有差异。

《涪翁针经》，根据《后汉书·郭玉传》谓，涪水渔翁所撰。

《子午经》，据传谓扁鹊所著。

《灵枢经》又名《针经》81篇，现与《素问》合编，即《黄帝内经》。

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自号元晏先生。撰有《黄帝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固以十干为分类序数，故称甲乙。

杨玄操，唐，曾为吴歙县尉，精于医、明于脉。撰有《黄帝明堂经》及注《黄帝八十一难经》

《明堂经图》，唐、甄权撰。

亲身操作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隔附子灸：《要方·丁肿痛疽·痈疽》“痈肉中如眼，诸药所不效者方。取附子削如棋子，安肿上，以唾帖之，及灸之。”

泥灸：《要方·丁肿痛疽·发背》“背上痒痛有异，即火急取净土，水和为泥，捻作饼子，厚二分，润一寸半，以粗艾作大炷，灸泥上，贴着疮上灸之”。

隔薤灸：《要方·丁肿痛疽·凜疽》“治恶露疮方。捣薤菜傅疮口，以大艾炷，灸药上，令热入内”。

隔面灸：《又》“治恶疮，面一升作饼，大小覆疮，灸上令热，汁出尽，差”。

隔蒜灸：《要方·痔疮·九漏》“灸一切瘰疬在项上及触处，但有内结凝似作瘰及痈疔诸方。以独头蒜，截两头留心，大作艾炷，称蒜大小，贴疔子上灸之”。

隔鼓灸：《翼方·疮痈下·痈疽》“取香鼓三升，少与水和，热捣，成疆泥作饼子厚三分已。有孔，勿覆孔，可肿上布鼓饼，以艾列其上，灸之使温”。

隔商陆灸：《翼方·疮痈下·鼠瘻》“颈漏，持生商陆根作饼子，如钱厚三分，贴漏口，以艾灸之，饼干热则易之”。

隔葶苈灸：《又》“葶苈子二合，鼓一升，有未味，合捣大烂熟作饼子如上。以一饼子当孔上贴，以艾住如小指大，灸上三壮一易，三饼九炷”。

隔豆灸：《翼方·针灸上》“卒中风口，以竹筒长五寸，以一头刺耳孔中，四畔以面密塞，勿令泄气，一头内大豆一颗，并艾烧之令燃，灸七壮”。

盐灸：《翼方·针灸·淋病》“第一法，着盐脐中，灸三壮”。

这样丰富多采的灸法，给后世临床家更其是外科，留下了

不少遗产，直到18世纪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还列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如隔蒜灸法、附子饼灸法、豆豉饼灸法……等，都是直接采用了孙氏的方法。

(四) 对妇产科的贡献

《要方》首列妇人方三卷(卷二、三、四)。为什么把妇人病列之于首？虽然孙氏也已说了理由，但真正的指导思想，还是由于道教，是《易·坤》的“至哉坤德，万物资生”。

我们知道，妇科学在秦汉之际(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已有记载(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内寒月事不下”、“怀子不乳”等等)，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有《胎产书》，以及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妇人婴儿方》、张仲景《疗妇人方》……等书。幸而张仲景的《金匱要略》中三篇专论妇科病，一直传流到现在。南齐(479—502年)褚澄《诸氏遗书》中的“求嗣”，同一时期徐文伯《疗妇人瘤》，北齐(550—577年)徐之才

《医宗金鉴》90卷，清吴谦等奉旨编纂。成书于：1742年。全书包括有《仲景全书》、《名医方论》、《四诊心法》、《运气要诀》、《伤寒心法》以及内、外、妇、儿、正骨、针灸……等19种。

褚澄(414—483年)，字彦道，南北朝·齐时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为吴郡太守。所撰医论10篇，后人称为《诸氏遗书》。

徐文伯，南齐名医徐道度子，虽精于医而不肯业医，著有《疗妇人瘤》。

《逐月养胎法》，以及比《要方》早不了多年的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283种妇女病候论。除了《诸病源候论》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外，可惜大多已佚散无存，即使能从其他转载中读到的也是一鳞半爪。因之，毫无疑问的应推《要方·妇人方》是我国第一部妇产科专业文献。《诸病源候论》仅仅是病理病机，治疗方面付之阙如。

女子经、带两病，是《要方》讨论重点，凡月水不通、或一月再来，或隔月不至，或多或少，或淋漓不断，或经来腹痛，或闭绝不通，以及经来色如清水，或青黄黑等，或属虚乏，或属风寒，或属瘀血不清，或属癥瘕，则分别运用通、温、破、补等法。

至于赤白带下，崩中漏下，以及“带下有五崩”之说，都给后世在辨证论治上作出了规范。

他对怀孕的看法，是“阴阳调和，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所以正确地指出不孕不育的责任不一定在女方的科学论断，到今天更显示出他的科学头脑使人钦佩。

他在“求子”、“妊娠”、“产育”、“产后虚损”等在《要方》中论之较详，在《翼方》里还加了不少补充，更其是“求子”一篇的“夫婚姻养育者……而疾不及人之谬也”一节，在今天的优生学说来，很具有实际意义。

不孕症，在习俗上都是责之于女方。现在《要方·妇人上·求子》谓：“凡人无子，当为夫妻俱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有绝嗣之殃。”这九鼎之言，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人同意的。直到今天，思想解放，认识提高，才得医务界重视，所以刻下男科的建立，其功也不能不归于孙氏。

全世界提出胎教的国家，中国最早，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之际，甚至更早一些。《大戴礼·保傅》：“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它的内容，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得很完整，谓：“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不偃，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但十分可惜，这种“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见《荀子·礼论》）的古代礼仪制度，没有人把它引进到医学领域里来。在孙氏之前的《诸病源候论》虽有“妊娠养胎候”与“妊娠禁忌候”两章谈到胎前保养，但重点为了保胎，内中固然也有些“端正庄严，清静和平，无倾视，无邪听……饮食居处，皆有禁忌”，可是目的并非为“教”而是为“保”。

直到孙氏的《要方》才把这个古老的礼仪说教，引进到医学界里来为优生学服务，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在《要方·妇人方上》篇中从“妊娠一月”到“妊娠十月”，很多是涉及胎教的。且看《诸病源候论》的几条措施，都是为了胎儿的发育，防制损伤而设，对比孙氏的“欲子美好”、“欲子贤良”、“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等的真正把受孕妇的言行感化于下一代胎儿的胎教为目的的思想距离得很远很远。孙氏更怕别人把胎教和保胎混

徐之才（496—575年），北齐丹阳人。年十三即为大学生。博学多闻，独精医术。他手创的宣、通、补、泻、涩、滑、燥、湿、轻、重分为药性十剂，为药物学界药性分类的倡创者。

巢元万（550—630），籍贯无考。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又称《巢氏病源》，记50卷，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病、证候学专业书，成书于610年。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汉·洛阳人，曾官长沙王太傅，故人称贾太傅，又称贾生。曾撰《新书》53篇，分10卷，今已佚去3篇。

惑，所以特别提出一句“斯盖文王胎教者也”。因为儒教心目中的周文王，就是仁义礼教的化身。

关于临产，孙氏指出“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三二人在傍侍抚，产讫即可，……”及“凡产妇第一不得忽忽忙怕，傍人极须稳审，……”。强调临产妇的精神准备，不应紧张过度。照顾人员也不需过多，以免反增产妇不安。同时还介绍了难产、子死腹中、横产、逆产及胎衣不出等的应急办法。

等等、等等，在中医的妇产科领域里，都是首创的。远较汉代张仲景《金匱要略》有关妇女妊娠、产后和杂病的学说前进、深入了一大步。也是替560年后陈自明写《妇人良方大全》涤讪了理论、临床及写作框架和基础。且看陈氏在《妇人良方大全·自序》的“古云，看方三年，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无药可疗”，正是孙氏《要方·大医精诚》中“世有患者，读书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语言出于一脉相传。

此外，刻下已无法见到的徐之才《逐月养胎法》，经孙氏的转载（在《要方·妇人上·养胎》），得以保存下来，也是厥功不小。当然，孙氏本人也未必知道。

（五）对小儿科的贡献

小儿科在孙思邈之前，远远不及妇产科那样已有成就。虽然《素问·奇病论》“人生而有病癡疾者，……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故令子发为癡疾也”，稍稍涉及于小儿科。《汉书·扁鹊列传》有过“（扁鹊）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可知当时还没有小儿的专科医者。

西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也有“婴儿病痛”、“婴儿瘦”的记载。

西晋（265—316）·王叔和《脉经》中，有小儿脉法。

隋（581—618）·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六卷（卷45—卷50）、255论的“小儿杂病诸候”。

除了以下散在而零星无系统的记述之外，幸而早已散佚失传的《颅凶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再编为两卷的辑复本给我们能读到。提示当孙氏之前小儿科的水平，尚徘徊于低级阶段。

即使以成为小儿科专业书的《颅凶经》来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还认为是“自唐艺文志以上，皆无此名。至宋艺文志，始有师巫颅凶经二卷。……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此说而存立，则孙氏之前，竟没有过一本像样的儿科专书。《要方》紧接《妇人方》之后的两卷（卷五上、卷五下）“少小嬰孺方”，可以目为中医第一部小儿科专业书，而且还是高水平的。

孙氏为何把儿科排列第二？孙氏则明白指出谓：“易称积小为大，诗有厥初生民”之故。同时更可以体会出他对下一代的关心与重视，在“今斯方

陈自明（1190—1270年），字良甫，一作良父，江西临川人，三世业医，家藏医书很多，精于外科及妇科。撰有《外科精要》3卷及《妇人大全良方》24卷。《妇人大全良方》分九门，刊行于1237年。

《颅凶经》，托名周穆王时师巫所作。今存者为《四库全书》辑本2卷，但不能反映出原书的全貌。

《永乐大典》为明代永乐六年（1408年）由政府指定姚广孝、解缙组织两千余人编纂的大型著作。全书共22877卷，约3.7亿字。可惜现存者仅795卷。

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也”（以上两节，俱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一言中毕露。

从“初先出腹”至“杂病”，基本上把儿童常见病、多发病，都罗列无遗，这是前无古人的有系统的著作。第一人提出因小儿“气势微弱”、“在襁褓之内、乳气腥燥”，容易疾病摧残夭折。故而唤醒医生应“留心救疗”、“达兹养小之术，则无横天之祸”（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因之后世·元·曾世荣《活幼口议·议料理》，明·王大纶《婴童类革·慎护论·调理五法》，万密斋《幼科指南心法·述前全幼堂箴》，清·陈复正《幼幼集成·初生护持》……等书的留心医护的思想，都在孙氏的启发之下产生的。

文中不少引用《小品方》、《小儿颅凶经》、《徐王小儿方》、《徐之才养胎法》……等前人著作，也更可能接受了“江左推苏家”、“徐有徐王者”的苏氏、徐氏学说。纵然可以怀疑孙氏在儿科方面的种种论调、观点到处理方法，是来之于前人遗泽，但以上诸书及苏、徐之术，早已失传，那末孙氏的继承续断而得以保留到今天，其功其绩还是不可低估的。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孙氏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阐发与补充。

《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容忤》：

少小所以有容忤病者，是外人来，气息忤之，一名中人，是为容忤也。虽然是家人或别房异户，虽是乳母及父母或从外还，衣服经履，鬼神粗恶暴气，或牛马之气，皆为忤也。执作喘息，乳气未定者，皆为容忤。其乳母遇醉及房劳。喘后乳儿，最剧，能杀儿也，不可不慎。凡诸乘马行，得马汗气臭，未盥洗易衣装，而便向儿边，令儿中马容忤，儿卒见马来，及闻马鸣惊，及马上衣物马气，皆令小儿作马容忤，慎护之，特重一岁儿也。凡小儿衣布帛绵中不得有头发，履中亦尔，白衣青带，青衣白带，皆令中忤。凡非常人及诸物从外来，亦惊小儿致病。欲防之法，诸有从外来人及有异物入户，当将儿避之。

天下有女鸟，……阴气毒化生，喜落毛羽于人庭中，置儿衣中，便令儿作痲，病必死。……是以小儿生至十岁，衣被不可露。

过去我们对这种“容忤”的概念，仅仅是认为小儿神气虚弱，忽触非常之物，或见不识之人，与儿神气相忤，以致诸病丛生，也有像《中国医学大

曾世荣（1252—1330年），字德显，别号省翁，元·湖南衡州人。撰有《活幼心书》3卷及《活幼口议》20卷。在身后的1545年才梓版付印。

王大纶（？），明·崇州人。字怡罔，撰有《婴童类萃》上中下三卷，出版于1622年。

万密斋（1488—1578年），名全，明·罗田（今湖北省罗田县）人。祖传三世业医，著作很多，《幼科指南心法》为其著作之一，计上、下两卷。

陈复正（？），清代儿科名医，字飞霞，广东罗浮人。撰有《幼幼集成》6卷，刻印于1750年。

《小品方》，是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一部方书，自东晋问世之后，至北宋来亡佚。在唐代作为当时医家圭臬，传到日本之后，也有极大影响。原有12卷，除在《外台秘要》中见到部分梗概之外，大部分早已无从考证。作者为晋·陈正之。1983年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小品方辑校》。

《小儿颅凶经》即《颅凶经》。

《徐王小儿方》，据不正确的说法，为徐熙传至第六代孙徐之才的家传秘方。又称《徐王方》或《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

辞典》的认为“畏见生客也，小儿多有之，亦为精神病之一种”。现在随着变态反应性病病理学的发展而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孙氏这里的描述，纵然粗糙、笼统甚至有些“玄”的感觉，但事实无可否认的是最早的变态反应学的启蒙著作。我们必须知道，我国对变态反应病及其学说的认识和研究，最多未超过 80 年，且看清·宣统二年（1910 年）初版、高似兰、杜天一译《欧氏内科学》的第五版（1928 年）“急性支气管炎”病因中谓“尘埃之吸入，系一常见之协助病原。各种气体之具刺激性者，亦可致支气管炎。此次欧州大战发现若干剧烈之支气管炎，为战时所用各种毒气所致。吸醚而致此病者，亦颇多”。在那时才发觉还有某一种致病因素在某一病起到了致病作用，但尚未知有变态反应。出版于 1951 年庄畏仲、连洁群编译的《庄连氏内科学》就有“变态反应性疾病”一章。内有一节谓：

变态反应这个名词，是一九零六年，Pirquet 氏所创始。这个名词的意义，即表示人类对于寻常的食物、药品、血清、植物花粉，某种染料或工业原料等等之感受性反应。变态反应可以包括过敏、感受性、特异反应等等这此意义。目前尚不能详细解释变态反应的种种情形，许多有关于变态反应的知识还在继续研究中。

因之可以说，孙氏在变态反应疾病观察上、初步认识上是超越于 1000 多年前的先知先觉者。而且孙氏这种学说的影响所及，在医学领域里极为深远。且看历 952 年后的申斗垣《外科启玄》第八卷“无辜疔疮”，也称“此疔，固儿汗濯晒凉，误被鸩鸟粪及羽毛所落于上。”

（六）对耳鼻喉科的贡献

自世界上第一位五官科病专业医师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瘵医”（见《史记·扁鹊列传》）之后，从此即后继乏人。内中喉科则再起于明而盛于清、民国。耳科仅仅在清末的杭州金氏（见陆定圃《冷庐医话》）与苏州顾氏（见干祖望《中医耳鼻喉科师资提高班讲义》）两家，但十分可惜，都是昙花一现，顾氏继金氏之后而失传断绪。鼻科则自古至今，尚付之阙如。

1972 年，全国各大中医院都成立了中医耳鼻喉科，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向西医分科的学习，但鲜为人知的而又未加注意的《要方》里，早就有耳鼻喉专业体系的专著，即两卷（卷六上、卷六下）“七窍病”。

孙氏除了有鉴于各器官位置贴邻之外，更是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中国医学大辞典》为近人谢观主编，出版于 1921 年，因实用价值很高，故在解放后 1954 年商务印书馆又予以再版。

《欧氏内科学》13 篇。高似兰译，协和书局版，清·宣统二年（1910 年）粹行。

申斗垣（？），字拱宸，明万历时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撰有《外科启玄》12 卷。

陆定圃（1802—1865 年），名以湑，字敬安，定圃为其号，清·浙江吴兴清溪人。撰有《冷庐医话》5 卷。

《中医耳鼻喉科师资提高班讲义》撰者干祖望 1980—1989 年间，干氏主办兼亲自执教“中医耳鼻喉科师资班”五期于南京中医学院、1990 年“中医耳鼻喉科国际培训班”于厦门市“中国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此讲义是用于其中一班“提高班”的。

“谷气通于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与《素问·通评虚实论》“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的思想指导下而作出如此安排。

正因为《要方》的开端创始，步之于后尘的所有巨著，都沿着这个道路以继承与发展。例如唐·王焘的《外台秘要》用两卷（卷22、卷23）；宋·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用三卷（卷35—卷37）；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政府编纂的《圣济总录》用六卷（卷114—116、卷122—124）；明·周

定王朱棣的《普济方》用十卷（卷53—57、卷60—64）；徐春圃的《古今医统》；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政府编纂的《医

宗金鉴》都有大量耳鼻咽喉种种疾病的材料。甚至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用一卷（卷5）；朝鲜金礼蒙的《医方类聚》用十卷（卷71—80）的大量篇幅来集中讨论耳、鼻、咽喉疾病来满足耳鼻咽喉科从业人员在理论上、临床上的要求。如其孙思邈不开拓这条通途，不可能有这样的追随者。

还有如药粉绵裹塞鼻内、粉剂吹鼻内、药汁灌鼻腔、傅法、拭法、涂法……（以用于鼻病）、以刀决溃泄脓、含漱法、噙化法、热敷法、铁篦熨法、烧铁钉烙法、涂拭法、填塞法、烟熏法、咬咋法……（以上用于口腔、咽喉病）、直塞耳中法、水剂滴耳法、艾灸法、桃叶火灸法、以药物作枕法……（以用于耳病）等丰富多采的外治法，作为内治等法的辅助。而且内中很多方法，至今还在临床上取用。更有由此而得到启发而衍化出来的外治法，更不胜枚举。

大家都知道国外的耳鼻喉科并不包括口腔病，凡在舌腭弓之前者属口腔科，舌腭弓之后才是耳鼻喉科。但我国的中医耳鼻喉科还是把舌腭弓之前的一切疾病包罗在内，没有口腔科，这还是《要方》遗风，也可以说是孙思邈模式的耳鼻喉科。

（七）对骨伤科的贡献

在孙氏之前，可以说没有过骨伤科专业书。虽然根据《医籍考》戴，有《亡名氏金创痍方》、《华忙外科方》、《疗痈疽金创要方》和《甘伯齐疗痈

王焘（？），唐·郾县（今陕西郾县）人。撰有《外台秘要》40卷，有1104门，医方6000余首，刊行于752年。

王怀隐（925—997年），五代、北宋·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当道士，后成名医。主编《太平圣惠方》100卷，分1670门，方16834首。从987年开写，至990年完成。

《圣济总录》200卷，分66门，方20000首，成书于1111—1117年。

朱棣为明太祖第五子，封周定王，博学多才。主编《普济方》，为中医文献中至今没有其他巨著可以超过他。原为168卷，后经《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凡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书成于1406年。实际工作者为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

丹波康赖，为日本有名的汉方医学大家。考其先祖是中国汉灵帝六世孙阿留王，因避战乱，于应神天皇时到日本。撰有《医心方》10卷，成书于982年。

金礼蒙，朝鲜国15世纪人，官集贤殿付校理。主编《医方类聚》266卷，分92门，方药5万余首，1443年开写，历3年于1445年完成。

《医籍考》即《中国医籍写考》80卷，日本·丹波无胤撰，刊于1831年。是一部中国古医书内容提要的巨著，刊载医书三千几百种。

疽金创方》四种，但遗憾的是我们已

无法见到，唐代是否存在也未可知？此外还有《葛洪时后备急方》、《刘涓子鬼遗方》两书存在，但前者仅仅在卷七中有熊虎狂犬咬伤，无伤骨科病之可言。后者的卷二，全文都是金疮，可惜的是“伤”多而“骨”少。因之《要方》卷二十五的“卒死”、“蛇毒”、“被打”、“火疮”和《翼方》卷二十的“从高堕下”、“金疮”等，可以因为把伤骨科集中而作为最早的一部专业书，恐怕不会遭人反对的。一致公认为中国第一部伤骨科专业书是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却在孙氏逝世之后 170 年而才问世。

孙氏对骨、筋和肌肉的生理、病理变化观点，都是从《内经》有关“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肉”（见《素问·宣明五气论》）的指导思想上出发的。进而深入一步地探索到“肾生骨髓”（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见《灵枢·海论》）、“髓伤则销铄筋酸”（见《素问·刺要论》）等肾与骨髓、骨髓与骨的生理、病理变化的联系。所以他的“补骨髓”、“坚筋骨”、“长肌肉”的药物 50 余种，提出了用药物促进骨髓、骨质、肌肉的生长修复，使筋骨坚强有力思想的形成，亦势所必然。

《要方·备急·被打》中对于因跌打压撞等损伤所致的昏厥、内脏损伤、出血等危重症候，运用复苏、止痛、止血、补血和化瘀五法，直到今天，还奉为非此不可的常规。

虽然华佗早已有麻沸散以止痛，但无方传，仅仅耳闻而已。孙氏用大麻根及叶，捣取其汁，内服以止“腕折骨损，痛不可忍者”（见《要方·备急·被打》），在伤外科治疗学中又是创举。在《要方》之前的《刘涓子鬼遗方》虽然也有过“当归散方”、“麻黄散方”……等止痛方，但在理论上都不及大麻根。

也有学者，认为葛洪的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疗法，再传到《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见“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第 20 节“须用杉木皮夹缚之”，第 24 节“夹缚用杉木皮数片”，第 26 节“用板子一片”）而得以不绝于世，其主要功绩也有赖于《要方》的桥梁作用。

（八）对外科的贡献

治疗外科病，早在西周（公元前 1066—前 771 年）就有“掌肿疡、溃瘍、金瘍、折瘍之祝药副杀之齐”的“疡医”（见《周礼·天官》），但外科文献很少。在《要方》之前，仅有《灵枢·八十一篇·痈疽》和《刘涓子鬼遗方》。但前者只有 19 个外科病和极简单的病名、病状、病机和预后。而且这 19 个病中，生者仅六例，占 31.58%，死者有 13 例，占 68.42%，死亡率之高足以惊人。所以在临床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后者作者，出身行伍，一生随军治病，是一位军阵外科医生，其书五卷中第二卷“金创”，纯属军阵外科学。卷一、第三，俱为化脓性感染，如一般脓肿、痈疽、乳腺炎、阑尾炎……之类。卷四为方剂、外用药，同时也有泛泛而谈的涉及癣疥、皮肤病、黧黑斑、酒渣

鼻、秃发、瘰管、疔肿、淋巴结炎及灸疮等等。但多语焉不详。《要方》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仅“口诀”和“方论”两篇。为唐，会昌间，蔺道人所撰。约成书于 841—846 年间。

两卷半（卷二十二、卷二十二及卷二十四的前半）的外科病，病种比过去增多，理论比过去详实，处理方法也具体。所以《要方》在时间上尽管在这两书之后，但以完整、实用、水平各方面而论，可以认为中医外科书中最早的一部文献。从来仅仅有疮疡名称，不分型类，对它的性质也十分朦胧。自《要方·丁肿痛疽·痈疽》的“凡肿，根广一寸已下名疔，一寸已上名痈”之后，才开始有分型的标准，尽管这样分划是粗糙的，但给今后在诊断上、治疗上却创造了科学的条件。

汪石山《外科理例》展卷首篇“痈疽脉”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方·丁肿痛疽·痈疽》的数、浮、微、滑脉理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在麻风病专著中奉为权威之作的沈之问《解围元藪》，他的火、木、土、金、水五癩学说，完全接受于《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中的五癩思想。

申氏《窦氏疮疡经验全书》的13种疔肿，就是《要方·丁肿痛疽·丁肿》“十三种疮”的复制品。

《要方·丁肿痛疽》“以其冷未成熟之时，其用冷药贴薄之，治热已成以消热，令不成脓也”（痈疽第二）。“未坏者，使不成脓”（痈疽第二）。这是在脓肿没有化脓之前的措施，力求消散（即吸收）。

《又》“内补散，治痈疽发背，已溃排脓生肉方”（发背第三）。“李根皮散方，……有人患骨从疮中出，兼有三十余痈疔，服此散得差（搓）”（发背第三）。这是用药力来把内蕴的邪毒排出，促使愈合。

《又》“痈疽溃后，……黄芪茯苓汤方”（痈疽第二）。“地黄煎，补虚除热”（痈疽第二）。这是用补法来促使未溃者消散、已溃者速愈。

后世外科奉为圭臬的消、托、补三法，就是在孙氏这个思想来总结出来的。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痈疽总论歌·注》的入风学说，也就是《要方·丁肿痛疽·丁肿》的“卒然大风大雾、大寒大热，若不时避，人忽遇之”的阐明和发挥。

《要方·丁肿痛疽·丁肿》中苍耳子作外治于疔肿，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疗效满意。

自《素问·生气通天论》第一个提出“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癖为痔”后，《金匱·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篇》也有“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之外，很少提到肛门的痔漏病。时至隋、唐，《诸病源流论》在卷十七中有“脱肛候”、“谷道生疮候”、“谷道赤痛候”，及卷三十四的“痔疮诸候”六论。但以上都是语焉而不详，更无处理疗法，故在孙氏之前肛肠病论著处于空白，至《要方·痔漏·五痔》，才在中医外科病中出现了第一篇痔疮专业论著。根据他能把稍早几年出版的《诸病源候论》的牡痔、牝痔、脉痔、肠痔、血痔五痔一个无遗地搜集在内，可以证明在当时

汪石山（1463—1539年），名机，号省之。安徽祁门人，随父行医而终成明代大名医。生平著作丰富，《外科理例》9卷，是其许多著作中之一。书成于1531年。

沈之问，从祖父起三代业医，对麻风病最有研究。所撰的《解围元藪》4卷，成书于1550年。

《窦氏疮疡经验全书》12卷（上海广益版为6卷）。旧题宋·窦默撰。事实上是后人伪托的伪书，乃明代江苏无锡人申氏手笔，详见1957年《上海中医药杂志》月号45页，干祖望“谈中医外科的伪书之一……疮疡经验全书”。

临床上所见的病种，是收集得比较完整的。而且痔漏的病因、症状及治疗方法也第一次从孙氏笔尖下谱出。在解放前作为中医界的权威巨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是痔科医师奉为圭臬的专业之著，虽然把五痔衍化为 24 痔，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孙氏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要方》中痔科常用药如槐子、猬皮、大黄……等，到今天还是在临床上必不可少之品。后世所有有名的外科著作除个别少数如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外，一般都把感染、痔疮、皮肤病、瘰疬、脏腑内痛、意外创伤及急救等项目搜集在内者，却是采用《要方》的模式来撰写的。

所以《要方》在外科方面邀功论赏起来，也决不在妇科、儿科、耳鼻喉科与伤骨科之下。

（九）对营养卫生学的贡献

《要方》的“食治”一卷（卷 26），比最早的营养卫生学家孟洗《食疗本草》还早上几年。最有权威的忽思慧《饮膳正要》（1330）更早 678 年。因之可以夸耀为最早的第一部营养卫生学著作。

药食同源，事实上药仅仅是暂时的救偏，而食则日常生活中真正赖以维持其健康甚至生命。孙氏“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见《要方·食治·序论》），就要言不烦地一言道破。因之他更主张“夫为医者，当预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见《要方·食治·序论》）的药治应在食治失效之后，才再取用的正确思想。其食疗的中心思想，有五大重点：

其一，食治为主，不得意才求之于药治。

其二，必先明了食物的禀性，然后因人因病而选进。

其三，不能贪味恣餐，狂饮大饱。

其四，食后要适当地将息。

其五，凡某种食物对某一种病特别有治疗作用者，务当加多进食。

这样研究饮食、营养、素食及其对健康影响的学问——营养卫生学，到 1300 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

（十）对美容术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意男子的龙章风姿，女子的明眸皓齿，即使老年的也要矍烁蟠然。因为不仅仅是为美容而美其风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仪表上的精神面貌。君不见三国时大政治家曹操请崔季珪作替身去接见单于，也是为了仪容。《山海经》中已有不少用某药、取某物来“佩之”、“食之”

王洪绪（1669—1749 年），名维德，别号林屋山人，清代吴县人。世代以外科名于世，撰有《外科证治全生集》不分卷。他学说的特点是“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是外科全生派的创始人。

孟洗（621—713 年），唐·汝州梁（今河南临汝县）人。少时喜好方术，据说曾师孙思逸。撰有《食疗本草》3 卷。但原书已佚，散见于《证类本草》、《医心方》中，1984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新版印行。

忽思慧，元·蒙古族营养学家，曾任元代宫廷饮膳太医。撰有《饮膳正要》3 卷。

《山海经》，写成于战国时代，又经秦汉加以增删而成。书中记述各地山川、道里、部属、物产、祭把、医巫、原始风俗，往往参杂怪奇。晋·郭璞曾加以疏注。

而求得抗衰老容的美好。致于贴鬓画眉，在我国一直是流传着的韵事。

《要方·面药》、《翼方·妇人》的“妇人面药”、“薰衣浥衣香”、“令身香人”、“生发黑发”……几节文章，堪称中国美容方面最早而又较为完整实用的第一部美容术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珠海市的中西美容院，绝大多数都以“中药”作标榜。他们所取用的几种中草药，也都出于两部《千金方》。

孙氏在《翼方·妇人·妇人面药》中谓“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间亦不传示。”可见当时受旧礼教束缚之深，医家也对这种美容医药不能不予以保密封锁。也可能为了谋利于禄而保密自守。正因为保密，致《史记·滑稽列传》：“主人留髭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香泽”的与美容并列的香身法至今失传，是多么的可惜！但孙氏则偏偏秉着“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见《翼方·妇人一杂病》）的思想，把当时目为左道旁门或视为有失圣贤礼教的美容香身学公之于世。

他用较多的笔墨，把可供美容、香身的药方与药物，制成面脂、面膏、面粉、藻豆，用以泽润面容、芬芳身体、防止皮黑、生疮，并及于除狐臭、生发、染发、白发转黑的方法和治理。

这凡篇包括“面粉”在内的文章，是集古代化妆品之大成，在历代方书中，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朽著作。

至于疗效如何？似无可考数据，殊难回答。但再检阅一下清宫·慈禧太后所用的长发香发、美容健齿方中，不乏为两部《千金方》所用或由此启发而新裁的可以作证（见《慈禧光绪医方选议》）。

（十一）对老年医学的贡献

对松寿鹤年的老人，华封三祝，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之一。《礼·大学》谓：“上老老而民兴孝”，所以作为老年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老年医学，在医学体系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了。

孙思邈以真人水平来研究《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和“四气调神大论”等对老年期的划分，老年期的生理、病理和老化证状特点的理论，当然比一般饱学之士、医林国手更上升一层。再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阐明发挥。故他的洞察、研究、论点的精湛，远远青出于《素问》之上。

在老态描写方面，更能刻木三分，他总结出“心力减退，忘先失后，兴居怠情，计授皆不称心”，甚至“饮食无味，寝处不安”、“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嗔怒”（见《翼方·养性·养老大例》）的几个特征，从而抓住了体力、精力及内在的心理变态等特点。

老年病的治疗大法，孙氏归纳为饮食疗法和药物治疗。孙氏既为道教中人，所以更善于使用其吐纳、导引等修炼内丹方法来作为辅助。现在临床上还是恪守着这个指导思想来处理老年病，历1300多年而不衰。

以孙氏善谈庄老，兼好释典，深受道释两教，更其是道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有意无意中把两教的清净无为，六尘不染，五色皆空与儒家之“吾善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共搜集慈禧、光绪的医方391首而成。内中以保健的为多，关于美容方面也不少。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养我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上》）的修心养性方法，引进到医学中来而丰富了防病、去疾、健身、抗衰、益寿、延年的内容。

孙氏更指出，除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之外的防老延年法，还总结出：

1.要稳定情绪，节制过度的用脑用力。用它的话来说，是“如膏用小炷之与大炷，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多繁而我小记，众人悖暴而我不怒。不以小事累意，不临时俗之仪。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天下莫我知也”（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

2.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节制。用他的话来说，是“乐恬淡之味”，“食不可过饱”（见《要方·养性·序》）。

3.要适当的活动和轻松的体力劳动。用他的话来说，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见《要方·养性·道林》）。但又“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见《要方·养性·序言》）。

4.要养成卫生习惯。用他的话来说，是“第一勤洗浣，以香沾之，身数沐浴，务令洁净”（见《翼方·退居·养性》）。以及居处要“椽梁长壮，柱高间阔”，“草盖令厚二尺，则冬暖夏凉”（见《翼方·退居·缔翊》）。

以上四点，是纲领性的关键所在，至于节欲、戒酒，忌烟。贪嗜、不避风雨、居心不良……等养生常事，当然也言之及之。

总之，他的两部《千金方》，都是在道教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发扬《内经》精神，参以自己经验体会而写成的老年医学重要著作。且看从来·陈直《寿亲养老新书》到清·曹庭栋《老老恒言》的所有老年防衰保健专书，都是在孙思逸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就可以显示出孙氏在老年医学方面的真正价值。

（十二）对预防医学方面的贡献

预防，为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即使在原始社会里，也早就学会了这套本领。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像今天那样的要求。同时尽管我们现在最先进的预防，是否能保证在一两百年之后的后人不会指责我们的落后？所以在1300年前的孙思邈时代，只能是由朴素的、迷信的和凭经验的三个支流混合而成的预防医学，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苛求。同时更要想到，正是他们涤讪的基础，架上了人梯，我们才有今天这样有系统、合乎科学的预防医学。

自《易·既济》提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之后，中国人都知道并做到“居安思危”、“趋吉避凶”的戒心常存。这门科学，从秦汉时代（公元前219—前220年）就把它引进医学领域里来，终于发展到今天的研究预防和消灭病害、讲究卫生、增强体质、改善和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一整套预防医学。在这2000多年中孙氏承上启下的功绩与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他的预防思想和办法，在两部《千金方》中明显而忠实反映出来，例如：

陈直，宋时人，元丰中为兴化令。撰有《寿亲养老新书》1卷。又称《养老奉亲书》。

曹庭栋，清代隐士，字慈山。所撰《老老恒言》5卷，成书于1773年。1981年上海书店排版发印时，改称为《养生随笔》。

《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的“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脏腑骨节皆未成足，故自讫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这说明人入世之前，早已有预防措施。

《要方·妇人方上·产难》的“产妇虽是秽恶，然将痛之时及未产、已产，并不得令死伤、污秽家人来视之，则生难。若已产者，则伤儿也。”这是对产妇产子的双方保健，预防意外，因为这时是意外事故最易发生的时刻。

《要方·少小婴孺·初生出腹》的“小儿初生，先以棉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此为之玉衡。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几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帟帐之中，重衣温暖，譬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堪风寒也”，“凡乳儿不欲太饱，饱则呕吐。每候凡吐者，乳太饱，空乳乳之，即消”。

《要方·少小婴孺方·容许》的“欲防之法，诸有从外来人及有异物入户，当将儿避之，勿令见也。”

《要方·丁肿第一》的“卒然大风大雨大寒大热，若不时避，人忽遇之，……变成痈疽疔毒恶疮诸肿”。

《要方·诸风》：“五月五日多取（瘧耳叶），阴干之，着大瓮中，稍取用之。若欲看病（指门诊或出诊）、省亲者，便服之，令人无所畏。若时气不和，举家服之。”

《要方·食治·序论》：“食啖鲜肴，务令简少。鱼肉果实，取益人者而食之。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盆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这是饮食方面的保养。

《翼方·退居》“择地……，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立一正屋三间。……瓦盖之，四面筑墙，不然新垒，务令厚密。……充念诵入静之处。中门外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菱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堪采食，兼可阅目怡闲也。”这是居住方面的保养。

《要方·养性·序》“不自摄养而驰聘六情，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干诈万巧以求虚誉，没齿而无厌。故养性者知其如此，于名于利，若存若亡。……是以其志闲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惧，其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这是在性情方面的保养。

孙氏更针对一批小病大养，无病吃药自以为是保健而实是慢性自杀者提出了警告，谓“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见《要方·食治·序论》）。

当然，孙氏在保健的预防学中，以时代的关系而或许涉有些不科学成份，这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孙氏的种种思想、方法和1300年后的今天不能一一符合，但这样的比较系统、完整、实用的预防医学，在他之前似乎没有见过。

（十三）几首用了1300年到今天还有生命力的常用方

用杨倓《家传方·自序》中的“探天地清浊之源，察阴阳消息之机，顺

杨倓，宋名医，但籍贯及生歿无考。撰有《杨氏家传方》。

四时之宜，籍百药之功，以治人之疾者也”来赞美商部《千金方》中几首方剂，再帖切也没有了。否则为什么以下几方使用了1300多年而还在临床上一日不可无此君！犀角地黄汤：它的清营解毒，凉血散瘀的作用，十分稳定。过去仅仅使用于疗疔、出血、发斑……等病种。现在已扩展到急性白血病、肝硬化、过敏性紫斑……等。纵然抗菌素、激素脾眠一切，但还没有办法来把它挤出临床。

三物黄芩汤：现在还为妇产科用于产后营血内热，烦躁阴亏等症。

温脾汤：一见于《要方·脾脏下·冷痢》、又见于《翼方·补益》。内容虽然前者有桂心无甘草，后者有甘草无桂心，但作用基本相同。现在临床上冷积便秘或冷瘀腹痛，泄泻难止，休作无时，四肢不温之症，还是非它不可。

苇茎汤：它的清肺法痰，化痰排脓作用可靠。所以在西学中队伍里很有知名度。凡肺脓疡、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继发性感染，甚至麻疹中期，热性病余热难清……等等，医生考虑用药时，包括西药在内总是在前三位之内。对其一型急性鼻窦炎，也有一定的疗效。

温胆汤：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二陈汤，不愧是一张临床上跌打不破的有效名方，纵横驰骋、推枯扫烂于内、外、妇、幼各科疾病领域里。但却很少为人知道的是它是取之于《要方》温胆汤中四味药而成方。因之真正的贡献，不在《局方》而是《要方》。考痰证，未见于《内经》，到《金匱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才在医学领域里第一次漏脸。虽然很早就有“淡”。考“淡”字《文字集略》疏为“澹通淡，胸中液也”。不管为淡为澹，但与医学尚无联系。所以张仲景的论痰，

尚在初期阶段。至宋，《太平圣惠方》（992年）、史载之《史载之方》（1117年）、《圣济总录》（1111—1117年）、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174年）、严用和《济生方》（1253年）、杨士瀛《仁斋直指方》（1264年）……等有名医学文献中，把痰证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之后，王隐君的《泰定养生主论》，才把痰证基本上认识得“得窥全豹”，他的礞石滚痰丸一方，更是脾睨杏林，饮誉千古。逮明代以后，则各家更有增枝助叶，作锦上添花的发明。所以自张仲景至宋代之间的一段时间里，论痰的都未深入，且看《诸病源候论》（610年）也只有寥寥十六论（在卷二十）。因之孙氏在这个时

《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简称《和济局方》或《局方》10卷。宋·太医局编，初刊于1078—1085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方书。

《文字集略》，见《中华大字典》“淡”。

史载之，名堪，宋·四川成都人，政和中（1111—1118年）进士。所撰《史载之方》2卷，粹于1117年。

陈言（1121—1190年），字无择，号鹤溪，宋·浙江省青田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福建莆田人，撰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又称《三因方》18卷，成书于1174年。

严用和（1200—1268年），字子礼，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曾提出“补脾不如补肾”学说。撰有《济生方》10卷，书成于1253年。但佚散失传，解放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成《济生方》，于1957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在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又排印了《重订严氏济生方》，分41门。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南宋·福州怀安（福建闽侯县北）人，世医。撰有医书多种，内《仁斋直指方》4卷，内分12门，成书于1264年。

王隐君（？）名珪（也作圭），字钧章，号洞虚子，因隐于虞山，故人称隐君，元时吴县人。撰有《泰定养生主论》16卷。王氏对痰证最有研究与成就。

期里订出温胆汤，是令人惊叹的，而且到今天还在方剂学中稳坐着重要的交椅。可能也有人说，这方也是当时在临床上常用之方。即使的确如此，那末也像麻黄汤、桂枝汤等被张仲景所总结而得以传诸后世一样，也是厥功不小。

磁珠丸：《要方·七窍上·目病》名神曲丸，至今还是为眼科病、耳科病不可缺少的重要药品。它的商品药，满布全国及东南亚，久销不衰。

枕中丹：在《要方·小肠腑·好忘》中称为“孔子大圣知枕中方”的枕中丹，的确一如孙氏所谓：“常服令人大聪”，现在在滋补药中仍然占着重要的位置。

小续命汤：现在临床上，仍为常用方，因之《成方切用》认为是“此六经中风之通剂也”。

独活寄生汤：为现在对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他慢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坐骨神经痛……等属于肝肾两亏、气血不足证疾病的常用方。之后，有名治痹方剂如《妇人良方大全》的三痹汤、《百一选方》的蠲痹汤……等等，都是从本方衍化而来的。

驻车丸：孙氏凭着“用黄连以驻鹿车之骤（典出《汉书·鲍宣妻传》的“与宣共輓鹿车归乡里”），用干姜以策牛车之疲（典出《史记·淮阴侯韩信传》的“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指导思想而订此方，故而名为驻车。世界上不乏有美好的想象，未必能代表有美好的愿望，所以这里以效益来评议。因之在临床上来检验，此方凭它滋阴补血、固肠止痢的作用，对湿热久困，日久伤阴，下痢脓血，里急后重，脐腹疼痛，身热心烦，……的病证，可以收到预期的疗效，至今在内科领域里推崇为有效名方。

紫雪丹：在《翼方》中名紫雪，孙氏认为其色紫绦，大有绎雪出于紫台（仙人居信之处）而名“紫台绦雪”，最后截为“紫雪”两字。考紫雪丹有三种处方：

《温病条辨》（1789年）及现在全国法定处方（见《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1962年））都取用《和济局方》。现在很多方剂书上把紫雪丹的出处都写作《和济局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纠正过来，是《翼方》。

紫雪丹凭它的清热凉营、解毒止痉、开窍安神的作用，治疗急性热病和麻疹、猩红热、脑炎、斑疹伤寒……等，甚至败血症、脓毒血症、海绵窦血栓等严重病症。对高热烦躁、抽搐痉厥，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更是在重症、危症的乙脑、流脑，有折旗斩将的屡立奇功，更使中西医界对它的拜倒。除此之外，在方剂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有名的“御药院方”天真丸，是在《要方·妇人方中·心腹痛》中三首羊肉汤、羊肉当归汤和羊肉生地黄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要方·脾脏下·热痢》的“下痢热者诸治不差方·乌梅、黄连”，至今还是内科医师经常取用的特效方。

《要方·胃腑·痼冷积热》中竹叶汤，仍然为内热骨蒸、心烦津燥病的有效方，为现代医师所乐用。

《成方切用》13卷，成书于1761年，分24类，搜方1180余首。作者清·吴仪洛，字遵程，浙江省海盐人。

《百一方选》28卷。宋·王璆撰，字孟王，山阴人。

《温病条辨》6卷，清·吴鞠通撰，吴名璜，江苏省淮阴人，为温病学奠基人之一。

《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62年发行。

如其我们把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回中“留芳百世”改为“留方百世”来赞美孙思邈的两部《金千方》，其谁曰不宜。

（十四）提倡综合疗法

宋·林亿的《新校备急千金方·序》谓“苟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不足以极表里之变”。这正是对孙氏医学思想的真实反映。谁能做到这点？接下去用回答的口气谓：“如能兼是，圣贤之组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孙氏自己也说过，谓“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引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急救之术也”（见《翼方·禁经上》）。

在孙思邈时代以前的医学著作：

《难经》只谈理论。

《素问》稍涉外治。

《灵枢》《甲乙经》专采穴位针灸。

《伤寒》《金匱》重于汤药。

《肘后方》重急救丹方。

《鬼遗方》专言外科。

《诸病源候论》尚吐纳导引。各自“凭我单枪，制尔二竖”。逮孙氏出而综合疗法以完整的面貌问世。从此即避免了孙军作战，独木支撑的局面而提高了疗效。

孙氏在治疗上主张把针、灸、药、手法甚至禁咒、符篆也配合进行，丸、散、膏、丹交错取用，内治、外治包括精神疗法同时兼施。以尽量争取缩短疗程，减少痛苦为目的。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时愈疾，兹为偶差，非医差也”（见《翼方·针灸上·取穴孔法》）。并批评那些“各承一业，未能综练众方”（同上）的医生。所以他的采用针、灸、汤、散交替或同时使用来治疗复杂、顽固的疾病如脚气病……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十五）几个了不起的发明和发现

1. 导尿

现在全球任何一所医院或诊所，导尿疗法是最最普通而又不可缺少的常规手段。但真正谁第一使用，是孙思邈。

《要方·膀胱·胞囊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能。以葱叶除尖头，内（古纳字）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

也许有人认为太粗糙，不卫生。但应该知道医学的进步，就是寄托在文化与工业，没有冶金术，永远也不会有金针。当时没有塑料管、没有橡皮管，竟能利用唯一的天然管型物来导尿，实是巧夺天工了。

2. 提倡检查而可惜后继无人

罗贯中（1330—1400年），元·明间钱塘人，一说山西太原人，名本。撰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240卷。

要有效的治疗疾病，首先要有准确的诊断，要有准确的诊断，必定先要详细的科学性检查。纵然我们早已掌握了四诊，但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四诊基础上加一个查，成为“望、闻、问、切、查”的五诊才是。在这里倒可以说，孙氏是提倡“五诊”的先驱者。

查诊两字在中医书上是见不到的，但孙氏却已在那里静悄悄地实行起来。君不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谓“谓之瘥也。诸反张，大人脊下容侧手，小儿容三指者，不可复治也”。这样科学性很强的检查方式，和“容侧手”、“容三指”的标准数据作依据，和20世纪的检查肝脏、脾脏及口腔科检查颞下颌关节的开合“一指”、“两指”、“三指”何其相同乃尔。这都是在孙氏之前所没有见过的。如其后世每代医生都能接受他的启迪而深入发展，恐怕现在也不至于对西医的检查瞠目而瞻其背了。

3. 烟熏疗法的始创者

烟熏疗法，是药气藉火气而趋达病灶的疗法。虽然《素问·血气形志篇》有“治之以熨引”，《灵枢·经筋篇》也有“在内者，熨引饮药”的熨，也是赖药气藉火气而透入病灶所在之处，但方法完全不同而并这里的烟熏疗法。孙氏此法，是在《要方·七窍病下·耳疾》：

作一坑，可容二升许，著炭火其中。坑似窰形，以砖覆口上，砖上作一孔子，容小指。砖孔上着地黄一升，以木盆覆之，以泥泥盆下，勿泄。盆底上钻一小孔，可容筷。其孔上着三重布，以耳（有病的）孔当盆上熏。久若闷，去黄水（外耳道分泌物），发裹盐塞之。

《要方·诸风·风懿》：

治卒中风口 方，以苇筒长五寸，以一头刺耳孔中，四畔以面密塞之，勿念令泄气。一头内（古纳字）大豆一颗，并艾烧之令燃。之后，《外台秘要》的疗欬饮烟法，《澹寮方》的熏头风方，《御药院方》的龙香散治偏正头痛以及在气管切开术未普及之前作为抢救急性喉梗阻的巴豆捻子烟薰法等等，都是向孙氏学习而得来的。毋怪乎今顿亮只卿在《医事启源》中谓：“嗅炯，……最为有效焉，千金疗咳薰法，……”

4. 取用阴道塞药栓

《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右十味，未之，以绢袋盛，大如指，长三寸，盛药令满，内（古纳字）妇人阴中，坐卧任意，勿行走急。小便时去之，更安新者”。

5. 第一人发现“三早”的重要性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也是孙氏第一个人所发现和提出。《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在死者众，略而言之有三种，一、觉之伤晚，二、骄狠恣傲，三、狐疑不决”。觉之伤晚，当然为不是早期发现；一个骄狠恣傲者，必然刚愎自用，正当的言语不会接受的，所也不会听你医生准确的警告与诊断的，即使早期诊断，也无助于事；狐疑不决者，必然因循误事，失去治疗机会。三者失一，那有不枉死之理。与此相反，即使重症麻

《澹寮方》全称《澹寮集验秘方》15卷。元·释继洪撰。

《御药院方》11卷。元·许国祯撰。

个顿亮只卿，日本有名汉医名家。撰有《医事启原》20篇，在中国搜集于《皇汉医学丛书》中。

风病，但能及时早治，也可免于死，所以孙氏指出“斯疾（指麻风病）虽大，疗之于微（指初起的轻微阶段），亦可即差（同瘥字）”（见《要方·痔疮·恶疾大风》）。即使其他的病，也是“感病轻微（指初期），易于医疗”（见《要方·序例·用药·或曰》）。

（十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著作

“无心插柳柳成荫”，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这样。孙思邈在写这两部《千金方》时，决不会想到在保存亡佚书籍方面作了如此的贡献。

从西晋（265—316）、十六国（304—439年）、南北朝（386—589年）而至隋皇朝（581—618年）350年中绵连战祸，人民颠沛流离，非但当代的医学著作无法产生，而且已有著作也因之而散佚。直到唐代，国家统一，生产发展，交通发达，对科学、文化和医药学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孙思邈生逢盛世，他的两部《千金方》在稳定宁静环境中就得以大量地引用、摘录、转载了许多当时尚幸存而现在宣告失传的抄本、珍本、孤本甚至残本缺页的著作，使唐以前的医药成就不至于全部湮没毁灭而失传，或多或少保留到后世。

所以林亿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谓：“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且看两部《千金方》中摘录或转载唐前现已失传的文献，如《药对》、《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小品方》、《水经》、《名医别录》、《新修本草》、《小儿方》……等，如其没有两部《千金方》的摘录或转载，则从此即真的广陵散绝！

再看1981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唐·新修本草·辑复本》、1983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小品方辑校》与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名医别录·辑校本》在恢复、整理工作中，两部《千金方》就显示及证明它在这方面的贡献。

（十七）善于正确吸收外宋医学学说

除号称古老的中医学外，世界上还有印度医学，大约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时上古文献《阿闍婆吠陀经》731首诗中不少是描述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苏希罗塔本集》里，就已对人体的血液循环作了朴素的论述。

当初印度称医生为“阿优吠陀”。阿优的意思是生命、年龄和寿命。吠陀的意思是知识。所以全文的意思是生命的知识者，也可以理解为长生之学。后人称这种医学为“吠陀医学”。孙思邈时代，以佛学的兴旺，所以与印度的接触频繁，因之而医学也更多的输入。故而孙氏的吸收国外学说也必然的以印度为主。

当时印度文化的对中国影响是巨大的，它甚至能把中国的历史都可以左之右之。人尽皆知“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是一手创造，“天、地、人”的中国第一位圣人，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盘古氏确来之于印度。中国最早的著作，

首推《山海经》、《楚辞》等，可是在这里面都找不到盘古氏的踪迹影象。《楚辞·天问》中有。“女蜗有体，孰制匠之”的女蜗；《山海经》中有“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的伏羲；《礼记·月令》中有“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的神农；《书·吕刑》中有“蚩尤惟始作乱，……黄帝请问下民”的黄帝，而独独不见盘古氏，即使秦汉之际，也没有盘古。直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三国（220—280年）时徐整《三五历纪》中才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见《太平御览》）。所以盘古的出现在第三世纪之末，也就是佛教盛传中国之后。那末徐整的盘古又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呢？他是以“梵天”作摩特。梵天亦称大梵天，在印度称“婆罗贺摩”，是婆罗教、印度教的创始人，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梵天出自“金胎”（即梵卵），他把卵壳分为两片，在上为天，在下为地。徐氏巧妙地把《易·乾凿度上》“太易者未见之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似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似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混沌”的“混沌”相结合而塑造出一个混沌世界，然后待盘古氏去开辟。这种说学，又影响到中医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鸡·鸡子·发明》中也谓：“卵白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

所谓吸收，是吸取与接收，一个学说能使另一种学说摄入其内并与之融和或化合使之更完整提高。孙氏在这个问题上做得相当成功，而且更作为后世之法。其所以然者，有两个十分重要而又常常被人未加注意的手段，即“百川归海”样的善于容纳与“用夏变夷”法的不使中医变色。

1. 百川归海

每个人想干什么事，必然先有思想的指导。否则必然茫然妄动，一无成就。孙氏深深知道，要当好一位合格的大医，除了在本职内的学问深入钻研之外，一定还要开阔视野，充实知识。这个思想早就在《要方·妇人方上·求子第一》第二节的“至于学问，则随情逐物，堕于事业。诘肯专一推求至理，莫不虚弃光阴，没齿无益”一言中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孙氏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吸收外来医学学说，那有不成功之理。

印度医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主张对病人先“净身”。这个治法是否为接受了佛教“净心”、“净口”、“净名”、“无垢”的影响？一如中医把五行的进入医学，那是无法得知了。所谓净身法，绝非中国宫闱的净身，而是先把病者身体内外荡涤得干干净净，手段不外乎取呕吐、泄泻和放血等等方法。只要病体洁净之后，用药取治才有效果，所以《要方·脾脏下·热痢》的开始九个“下之”、“急下之”、“更下之”，殊符吠陀医学这个学说。

甚至孙氏念念不忘这个净身学说，错误地加到张仲景身上，《要方·序例·诊候》的“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其实张仲景的用泻法，仅仅局限于“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气汤主之”；“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绝对不是“先以汤药涤五脏六腑”。而且张氏更强调“……若汗多，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见1955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本《新辑宋本伤寒论》第

《山海经》，称为夏禹、伯益所著，殊不可靠，最可能的为战国时作品，经秦汉有所增损。内容多怪异，保存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材料很多。

《太平御览》1000卷，宋·李昉等14人奉敕编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馆，历8年定稿，完成于984年。

208条)。张子和的“夫病之为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然，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见《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论》（卷二），可知张氏独宗汗吐下更其是吐下两法的学术思想，是直接接受于孙氏间接接受于吠陀医学的影响。

古印度的吠陀医学还有一个由“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认为人体有101种病，“四大”各有一个101种，则全身即有404种疾病。如：

《要方·序例·诊候》：“四气合德，四神安和，……”；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将知四百四病”；

《要方·养性·调气》：“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痺、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

《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疾风有四百四种”。

以上论点，都来之于吠陀医学学说，通过孙氏用“用夏变夷”的巧妙手法来使之国粹化，以冷来代表水，热来代表火，风来代表风，气来代表地而使歧黄医学与吠陀医学中间的鸿沟填平了，更进一步成为歧黄医学。吠陀医学“四气”之说，经过孙氏的引进，非但在医学上影响巨大，而且连民间都受到它的冲击波，例如《三国志评话》卷上的“学究用手揭开匣盖，见有文书一卷，取出看罢，即是医治四百四病之书”，《倩女离魂》第一折“三十天飏了，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害了，想思病怎熬”，就可证实。

孙氏还十分崇拜印医耆婆，在两部《千金方》中，屡屡提到他。并引用了他的万病丸、消石酒方、大白膏、大黑膏……等十多首耆婆的方药。更欣赏耆婆的“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见《翼方·药录纂要·药名》），为之记载于著作中，而且还不折不扣的照样去发掘新药。

孙氏全套引进了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在《要方·养性·按摩法》中作了详细介绍，还不惜笔墨转录了18个全部操作过程，完整无缺。总之，孙氏是抱“偶逢一方，岂怯千金”（见《翼方·禁经上》），“驰百金而询经方”（见《翼方·序》）的精神来追求一方一药、一技一智的，包括外来医学。

此外，零零星星散见于两部《千金方》中还不少，如“胡运迦摩罗病，世医拱手无方”（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有天竺大医耆婆”（见《翼方·药录纂要》）……等等。

孙氏对这样外来方药的研究、探讨、实验、总结、推广及记之于笔墨，已经十分艰巨了，可是更困难的是用中医传统理论来溶解于实践观察、理论检验中，使它成为中医辩证论治的武器。且看：

婆斯盐（见《要方·七窍病上》）。

匈奴露宿丸（见《要方·胃腑·痛冷积热》）。

诃梨勒蜜丸（见《要方·肺脏·积气》）。

戎盐（见《翼方·本草上》）。

张子和（1156—1228年），名从正，号戴人，河南考城人，金元四大家之一。特点是擅用汗、吐、下三法而成家。所撰《儒门事亲》15卷，成书于1228年之前。此外尚写有《治病撮要》《张氏经验方》……等。

《三国志评话》，成书于元朝，为《三国志演义》的蓝本。

《倩女离魂》，元代有名的杂剧剧本，作者郑光祖，取材于唐小说《离魂记》故事。

西蕃阿魏（同上）。

婆律国膏香（见《翼方·本草中》）。

西域毗梨勒（同上）。

西戎底野迦（同上）。

除天竺医之外，在盛康之世，国内外的兄弟民族也相处得很好，所以民族医学也得以有交流的条件。如西州（现在新疆吐鲁番县及都善县一带）的续命汤、蛮夷酒、露宿丸……，波斯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东部为大秦，因为该处风土人情接近中国）的悖散汤……等。

在养老食疗方面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所喜食的乳、酪、酥等，而且对它的性质、作用加以探讨。但又告诫老年人在“夏至以后，秋分以前，勿进肥浓、羹臄、酥油酪等”（见《翼方·养性·养老食疗》）以适应长江、珠江流域居民的体质禀赋、生活习惯。

孙氏为什么主张集思广益？他的回答就是“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竟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捐其源流”（见《翼方·禁经上·论曰》）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

2，用夏变夷

孙氏肯定读过《淮南子·汇论训》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因而他的研究和运用医学时就反映出这个思想。所以他没有狭隘的保守思想，对外来学术思想不是拒绝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用欢迎的态度来引进、研究和应用。但他毕竟是登孔孟之堂、入儒家之室的人，所以对孟轲的教诲，更拳拳服膺地执行。孟子曾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见《孟子·滕文公》）所以他把外来学说的理论探讨、临床运用，都在恪守不渝地抱着“用夏变夷”的思想来处理。

这一时期，唐代国内民族关系增强，交往频繁密切。对外关系也采取开放政策，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达30年之久，孙氏一生中黄金时代也有幸而躬逢盛世。以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路，与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来频繁，外来医学、药品也随之而源源不竭地输入或输出，给医学与本草学灌注了新的血液。

当时的内外交往虽然很旺盛，但只有印度以佛与医的关系而占居首位，对医学的影响也最大。如其孙氏而迷信“一切外来的好”、“月亮在外国更圆”而把印度医学请进了中医堂室之内来指导、指挥、改造、统治了中医，那末恐怕20世纪的今天，中医早就“无瞧类”矣，所存者唯“吠陀医学”的中医！

我们看孙氏如何把外来医学，与中医传统学说相结合、溶化、改造成为中医的东西，且看以下几个例子：

《要方·序例·诊候》“吠陀医学”的“地水火风”作了以下的配匹对照：

同时还把“火”隐射为心，“风”隐射为肝，“水”隐射为肾，“地”隐射为脾。

我们再看《要方·脾脏下·热痢》中九个“下”：

孙氏的取用净身法，是有选择的，并非不问虚实、寒热而恣意泛用。明白的说来，他已用中医传统理论来使这个“净身法”转变为中医的“净身法”。

这就是孙氏的“用夏变夷”手段，使外来的学说为我们利用。换一句话，就是把“吠陀医学”加以改杂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内容。

孙氏把吠陀医学“净身”作用的“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论点，巧妙地轻轻引导纳入中医理论的轨道上来，谓：“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

在《要方·养性·调气法》的用夏变夷手法，更是天造地设的神妙。他解释“四百四病”，丢掉了“吠陀医学”本来的意义，新创了“百病不离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疾”学说。的确，以81病乘以五脏之五，得数为405。虽然多了一个“一”，但中国向有“缺则积而闰之、余则舍而去之”则恰巧为404。这81，从九的自乘而来，中国古代就认为“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见杨雄《太玄经》）。甚至更认为是天数，《管子·轻重》：“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且看周代官制，就已有“天子有八十一元士”的规定。医学经典著作《素问》、《灵枢》、《难经》也都是九九八十一篇。所以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孙氏利用、改造外来学说的苦心，更钦佩他的匠心独运、智慧天才地来把一个外来学说在轻描淡写中改成突出中医风格的为我所用的国粹。

“吠陀医学”的学说，原出于“四大”、“六大”。“四大”指地水火风四者，内中又有“假四大”与“实四大”之分。“假四大”是指客观存在的、人们所见到的土地、流水、火焰和空气流动的风。“真四大”又称“四界”或“四大界”。内容为：

一地大，稟性坚韧，支持万物；

二水大，稟性温润，收摄万物；

三火大，性温值和，调熟万物；

四风大，性好活动，生长万物。

如其扩大一些，则成“六大”，是：

五空大，指事物的虚幻莫定；

六识大，指表示一切精神活动。

现在再对照一下《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

将知四百四病，身手自造，本非由天，及一朝病发，和缓不救，方更诽谤医药无效，神仙无灵。故有智之人，爱惜生命者，当自思念，深生耻媿，诚勤身心，常修善事。……

很明显地看出孙氏由“假四大”而进入“实四大”，再由“实四大”而领会到“六大”。纵然层层深入，但终以中医传统理论来结束全文，把四大、六大学说，充实了中医。

孙氏在《要方·养性》中全部照录了天竺国婆罗门的“迦瑜按摩”。但巧妙地踵接着又抄录了“老子按摩法”，而且内容比“迦瑜按摩”多了一倍以上（前者21行，后者50行），用来把外来的按摩稀释到不居主位的位置。孙氏尚未之为足，又加上了“调气法”一节，把已经屈居宾位的“迦瑜按摩”更下降到宾中之宾，从而显示出还是中国的东西是主。这又是另一种“用夏

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汉·四川成都人，字子云，为汉代大文豪。所撰《太玄经》，全书分为一玄、三方·九州、27部、81首。用三分法把事物变化机械地纳入以九为基础的格式中。

和缓，指战国时医和、医缓两名医。

变夷”的手法。

所以孙氏的准确对待吸收外来学说态度与方法，永远是我们百世之师。同时我们再找一个吸收外来学说工作方法来作对比。当鸦片战争(1840—1842年)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之后在一片洋务声中，大家也注意到他山之石的重要性，吸收了许多泰西医学，可惜都没有孙思逸这样思想和做法。请看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医洪士提反的《万国药方》，由洋务翻译局译成中文，拟把西方新药介绍到我国来扩充中药的内容。该书是这样吸收的：

例一，下醋酸铜，旧名铜养炭轻养，结冰，绿色，味似铜。治恶疮。

例二，醋酸桂，结冰如芒针，味苦无臭，每服一至五林士，解热用。

例三，玛替哥，主治白浊，在溺管内发其力。

请看如此吸收，怎能给中医来利用？但万幸的正是没有用它而今天还有中医的存在。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成书于1694年的《本草备要·辛夷》也有一节吸收西方医学，有：“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外来医学学说是吸收了，但十分可惜，孤单单的一节没有消化的文章，吸而不收，有等于无。两者(《千金方》与《本草备要》)对照，更显示出孙氏的才能。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孙氏对外来学说的利用，全凭“百川归海”、“用夏变夷”八字诀。内中“百川归海”尚易，而“用夏变夷”实难。因之笔者希望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同道，务需学会了孙思邈一套吸收外来医学本领与思想之后，然后再展开工作，以避免中医之学在体面而光荣中消失！

(十八) 疾病与梦的问题

《要方·序例·诊候》的：

阴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盛则梦蹈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扬，下盛则梦堕坠。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惧，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手足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器奇物；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见深渊，设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见游行；客于胃，则梦见饮食；客于大肠，则梦见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见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见斗讼自剖；客于阴器，则梦见交接斗内；客于项，则梦见斩首。客于脖，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乃渠阱窟中居；客于股，则梦见礼节拜跪，客于胞值，则梦见溲溺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善诊候者，亦可深思此意，乃尽善尽美矣。

《翼方·养性禁忌》的：

《万国药方》8卷，六眼线装本，现国内恐仅此一本，为作者所珍藏。

《本草备要》不分卷，清·汪昂许多著作中之一部，成书于1694年。

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沈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者则梦蛇飞鸟，衔发者则梦飞。心躁者梦火，将病者梦饮酒歌舞，将衰者梦哭。是以和之于始，治之于终，静神灭想，此养生之道备也。

孙氏的言梦，后人颇有微言，认为唯心迷信。其实病与梦的联系，肇于《素问·方盛衰论》、《灵枢·淫邪发梦》，甚至《金匱·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也有“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的记述，所以孙氏不是没有根据。稍前于《要方》一些时间的《诸病源候论·虚劳喜梦候》中更是有段文章的谈梦。而且孙氏文中不少的即从《诸病源候论》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孙氏没有理由来承担唯心和迷信的责任，又如东晋·谢安（320—385年）梦鸡，自知将死。因为鸡在十二生肖中值“酉”。不久果于孝武帝·太元十年逝世，因为该年甲子是“乙酉”（见《幼学琼林·疾病·死丧》）；后唐（923—936年）·刘赞，梦吞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梦吐出金龟而不久即死（见《古事比·梦寐》）；唐·李白梦见笔头生花而文思大进（见《开元天宝遗事·梦笔生花》）。

虽然事属离奇，但也不能一概以迷信目之。况且国外医学界也正在展开梦与病的研究，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发现和理论。

我们更应该知道，这样从病理学角度上来研究梦，与迷信唯心的“详梦术”务必严格分清，绝不允许混为一谈。

（十九）怎样来看待两卷“禁经”

《翼方》两卷“禁经”（卷二十九、卷三十），一直是后人更其是解放以后指责的靶子，进入20世纪60年代，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罪名不外乎是唯心、迷信、谎言、糟粕……等等。这种指责的理由是充分的、批评是准确的。本来嘛，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探求客观真理的科学面前，不论古人与今人都是平等的。

但我们更必需知道孙思邈毕竟是1300年前唐代人物，同时更要冷静地洞悉一下“禁经”的出笼，要与当时的地位、作用和与医学的关系。

禁法的内容实质，早在“第五章·真人”中“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三）符篆派的入幕之宾”中谈过，而且介绍得比较详细，这里不作重复，但已必需补充一些当时的情况。

考禁法，肇于嬴秦，盛于两汉，历南北朝、隋、唐而至于赵宋。虽然之后即告衰落，但这微弱的一息，不绝如缕地残喘苟延到明、清，直到解放之前，尚可在民间偶而一露面目。当然，在人们的头脑里科学细胞逐渐密度增高与无神论的占有整个

思想领域的时代里，势所必然地已无立锥之地。

在孙思邈时代，于高级知识分子队伍里，有不少人乐于此道，更妄论涉

《幼学琼林》4卷，清·程允升著。初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为今名。

《古事比》52卷，275门。清·方中德辑著，成书于1706年。

《开元天宝遗事》4卷，简称《开天遗事》。五代·王仁裕撰纂，采集民间传说中的唐明皇时期遗事，笔录而成。

猎、善谈、研究老庄学说的人。所以孙思邈而谈禁法，更在情理之中。

至于禁与医学的关系，在前论已言之详矣。这里重点谈一谈当时的医事制度与医界大事。根据《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经籍志”或“职官表”或“百官志”、《唐六典》、《唐律疏义》……及《历代职官志》的记载，可以了解如下。

在医事方面，我国历来就是靠师徒、父子传授的方式，甚至今天的中医还是如此。至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秦承祖奏置医学博士，用以教授医学于第二代，从此开始有了初级形式的医学教育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门道。南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吴兴大水，疫病因之猖狂，乃立“廨”以收养、治疗给药。所谓“廨”，是民间自发性组织起来的以救济灾民的寒衣、粗粮及治病的慈善机构。这是在医务事业上中国第一个私立慈善医院的最早形式。北魏·宣武帝十年（510年），平阳郡的禽昌、襄陵两县大疫，帝（拓跋元恪）诏敕太常，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这是这种慈善医疗机构，升级为官办。十二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太医、折伤医，并颁所需药，就治之。这是在抗灾救灾中的临时性医疗机构的开始。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诏太医署属太常寺。这是隋王朝开国之初，第一件事把太医署的归属，隶属于专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务的太常寺领导与管理。文教与卫生的归口可能从此开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尚药局、太医署。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这是医药界中的五个职称：专以药物治疗的为医师，针灸的为针师，按摩的为按摩师，用符篆禁咒的为咒禁师，专事药的为药师，地位等级相同。在此一举中，可以看出李渊一执政，入手即抓医药事业，而且具有大幅度革新的意义：其一，规定了医师、药师的职务、职称；其二，历来医生自己采药、制药，职业采药者也可治病，医药难以分家的局面，也因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精细的规律而两者明确的分工。武德七年（624年），设太医署中的教学机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个医学院校。武德九年（626年），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二人。这是在太医署内内部的调整。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减置医博士之助教一人，又置医师、医士佐之，掌教医生学习《本草》、《甲乙》、《脉经》。减置按摩博士一人，又置按摩师、按摩工佐之，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除人八疾。李世民在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召见孙思邈入京的那年，即大事整顿，而使医药制度，更臻善美。

当《要方》脱稿后一年的永徽四年（653年），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医药法，内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造畜蛊毒以毒药药人，医违方诈疗病，医合药不如方，妇人怀孕犯死罪，拷决孕妇等刑法。

在孙氏在世的时期中，医学的分科情况，大体如下：

其中咒禁一科，非但是临床上与所有医科平肩并坐的一个科目，而且在教学中也是列入重点的培养对象。

《唐六典》30卷，为《新唐书·百官志》的蓝本。

《唐律疏义》30卷，唐·长孙无忌等撰。

《历代职官表》63卷，清·纪昀等奉敕编纂。

吴兴，今浙江省，吴兴县。

肆州，今山西省代县西。

所以我们打开两部《千金方》的内含科目来对照，与此完全一样。那末试问孙思邈有什么理由来把“禁法”排之于外而不予写入。这咒禁一科是为当时临床上需要的、教学上列入的、政府承认的和太医署规定的作为治疗手段之一的一个项目，是不能不写入的。所以如其欲加之罪，就一如责备三宫六院的皇帝犯了婚姻法。至于今天我们的废除它、摈弃它，这是我们的事，与孙氏毫不相干。

此外，医学是多学科的，和它周围的事物，更不可能毫无影响。当《内经》在撰作过程中，正是阴阳五行学说从萌芽到发展到鼎盛时代。例如《国语·周语》“阴阳分布，震雷出滞”、“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书·洪范》“水火者，百姓之所资生，是为人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在周围事物的影响和渗透下，当然《素问·六元纪大论》会得有“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的学说以感应。由之可知，我们古代任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医学都在这个圈圈里转，即使你不转，也身不由主地大转而特转而自己也不感到。

更其中医学，都从《素问》、《灵枢》中蕴育出来的。你抛弃了它，你即没法来谈中医。

隋、唐初期，在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突破性的进展。如隋代卢太翼的占候算历之术，耿询制造出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裴矩画出《西域图记》的平面地图，唐代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三次方程的解法，魏王李泰命萧德言、顾胤等撰写《括地志》……等等，不论在天文、地理、数学及其他实用科学方面高度成就，他的冲击波肯定要冲进并动荡到医学领域里来的。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说得再明白而坦率的说来，是不允许你离开当时的时代气息而作真空的星外人，所以孙氏也及时地提出了必须“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见《要方·大医习业》）的要求来适合潮流。那末他有什么理由来把当时国家承认、医政规定、医生研究、人民取用的医事各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咒禁科”摈弃不录。我们再细读两部《千金方》，孙氏基本上每一种疗法的章节中都附有病例来证明疗效，而独独“禁经”中付之阙如，那末孙氏的良苦用心，我们有心人也能体会得之。

至于现在我们用不用它？那是我们的事，等于我们对待《素问·腹中论》的“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一样。

所以徐灵胎较为客观，对于禁方的看法，是“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见《医学源流论·禁方论》）。

卢太翼，隋·河间人，不求荣贵，隐居五台山，善占候历算。晚年目盲，以手摸字以读书。

耿询，隋·丹阳人。滑稽善辩，伎巧绝人。

裴矩（？—627年），好学，有文藻智数。仕北齐，作有《西域图记》三篇。

李泰，唐太宗第四子，封邑于魏，好学能文。

萧德言，贞观间历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能文。

顾胤，唐·吴人，永徽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

《括地志》又称《坤元录》，550卷，今佚。

（二十）白璧之瑕

本来世间金无足赤，玉有微瑕。评价极高、后人赞誉为质朴流畅的《陶渊明集》，尚且被萧统 批评为“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虽在闲情一赋”（见《昭明太子集·陶渊明集序》）。所以把两部《千金方》予以爬疏，当然有他的不足之处。例如：

1. 引证失实

多处引证，往往和被引者的口气不相符合，例如引张仲景：“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见《序例·诊候》）等语，根本不是张氏的口气和医学思想，明明是印度“吠陀医学净身”的说法。孙氏这里一错，也即《要方》影响了后世，之后1232年的陆九芝也追随而错误，在他的《世补斋医书·补后汉书张机传》中把《要方》从“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到“无地消散，病笃而死”一段257个字，一字无遗、一字不错的照录下来。使一位伤寒大家成了“吠陀医学”派的医生。

2. 过份夸张

“芜花散，治一切风冷痰饮癥癖 瘕，万医所不治者，皆治之”（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按下去谈到疗效时，谓：“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这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不能不搬出了“神”来解释。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医古书中大多是过份夸张“神效”、“其效如神”的，岂独孙氏一人。

3. 自相矛盾

既谓：“原夫霍乱之为病也，皆曰食饮，非关鬼神”（见《要方·膀胱腑·霍乱》），多么科学。但又称：“凡小儿所有魅病者，是妇怀娠，有恶神导其腹中胎。”（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客许·小儿魅方》）

既谓：“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见《要方·食治·序论》）揭示出对乱进药的害处。但又称“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气也”（见《翼方·退居·论曰》）。

既反对处方用药大多而谓：“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见《要方·序》）但自己处方用药（丸剂方不在内）超过三十味者屡见不鲜，甚至天门冬大煎有四十六味（见《要方·胆腑·胆虚实》）。

所以孙氏的思路是比较复杂的，既是“子不语怪”的儒家，又是“谈仙说易”的道家。尽管你想如何溶合协调，终究还要龃龉枘凿。但幸而在整个思想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很微。可以借用茅盾的话，是“这一切小毛病，只是白璧微瑕而已”（见《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

4. “房中术”问题

《陶渊明集》7卷。晋·陶渊明撰。

萧统（501—531年）字德施，为南朝梁武帝子。好文学，博览群书，年31岁卒，谥昭明太子，遗有《昭明文集》30卷，今本分为60卷。

陆九芝（1815—1887年），名懋修，清·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喜谈五运六气之说。

《世补斋医书》33卷，分正续两集，陆九芝撰，刊于1884年。

茅盾，近代大作家，即沈雁冰。

比“禁经”指责得更严厉的是一篇“房中补益”（在《要方·养性》的第八节）。考房中补益即房中术，这是古代方士、道士用运气、逆流、采战三个环节组成的节欲、保气、养生之道。它的作用，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益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但十分可惜，一如境界极高的艺术品素描人体画，在俗人眼里就沦为性感的黄色画一样，终于作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中一个丑事。

孙思邈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身后1300年之后，竟然为了这篇“房中补益”闹出了一件轰动整个中医界的很不光彩新闻。事实是日本·丹波康赖氏于日本永观二年，也即中国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以两部《千金方》作为蓝本而写成《医心方》，“房中术”当然也在取用之中。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把日本浅仓屋藏版影印发行。1958年上海×××老中医竟然和女徒弟也如法泡制，造成了全国中医界一片讨伐之声。于是卫生部下令收回已经出售的《医心方》，予以焚书毁版而了事。当时发行4500部，除库存、未售出及收回之外的流传在外的尚有100余部。这100余部，也如集邮一样地成为珍本了。

笔者弱冠之年（20岁左右，为1931年前后），从浙江嘉善西塘名医钟道生先生游，他藏书很丰，一以自娱，一以供生徒们学习。他几部《要方》却撕去了“房中补益”一篇，今天才知他老人的用心良苦。

孙氏此篇，肯定是根据“治病、保健、延年”而作为保健养生一个内容而搜集的。写者无心，后遗有患，毋怪乎被后人所非议指责。

或谓“房中术”无罪，乃是读者的“酒不醉人人自醉”耳。但不管如何欲人不醉，还是无酒为上策。因为它在医学上的作用，毕竟还是一个未知数，删之也未必可惜。虽然时历逾一个甲子，但尚未忘掉我老师的聪明。

房中术一节，的确是两部《千金方》的白璧之瑕，但对两部《千金方》的价值，并无损害。我很同意《四部寓眼录》的“有言房中术者，但可供查阅而已，至其议论之佳者，则不可废也”评语。

5. 转载问题

有人用柳宗元语“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见《柳先生集·辩文字》）来指责《翼方·痈疽上》中三节文字有剽窃之嫌。

“黄父相痈疽论第一”与《刘涓子鬼遗方》卷四“黄父痈疽论”雷同。从第一句“九江黄父相痈疽论黄帝间于歧伯”起，至“不斩去者死”。两者仅仅个别虚字有所各异之外，完全一样。

“诊知是痈疽法第四”与《刘涓子鬼遗方》“相痈疽知是非可灸法”，也完全相同。仅仅个别虚字有些不同。

“诊痈疽有脓法第五”与《刘涓子鬼遗方》“相痈知脓可破以未”也完全一样。在《翼方》中除了个别字同和多了一句“不尔侵入筋骨也”之外，也是一式两份。

其实这是转载，在历代医学文献中更屡见不解，不能与剽窃同日而语。

假如《刘涓子鬼遗方》而今天已告失传，那末正是这个转载而使古代不至于绝迹于尘环，相反的又是大功于医林了。

（二十一）在中医学学术上的地位

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医籍书目，虽有百余部之多，但能保存到唐代，也已凤毛麟角了。除了孙氏把它转载下来而得以使我们看到读到之外，更予以整理的医方，在《要方》有 4500 百余首，在《翼方》中有 2000 余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的医学宝库遗产，更搜集了黄帝、歧伯、扁鹊、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崔氏、刘涓子、范王、徐嗣伯、

以两部《千金方》篇幅浩繁，对普及颇为困难，但后人又不能割爱，于是宋·郭思把它浓缩成为《千金宝要》六卷。在宋·宣和六年（1124 年）刻石于华州公署。明·正统八年（1443 年），华州知州刘苍，以旧碑经过 370 年的风侵雨蚀而字迹模糊，又重刻了一次。景泰六年（1455 年），杨胜贤以石刻不便于拓印，再刻木版。隆庆六年（1572 年），秦王守中，又刻石碑，树立在太玄洞前。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孙星衍（1753—1813 年）又重刻一次。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商务印书馆把它搜集于用 3111 部古籍书组成的大丛书《丛书集成初稿》中，编号为 1433 号。

历代包括以医界为主的各界人士的评价，当然是公正的，例如：

林亿：“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原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见《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

林亿又谓：“粹乎哉，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见《校订备急千金要·后序》）

晁公武：“后世或窥其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见《郡斋读书记》）

郭思：“关百圣而不惭，贯万精而不惑。”（见《千金宝要·序》）

张学懋：“真人神化济世，全在千金一书。”（见《千金宝要补·序》）

秦王守中：“信有功于人之实用，乃珍如拱壁。”（见《重刊千金宝要·序》）

张路玉：“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上下也。”又谓“伏读卅卷中，法良意美，圣漠洋洋。其辨证之条分缕析，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干斯乎。”（见《千金方衍义·自序》）

《古书经眼录》：“医家之书，不为不多，独独真人千金方，决不可缺。”

《郑堂读书记》：“千金方辩论精博，囊括众家，高出于前辈。犹虑或有所遗，又撰千金翼方，以辅一家之书，可谓大备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翼，……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陈延之，晋代名医，生世无考，所撰《小品方》12 卷，为医学界名著。

支法存，晋代名僧，少以聪明入道，长以医术闻世。

崔氏，指北魏崔景哲。

刘涓子，东晋彭城人，系南朝到宋武帝裕的从父，曾任随军医官，精于外科。

范王，即范汪，晋·颖阳人，字元平，有著作，失传。

徐嗣伯，南齐人，为徐叔乡子。《南齐书》作徐嗣。

郭思，宋人，官徽猷阁直学士，故人称郭学士。纂有《千金宝要》17 卷，附论 1 卷。

华州，今陕西省华县。

《古书经眼录》12 卷，作者佚名。

《郑堂读书记》71 卷，补遗 30 卷，清·周中孚（1768—1831 年）撰。

《四部寓眼录》：“至其议论之佳者，则不可废也。”

刘毓崧：“专以拯人为急，而非以获利为心。”（见《千金方考》）

孙星衍：“真世间秘传之书，……书备其术，尤为济人之仁术。”（见《嘉庆重刊千金宝要·序》）

诸家评议不少，但总不及徐大椿的客观中肯，他在《医学源流论·书论·千金外台论》中谓：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

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无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一大变也。

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

以上徐大椿 306 个字的评议，虽然不敢谓：“后无来者”，但“前无古人”除张仲景之外的确毋容异议了。他不论用褒的字眼或贬的口吻，都对两部《千金方》的优点，客观、明察、求是、公正的下了断语。

徐文分三段；第一段立出一个如何才能称得上好的医学标准，以作为评议的准绳。他的标准是要医者严守古训，而且不允许有些雷越。

第二段，入题开始对两部《千金方》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却骨子里比表扬的还要表扬。批评孙氏用内经学说，但杂以后世臆度，其实所谓“后世臆度”，实质上是推陈出新。批评孙氏用古方而兼取后世偏杂之法，用药本乎本草而兼取杂方单方之品，实质上是承认孙氏在方药方面的发展和扩大，打破古人的局限性而适合于今天。所以徐氏指责批评的几点，正是孙氏优点所在。因为世界上事物总是在发展而不是静止的，一直停顿在《内经》阶段的思想是违背科学的。旁的不谈，主张守旧的徐大椿是否还在用鸡屎来治病？我无法得知，但徐氏所有著作中则于真万确没有见过他有鸡矢醴来治病的记录；那末为什么忘了《素问·腹中论》的“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其实徐大椿也并非真正的顽固守旧者，在这里固然以卫道之上的口气来议论孙思邈的推陈出新，但他自己在临床上也是推新人物。且看中医第一个取用舶来的医疗器械者就是他，他亲自这样说过“以洋刀点之，洋刀坚利非凡”（见《洄溪医案·发背》）。200 多年前的老中医，取用西医医械，也不可谓不“洋”了，而且还对这个舶来品赞赏不已。为什么？因为事物是在发展与进步。

中医学精髓所在，除“整体观念”之外，只有“辨证论治”。徐氏文中批判孙氏“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这正是高级的“辨证论

刘毓崧（1818—1867），清·仪征人，字伯山。所著《千金方考》12卷。

孙星衍（1753—1818年），字伯渊，号季述，清·江苏阳和人，乾隆进士。曾主持诂经精舍、钟山书院讲席。藏书丰富。

《洄溪医案》1卷，徐大椿撰，这是他晚年的著作。

治”。一个医生的高明与否？关键就在对“辨证论治”的掌握得怎样。

致于批判孙氏之方“故治病亦有效有无效”。如其用这顶大帽子去套在《伤寒论》《金匱要略》方剂头上，恐怕也不大不小地十分恰当的。徐氏既然崇拜《内经》的，那么请看《灵枢·痈疽》，内中有19个外科病，生者仅6个，而死的却有13个，治愈率之低是足以惊人，孙氏方的无效程度是否这样？第三段，属于赞美的。最后一句“不可磨灭”，的确估计出两部《千金方》的真正价值。

徐大椿的评语，比较客观而公正的。更其是文章一开始即开门见山，一言道破地谓：“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这九个字字数不多份量极重。一个人而能改变大局的局面，就伟大。

评某一部著作的价值，凭样印再版的次数来衡量，用现代语来说是发行量，倒也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且看两部《千金方》的版本罢。

从宋代至今讨论得很多，如《崇文总目》《脉望馆书目》、《医藏书目》、《读书敏求记校证》、《万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百宋一廬书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郑堂读书记》、《古书经眼录》、《百宋楼藏书志》、《经籍访古补遗》、《日本访书志》、《艺风藏书续志》、《善本书室藏书志》、《四部总录医药篇》……等等，都有记述或评议，这种情况，为历代中医著作所罕见的。以下将现存主要的古刻版本，再作一简介：

《要方》：

1. 宋·治平二年（1065年）原版（现在日本、米泽的上杉文库）
2. 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小丘山房乔世定刻本。
3. 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刊本。
4. 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吴氏重刻本。
5. 明·刘氏慎独斋刻本。
6.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年）刊本。
7. 《四库全书》本（1799年）。
8. 日本·天明六年（1786年）西宫园藏版皇都西村上勘兵卫等发行。

《宗文总目》66卷，宋·王尧臣等撰。

《脉望馆书目》，脉望馆，是明末·常熟（今江苏苏州市常熟镇）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书斋名。将藏书编成的目录。

《医藏书目》100卷，明代著作，作者待考。

《万卷堂书目》，为明代·广东省东莞陈璉藏书楼“万卷堂”的书目。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清·纪昀等编。

《百宋一廬书录》1卷，清·顾广圻撰，黄丕烈注。因顾氏藏有宋刻本百卷而名其书斋。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清·瞿镛编。瞿为江苏、常熟大藏书家，且多珍本书。

《百宋楼藏书志》120卷，清·浙江省归安（今湖州）·陆心源撰。陆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其书分藏于“百宋楼”、“十万卷楼”、“守先楼”三处。“百宋楼”中藏有200部宋版古书。

《经籍访古补遗》106卷，清·阮元主编。

《日本访书志》16卷，清·杨守敬撰。今人工重民续以《补遗》。

《艺风藏书续志》待查。

《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附录1卷，清·钱塘人丁丙撰。

《四部总录医药编》不分卷，分八门（之曷），近人丁福保、周云青编。

9. 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翼方》：

1. 元·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年），梅溪书院刻本。

2. 明·万历三十二年乙巳（1605年），王肯堂刊本。

3. 清·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金匱华希闾刊本。

4. 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上海印日本文政版。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孙氏在中医学学术上的地位，就借用北京中医学院的《中医各家学说·孙思邈》的“这两部书是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给后代传下了丰富的遗产”，“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二十二）国际影响

两部《千金方》的国际影响，主要在日本。

日本在《大宝律令》（701年）里，从中国引进的仅有《素问》、《甲乙》、《小品》、《集验》等书。纵然在682年两部《千金方》都已脱稿，但总以手抄不易、时间太短、交通不如今日的方便而未能及时传入。在897年逝世的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才见有《千金方》的记载。因缺乏可靠资料，只能推测起来，很可能那年66岁的鉴真和尚在天宝十二年（753年）12月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时带来的。

之后，成书于十世纪前半叶的深江辅仁《本草和名》中就有29种药，取材于《千金方》。

成书于日本·永观二年（982年），丹波康赖《医心方》中引用《千金方》的有481条。所以丹波氏有这样一句话，“脱离了千金方，就谈不到医心方”。

写成于日本·永保元年（1081年），丹波雅忠的《医略抄》，也把《千金方》列为23种日本医学重要文献之一。

丹波行长也用《千金方》作蓝本，在弘安十年（1287年）写成《卫生秘要抄》。

镰仓时代（指1192—1333年之间），重要医书《顿医抄》，就是释性全引用《千金方》中190方在1304年写成的。

到了室町时代（指1338—1573年，室町幕府时代）有了字典，饭尾永祥的《撮壤集》（1454年）中，把两部《千金方》列在30部重要医书中的首位。

直到现在，日本皇汉医家对这两部《千金方》在奉为圭臬而认真地在学习、探讨、研究。1975年6月23日，东京中央社电，题为“日本发现中国古代医书《备急千金方》”（见（1975年7月7日《参考消息》），文为：

……世界最古老的一本中国的疾病药方，被发现在日本保存下来。这本古老的中国医药书籍，名为《备急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编撰的。这位传奇人物，据说是生于隋。初版极可能是手抄本，因为当时中国的印刷术尚未

《医略抄》1卷，分50门，集方232首。

《卫生秘要抄》8卷，丹波行长撰。

《顿医抄》8卷，日本性全和尚将《千金方》的方药重编而成。

《撮壤集》，日本饭尾永祥撰。属于字典、词典一型的著作。

发展完全。

第一版刻印本是林亿领导的一批学者和医药专家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 1066 年）奉诏出版的。

这本书在唐、宋年间最为流行，一般人都广为采用书中的药方。

这部第一版的《千金要方》流传到日本，目前保存在米泽的上杉文库。它一向被日本政府视为“国宝”，咸信这是世界上仅存北宋版本。

本书和《素问经》、《灵枢经》等其他古代中国医书不同，后两本书是理论上的探讨，一般读者都难以了解。

然而，《千金要方》搜集了 232 种疾病的 5003 种药方。

这本书在序文中指出，该书首先讨论女性病患，其次是婴儿，随后是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其他一般疾病。

著名的日本学者多纪元坚在江户时代，曾重印这部中世纪的古代中国草本药方辑要。多纪是平安时代另一位著名日本医学专家丹波康赖的后裔。丹波是《医必要》一书作者，他自称是汉灵帝第五代后裔。

这部最古老的中药处方辑要，最近曾由中国在日本学者景嘉照相印刷重新编辑。

每日新闻开发公司印行的 500 部 35 册有限版本，使用的是土佑制造的宣纸。

这一套书售价是 1200 美元。这 500 部书实际上予售一空。

因之，可以知道两部《千金方》在日本的身价了。

在日本翻印的两部《千金方》，有：《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659 年），万治敦贺屋久兵卫。《千金翼方》（1770 年），明和植村藤三郎。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785 年），天明西宫园。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799 年），宽政村喜兵卫。《千金翼方》（1829 年），文政江户医学。

《千金方》真本（1832 年），天保松本幸彦。

《少小婴孺方》（1833 年），文政岡氏偷闲书居。

《大医习业》（1844 年），天保喜复村学训堂。

《备急千金要方》（1848 年），嘉永江户医学。

《大医习业》（1860 年），万延喜多村氏活字。

还有不少把整个或部份的两部《千金方》译成日文者，因手头没有可靠资料，不敢鲁莽错引。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

且看人民卫生出版社在 1955 年影印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还是从日本反馈过来的“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哩。

此外在朝鲜的影响也不小，朝鲜两部医学巨著《医方类聚》与《东医宝鉴》，都是以两部《千金方》作准绳来编写的。

《医方类聚》为朝鲜金礼蒙等所编，计 265 卷，成书于

1445 年。它第一卷第一、二篇，就是把《要方》的“大医习业”“大医精诚”全文转载，把孙思邈思想作为中心的精神。在第 199 卷（注：原书为 365 卷，后被日本丹波元坚加以整理，乃为 266 卷。这里用的，为原有的 365 卷计算，下同）索性把《要方》二十七卷中的“养性”、“道林养性”、“居处法”、“调气法”与“房中补益”五篇原封不动地予以转录。除此之外，全书或大段照抄，或把方剂、小论，安插在全书中者有 162 节，内《要方》148 节，《翼方》14 节。

《东医宝鉴》25卷，为朝鲜许浚奉敕而撰写，成书于1611年。一展卷除了把《千金方》列入“历代医方”之外，还把孙思邈思想完整地贯彻其中。卷一之首第一句就是“孙真人曰，

……”。第一篇论文“身形”中的“形气之始”、“四大成形”、“形气定寿夭”、“四气调神”、“以道疗病”、“搬运眼食”、“按摩导引”、“还丹内炼法”及“养性禁忌”……等句，也不折不扣地是孙氏思想的反映。甚至“养性延年药饵”中绝大多数的方与药，是两部《千金方》的。

(二十三) 小结

通过以上推敲，两部《千金方》的价值，是肯定的。在中医文献中除了四大经典之外，可以屈指居首。“思邈以绝人之识，操慈仁恻隐之心，其叙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祸，至为愤切。后人稍闻其藩垣，亦足以其术鸣”（见《医学正传·医学或问》第一条），虞氏言简意赅的指出医术和医德两个要害之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予以否认者，如明·李汤卿就认为“如巢元方之作病源书，孙思邈之作千金方，盖辞益繁而理愈昧，方弥广而法失真”（见《心印绀珠经·原道统道》）者，也只能代表其个人而已。

如其用国外学者评价的话，国际科学史学院会员、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谓：“中国医传到日本，即形成了所谓汉方医学。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孙思邈的著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的一个世纪期间（约1767—1867年间），虽然也获得高度评价，但若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是昌盛一时；就其影响的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

当然，也可以因时代关系难免有一些白璧之瑕，但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足挂齿的。

总之，两部《千金方》是孙氏毕生心血，同时也正是这两部《千金方》使孙氏得以千古不朽。

两部《千金方》是由精湛的医学技术、高深的道教修养和纯洁的品德思想三者结合而成的。也可以说“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再加上崇高品德。假如不是如此，那末为什么医界文献中有他崇高的地位。假如不是如此，那末为什么开编于六朝（386—589年）、杀青于明·万历（1573—1620年）搜集文献5485五部、分装五百十函的《道藏》在医书中仅仅把《黄帝内经》与《千金要方》搜集入编呢？假如不是如此，为什么自古以来不少不是医林中人物的学者，来拜读它？

再一个有力证实两部《千金方》的渊博和倾侧于道教，全书中引用前人名言也不少，如：

孔子：见《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孔子曰，……”（还有不少的引用，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下同）。

《医学正传》8卷，1515年写成。作者虞博（1438—1517年），明·浙江义乌人，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人。学宗朱丹溪。

《心印绀珠经》2卷，为明人李汤卿撰，李氏生卒年月及事迹迄无可考。书成于1547年。见1983年《中华医史杂志》第13卷、第1期56页，宫下三郎“孙思邈在日本”。

(以上儒家一人。)

老子：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老子曰，……”。庄子：见《要方·序例·大医习业》的“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

列子：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列子曰，……”。天老：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天老曰，……”。淮南子：见《翼方·养性·养老大例》的“淮南子曰，……。”

彭祖：见《要方·养性·房中补益》的“彭祖曰，……”。高阳负：见《要方·肾脏·补肾论》的“高阳负曰，……”。稽康：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嵇康曰，……”。张湛：见《要方·序例·大医精诚》的“张湛曰，……”。张天师：见《翼方·禁经·掌诀》的“张天师曰，……”。仲长统：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仲长统曰，……”。皇甫隆：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隆上疏对曰，……”。

张季伯：见《要方·伤寒下·溪毒证》的“张季伯书之，……”。

王良：见《要方·伤寒下·溪毒证》的“王良……书之”。(以上道家14人。)

扁鹊：见《要方·诸风·诸风》的“扁鹊曰，……”。张仲景：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的“张仲景曰，……”。

华佗：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华佗曰，……”。王叔和：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王叔和曰，……”。陈延之：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小品曰，……”。卫汛：见《要方·食治·序论》的“河东卫汛记曰，……”。徐嗣伯：见《要方·小肠腑·风眩》的“徐嗣伯曰，……”。

徐之才：见《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的“徐之才逐月养胎方，……”。

陈廩丘：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陈廩丘云，……”。

甄权：见《要方·针灸下·取孔穴法》的“甄权曰，……”。

张笛：见《要方·伤寒下·劳复》的“医者张笛说，……”。

(以上医家11人。)

黄帝：见《要方·膀胱腑·膀胱腑脉论》的“黄帝曰，……”。

歧伯：见《要方·诸风·论杂风状》的“歧伯曰，……”。

伯高：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伯高曰，……”。

雷公：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雷公曰，……”。

葛洪：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抱朴子曰，……”。

(以上亦医亦道者五人。)

以上共引先哲们的言论者31人，除去儒家与亦医亦道者6人，计25人。医家仅仅11人，而道家则14人，这不是说是道家的医书是什么？

这型衷道参医的医学，可能还是在学术上、群众间是十分欢迎的、接受的，所以步其后尘的著作也不少(详见下节“三·《千金方》不是孤芳无伴”)。而且直到宋代，连政府都鼓励医学要与道教合参。事见《玉海·艺文艺术》：“诏以《内经》考其常，以《天元玉册》极其变。”考《天元玉册》虽已失传，但都能知道，为启玄子王冰所撰，专论五运六气而接近于道家之书。

《玉海》200卷，宋·王应麟撰，内容为搜罗典故，囊括旧闻，分240余类。

《天元至册》30卷，《医籍考》作《天元玉策》，启玄子撰。

最后，还是借用元代虞山隐士、中阳老人、王珪在《泰定养生主论·自序》中的一言，是“泄二教（指医与道）之机奥，引九流（隐射百工杂技，意思是多学科）之绪余”来作两部《千金方》的总评语。

大医（二）

《千金方》不是孤芳无伴

“泄二教之机奥，引九流之绪余”的两部《千金方》，是否在橘井书林中孤芳独赏吗？不，还有，而且还多哩。但终以水平不及两部《千金方》而难以被人所侧目。

号称《小道藏》的宋·张君房的《云笈七签》，的确是道

家文献中佼佼之作，除了高深的玄机真证道家理论之外，还有不少关于人的生理、病理、保健、养生、长寿的章节，但毕竟难称医学著作，故不论。但李时品的《医道還元》，凭作者自己的话“得遇钟离老祖，授以心性之学，皈依至道，并授济世救人妙术”（见《医道還元·自序》），是典型的积善派道教医书。陈士铎的《百病辨证录》、《石室秘篆》和《洞天奥旨》，纵然，书名早就发出了道教浓厚气息，而且“未有怪妄至此者，亦拙于作伪矣”（《四库全书提要》）对它的批判，可是内容中毫无道教思想。现在把道教与医学融为一炉的著作，作一介绍，证明两部《千金方》的风格，不是孤独无伴的。

《养生必用书》，作者初虞世，宋时人，字和甫，精于医，对《素问》、《难经》造诣极深。因未搜入《医籍考》，故无法证实“医”与“道”的比重如何？但也因之可以看出，“道”多于“医”而不被搜入。

《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引用《庄子·庚桑楚》的“《宇泰定者，发乎天光》”而命名其书。作者元代吴郡人王珪，字均章，号中阳老人，因隐居虞山，故人称隐君。医学方面对痰症最有成就。精于医而好丹术，故自称为洞虚子。

有人认为《医道還元·脉理奥旨》的：“北坎命根，活五黄而通九柴。南离神室，宰白壁、而守青松”……等句，是出于元代成宗·大德间（1297—1307年）玄白子的《西原正派脉诀》。同时再对照玄白子自序“悉自刘氏我师，宗阳朱炼师脉明，最为得传者。大德辛丑（1301年），既从炼师得崔刘四脉，玄又乃扩其意，为之图并歌括，以教稚子”，也颇符合。考玄白子名张道中，可惜人与书都已无法考查。

《乾坤生意》作者朱权。生于明而歿于清。大文豪钱牧斋（1582—1664年）对他作过这样的介绍，谓“宁献王，讳权，皇帝高十六子，……晚年深自韬晦，益慕冲举，自号臞仙。所著有《神隐时后神枢》、《遐龄洞天志》、《神奇秘谱》、《运化玄机》《神应经》作者陈会。本书刊行于明。洪熙乙巳（1425年）。朱权序谓：

独宏纲乃遇信卿席真人所授之木，故其补泻折量之法，其口诀指下之妙，与世医所不同，……更其名曰《神应经》。

《四库全书提要》：

张君房，宋·湖北安陆人，景德间（1004—1007年）进士，大中祥符（1008—1016年）从御史台谪官至海宁。时真宗崇尚道教，又起用张氏，整理道教书籍。主要有《道藏》及《云笈七签》等。

《石室秘篆》6卷，陈士铎撰。

《洞天奥旨》16卷，为外科专业书，清·陈士铎撰。

此书当在正德（1506—1521年）前矣，所论皆针灸之法，有歌诀，有图有诀，传写伪谬，不甚可据。前有宗脉图一页，称梓桑君席宏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在席信卿，十一传至会，……。又有席宏达誓言，谓传道者，必盟天敌血，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或妄传非人，私相付度，阴有天刑，明有阳谴云。是道家野谈耳。

《神应经》，属针灸一类的文献，因出于道家之手，故而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据说日本也有一部《神应经》，乃1868年日本维新之后，为大教院所撰，与这里的《神应经》毫无干系。

《忽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成书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作者熊宗立，此书完全用道家理论来解释《八十一难经》。但后人对它的评价不高，虞搏认为“此马宗素无稽之术，而以世之生灵为戏玩耳”（见《医学正传·医学或问·第三十五》）。《四库全书提要》也认为“以生克制化，推其王相休凶而已，初无所徵验也”。

韩懋的《韩氏医通》，作者是以道家身份来参予医界的。此书开卷第一章“绪论章”第一节、第一句就是“天地万物，气成形也。不位不育，病之时也。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气之冲、神之化，皆此身之真息以踵也”。考气字，道家认为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基础，因为他们接受了《易·系辞上》的“精气为物”的思想。诚如他们所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而为万物”。道家求其保健延年，所以有“服气”“炼气”“食气”“行气”……等的修炼。

任何一部书，第一篇或第一节或第一句，内行称为破题，都是曝露全书的中心思想，所以《韩氏医通》的医学思想也明之又明地归乎道教。

之后“万物负阴而抱阳”、“医之理，可比周易”……等等，以及文章中杂以八卦学说，也都是为气字作解释与阐明。

最后“同类勿药章”殿后，也仿《翼方》的用房中补益术来作结束。

《赤水玄珠全集》，为在孙思邈医学思想指导下撰写的许多医书中唯一的有名巨著，作者孙一奎。孙氏在其著作中，屡屡谈到“道遣异教，家有仙仙者”（见《赤水玄珠集·序》），“与河、洛、周易、灵、素、洪范、黄庭、性理诸家，合一不背”（见《赤水玄珠集·几例》）“余故采仙经要语以示人之摄养”（见《赤水玄珠集·方外还丹》），“元精化为交感精，元气化为呼吸气，元神化为思虑神，此三元分泄，难复天真”（见《赤水玄珠集·还丹秘要论》）……等不少以道教说理来解释医理。

其中更用《黄庭经》来纠正医家相火属右肾之非（见《医经绪余·命门图说》）。

所以后人对他的医学思想，用“融三教之说，会革于医”（见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赤水玄珠集·点校说明》）九个字作评语，的确一言中的。

熊宗立，字道轩，明·福建建阳人，师刘刻，好讲阴阳医卜之术。著有《忽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卷，国内已佚，1983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日本翻刻明成化八年壬辰（1472年）鳌峰熊氏中和堂本影印一批。

马宗素有两人，一为金代平阳洪洞人，受业于刘完素，著有《伤寒医鉴》1卷。一为金代道士丹阳子的本名，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知医精针灸。这里指的是道士马宗素。

《赤水玄珠集》30集，分76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种病证。明孙一奎著。

《医旨绪余》2卷，共78篇论文，明·孙一奎著。

岳甫嘉的《妙一斋医学正印》，妙的取义，是合《老子》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妙和《庄子·大宗师》“安排而玄化，乃入于寥天一”的一而故称“妙一”。不过作者自谓，是“先王祖忠武之用兵也，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妙一斋医学正印编·序略》），这非但可以叨荫祖上岳飞（即先王祖忠武）的光采，而且可以把道家色彩隐晦一些。

根据本书赵志孟序文，一开始即提到“昔孙思邈摄生太白山中”，最后以“阴调元化，则孙、陈两先生不得专席于古矣。天下之颂公者，宁止衡山燮理玉铉，炳光青史乎哉”来结尾。考所谓孙、陈两先生，孙指孙思邈，陈指陈搏，公指作者岳甫嘉。

在《种子编》中的“先天灵气”、“养精有道”、“炼精有诀”“胎始从乾”、“脉息和平”……等篇，都属于道教说理。

像这样一型“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的医学著作，事实上还不止以上几种。所以两部《千金方》模式，的确不是孤芳独赏。

此外，还有不少道家的医或医而崇道者，有：

汉：？——壶公

三国：？——负局先生

晋：葛洪——抱朴子

六朝：陶弘景——华阳真人

宋：王冰——启玄子

朱肱——无求子

崔嘉彦——紫虚真人

郑荣——自清道人

杨大钧——道士

元：？——西方子

王珪——中阳老人

刘开——复真道人

明：韩懋——飞霞道人

祁嗣策——肖虚道士

孙一奎——生生子

熊宗立——勿听子

清：陈士铎——朱华子

叶其秦——抱乙子

袁仁贤——悟真山人

这样看来道之与医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佛之与医。

岳甫嘉，字仲仁，一号心翼，明代末叶江苏兰陵（武进县）人。把自己手书的《种子篇》、《男科证治全编》、《女科证治全编》、《药性辨真总律》……等16种合订成本书。惜乎除《种子篇》与《女科证治全篇》两种外，全已佚散。《医籍考》也仅仅知道其七种，而且还言“未见”者六，仅仅一种谓“存”。

《妙一斋医学正印》共16种，计：《种子全编》、《保婴全编》、《颐志全编》、《男科证治全编》、《女科证治全编》、《家居慎疾良方》、《旅邸便易良方》、《读书辛苦良方》、《仕宦勤劳良方》、《行军济变良方》、《急救危疾良方》、《外科枢要良方》、《眼科指迷良方》、《脉理简明指掌》、《药性辨直释》、《食物辨真总释》。

陈搏（？—989年），宋·真源人，字图南，隐居武当山、华山、自号扶摇子，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后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以陈搏的先天图作蓝本的而成。

四、《银海精微》

《银海精微》，不但在“古书于作者可疑者，于作者名前常标旧题二字”（见新《辞源》）的“旧题”两字上一望而知非孙氏手笔，只要凭粗具读书常识者，早就能真伪之辨。而且《四库全书提要》早就认为唐、宋各艺文志上没有此书而怀疑。更认为“银海”两字，初见于苏东坡诗，不可能在唐朝出现。其实这个分析，本身就已错了，考苏东坡《苏学士文集·望秦陵诗》“石麟空举首，银海罢香沉”的“银海”，是引用南朝·梁·何逊《何水部集行经孙氏陵诗》“银海终无浪，金凫会不飞”而得，所以唐代早已有“银海”一辞了。现在笔者认为不是孙氏之作，有以下十点毋容异议的根据：

（一）书中无石英

孙氏在两部《千金方》中最喜用的为各色石英，而《银海精微》（以下简称《银》，下同）里始终未见石英。

（二）药性迥异

《银》中的滑石、石膏、青盐，与《翼方》中迥然不同。且看下表：

（三）入经

《银》书言药，必言“入×经”、“入×经”。而《翼方》中没有入经学说。考唐代本草，都无入经说法，且看《新修本草》（659年颁行）就可以证实。入经学说盛于清代，当时除《本草乘雅半偈》（1643年）外，他如《本草从新》（1745年）、《本草述钩元》（1833年）、《本草备要》（1894年）……等有名本草书籍，都有入经论述，以《归经》作标榜的姚澜《本草分经审治》（1840年）也写成于此时。

（四）薯蓣、薯药、山药

《银》书“蝇翅黑花”病中的补肾丸、“目暗生花”病中的还睛补肾丸、“血灌瞳人”病中的坠翳明目丸……等方中，都有山药。考山药本名薯蓣，后以避唐·代宗李豫（763—779年在位）讳，把蓣改为药而称薯药。之后又避宋·英宗起曙（1064—1067年在位）讳，把薯改为山而称山药。所以孙氏那时，根本没有山药之称，且看两部《千金方》都是称薯蓣吗。所以本书非但不是唐朝所写，而且还在宋·治平（1064—1067年）之后。

《新修本草》，为唐·苏敬等22人共事编纂的。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已散佚。安徽科技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唐新修本草辑复本》。

《本草乘雅半偈》12帙，明·卢之颐撰。

《本草从新》18卷，清·吴仪洛撰。

《本草述钩元》32卷·清·杨时泰撰。

《本草分经审治》不分卷·清·姚澜撰，内容重点在药物归经。

（五）宋方唐用

《银》卷下“患眼头痛”病中用川芎茶调散。考此方出于宋《太平惠民和济局方》（992年）。两者内容相同，当然不是异方同名的巧合。宋代方而唐人取用，于理更难以讲通。

（六）五轮八廓

《银》书开卷之首，即为“五轮八廓”，而《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仅仅谓：“睛之果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眇果，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果契，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两书根本无相似之处，显然非出一人手笔。

（七）《要方》言不及血

《银》书总论中有：“而又藉血为之胞络”，而《要方·七窍病上·目病》总论中，独独言不及血。

（八）缺磁硃丸

《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神鞠丸，现名磁硃丸，是一首使用到今逃邛不遭冷遇的眼科有名成药，而《银》中未见此方·孙氏自己手订的良方，决不会在自己写作中遗忘了它。

（九）病名

《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眼病病名，有：肝劳、惑、眼漠漠不明、眼暗、失明、目毗痛、眼赤、眼风赤暗、眼毗赤、眼中息肉、目生翳、目风泪赤、热翳漫睛、风翳、赤白膜、风泪下、目生珠管、目烂赤、风肿痛、目卒肿、目卒痒痛、雀盲、雀目、青盲、目中白翳、白幕覆珠……等，它的特具风格是既似病名又似症状或病因的名称。宋以前的气息十分浓郁而显著。

《银》则从“大毗赤脉传睛”到“眼能远视不能近视”81种眼病，都有能反映出疾病性质的专用病名，这种风格竟与893年后的葆光道人《秘传眼科龙木论》（1575年）、1035年后邓苑《一草亭目科全书》（1717年）的病名竟出于一个模式，反而和《要方》截然不同。

《要方》中唯有“白幕覆珠”一名，风格迹近于《银》，但在《银》中却无此一病。

文非出于一手，昭然彰彰。

（十）白诗旁证

《秘传眼科龙木论》10卷，作于明代或再上溯几十年，署名葆光道人作。

《一草亭目科全书》不分卷，九篇，附薛已选方一篇，共十篇，作者邓苑。

《银》书内有不少含有印度医学气息。考当时固然印度及其他外来医学引进中国传统医学中来，光是两部《千金方》就有很多以耆婆为首的天竺国医药学资料。但在眼科方面并不如此，《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中竟连一句话、一首方、一味药都没有涉及印度医学的。直到《外台秘要》（752年）才吸收印度医学到眼科里。在卷二十一眼科，第一论就是“天竺经论眼序”。在第二论“叙眼生起”中谈到了“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因之可以证明印度医学传入虽早，但眼科方面的传入却在孙氏百年之后。

之后，这种印度手术的金篦，即盛行于全国。白居易一生，从40岁开始即眼病缠身，后半生的三十四、五年（812—846年）在痛苦的眼病中渡过。他所有大量诗篇中，有30首左右是涉及眼病之苦。当40岁多些时候的一诗，就是证明当时眼科治疗情况的忠实反映，诗：

案上谩铺龙树论，
盒中虚贮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用，
争得金篦试括看。

从白氏诗的旁证，孙思邈在他这个时代是写不出《银》书的。

再把《要方》与100年后的《外台秘要》在眼病方面的论述对照，前者还是传统理论，而后者则满纸“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金篦”……等印度眼科学，所以又是一个对白居易诗的旁证。

总之《银》书决非孙氏手笔，而是后人托名的伪书，这个后人最早也不可能在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之前的。但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水平的好书，诚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谓：“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具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方伎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本草称神农，素问言黄帝，固不能——确也。此书疗目之方，较为可取，则亦就书论书而已。”

五、伪托孙氏的其他医学著作

从各方面史料中，可以找到署名为孙思邈所著医学著作很多很多，可惜不论在文墨上、口气上或思想思路，都与两部《千金方》大相径庭。如：

(一)《孙真人海上仙方后集》

一卷。搜入于明·胡文焕辑《寿养丛书十八种》内。明·万历余氏种德堂刊本。

(二)《千金髓方》

二十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及康熙五年·《蒲城志》引“重修孙真人词记”。

(三)《孙真人海上方》

一卷。搜入《珍本医书集成·方书类》中。书中共载七言方歌 121 首，含 125 方。并附“孙真人枕上记”与“孙真人养生铭”五言长诗两首。

有秦王守中序文一篇，其署名与内容和《重刻千金宝要·序》完全相同，时为“隆庆六年，岁在壬申三月之(《千金宝要》作上字)吉，秦王守中识”。

所有的诗，俱下里庸俗，不堪卒读，决不出于稍具水平之人的手，显然庸工俗手把《千金宝要》中摭取几十个病种而用韵文形式改写而成。同时更有一个铁证决非孙氏手笔，因在孙氏手笔中从来没有见过孙氏的诗。

(四)《龙宫方》未见。

见乾隆二十六年·《新修庆阳府志·拾遗》。

笔者认为《读书敏求记》等书的“得龙宫方三十首，散入此书(指《要方》)中，逐卷一方”误传而致，事实上即《要方》中某首方剂而已。(五)

《摄养方》

二卷。

见明·嘉庆十二年乔刻本《千金要方·乔序》。

(六)《摄生录》

二卷。很可能即《摄养方》。

(七)《摄养真录》

二卷。

见《续仙传》、《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五台山志·艺文志》。

(八)《医家抄要》

五卷。

见《医籍考》引《崇文总目》。

(九)《脉经》

不分卷。

见《本草蒙诂》、《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医学入门》。

及清·康熙四十三年·《三原县志·人物·方技·唐》。

(十)《明堂经图》

根据《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论四》：“正观中，入为少府，奉敕

《珍本医书集成》，近人裘庆元辑，刊于 1936 年。裘氏从历代 3000 数百种医书中选取精本、孤本，抄本、稀存本、未刊稿等 90 种而成。

《崇文总目》66 卷，宋·王尧臣把宋朝国家藏书书目编纂而成，成书于 1041 年

作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大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订图经”的记载。可知本书是孙氏仅仅参加校订而非作者，而且还不是主要的。

《医籍考》作为“孙氏思邈明堂经图”，实误。而且引用《翼方》语，也多乖讹。

(十一) 《针经》

一卷。

见《宋史·艺文略》及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

(十二) 《针灸方书》

四卷。

见清·雍正八年·《临汾县志·流寓》。(十三) 《枕中素书》

一卷。

见《续仙传》及明·嘉靖二十二年乔刻版《备急千金要方·乔序》。

(十四) 《六气导引图》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

(十五) 《摄生月令图》

见《本草纲目·麦饭石》及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

(十六) 《济人月令》

三卷。

见《宋史·艺文志》。

(十七) 《千金月令方》

三卷。

见清·康熙五年·《蒲城志》引“重修孙真人祠记”。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月令”，基本上是同一著作。(十八) 《千金食治》

见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笔者认为很可能是《要方·服饵》或《要方·养性·服食法》的单行本。

(十九) 《五脏旁通明鉴图》

一卷。

见《宋史·艺文略》、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及《医籍考》引《宋志》。

(二十) 《五藏旁通异养图》

一卷。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笔者认为以上两《五藏旁通》为一书两名，或其中必有一误。

(二十一) 《玉函方》

三卷。

见清·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经籍·子类》。(二十二) 《神枕记》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笔者认为即《枕中素书》的异名。

(二十三) 《医家药妙》

五卷。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

(二十四) 《风药方论》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并谓：“有人碑刻《风药方论》，托之孙公。余尤恐其误人也，故附着于此。”

笔者认为以上两书，是从两部《千金方》中摘录而成。

(二十五)《太清真人炼云母诀》

二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此书应属于道教练丹术。在第五章“真人，三著作”中的《炼云母诀》为同一本书。(二十六)《养生要录》

一卷。

见《新唐书·艺文志》。

以上《摄养方》、《摄养录》、《摄养真录》，俱为此书的误传者。

(二十七)《千金养生论》

一卷。

见《通志·艺文略》。

(二十八)《摄生枕中方》

一卷。

见《宋志·艺文略》。

现搜集人《三三医书》的，改称为《摄养枕中方》。可能为《枕中素书》或《神枕方》之别称。(二十九)《太常分药格》

一卷

见《宋史·艺文略》。

(三十)《兰草图》

二十卷。

见《宋史·艺文略》。

(三十一)《云母论》

二卷。

见《宋史·补编》。

为《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炼云母诀》的别称。

(三十二)《玄女房中经》

一卷。

搜集在《程刻秘传医书四种》中。

为《要方·养性·房中补益》加以改写后而作为单行本刊行。

(三十三)《气袂》

一卷。

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三石·《耀州志·艺文志》。

以上俱为关于医学方面的著作。此外还有文学、道教、炼丹术及杂著，概未列入。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

《三三医书》三集，每集33种，共99种医书。近人裘庆元辑，刊于1924年。

六、药王

药王，是后人用以尊称孙思邈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则尊孙思邈为“药上真人”。

“药王”这个无上至尊的桂冠，没有加冕于神农、雷公、李时珍而独奉献给孙思邈，在不可思议之后又感到并不奇怪。因为孙氏自有他受之无愧的条件。且看现在陕西省在隋·唐时代称为京兆华原的耀县东三里，孙氏隐居之处的五台山，为了纪念他，更名为药王山。山上有唐代封拜孙氏为真人的拜真台遗址。并对联一付（见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二）丹鼎派中也有一席之地），对孙氏之享有药王尊称的原因，这 22 个字已替你作了满意的解答。

其旁为孙氏炼丹之处，便是药王庙。主楼为真人祀殿。殿左侧碑亭中竖有“千金宝要方”石碑八座。右侧有洗药池，池是就山石挖凿而成。池西面壁上有“石盆仙迹”四字，惜乎以年代

过远而字迹已模糊难辨。

现在再从另一个侧面来体会，这一山一台，一庙一殿，一碑一池，沧海桑田经历 1300 年之久而依然留在人间，这又说明了什么？

考孙氏在药物学方面的研究和成就虽大，但终以医名的更大而被掩盖了。

（一）在孙氏以前的药学方面鸟瞰

在医药界一直的看法，是最早的药学文献为《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但自 1977 年安徽阜阳出土了一批简牍，系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 儿子夏侯灶墓中随葬品。内《万物》的残简，经过专家鉴定，乃真是中国的最早一部药学专业书。但十分可惜，笔者多方设法，至今仍然缘吝一面。在这里不能不暂时还把《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作为最早的药物学专业书。

目前现在资料来说，还是《山海经》与《神农本草经》，但前者在医学方面资料太少而逐渐地被医家冷落到遗忘，终于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数术界·形法类”而与医学彻底脱钩。后者，虽然认为在《汉书·艺文志》中榜上无名而怀疑后人所作，王应麟 更明白指出“今详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未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即神农氏）耳”（见《困学纪闻》），杨慎 也认为“本草相传为神农旧本，未必皆出于神农，后世人增之”（见《升庵文集》）。但不论怎样，在汉代前的作品或已具规模的初稿，是无法否认的。而且书的价值在乎实用，不似古泉收藏的专崇远古。

之后，魏（226—265 年），吴普把原来的 365 种药物的《神农本草经》，补充成 441 种，并论列正名、别名、药性、产地、药物形态、采摭时间、加

夏侯婴（？—前 172 年），西汉·沛县人，封汝阴侯，后为太仆。

王应麟（1223—1296 年），字伯厚，宋·庆元人。博学多识，官至礼部尚书。

《困学纪闻》20 卷，王应麟著作之一。

杨慎（1488—1559 年），字用修，号升庵，明·新都人·年 24 岁，廷试第一名夺魁。读书无所不览，著作亦丰，所著《升庵文集》81 卷，内容虽甚丰富，但难免有些穿凿附会之处。

工炮制、功能主治与配伍宜忌等，从而又称《吴普本草》，惜乎在唐、宋之际失传。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从《太平御览》、《齐民要术》等书中精心辑录，得231种药物的引文转载，返魂复貌地重辑成《辑复本吴普本草》。不知原版《吴普本草》孙氏是否见到？因为这回事，连搜罗广博、考据准确、下笔严谨的丹波元胤也交了白卷。从《神农本草》到《陶弘景本草集注》之间一段历史时间空白了500年之久。

与吴普同事华佗执弟子礼问业的李当之（《医籍考》作李钊之），据说也写有一部《本草经》。可能失传更早，所以在医药方面无影响可言。

梁（502—557年），陶弘景再度把《本草经》补充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七卷。陶氏还有一部讨论药物的《名医别录》。所以自第五至六世纪中陶氏两书，医家多奉为治病取药的指勺。盛行了100多年，直到唐·苏敬《新修本草》面世以后，才代替了它。孙氏所处的时代，恰巧在这个期间。

《新修本草》是在唐·显庆四年（659年），也就是孙氏《要方》已脱稿而开始写《翼方》的116岁那年。由苏敬上书重修本草，诏从其请，并召集许敬宗等名医名士22人共襄编纂，至显庆四年（659年）就全书完成。它是在《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书发挥作用历360年左右，至宋·开宝六、七年间（973—974年）“新定”“重定”两部

《开宝本草》问世，才与临床家疏远起来。

可见孙氏的当时，本草书籍比较贫乏，仅有《本草经》（即《神农本草经》）与《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的两三家，充其量还可见到《吴普本草》与《李当之本草》，孙氏也自谓：“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自余名医别录。”（见《翼方·取孔穴法·论曰》）

《新修本草》与两部《千金方》的完成，基本上是同时的。你看《千金要方》展卷动笔约在622年，脱稿在652年。《千金翼方》开写于653年，约至659年而杀青。而《新修本草》自开写至完成，计3年（657—659年），就可知其梗概了。所以《新修本草》迟于《要方》七年后成书。虽然仅仅七年，但孙氏写《翼方》时却可作为重要参考书之一。

再把两者的分类方法、排列次序、内容叙述等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似出一辙之感。

（二）孙氏药物学的重要参考书是哪一本

孙氏可以见到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是理所当然的。《吴普本草》因缺乏原始材料，难下断语。但根据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吴普本草》

《太平御览》1000卷，55门。宋·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命李昉等14人编撰。

《齐民要术》10卷，92篇。北魏·贾思勰撰。对农艺、园艺、土壤、选种、畜牧、蚕桑等记载详细，多来之于实验，为极好的农业专科书。

《名医别录》，乃陶弘景所著，惜已散佚不存。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也以此书失传可惜，乃于《新修本草》、《千金方》等书乃吐鲁番出土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残卷中搜集引文转载，辑成《名医别录辑校本》。

《开宝本草》，北宋初期，政府曾两次修订本草，即《开宝新评定本草》20卷和《开宝重定本草》20卷，统称《开宝本草》，共收药983种。

“辑校援引文献”17个引用本中独独没有《千金方》来臆测，则孙氏是没有见到的。或谓桂、狼牙、猪苓等，未见于《神农本草经》，也没有于《名医别录》、《唐·新修本草》，在作二传手的《翼方》中出现，可以说明孙氏直接来之于《吴普本草》，因为《吴普本草》中这三药赫然列于“草木类”（见《吴普本草重辑本》）中。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临床上取用的直接把经验化为理论的。

《名医别录》，我们很怀疑，孙氏有没有看到？理由是《翼方·目录》的“唐本草退二十味”。所谓“退”的20味中薰草、牡蒿、獐舌、葶草、五色符、香草、鼠姑、船虹、赤赭、占斯、婴桃、鸩鸟毛12味出于《名医别录》，《唐·新修本草》仅仅上承于《名医别录》而转载其八味，充其量不过是阐明发展而已，不应该称“唐本草退×××”而应书“名医别录退××××策”。但还有姑活、别羈、石下长卿、翘根、屈草、淮木六味出于《神农本草》，练石草、戈两味出于《吴普本草》也没有指出《神农本草》与《吴普本草》。其所以然者可能是《唐·新修本草》是最后写的，因之即以此为代表而已。不过问题又来了，这薰草、香草、船虹、淮木、鸩鸟毛五味不见于《唐·新修本草》，又作何讲？

《翼方·目录》又有“有名未用——一百九十六味”，但实际数字仅175味，缺少21味，这不能不怀疑漏写或误算。但其中又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这175味药物中《神农本草经》有两味（天雄草、扁青），《吴普本草》有两味（石硫黄、蜚厉），《唐·新修本草》有九味（终石、北苻草、排华、满阴实、让实、赤举、类鼻、鬼丽踪、救救入者），两味无考（领灰，垒松）外，尚有160味全部出之于《名医别录》，这160味中除14味（鸡、九熟草、灌草、封草、排蒲木、遂阳木、学木核、木核、栲木、紫兰、地筋、父陞根、雄黄虫、蜗篱），未被《唐·新修本草》所记载外的141味都出于《名医别录》而《唐·新修本草》转载的。所以有人怀疑孙氏没有看到《名医别录》。这14味药并非来之于书本而来之于临床。但可以再问一句，既然来之于临床，为什么列为“有名未用”？

毕竟如何？只能以后找到有力根据，再加以探索。

（三）孙氏时代的外来药物

能使孙氏在药学上的成就，除了有先贤们的肩梯之外，最主要的是药物新品种的日增。其所以然者，因“贞观之治”与“永徽之治”，海禁开放，国内外贸易繁荣，外来药物源源而来。

加之当时政府外交政策的成功，朝贡的外国药物更其是名贵品种也不少地流入中原。

可惜历来商业史，向不为历史家重视，不比国家大事的有史册记录，所以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只能从挂一漏万的在其他资料中蠡测推求。

现在从孙氏结束隐居生涯入京的86岁（627年）至逝世（682年）的55年中来看看外来药的输入引进情况。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伽毗国献郁金香（见《中国医史年表》）。

伽毗国，又译伽倍国，在新疆吐鲁番一带。

《中国医史年表》，郭霭春编，1984黑龙江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贞观十六年（642年），达摩乌长国遣使献龙脑香（见《全唐文》卷999）。

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使方士那罗迺婆寐于金甍门造延年之药（见《唐会要·医术》）。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见《续高僧传》）。

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拂菻国遣使献底也迦——为含有阿片的药（见《旧唐书·拂菻传》）。

此外，从永徽（650—655年）以后，阿拉伯国也屡次来我

国赠送很多药材。据《诸藩志》记载，输入的药物有没药、乳香、血竭、木香……等多种。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还把药方和葫芦巴传入中国，这些药物都曾被我国医家所采用。随着阿拉伯药材的输入，不少买卖药物的商贾也来我国开设药铺（见《中国医史医籍述要》）。

以上的资料远远不及当时实际情况的兴旺，所以孙氏在药学方面的成就，大多是得逃俚厚的良好环境与条件，但更不能忽略了孙氏的用过一番苦心钻研的代价，诚如他自己所说：“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见《要方·序》）

（四）强调医必知药和自采自制的重要性

“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质所主，取其时节早

晚，早则药势未成，晚则势盛已歇。今之为医，不自采药，……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见《要方·序例·处方》）。这种论调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但应该知道孙氏所处的时代里发表此言，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我们首先洞察当时的社会，当时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社会经济大步地发展，为了有利于发挥熟练程度，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效率，随着生产的发展进步，分工愈来愈细，生产逐渐趋向专业化，医与药的分开是趋势的必然结果，乃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正因为这样，就带来了那些采药失时，炮制粗劣，贮藏不妥，工艺不严甚至不法，使药效降低甚至失效的情况。孙氏正处在由医生自采、自制过度到专由药工、药农、药师来采集、炮制、管理的历史时期。上下数千年的中医中药史中只此一回的“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见《新唐书·百官志》）国家法令的颁布恰恰在孙思邈写《要

达摩乌长国，在天竺国北。

《全唐文》1000卷，18488篇，为总汇唐代所有诗文而成。主编董浩、曹振鏞率领3400余人辑成，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清·顾炎武编辑。

《唐会要》100卷，514目，宋·王溥辑。

《续高僧传》30卷，又名《唐高僧传》。唐·道宣和尚辑著，因为继慧皎的《高僧传》而作，故名冠以“续”字。

拂菻国，古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

《诸藩志》2卷，宋·赵汝适撰。收集40余国的地理、风俗。

《中国医史医籍述要》，崔秀汉编著，1983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的前夕、77岁（618年）那年。孙思邈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个医生自采药、自制药的优良传统的消失，弊端日渐明显，再结合自己长期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丰富经验，不由自主地感叹古风之优于当代时尚。所以他的强调要重视药物，是另有其特殊情况与重大意义的。

孙氏除《翼方·药录纂要·采药时节》中介绍了230种草药“采”、“阴”、“暴”、“干”的合法手续，《翼方·药录纂要·药出州土》中指出药源的地道来源，历数关内道等13个道的优良品种，《翼方·居退·种造药》的草本药培植方法、半成品药制法之外，并为制药、贮药而设计一套设备，如：

……四面筑墙，不然厚垒，务令厚密。……客至引坐，勿令人寝室及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一房着药，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天阴雾气，柜下安少火，若江北则不须火也。一房着药器，地上安厚板，板上安之，着地土气恐损。……前作格子，充料晒暴药物，以篱院隔之。……立屋二间，椽梁长壮，柱高间阔，以安药炉，更以篱院隔之，外人不可至也。……（见《翼方·退居·缔鞠》）。

总之，孙氏对于为什么要自种、自采、自制、自藏的理由，是“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率无裨益”（见《翼方·采药时节》）。

（五）对新品种的发掘

两千多年的中药，就是靠一代一代的扩展壮大起来的，通过世代代有心人在治疗疾病用药经验基础上，不断总结而丰富，终使药品逐渐增多，疗效不断提高。孙氏从18岁而志学于医，141岁而羽化，120多年的辛勤于临床第一线，加之寻访民间知识，千方百计地搜索有效丹方验药，达到了“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见《要方·序》）的程度。所以对他来说，这样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例如麦饭石的发现，在内蒙古东部，沿着努鲁儿虎山山嶺，穿过萋萋的大草原，就是一座卧佛状的山峦，表面被一层泥沙覆盖着，也有一些灰色斑斓的岩石露在外面，那岩石上还闪着点点金星，它就是号称“神秘的金丹”麦饭石。早在宋代就已广泛使用于外科病，而且还可外用，陈自明《外科精要》中的麦饭石膏，就是一张有名的名方，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又风靡起来。但谁先发现、发掘、认识及引进到医药领域里造福于人民呢，是孙思邈。李时珍根据苏颂的《图经本草》，肯定他说：“此方（指麦饭石），孙真人千金月令，已有之。”（见《本草纲目·麦饭石》）同时再检阅一下孙氏之前的医学文献，确实没有见过。

又如乔麦，在孙氏之前，未曾见过，在《要方·食治·谷米》中最早指出“味酸，微寒，无毒，食之难消，……”，事实也的确如此。

羊肝补肝明目，牛肝明目，肝主明目，兔肝主目暗……等学说，也是孙氏首先第一人指出，至今成为眼科一个有效的药物和药膳。

《外科精要》3卷，宋·陈自明撰。成书于1263年。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壁，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人。名著《本草纲目》作者。

孙氏把从《神农本草经》到《唐·新修本草》来一次综合处理，在药物数量上，把作用不大或无效可言的药品删去 216 种（见《翼方·目录》）。同时又把新的补充进去，新增 210 多种新品种。内有三白草、水蓼、冬葵子、安息香、苕根、瓦松、郁李仁、龙葵……等 21 味，至今还是临床上不可“一日无”的常用药。

还有来之国外或边缘地区的如底野迦、毗莱勒、河梨勒、无食子、胡椒、庵摩勒……十多味。

还有在原有的药品中进一步求精取细他讲究“道地”者，如竹叶中强调淡竹叶，车前子增用车前草，地黄中指明用生地黄而给犀角地黄汤提高了疗效，在笼统的抬糖中分别出沙糖……等等。其他的 180 余种药品，内有乌血木、蛇舌、紫葛、甲香、狗舌、马芹子、角蒿……等，有些现在已少用，有些还在使用。

孙氏在这方面的功绩有两个：其一，对药源的扩大，增多了治疗手段；其二，贡献更大的是，他一方面淘汰一批疗效不高或被时代所遗弃的品种，一方面发掘新药，在药学世界里开辟了一个“吐故纳新”的先例，使中药永远在推陈出新中永葆青春。像孙氏那样对待药物的思想，在今天更有其现实作用，且看伏龙肝、猩绛、百草霜……等已宣告绝迹，我们怎样办？

（六）亲自实验

成书于三国（220—280 年）的《水经·卢江水》：“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一言，博学的孙思邈肯定读之再三。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脚踏实地，工作负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极变探幽”和“贵察声色，深究萌芽，心考锚铢”（见《翼方·序》）而“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见《要方·大医精诚》）。故而所有新方新药，总要自己亲手通过实践来作取舍。

例如：

“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大悬绝不及甘草”（见《要方·解毒并杂治·解百药毒》）而否认了过去过份强调大豆解毒的说法。

“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见《要方·脾脏下·热痢》）。反过来说，其中二三是为无效而删掉。非亲手实验，是不可能知道其有效与否。

“古之术子，多用庆云散、承泽丸，今代人绝不用此。虽未试验，其法可重，故述之”（见《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其所以“故述之”，因为没有亲自实验过。“故”借用为“姑”字。“古人有十水丸，历验多利大便而不利小便，所以不能述录也”（见《要方·水肿》）。正因为通过多次亲身实验，说明没有利水作用而不加介绍。

孙氏能有计划、有目的地用客观来考察现象，并将观察所得的变化和结果来判断某方某药的有效与否？或获效的程度？最后决定取舍是十分科学而负责的。如其每一位医生都能做到这点，疗效不患不提高。

而且孙氏一取一舍之间，也十分审慎从事，举“芜花散”为例：

《水经》2 卷，三国亡名氏撰，晋·郭璞注记述黄河、长江、渭水等 130 条水流。但原书早佚，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40 卷，以《水经》为纲，原文得以复见。

……然比行之，极有神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急救，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亦犹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其不知所然而然，惟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非止救物兼深，抑亦庶几于博见矣”（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

孙氏把暂时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肯轻率否定、莽鲁摈弃，留待后人来探索。这种客观而负责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七）引进化学制剂

炼丹术是在冶金术中衍化出来的科技，中国是炼丹术出现最早的国家。《神农本草经》所搜载的 365 种药物里，属于矿物类的就有 46 种之多。这种矿物药，其中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单体自然元素的和各种自然化合物的，都是炼丹的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很早就有了物质基础，所以也很早就能有宋无忌、蒺门子高、正伯侨、充尚……等炼丹方士的辈出。到两晋（265—420 年）、南北朝（386—589 年）时，由于神仙服食的盛行，炼丹术更形兴旺，葛玄、郑隐、葛洪、陶弘景等有名的炼丹家，都在这个时代。

正因为炼丹术的兴起，就丰富了药物的内容。《本草纲目》中有 1892 种药物里，矿物药和丹药就有 222 种，竟占有 11.7% 之数。

自道教思想的创立者老子到稷下黄老的大集成者庄周，倡导“清净无为”、“自然为本”、“归真返璞”、“超然绝尘”之余，势所必然地联系到却病延年。于是导引术、吐纳术相继问世，这是炼内丹。

《抱朴子·金丹》：“夫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令人不老不死。”它是用丹砂、硫黄、水银（炼丹家称姹女）一类的矿物，加以高温来烧炼出黄金或“金丹”。因为黄金是火烧不变质的东西，所以想象中的“金丹”也有“金刚不坏身”的作用，人服后当然也可以长生不老。这是炼外丹。

炼内丹远远不及炼外丹的能为统治者效劳，因为统治者“黄金我所要也，长生我所要也”，不论黄金或金丹都是投其所好，所以内丹道路愈走愈狭，而外丹就不同了，升堂入室地走进了帝王之家。君不见《史记·封禅书》的“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乎。所以从汉武帝时（公元前 140—前 87 年）开始刮起了炼丹风，至东汉（25—220 年），因魏伯阳等方士涌出，为炼丹术更加油添薪。他们把《易经》的八卦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作为炼丹的理论基础。如以《易经》的“坎离匡郭；运轂正轴”，引进到烧丹的“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药物”来作为主导思想。易有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三（乾）（坤）三（坎）三（离）四卦，净存六十卦，作为火候，计三百六十交，所以一丹

宋无忌，燕国方士。

蒺门子高，秦始皇时代人物。

正伯侨，战国末期方士。

充尚，秦时燕人，方士，曾形解成仙。

郑隐，名郑思远，隐于括苍山，后成仙。

魏伯阳（约 100—170 年），汉·会稽人。从阴阳先生学道，得受金丹大道，与诸弟子出入成仙。

烧的火候须 360 时 之数。同时更凭着这个荒谬可笑的“推理”，认为服之可与天地并存。于是服食丹石的蠢事就不断产生，更是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阶级人物。且看《太平圣惠方》（992 年）、《圣济总录》（1111—1117 年）等书把“乳石发动（即丹石中毒）”作为当时的多发病，常见病来处理即可知了。

纵然葛洪以清醒的头脑来呼吁着“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以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见《本草纲目·水银》）。但求长生心切的人们，还是如蛾扑火地趋之若鹜。

葛洪在魏伯阳与陶弘景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孙氏再步其后尘而也精通炼丹技术。而且把黄老道家和方士炼丹术合二为一，在葛洪、陶弘景之后更成熟地融入于治疗学中。最典型的事例，为太乙神精丹：

……右六味，各捣，绢下筛。惟丹砂、雌黄、雄黄三味，以配酞醋浸之。曾青用好酒铜器中渍，纸密封之，日中曝之百日，经夏，急五日亦得。无日以火暖之，讫。各研，令如细粉，以酞醋拌，使干湿得所。内（同纳）土釜中，以六一泥固际，勿令泄气，于，然后安铁环施，脚高一尺五寸，置釜上，以渐放火，无问软硬炭等，皆得。初放火，取熟两秤炭，各长四寸，置于釜上，待三分二分尽，即益，如此三度，尽用熟火，然后用益生炭，其过三上熟火已外，皆须加火，渐多。及至一伏时，其火已欲近釜，即便满，其釜下益炭，经两度即罢。火尽极冷，然后出之，其药精飞化凝釜上。五色者上，三色者次，一色者下，虽无五色，但色光明皎洁如雪最佳。若飞上不尽，更令与火如前。以雄鸡翼扫取，或多或少不定，研和枣膏，丸如黍粒……（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

在上面一段文字中，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孙氏把服食丹石的蠢事，引渡到利用它来治疗疾病的途径上来，变害为宝。其二，就是把炼丹的技术引进到制药技术中来，扩展了医药内容，为人民造福。

《孔子家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末覆舟的丹石，也未始不可转化为载舟的良药。这样化学制剂进一步闯入了本草行列，又是孙氏一个莫大的贡献。或谓，中医的化学制剂，早就进入了医药界，《周礼·天官篇》就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劓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攻之”谓“今医人有五毒之药，合黄鞞，置石胆、丹沙、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三日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治疡”。所以引进化学制剂于医学中来并非孙氏开始。我们不能否认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早已化学制剂进入了医药界，但更要知道当时的制成品十分粗糙，仅仅供于外用，而孙氏的介绍者是高级的内服药。

所以颂扬孙氏的拜真台前联句中“铁杆铜条”、“铅烧汞炼”八个字，更突出了这点。

最后，我们要知道孙氏对金丹的看法如何？不妨从“又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一言中，证实，他是客观的、有科学头脑的。

（八）丹石方圃毕竟功大于过

时，当时每天为十二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孔子家语》原 27 卷，今本为 10 卷，44 篇。为三国魏王肃所传。

郑玄（127—200 年），字康成，东汉·高密人。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

丹石在那个时代一般人眼里，总是视为情同仙丹的至高无上的药品，从“纵有金丹，亦不可救”（见《要方·消渴》）一言中，可以看出所谓“金丹”（丹石），是起死回生的第一灵丹妙药。

后世对两部《千金方》中介绍炼丹石方面，大有非议指责。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避讳的。但在这一方面，毕竟大功可盖小过。

历来炼丹采取矿石，绝大多数为丹砂、硫黄、水银、雄黄之类，而孙氏则在《要方·服食法》中 24 首抗病保健方中，除了云母水方、钟乳散、西岳真人灵飞散三方中取用云母、钟乳之类的矿物外，其余都用偷樑法来重用天门冬、地黄、乌麻、松子、柏子、茯苓、枸杞……等的确有益无害的植物性药物。即使云母、钟乳是矿物，但也都没有毒性。

再阅《翼方·养性服饵》里，除华陀云母九中有云母、钟乳之外，也都是草木有益之品，绝无汞类、砷类。（《养老食疗》、《辟谷》等篇中取药，也完全是无害有益的植物类药物。

显然孙氏深知习俗难改，这个习惯势力的狂澜难以力挽于一时，不能不独运匠心以因势利导。用无毒有益的药物来在“丹石”的躯壳中作为主位而把有害无益的药品暗暗排挤出去。不过十分遗憾，这种苦心是否有人能体会得到。

也有人议论他自己也服用丹石，“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要方·解毒并杂治》）。欲知那时年未不惑，一个典型的书呆子，涉世未深，而且身居草野，正值研究道教及炼丹时期，自炼自服当然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孙氏一向喜欢亲身一试的个性。但届晚年，则对丹石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于年轻时代。诚如他所谓：“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免外伤逼切，庶几全其天年。然小小金石之事，又须闲解。神精丹防危救急所不可阙耳。……以冀神助，非可率致。”故而他决定“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而谆戒他人“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而使“其方从以烟火，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见《要方·解毒》）。

再则古人“常”“尝”两字可通用，这里的“常服五六两乳”，应作“尝服五六两乳”。而且以“尝”字来讲，上承“三十八九”，在文法上更通顺合理。再结合晚年的洞悉丹石危害的体会与言语，尤为混然一体。

因之，我们可以下此论断，孙氏在丹石方面不是鼓吹者而是批判者，所以是功大于过，甚至有功而无过。

（九）自有天知

解放前，药铺卖成药的仿单（说明书）上，都有“虔修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广告性质的联句。可是这个“天知”，做起来谈何容易。

“余以武德中，合玉壶丸，时值天阴，其药成讫后，卒不中用，终弃之”（见《翼方·杂病下》）。这里就可反映出孙氏对病人的负责及思想品德的崇高。

过去卖药仿单上还有“如有假劣，五雷殛顶”的誓言式广告。可知他们是为了怕“五雷殛顶”而不敢卖假卖劣。而孙氏则为了“卒不中用”而毁销变质药品。其思想境界的天壤之别，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个旧社会的药商，真的怕“五雷殛顶”者，还是属于具有人性者。

（十）始创剧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

药物既在“性”上取效，也即药的作用。但还有“量”的问题，也就是药的浓度问题。因为单单药物，没有接触到人体的吸收经过、反应活动相互作用是毫无效力可言的。凡药性正确而浓度未达到者，也是无效。反之浓度过高也能召来流弊，更其是剧毒药品，甚至可以致死。在今天当然已有“阈剂量”、“半数致死量”、“绝对致死量”和“最小致死量”的指标可据。但在1300年前，根本没有这样条件，所以当时仅仅知道“小毒”、“大毒”及“无毒”，更没有一定剂量标准。因之很多由于药物浓度过低而无效、过高而发生流弊。

孙氏第一个强调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主张“若用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米，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见《要方·序例·服饵》），“若不吐利，更加一丸，或至三丸五丸，须吐利为度”（见《要方·胆腑·万病九散》）。

这种服用剧毒药逐渐加量方法，不论对药物的使用或人身的安全，都有极大的保险作用。即使在今天，有时我们还在私淑这个方法。

（十一）认真对待药物用量

历来中医对待用药份量，很不考究，直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例如灯心一扎、荷叶一角、芦根一尺……等等。而孙氏早就关注了这个问题。如：

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拾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也。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几云等分者，皆是丸散。凡散药又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匕者，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皮，乃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毕，以半两准一枚。积实若干枚者，去穰毕，以一分准二枚。

凡方云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见《要方·序例·合和》）。

这样认真对待，为孙氏之前所罕见。即使孙氏之后，也不多见。还有如煎煮人参，强调“用流水”。这一点连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也十分欣赏，沈氏谓：“孙思逸千金方人参汤，言必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无异，予尝见……。”见《补笔谈·药议》）沈氏申说了许多流水与止水的不同事例，证实了孙思逸的科学思想。

（十二）小结

沈括（1030—1094年），字存中，宋·钱塘人。嘉佑间进士，博学能文，精通天文、地理、历算、方志、音乐、医学、并制造过浑仪、景表、浮漏等天文仪器。

《补笔谈》，北宋·沈括有名著《梦溪笔谈》30卷，是他根据科学实践与平生见闻而写成的。又有《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

相传宋神宗时(1068—1085年在位)，翰林学士赵概，他怀着曾参“吾日三省我身”的精神，在书桌上放置黄豆与黑豆各一把。每做一件好事，即在贮器中投一粒黄豆，坏事则投黑豆，每届一定时间，启器检查，黄豆黑豆谁多谁少。后人称这个自我检查方法为“功过格”。假定把孙氏在药学方面的好事坏事来使用“功过格”，肯定是黄豆，即使苛克的要求，也恐难以找到半粒黑豆。你看，他在药学领域里做的好事：

1.整理前人的本草学，并删增的吐故纳新。使本草学处于永葆青春的局面。

2.有许多新增的药品，如水蓼、冬葵子、龙葵、郁李仁……等，至今还是属于常用药物。

3.在车前子基础上发展的车前草，在竹叶基础上发展的淡竹叶，在饴糖基础上发展的沙糖……，都为后人所乐用，直到今天。

4.胡椒、无食子、底野迦、毗黎勒、诃黎勒……等外来新药，用中医传统理论来解释，使洋为中用者树立了榜样和方法。尤其在现在中西医结合潮流里，更有其实用而深远的意义。

5.引进了化药制剂。

6.利用“丹石”的躯壳，以有益药品代替了有害药品，使有害的丹石一变而为有益的保健延年良丹。更巧妙的是这场革命是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获得了成功。得以使药理学论坛上避免了一场无谓的风暴。

7.在介绍炼服丹石的同时，并揭露了丹石的危害性。

8.创造了剧毒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1300年来，不知道避免了以“致死量”丧生的多少事故。

9.以动物肝脏来治疗目疾，确立了千古定论。

10.对种药、采药、制药、用药极端负责，如：

(1)主张自采、自制及科学的贮藏。

(2)亲自实验，有效者用，无效者删。

(3)不肯轻易介绍自己没有试用过的方药。同时也不轻易否定暂时尚未明确知道有效或无效的方药。

(4)严格把持质量关，欠佳的、低效的、炮制有问题的宁可销毁，不使用于病人身上。

像他那样的业务水平，再加上那样的道德品质，而且百余年的临床经验，坚持终身，这顶“药王”桂冠不加冕于他的头上，给那一个。

赵概，字叔平，自学成才。尝集古今谏净事为《谏林》120卷。

曾参，春秋时鲁人，字子舆，孔子弟子。

七、临床

一个高明医生，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理论、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作风，三者基本条件，缺一不可。理论尽好，在临床上无法应付稍感难治之症，即叹黔技告尽者，像这样的赵括式医生，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孙氏的理论水平早已尽如前言，这里用专章来讨论他在临床上的成就。

（一）习医动机和条件

历代名医很多出身于世家，河东三凤 荀氏八龙 者不乏其人。如徐门的熙、秋夫、道度、文伯、雄、叔向、嗣伯、謩、践、之才、之范、敏斋……；危门的云仙、子美、岩崖、熙载、亦林……；龚门的信、廷贤……；薛门的销、新甫……；以及从宋代到今天还瓜瓞绵延不衰的何门 侃、广族、天祥、奎、土方、之、公谨、希鲁、廷用、凤春、九经、十翼、从政、汝闾、汝闾、令昭、鸿堂、铁山、北海、元长、世仁、世英、其伟、书田、其章、其超、长治、鸿航、昌焕、昌龄、昌粹、振宇、振基、伯鸿、寿彭、廷漳……至今还有几位知名度极高的老中医，历 27 代而不衰，在中医界是绝无仅有的。

也有因双亲多病，知医以奉亲者，如晋·殷仲堪，以“父病积年”；五代的孟昶以“母病有疾，屡更太医不效”；唐代的王焘，“以母有疾，衣不解带，亲絮汤剂”；明之吕复，以“后以母病求医”；汪石山，以“母病呕，遂究心医学”……等。

更有本身为二竖所苦，忿而学医者，如明之秦昌遇、清之高世栻；黄元御困于眼病，钱秀昌厄于骨伤。孙氏也正是“才非公干、夙婴沉疾，德异士安，早缠尪瘵”（见《翼方·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见《要方·序》）而为之学医的。而且生平也多病多痛，内、外科病经常不息。

赵括（？—公元前 260 年），战国时赵将，平时夸夸其谈，看来十分精通军事，但一旦上了战场，即兵败如倒。“纸上谈兵”故事，就出在他身上。

河东三凤，唐·薛收，族兄薛德音和从兄薛元敬，俱有文才，为蒲州汾阴人，属河东道，时人称为“河东三凤”。

荀氏八龙，东汉·荀淑有八子，俭、缙、靖、焘、汪、爽、肃、敷，都有文名，人称“八龙”。

徐门，指六朝·南齐，由徐熙传下的数代名医。

危门，指宋·元间由危云仙传下的家传名医，至危亦林已第五代。

龚门，指明代，金溪世医，内尤以龚信与子龚廷贤更著名。

薛门，指明代，吴县世医薛铠与子薛已。

何门，指上海市、青浦县世医何氏，从宋传到现在，已 27 代之久。

殷仲堪（？—399 年），东晋·陈郡（今河南淮阳）人，身列仕宦，而独于医。

孟昶（919—965 年），五代时蜀国君主，精于医。

吕复，字无膺，浙江鄞人，明代名医。

秦昌遇，明·上海人，字景明，为当代名医。

高世栻（1634—？年），字士宗，清代名医。

黄元御（1705—1758 年），字坤载，清·山东昌邑人。因庸医误治而目盲。

钱秀昌，字松溪，清·上海人·精伤科。

如“余立身已来，二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见《要方·热痢》），
“余以武德中（77—85岁时）六月，得此疾，经五六日，觉心闷不佳”（见
《要方·备急·蛇毒》），“余以正观四年（89岁那年），忽口角生丁肿”
（见《要方·丁肿痛疽》），“余以贞观五年（90岁那年）七月十五日夜，
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树，至晓逐

肿，痛不可忍”（见《要方·备急·被打》），“余以正观七年（92岁
那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肉疼痛，比至晓，头
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痛，不得手近，至午时至于右角，至夜诸处皆
到，其眼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见《要方·丁肿痛疽·丹毒》）。而
且到了晚年，仍然“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见《翼方·序》）。孙
氏从童年的“幼遭风冷”到晚年的“而勤药饵”，真是多病之躯。屈原《九
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孙氏而不是医生，那未在这九折臂之下，
也会成医，俗谓“久病成医”，何况又是身为良医的人。本来以抱病之身
的人来研攻医学，当然更能比一般人更深入。疾病本来是人生不幸，但对于
业医者本身业务的提高，却有锦上添花裨益。

（二）临床时间和地点

“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见《翼方·取孔穴法》），则他跨入医门约
在陈·武帝·永宝三年（559年）之际。学习两年，大有进步，故而自谓：
“至于弱冠，颇觉有悟。”（见《翼方·序》）考悟字，为深入理解之意。
中医的业务水平，分为懂、通、精、悟、化、神六级：

懂：把中医基本理论，有了一个初步的较为完整的概念。

通：非但知道其一般，而且能触类旁通。也就是对某一个论点能够过渡
到另一个论点，把前因后果、周围联系之间贯通起来。

精：在通的基础上，能掌握而运用于临床，而且用来要左右逢源，毫无
捉襟见肘之憾。

悟：除了具备了精通条件之后，更进一步知道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效？
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无效？为什么？

化：精通全套中医理论，熟悉各家不同学说及学派，使许多反面的、出
奇的理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于临床，而且都能有效。

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取方用药，使一般低水平的人们难以
理解的境界。

他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达到了悟的阶段，也就是六个阶梯上登上了第
四级，除了具有得逃俟厚的天资之外，主要是学习刻苦，方法得宜。也有人
认为他的多病和“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见《要方·序》）的“穷”，也
是促使他刻苦钻研的动力，即欧阳修所谓：“盖愈穷则愈工。”（见《梅圣
俞诗集·序》）含有哲学的道理

这个时期里，仅仅是尝试性的临床应诊，不过是“亲邻中外，有疾厄者，
多所济益”（见《要方·序》）。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楚人，名平，字原，楚怀王任三闾大夫。后遭人诬陷，被放逐，
作《离骚》，终于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欧阳修（1007—1072年），宋·庐陵吉水人，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为中国历史上大文豪之一。

以后的临床活动无史可稽，唯在两部《千金方》中可以找到些一鳞半爪。在两部《千金方》中最早的为“治蚊龙病，开皇六年（586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飧三斗，大验”（见《要方·肝脏》）。

之后，“余以大业中（605—617年），数以合和，……以之治病，神验不可论”（见《要方·胆腑》）。

再后，“在唐王朝，武德中（618—626年），有贵妇人，师市奴，谓之金石凌，非也。”（见《要方·胃腑》）

再后，“武德中，有德行尼名净明，患此已久。”（见《要方·膀胱腑·霍乱》）

再后，“武德中，龙资此一卷服水经授余，……。”（见《翼方·辟谷·服水》）

更后，已应召来居长安厘市，时在贞观间（627—649年），这个阶段的人于纪录的临床事迹最多。有“昔正观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后四旬发病而死”（见《要方·养性》）。

“贞观初，有人久患羸瘦，殆死。余处此一剂，则差。”（见《要方·肾脏》）

“正观初，衢州徐使君，访得治疗肿人玉山韩光方。……正观中，治得三十余人，差。”（见《要方·丁肿痛疽》）

“余以贞观年中，将一病士入山，教服云脂。”（见《要方·痔漏》）

“余以贞观五年（631年）七月十五日，……。”（见《要方·备急》）

“正观十年（636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见《要方·消渴》）

最后一例，为“正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胎上，……永徽元年（650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杂病下》）

根据以上统计，学医于永定三年（559年），时18岁，在这一阶段里，不可能马上临床治病。事实上也正如此，自谓：“我初学医，未以为业。”（见《要方·备急》）

行医事迹有记录可凭者，仅赖两部《千金方》。它的记录开始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当时孙氏为45岁。从学医到现在已有28年之久，在业务上早已成熟。中间经过大业（605—617年）、唐·武德（618—626年）至贞观（627—649年）而达到高峰。最后为永徽元年（650年），也就是《要方》成书前两年，前后跨度历65年之久，也即孙氏从45岁到109岁之间的一个漫长岁月。不过开皇六年之前及永徽元年之后到永淳元年中33年里，不可能没有临床治病。想来开皇六年之前，一则身居僻壤，再则名望未高，仅仅是求诊者为数不多。永徽元年之后，毕竟年事过高，精力有限，杜门谢客著书（《翼方》）。在此一段时间里很可能把未入京野居时代的研究黄老学说再度重温复习，且看《翼方》中道教口吻要比《要方》浓厚得多吗？再则关于临床日期的记录，迹近衍文，不是认真填写，失载漏书更为常有之事。且看“武德中龙资服水经”与“永徽元年治疗流矢中背”案，都失载于《要方》而补述于《翼方》吗。

所以即使以65年最少的数字来计算，临床时间之长，也为古今所罕有，所以经验之丰不言可喻。

再谈临床地点，孙氏年轻时代，早已明确得很，是长居的长白山（见《新

唐书·本传》)。

唐·贞观元年(607年),孙氏奉召入京,来定居长安,当然是在长安。

但问题又来了。《唐会要》:“显庆三年(658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邈,至,居干鄱阳公主废府”,似乎在显庆三年才来居长安,要比这里后退31年。其实这里的“太白山人”,不应该理解为居在大白山的人,而要把“太白山人”作为孙氏的代名词。“居”也不能认为是赐居,而是作为居住、住宿、寄寓的意思。既然是居住,那末从贞观元年入住以后,只要身处于此,任何时候,都可称“居”。所以尽管显庆三年又召见一次,和这贞观之初,毫不相干。再根据孙氏故乡孙家塬孙真人祠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的《重修孙真人祠记》:“宣帝时(569—580年),以王室多故,遂隐居蜀之峨嵋山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之复至,又隐于秦之太白山十二载。”如以贞观元年(627年)上推52年来计算,的确接近于北周宣帝时代。尽管这个推算是粗糙的,但十分合情入理。

隐居何处?《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579—580年),……乃隐居太白山。”《西阳杂俎》:“尝隐终南山。”考终南山,现在陕西省、西安市南40多公里处。是秦岭西自武功县境,东至兰田县境的总称,包括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骊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锦绣的画屏,屹立在古长安之南。又称太乙山,为秦岭山峰之一。再以两部《千金方》中反映出从贞观之后而临床记录特多者,此乃身居闹市之故。他所“固辞不受”者,是爵位而不是定居京师。

长安住在何处?当他92岁时,《病梨树赋·序》:“余病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今年93矣。”

住在这里应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之前。也就是贞观元年(607年)到十七年之间,“正观中,人为少府,奉敕修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定经图”(见《翼方·针灸上》)。考甄立言,当年已103岁,也就是他逝世的那年。孙氏比他小一岁。

《旧唐书·本传》:“显庆四年(659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当时为118岁,《要方》已完成了七年。《唐会要》作“显庆三年”。不管他三年四年,总之他仅仅辞了爵位,并没有告老还乡,当然还住在这里。

《旧唐书·本传》:“上元元年(674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这时已133岁,的确已老而且衰,请归是势所必然。同时唐高宗李治还把他居住的都阳公主废宅索性赐了他。

以后他是否迁出京师而再度隐居草野?根据“……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的“居焉”口吻上推敲,还是延续定居下去的,直到八年后羽化时为止。

即使没有“居之”一言,也不可能作为迁出鄱阳公主邑司的。因为古人习惯,既是御赐之物,决不可以转赠给他人,以房屋而论当然亲自居住,否则即是欺君犯罪。

也有人引用《后汉书·桓荣传》中的“再拜归道”的归字作谢字来解释。是说孙氏以老病而辞去在职的一切职务,并且拜谢皇恩。当然也说得通的,但并不证明孙氏迁出居处。

甄立言,为甄权之弟。唐武德间(618—626年)升任太常丞。

每一个有资格的临床老医生，都有这个体会与经验，当在青壮时代，多治疗急性病，到了晚年就擅长调理性的慢性病了。而且还有一个称不上规律的规律，乡村多急性病，城市多慢性病，这两个概念到今天还是如此。现在我们再对孙氏的记载来旁证一下：

开皇六年病例，为发病急（“似痴病”）而吐蛔，急性病。

大业中病例，为“病症风气”，也较急性。

武德中的比丘尼，患的是霍乱，当然是急性病。

贞观初的老叟病，典型的老年病。又一例“久患羸瘦”，显然都是慢性病。

贞观中一士人病例，为麻风，慢性病。

永徽元年一例，乃病起于正观年代，是慢性病急性发作。

从经治的病种，很可以推测出医生的年轻时代和晚年时代，市居与乡居的情况。当然，以上的病例太少，不可能有足够的说服力。

总之，孙思逸的前半生（85岁之前），是在貌似不幸而实际上大幸的年代间度过的。正因为兵灾战祸，民不聊生而迫使他闭门读书、修道、学医。后半生（86岁之后），适逢两个“之治”，是他生逢盛世的大幸大福中度过的。因为此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医学的发展。当时的经济繁荣，反过来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也更促进了医学本身的更发展。

孙氏更幸运的是遇到李世民这样一位英明之主。李世民的“去奢轻赋，宽刑整武，海内升平，威及域外”政策，同时对甄立言、孙思逸等医家的礼遇，都是孙思逸得以成功的良好条件。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息猛增，客观上就增加医生的医疗实践活动，而医家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医疗水平以适应一切挑战。使业务、疗效、水平纳入螺旋型良性循环的轨道。

而且一个和平安靖的环境也给予医家总结、传授医疗经验和撰写著作、刻书传流的条件。假如孙氏而提早大半个世纪出生，或不享141岁的逻辑，要作出这样的事业，是必须要打问号的。更可以干脆地说，今天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唐代有过孙思邈其人者。

八、刻苦钻研

孙氏在医学方面的伟大成就，不是偶然的。除了有禀质聪慧过人的资本，极好社会背景赋予的条件，身弱多病和“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见《要方·序》）及“皆家贫不济乃止”（见《翼方·养性·服饵》）的“穷”来作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态度刻苦钻研。他为什么要在刻苦钻研中才能得到成就？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见《要方·大医精诚》）。

现在我们可以细致分析他所以能博学的八个方面：

（一）穷究

《淮南子·览冥》：“悖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地。”凡各门学问，都是在穷本索源的深究之下，才能格物致知而有所心得，我们看一下孙氏是怎样穷究的：“既不深究其道，何以为医哉。”（《要方·平脉》）

要认识某一个事物，必先接触那个事物，了解那个事物，深知那个事物。如其只须知其梗概的话，那末只要浮光掠影地过目一番即够了。但学问这个东西，更其是医学，凭浮光掠影的不求甚解，是坚决不行的。必须要“深究其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涉猎不精，是多学之弊”（见《幼学琼林·文士》，读书再多也无用。所以孙氏“深究其道”四字，的确是学医求精的唯一不二法门。

朱熹在《训学斋规·读书写文字》中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光用眼去阅览，远远不及朗诵的深入，且看老一辈中医数百首方剂可以一味不错地记得清清楚楚者，就是在摇头晃脑中视狐了《汤头歌诀》的收获。现在“读”的风气已没有了，所以还有那一位能记得住数百首方剂？但眼到、口到还是不行，最最主要的是心到，诚如朱夫子所谓：“心到最急。”所以孙思邈提出“必须视讫此方，寻思妙理”（见《要方·大医习业》）、“心当屏弃俗情，凝心于此”（见《要方·平脉》），然后“审谛覃思”（见《要方·大医精诚》）。

能做到孙氏的两点，事实上也并不困难，纵然资质较差者，只要“人一能之已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地深研究究，无有不成功之理。且看苏秦读书困倦、闭目欲睡时，即引锥自刺其股。孙敬久读，神疲头垂，用绳把头发吊在梁上。孙氏的学习精神的确与这“刺股悬梁”情出一辙。

“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怯千金，遂使各方异术，莫能隐秘”（见《翼方·禁经上》）。这孙氏又一个穷究的手段。像蜜蜂一样地采集效方良药，海洋不拒百川，所以成其浩瀚。李时珍《本草

《幼学琼林》4卷，清·程允升撰。清代作为童蒙读物，内容十分精彩。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宋·徽州婺源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训学斋规》等书，尤以注解四书而享盛名。

苏秦（？—公元前317年），字季子，师鬼谷子。战国时洛阳人。习纵横家言，出游数年，樵悴而归。乃发愤读书，终成大业。

孙敬，汉时人。字文宝，好学，后成名儒。

纲目》的不朽之作，是否私淑孙思邈，那是不得而知，但两人的治学态度，都如出一轨。

（二）精读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言，遗害不浅，读书最忌不求甚解。

孙氏是主张精读的，虽然他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但他却这样认认真真地去做，那是有目共睹的。请打开《要方·针灸·五脏六腑变化傍通诀》，就可以看到孙氏把《素问》的“金匱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灵兰秘典论”、“五脏生成论”、“五脏别论”、“经脉别论”、“大阴阳明论”、“五运行大论”及《灵枢》的“本输篇”、“本神篇”……等几篇经文，综合分析，排列出一幅表格。不是加以精读细读、深入领会，是无法做到的。如此既可一目了然，更可加强记忆与深入。这样的学习方法和读书精神，直到1300多年之后的《中医学概论》，还在采用孙氏的归类推演。

（三）博览

任何学问，最难得的是“博闻强识”，用精辟而简单的话，就是博学。因为穷究、精读，是深度问题，而博闻是广度问题。有深度而无广度，迹近于迂。有广度而无深度，则迹近于浮。所以深与广两者是形影的相随，不可废一。

中医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从天时到地理，从化学到物理，那一样没有密切关系，你光是以医学医，以医论医，是无法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只有博览群书、开阔眼界、放宽视野，要做到《论衡·超奇》所谓：“博览古今者为通人”的通人，才能坐到诊疗室的写字台座上。

所以孙氏强调“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然识之。不读内典（原文为“经”，实误），则不知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见《要方·大医习业》）。可惜当时没有理化外文，如其有的话，孙氏肯定也目为必修之课。且看他把印度的“地水火风，和合成人”（见《要方·序例·诊候》），“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见《要方·养性·调气》）学说，也搜罗列入到中医基础理论之中，就可以证实这点。

孙氏又谓：“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闲来阅之。”（见《翼方·退居·养性》）此言除了要求医务工作者必需博览之外，更给人一个启发，就是虽在空闲之际也应见缝插针地争取多多阅读。本来嘛，“开卷有益”。

（四）务实

《中医学概论》在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由昆院长领导下编纂而成。1959年修改再版。27年后，又重加修润，第三版于1987年完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任何工作，更其是学问，最忌华而不实。对每一个事物，必须脚踏实地地弄清彻底，求得准确而深刻的认识，才有真正的

心得，也就是务实。从来大学问家，都是赞成务实的，如《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孙氏求学，的确做到这点。

孙氏曾谓：“世间大有病人亲朋故旧交游来问疾，其人曾不经一事，未读一方，自聘了了，诈作明能，谈说矣谒，或言是虚，或道是实，或云是风，或云是蛊，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纷坛谬说，种种不同，破坏病人心意，不知孰是？……窃悲其如此者众！”（见《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在字里行间，孙氏是多少痛恨这批浮而不实之徒，同时也反映出孙氏的务实精神。

（五）持恒

一个伟大事业的成就，与持之以恒的“恒”字，是离不开的，一个持久不变的意志，是创业成事的主要保证。自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朝秦暮楚的人有所在事业上成就的。孔子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见《论语·子路》），照孔子的意思，医生的学习恒心，比谁都更重要。一个人在事业上、学问上一无所建者，病在“无恒”，所以孟子还把孔子的话加以补充，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见《孟子·梁惠王上》）。李白少时也读书无恒心，但接受了“铁杵成针”的教育，从而发奋读书，终成千古大诗人（见《潜确居类书》）。元·戏曲作家王实甫有一句名言，是“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见《西厢记·张君瑞闹道场》）。

反映孙氏研究医学的恒心，虽然仅仅两句话，“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见《要方·平脉大法》），但已淋漓尽致地忠实反映出孙氏对医，即使在忙得不堪的时刻，不会放弃，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也不会放弃。纵然寥寥十个字，而孙氏治学恒心，早已跃然于纸上。

（六）戒满

《老子·十五》：“旷兮其若谷”，《老子·四十一》：“上德若谷。”的确，一个学者务必虚怀若谷，中虚则即能接纳知识而不会拒绝。更其是文学医学，是永无止境的。反过来说，人最忌自满，这种自负、自满者，是不会学到真实本领的。《书·大禹谟》的“满遭损，谦受益”，说得更有力而明确。孙思逸不折不扣是儒门弟子、道教真人，他对两教的祖师遗训当然拳拳服膺而深铭五中。他对自满的警惕性也高。而且对“自满”一事在语言口

事谓李白少时，见一老媪在磨石上磨铁棍。李问她做什么？老媪回答谓“把它磨成一根缝衣针”。李即骇然而有难色，媪对他说“铁棍磨成针，全在工夫深”。李白受此启发即读书有恒心了。

《潜确居类书》120卷，明·陈仁锡编。内多历代故事。

王实甫，元·北京人，字德信，戏曲名作家。名剧“西厢记”，出于他的笔下。

气中也蕴藏着仇恨。如：

世有愚者，读书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见《要方·大医精诚》）。

偶然治差（古瘥字）一病，是昂头戟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见《要方·大医精诚》）。

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极自误也（见《要方·备急》）。

孙氏出于肺腑的真诚忠言，既自勉，更勉人，我们应当作为座右铭来对待。

（七）有紧迫感

学习或工作，最忌的是优闲流荡，一句“来日方长”，正不知道使多少人、多少事的岁月磋跎！有了压力，然后才有动力。可是压力之来之于外者，不可能经常遇到。所以唯有自己主动的自加压力，才可以不借助于外来的而能产生紧迫感，而且自己的紧迫感压力未必比外来的为小而轻。孙氏对求知的紧迫感，也可以从字里行间反映出来。如：

“临事之日，方知学为可贵”（见《翼方·万病·总疗万病》）。后人一幅名联“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上联，就是根据孙氏此言而得来的。正因为怕“临事之日”的随时随刻的到来，感到紧迫而不能不加紧学习。

“凡人在身感病无穷，而方药医疗有限”（见《翼方·药性纂要》）。一个医生能经常想着凭有限的方药，应付千变万化的无穷病患，总有感到捉襟见肘时的困难，必然穷则思变。为了应付这个挑战，当然不能不迫使你去学习。

（八）善于总结

翻遍两部《千金方》，没有见到孙氏在总结方面的一言半语。但两部《千金方》的本身，就是没有言语的总结方法示范介绍，是孙氏善于总结的实物展示。

在两部《千金方》之前，虽然《伤寒杂病论》在疾病方面作了一次总结，但总嫌太不细致。《时后方》、《刘涓子鬼遗方》当然也是杂病、外科病的一次总结，但也很不完整。《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病机的总结，是较先进的，但治疗学付之阙如。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汉代医简》，在编排方面更显示出十分凌乱。当然，这是时代关系，我们毫无理由来苛加要求。但两部《千金方》独能在这块荒地上垦筑出了井井有条的阡陌沟渠来，却是十分不易的。

至于内、外、幼、妇、五官各科的分划，疾病的分型归类，则自两部《千金方》为始创。之后许多名作巨著的框架模式，都没有越出这两部《千金方》的雷池一步。明·楼全善的《医学纲目》编排，也以十二脏腑来归类，更说明孙氏总结归类方式的科学性，否则时历 883 年之久而怎样还有人来欣赏和

楼全善（1320—1389年），名英。明·浙江肖山人。所著《医学纲目》40卷，刊于1565年。

法宗。在这里，不能不提醒一下读者，孙氏的疾病归系，已经把《内经》不科学的“演绎法”一改而为“归纳法”，这是不为大众所发党的又一个更大贡献和医学理论上的大飞跃。

总之，孙氏在医学方面，刻苦钻研的程度与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忘寝废食，讨幽探微”（见《翼方·万病·总疗万病》）八个大字，前四字为刻苦，后四字为方法。正因为他本人的刻苦钻研，所以对学习态度不端正者，就感到鄙视和痛恨，情不由己地要叹惜这一批“后生志学者，但知爱富，不知爱学”的人了。

大医（三）

九、医德

凡职业道德在医务界的，就是医德。全衔应称医生的职业道德。

谈到道德，中国人言之最早。《书·盘庚上》：“施实德于民”，嘱普天之下第一人王帝尚且要施德于人。《易·乾》：“君子进德修业”，把道德置于业务之上。《大学》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以这个德在包括儒家在内的炎黄子孙心中早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佛教的德，《法华经·序品》：“于诸佛所植众德本”，《无量

寿经》：“消除诸漏，植众德本。”用佛门的话来讲，有了善根，不怕没有德。因为德是建立在坚不可拔的身、意、口三业之善根上的。孙思邈把佛教精神渗透到儒教中来，这个特点明显地反映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见《要方·大医精诚》）。他把佛家“与乐为慈，拔苦为悲”的《法华经》的“大慈大悲，常无懈怠”与《孟子·公孙丑上》的“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巧妙地既硬凑而又协调地揉在一起。如此者还有“圣人之道，以慈济物”（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等多处这样的手法。

道教的德，又不同于儒、释。《庄子·德充符》：“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庄子·天地》再进一步解释谓：“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没有占有欲思想。《要方·大医精诚》中“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失荐，食如无味，醯醢兼陈，看有若无”……等等，都是道教教育出来的德，孙氏兼搜并蓄地移植过来。

孙氏吸收三教德的标准合而为一，形成了他具有完整和特色的医德。所以有人称他为“我国伟大的医学伦理学家”，我看并不过份。说来或许不会使你相信，第一个人提出医德问题的，不是医生而是南朝·梁（502—557年）人杨泉。在他的《物理论·论医》中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只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孙氏的医德思想，与此也十分符合，是否孙氏也读到斯文，那就无法考证了。

《素问·金匱真言论》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意思是对不适合为医者的人，不能把技术传授他。什么是不适合为医者的人，就是无道德者。

（一）两篇《大医》论

所称两篇《大医》论，是指《要方》第一、第二篇文章：

《大学》为《四书》之一，为儒家经典，相传春秋时（公元前505—前436年）曾参所撰。

《无量寿经》2卷，为净土三部经之一。

杨泉，生卒失考，字祖德，魏晋间哲学家。辞官不仕，从事著述，今仅存残篇《物理论》。他上继王充学说，下启范缜思想，是一位比较唯物主义的古代思想家。

《大医习业》（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凡欲为大医，必须请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笛、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原文作内经，误矣。今更正为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有许多学者认为《大医习业》，是医学教育中医德教育的指南针。他强调培养和造就合格的医学人才之前，必须首先接受医德教育。而且孙氏更注意到加强业务学习，也是作为医德的后盾。一个业务水平不高的医生，光凭一个德字，是无法治病救人的。因之他要求业务的精通，就要以素问、灵枢、明堂·流注、本草、药对及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笛、靳邵等诸家学说来奠定结实的基础。旁通的龟五兆、周易六壬、阴阳相法来帮助思维。还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来扩大视野。更主要的是不能“不知有仁义之道”！为什么要有仁义之道？孙氏又用佛家说教来解答谓“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皆应于天”（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此言的后半，又接近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这也说明孙氏的思想，结合儒、释、道三者为一体了。

《大医精诚》（根据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者！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枪，勿避峻嶮，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日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峻嶮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皆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载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所以医人不得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有些学者又认为《大医精诚》，是阐明医术与医德的辩证关系。考精诚两字，孙氏是现现存地取《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精诚之至也而得。但其深奥的涵意还不尽于此。精是《论语·乡党》：“食不厌精”，是要求业务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是《礼·乐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是指医德的真诚者实。孙氏强调这两者，必须兼而有之。不精则必然“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者”。不诚则是“含灵巨贼”，反足以置人于死。只有“勿避峻嶮，一心赴救”之诚，才是“苍生大医”。用现代语来说，是病人有一线生机，医生要冒万分风险来抢救。

这里还有一种医德，虽然不属于对待病人的态度问题，乃是医生自己品德问题，不得在病人面前大吃大喝，高谈阔论，自我吹嘘炫耀，低毁别的医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是，医生因病投药，不该乱开贵重处方。现代的“人情方”，是孙氏所无法看到的，如其孙氏而生活在现在，对此不知作何想法。

中医在几千年来，瓜瓞绵联不替者，医术与医德，也就是“精”与“诚”的一直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我国古代那一代不是以先进的医术促进了医学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凭高尚的医德，鞭策医术的更形提高而造福广大人民。两者相互因果、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把整个中医事业的德泽常存，证明了孙氏“精诚”论点在中医事业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五个规范

孙氏除提出了“精”“诚”两大纲领之外，还罗列出具体的规范五条。对医德的要求，有了权衡的准绳。他的五个规范，为：

1. 与病人要心连心

首先强调“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了这一个思想感情，然后势所必然地“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而“勿避峻嶮，昼夜寒暑，饮渴疲劳，一心赴救”了。这是医德的核心，如能做到这点，则医生的心已与病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后世《医说》（1224年）的“医者当自念”、“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勿问贵贱，不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医学入门》（1575年）的“病愈而希望求贪，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古今医鉴》（1576年）的“今之明医，心存仁义，……不论富贵，施药一例”；《万病回春》（1587年）的“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医彻》（1808年）的“惟心之既挚，则危之之际，痛痒悠关，……”“伊之属望既殷，非我救之而谁哉”；《医医病书》（1831年）的“有德者，必有不感之心”……

《古今医鉴》16卷，明·龚信撰。其子龚廷贤作续编。

《万病回春》8卷，明·龚廷贤撰。

《医彻》4卷，清·怀抱奇撰。

《医医病书》1卷，清·吴鞠通撰。

等等，都是紧步孙氏之意而加以发挥的。

孙氏不仅不是纸上谈兵式的谈谈而已，口上说了，还付之实际行动。一般人遇到大麻风病人，莫不避之不暇，而孙氏则对大麻风病人是“余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所以深细谙委之，且共语看”（见《要方·痔漏·恶疾大风》）。

《论语·雍也》：“伯牛有疾（麻风），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孔子不避恶疾传染而与伯牛握手，这是为了“亲”。现在孙氏所接触的六百余人，不可能都是亲人，而他能“一一亲自抚养”，就可以证实他的“皆如至亲之想”一言，是十足的兑现。

2. 业务水平是医德的后盾

《褚氏遗书·审微》：“病有微而杀人，势有重而易治，精微区别，天下之良工哉。”他的意思是轻病庸医治之能死，然而即使重危病在良医的治疗下，亦能化险为夷。后《古今医统·庸医连报》又作了补充性的解释谓：“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这都说明医生仅仅有对病人一片热忱而没有一定业务水平来谈医德，也是司马相如举鼎全属空话。真是《礼·表記》所谓：“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有什么用处。所以孙氏强调“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势必“虚者劳之，其弊万端”，“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疾”而“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见《要方·处方》，甚至“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

心中有了病人，就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精益求精，对诊疗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古代大医家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口诛笔伐，无情地鞭斥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孙氏就是这样说：“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见《要方·治病略例》）因此，凡医术不高明，在辨证论治上任何那一个环节上失误，其后果是严

重的。诚如张路玉所谓：“奕具战守之道，一子之得失，全局有关。医秉安危之机，一药之乱投，杀活所系。”（见《张氏医通·医门十诫》）故龚信慨然而叹，谓：“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误人性命。”（见《古今医鉴·庸医箴》）

这一点《小儿卫生总微方论》说得更为透彻地把孙氏思想阐明加注，谓：

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如此然后事必济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己，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今冠于篇首，以劝学者。

3. 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褚氏遗书》10卷，南北朝·齐·裕澄撰，又名《尊生秘经》。有人说此书系萧渊所写而伪托褚氏的。《古今医统》即《古今医统大全》100卷，明·徐春甫辑。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家。以病丢官，常年患糖尿病，弱不禁风，故有“病相如”之称。力能举鼎，是项羽等大力士等人为。

《小儿卫生总微方论》20卷，作者无考，但知其为南宋以前的医学著作。书中较全面地总结了南宋以前的儿科成就。

《尤氏喉科》里有这样一句与医德叛道而驰的话，谓：“……此系危笃将殁，慎勿治之，以取谤怨。”（见《尤氏喉科·辨证》）这里所看到的是保持自己声誉而不关心病人死活的丑

恶面目，应为人们所唾弃的。每当病人只要一息之存，医生就应该全力以赴的抢救。一切为了病人，把自己的名誉得失置之度外，那里还容得你半点踌躇。所以孙氏强调要“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枪，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来为危重病人抢救！倘若“苟心中不切，则视之易忽而审之不精，安能得病之本末，握而擒之”（见《医彻·心术》）的人，那是无法语之以医德。

4. 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叶天士、薛生白，纵然文章千古，医誉万年，但终以叶氏的“踏雪斋”和薛氏的“扫叶山房”事而为两位大名医脸上抹了黑。用现代语来说，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也是医德大忌。

张路玉对此等丑人丑事曾予以无情抨击，谓：“游于艺者，咸赖声气之交通；悖于谊者，尤为医林之切务。有互资相长之功，切磨相向之益。但今之道中，多于利而行，是不得不假借吹嘘之力。”（见《张氏医通·医门十诫》）雷少逸对这种卑鄙行为更予以严厉批判，谓：“尝观世之同事，每多嫉妒，行行犹可，惟医道中最为甚焉。夫医以苏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为重，功利为轻，而可稍有嫉妒哉！奈何今之医者，气量狭窄，道不求精，见一神其技者则妒之。妒心一起，害不胜数，或淫言百出，或背后破道。或前用凉药，不分寒热而改热；前用热药，不别寒热而改凉。不顾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总使有道者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见《时病论·医家嫉妒害人论》）

以上不论张氏也好、雷氏也好，一句一字，都能扣人心弦而爽人肺腑。欲知他俩的论点及洞察力从何而来？乃是从《要方·大医精诚》的“夫为医之法，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皆毁诸医，自矜已德”及“古来医人，皆相嫉害”（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等警句中得到。孙氏为了恨透这批“相皆嫉害”的败类，故而不惜翰墨，挥其无情褒贬史笔把秦太医令李 曝光示众（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使这个千古罪人，在“述大典奋鸿之笔，藏名山骋直之词”下无可遁形而遗臭万年。

5. 痛病人之痛

“现在看病、住院、找老中医也要开后门”的呼声，似乎已响彻云霄了。南京电子管厂因恶性肿瘤而未到年龄的退休工人 40 份病退医院诊断证明书

《尤氏喉科》1卷。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版作尤乘所撰，实误。1983年江苏科技出版社版，为干祖望纠正真正的作者，为尤存隐。

叶天士（1667—1746年），名桂，号香岩。先世自安徽歙县迁江苏苏州。与同时的薛生白，相互妒忌，乃名其书斋为“踏雪斋”，因薛生白名雪。

薛生白（1681—1770年），名雪，一号一瓢，清·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相恶，故名其书斋为“扫叶山房”。

雷少逸（1833—1888年），名丰，一字存松，原籍福建浦城，随父辗转徙居浙江，先迁龙游，后居衢县。他是一位幼承家业，博学多能，长于诗文、善作书画、旁通星卜的一位名医。撰有《时病论》8卷。典出《词林典故·文事·史》，意思是流传百世的《史》书。

同上。

中有 39 份是假的（见 1982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人民日报》）。诸如此类，都是医生向病家伸手的最终产物。这种人间丑闻、医林败类，毋怪乎八百年后的张果就恨牙切齿地说“今之医者，急于声利，率用诡道以徇流俗，殆当穴坏挟刃之徒无异”（见《医说·医工报应》）。

孙氏在 1300 多年前，就谈到这个问题，如能遵守孙氏的“到病家，纵罗满目，勿左右顾盼，……看有若无”，否则即“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盖医之本意也”。

孙氏提出的医德问题，既全面，又深入，的确切中时弊，效及将来，更使人惊讶的是，在两部《千金方》粹行之后（从 682 年算起）历距 1307 年后的《健康报》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社论中痛心指出“……首先选择医德医风这个群众敏感的问题为突破口，教育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为群众服务的观念淡薄了，出现了一些医德医风‘滑坡’现象……”（见 1989 年 7 月 22 日第一版），与孙氏两篇《大医》遥遥呼应，何其伟大乃尔！

十、孙氏医学思想探讨

(一) 医学思想

正因为孙氏形象的高大，事业的辉煌，声名的孚望，似乎势所必然的是一位伟大人物。人物伟大了，当然有他的特殊思想，于是每每讨论起来就人为的复杂起来了。事实却完全相反，孙氏医学方面的思想，相当简单，仅仅只有三点：

- (1) 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
- (2) 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
- (3) 服务态度强调我为人人。

除了这三点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1. 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

他主张集思广益，从古至今，包括洋人在内。

医学本身就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除了自己专业所必需的各种基本知识之外，更要旁及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地质学、水利学、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文学、史学、哲学和伦理学等等，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所以孙氏在《要方》第一卷、第一篇（即“大医习业”）中就强调指出：“凡为大医”，除了医学、药学之外，还须旁通天文（本文“七耀天文”及《要方·伤寒上·辟温》“天气不和，疾病流行”）、地理（见《翼方·退居·择地》“山林深远，固是佳境，……背山临水，气候高爽”、“柜下安少火，若江北则不须火

也”）、《翼方·退居·缔韧》四书（诸子）、五经（五经）、文学（“涉猎群书”）、历史（三史）、阴阳（“阴阳”）、五行（“五行休王”）、道教（“庄老”）、佛教（“内典”，原文为“内经”，是错误的。因为《内经》里根本没什么“慈悲喜舍”学说，只有《内典》中有这个学说）、周易（“周易”）、卜筮（“六壬”“龟的”）、数术（“五兆”）、星占（“禄命”）……等等，都要求融会贯通。

深入方面，孙氏也提出了“必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见《要方·大医习业》）、“审谛覃思”（见《要方·大医精诚》）、“既不深究其道，何以为医哉”、“心当屏弃俗情，凝心于此”（见《要方·平脉》）、“遂使各方异术，莫能隐秘”（见《翼方·禁经上》）。

至于孙氏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做到这点？那末在两部《千金方》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2. 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

他在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的思想指导下，所以提倡综

合疗法（见本章二，两部《千金方》中（十四）提倡综合疗法）、重视各种治疗与检查手段（见本章二，两部《千金方》中（十五）几个了不起的发明和发现）……等等。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本身业务水平的提高，这种精神，在两部《千金方》中已浸透于全部文字中。

3. 服务态度强调我为人人

孙氏在儒家的忠恕仁义、佛家的普渡众生、道教的任真纯洁的教育下，我为人人的思想，不论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都是身体力行，而且不

胜枚举。他的“知识面主张广博而深入”是为了“临床疗效力求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提高”就是更好的“为人人服务”。三者既属各自为政，但又浑然一体。

（二）业务知识结构

只要是一个从事于专业的人员，即以医务界来论，不管你技术高明或拙劣，医德高尚或卑鄙，都有他“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的形成，是出之于思想的指导。一个好导演，不一定出好作品，因为还要好的演员。有好演员，也不一定能出好影片，没有好导演，肯定不能出好影片。也就是说没有工作方法，尽管思想准确，不一定成为合格的医生。没有准确思想，工作方法尽好也不能成为好医生。

所以业务知识结构的内涵有两：一为思想，一为思想加工作方法的终产物——业务。思想与业务，既是因与果的关系，又是并存的孪生儿。所以有时因业务而左右其思想，反之也能以思想而改变业务。这种矛盾与矛盾的统一，孙氏早就在《要方》两篇“大医”中用唯物辩证法来讨论得十分清楚。可惜的是孙氏还没有知道在13个世纪之后的“结构”两字在当时尚未眉目端倪而已。

一个不齿于医林的医生，也同样有他的结构，在业务上读几本通俗启蒙型的中医书籍，科普型的药物著作，强记几首对病发药的呆方，也能鹦鹉学舌他说得出“辨证论治”一词，但根本不知道其内容，更遑论知道如何运用。这也是业务知识结构。脑子里一心考虑怎样弄几个钱，用什么手段来谋得进级加薪。这就是他的思想结构。

我们认识了这点，不妨再把孙氏业务的知识结构来探索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结构有以下六个组合要素：

1. 以《内经》《本草》等传统理论与道教牢牢结合为中心《易经》本来就是《内经》的核心，中医和道教的源泉。惟以后以两个不同专业而各自发展且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个距离虽然拉大了、甚至接近于分裂，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刀两段，且看“唯象中医学”的兴起，就可证实这点。

孙思逸的医学思想，完全建立于道与医混为一体的基础之上。唯在治疗方面医多了一些，养生保健方面道多了一些。假定放到天平上，则两者难分高低。

因为这一部分，在两部《千金方》中表示得既普遍而又明显，毋用举例来饶舌。

2. 在知识上广搜博集、多多益善

孙思邈从他“青衿展卷”到“皓首穷经”的一生中，的确认真地虚心学习、继承前贤先哲的经验与学说，同时还向同一时代的中、外医家的各种长处，连仕、农、工、商、方外人士之有一方一药者，也莫不诚恳请教。他深深地知道“学富增才，知多添智”的道理。

一个高明的商店经理，懂得要业务的发展兴旺，必须做到陈列货架的商品与库房里的货源比例，为1：3—1：4。孙氏的知识上要广搜博揽，就是这个道理。

3. 在运用上强调精益求精，在治疗上反对孤注一掷

他在临床时，决不粗心大意，力求精益求精。其中内容，包括有：

论；解放前，不会有赤脚医生的出现。第二是当时及其前些时期医药的实际情况，因为清朝的“勇”（即兵），决不可能操作雷达或搜索地雷的。没有白喉，就不可能有养阴清肺汤的问世。第三是本身及其周围的环境，假如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在孙氏的前半生，或南北朝之乱在孙氏的后半生，肯定要把孙氏的事业史写成另一个模式，而且还恐我们不知道孙思邈其人者。否则的话，橘逾淮而北也不能为枳了。

1. 社会背景

孙氏自诞生的一天开始至羽化的一年结束（541—680年）142年中，正是我国经过近乎300年的封建地主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连年战争，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封建国家重新得到统一，封建经济在崩溃之后有了恢复和发展，是国土分裂到民族大融合时期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在孙氏40岁那年（581年），杨坚夺去取了北周政权，统一中国，建立隋皇朝。这动荡的40年正好给孙氏一个闭门读书的大好机会。在七岁启蒙之后，以其“日诵千余言”的“圣童”天资，加以33年静心求学深造。在弱冠之年，就“高尚兹典”、“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

隋皇朝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政策，使隋皇朝得有20多年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局面。“隋大业中（605—617年）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见《诸病源候论·宋序》）的《诸病源候论》在大业六年（610年）成书。还有现已失传的《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两书，也在这个时期里通过政府、组织策动下写成。更可证明当时的政府已关注医学卫生事业了。历史上由政府主持撰写医学巨著，恐怕还是事无先例哩。这年约69岁左右的孙氏，早已行医多年，对他的鼓舞也肯定很大。但十分可惜到隋后期的炀帝·杨广（569—618年），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不断地横徵暴敛，实行一系列的残暴政策，终于在戊寅（618年）那年被杀，结束49岁的生命，隋皇朝也只经历仅两代皇帝共37年短暂的国祚，宣告倾覆。这年孙氏已77岁。

李渊在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太原，进军长安，翌年（618年）自立称帝。建立另一个新的政权，国号唐，他即唐太祖，年号为武德。又一个统治政权代替了这一统治政权。武德九年（626年），李渊传位于李世民，他又进一步调整施政政策，其中包括着对文化卫生事业的重视，如诏魏征等修史，诏甄立言等校订《明堂经图》并曾亲自驾临甄权家中询问药性（见《旧唐书·甄权传》）。以后屡召孙思邈入宫赐爵等等。终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孙氏也自86岁这年起，应诏来京，从隐居山野而转为长安城市居民。在临床上的活动，也由此而转入高峰。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高宗李治续位，改元为永徽元年（650年）。凭着

杨坚（541—604年），即隋文帝。

李渊（566—635年），即唐开国君主。

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

李世民（599—649年），李渊次子，即唐太宗。因治国有方，人称为“贞观之治”。

李治，即唐高宗，世民子。

太宗的遗泽，继续推行正确的政策，也出现了“海内艾安”局面的“永徽之治”。这两代人50多年“之治”，把大唐江山巩固了290年。

唐代国内民族关系融洽，交往频繁，对外关系采取开放政策，以西北陆路与东南水道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路，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阿拉伯、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来频繁，对孙氏来说，其影响之大也不言而喻。

贞观元年（627年）以前的85年，因群雄割据，战祸弥连，有利于孙氏逃世野隐、潜心攻读。这种面壁九年的机会，就是奠定了孙氏文学与医学的扎实基础，更塑造了他品洁志坚的性格。如其没有这个机会，决不可能有后半生的际遇。贞观元年以后的57年，生活于重视文教卫生的太平盛世，更有利于才能的发挥与事业的成就。如其没有后半生这样处境，孙氏纵然怀有撑肠拄肚、茹古涵今的文学修养和徒柳针茅、活人医鬼的医学绝技，也只能是老死窗牖，肯定也会湮没不彰，有谁知道你这个孙真人。充其量在《仙籍》中占一席真人的座位而已。这一乱一治的客观世界，如其前后倒置一下，那孙氏的命运便不堪设想了。

其中还有一个无人注意到的“祸兮福所倚”的给孙氏命运因祸得福的际遇，就是六朝到隋唐，谁都知道是佛教最最盛行时代，但那里晓得，在某一个领域里却遭到抵制和摧毁。你只要打开史册，略加注意，就可以看到。

陈·太建六年，也亦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他下诏禁佛毁道，焚佛经、烧佛像，逼使沙门（佛）、道士（道）200万人还俗遣散。并下诏谓：“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四次“毁灭佛法”事件中的第二次“周武帝灭佛”。这年孙氏仅33岁。

人是有逆反性的，孙氏也未始不这样，而且还在血气方刚之际。从“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今至道不行，拥圣人之意，甚可怪也”（见《翼方·妇人方一》）一节语气中体会，孙氏这种“逆反心理”还是强于一般人。所以面对这样毁佛废道事件不断发生历37年之久，试问一个崇道信佛而又又是“逆反心理”特强的孙思邈，能承受得了吗？所以对当时政府的仇视抵触，也势所必然地采取对立不合作态度来愤世嫉俗。正因为如此，因之他的前半生就坚决地隐居逃世，安心到死心的地步来闭门读书，终至有助于学问的猛进。其受益是无法估计的。

后半生呢？幸运地躬逢盛世，正好给一个满腹经纶、养精蓄锐的孙思邈大展鸿图的机会。

2. 当时医、药、病的实际情况

（1）丰富的前人遗产

在孙思邈两部《千金方》之前，医学著作，已经有不少，但遗憾的是当时无印刷而赖手抄，事难广泛流传，所以保存者百不得一。至于该时情况如何？也以缺乏资料，无法作正确的回答。以下只能根据有案可稽者录下：秦汉之前：

《黄帝内经》

《黄帝素问》

《黄帝虾蟆经》

《万物》1977年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山海经》

《神农本草经》

《桐君药对》

汉代：

《伤寒杂病论》张机

《脉经》张机

《疗妇人方》张机

《养生篇》稽康

《本草》七卷 蔡邕

《辨灵药经》张道龄

《玉匮针经》吕博

《黄帝扁鹊脉书》公孙阳庆

《仓公决生死要诀》淳于意

《太仓公方》淳于意

《说疾》史岑

《李八百方》李八百

《中藏经》华佗

《青囊经》华佗

《经文颂说》郭玉

《葛氏杂方》葛元

《五十二病方》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足臂十一脉灸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脉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导引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旱堆汉墓出土

魏：

《诸药方》李修

《吴普本草》吴普

《李当之本草》李当之

《崔氏方》崔氏

《医方》王显

晋：

《范东阳方》范王

《殷浩方书》殷浩

《殷荆要方》殷仲堪

《摄生论》阮侃

《论病》王叔和

《脉经》王叔和

《时后备急方》葛洪

《抱朴子养生论》葛洪

《议论备予方》于法开

《救饥辟谷诸方》佚名

《甲乙经》皇甫谧

《羌籍药方》番僧·佛陀耶舍

《伤寒身验方》王珉

《孔中郎杂药方》孔汪

《小品方》陈延之《阮河南药方》阮炳

南北朝：

《药录》李密

《褚氏遗书》褚澄

《杂病方》褚澄

《玉衡隐书》周弘让

《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徐叔响《杂疗方》徐叔响

《解寒食方》徐叔响

《药方》徐嗣伯

《杂病论》徐嗣伯

《辨伤寒》徐文伯

《疗妇人瘕》徐文伯

《雷公药对》徐之才

《徐王八世传效验方》徐之才《羊中散药方》羊欣

《王世荣单方》王星

《集注神农本草经》陶弘景《名医别录》陶弘景

《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如意方》梁·简文帝

《集验方》姚僧坦

《刘涓子的鬼遗方》龚宣庆《杂香膏方》范晔

《小儿方》徐玉

《集验方》姚法卫隋：

《黄帝明堂经注》杨玄

《产乳志》刘祐

《本草音义》姚最（《医籍考》作者为孔志约，疑唐时成书）

《注黄帝素问》全元起

《要方》徐奘

《四海类聚要方》佚名

《四海类聚方》佚名

《诸病源候论》巢元方

《淮南王食经》佚名

《玉房秘诀》佚名

这样八九十种隋以前的医学文献，可能更有我们所未知者，都是孙氏知识宝库里的有益营养。再看两部《千金方》中的频频引用可知。还有唐代之初的各家写作，计有：《明堂经图》甄权

《注黄帝八十一难经》杨玄操

《本草音义》甄立言

《本草药性》甄立言

《古今录验方》甄立言

《新修本草》苏敬 李勣

《脉经》李勣

《五明经》攘那拔陀罗同闾那那舍译

《纂要方》崔知悌

《骨蒸病灸方》崔知悌

《产图》崔知悌

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还有以国外翻译来的印度医籍，如《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耆婆所述人命论方》、《乾陀科治鬼方》……等十余种。这样多的资料，孙氏是否完全看到？那是没法知道了。但他不至于完全没有见到，否则怎样会把四气学说、净身学说、许多耆婆方药及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引进到两部《千金方》中。

这丰富的遗产，是孙氏成功的原因之一。

(2) 频繁的交流

唐代是开放的时代，更其是在两个“之治”之际，在医学方面融合了国内兄弟民族和国外的优秀成果，丰富了自己的内容，促进了发展。孙思邈既是一个受益者，又是一个为这种大好形势贡献出力与辛勤者。

依据不可能完整的资料，在孙氏一生中（541—682年）的医学药学大交流有以下几次。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即日本钦明天皇——神代天皇即位之际，第一次把中国的针灸，传入日本。

梁·元帝丞圣元年（552年），中国以《针经》赠送日本钦明天皇。

陈·武帝永定二年（556年），《五明论》由印度传入中国。

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160卷书，到日本。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龙树眼论》，从天竺传入。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小野好子和难波雄成来中国，返国时带去了许多中国医书回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来中国学医。

唐初（618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印度医学大量传入中国，更其是眼科方面的。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日本僧惠济、惠光来中国留学。同年留学于中国13年的惠日、倭汉直福田学成归国。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诸州置医学。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1月，由李道忠送文成公主（？—680年）出嫁吐蕃弄赞。所查赠的医书，由哈祥哈德娃和德田马郭吉两人译成藏文。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达摩乌长国（在天竺北），遣使来献龙脑香。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等药品。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法师由天竺学成回国，带回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经书657部。当时孙氏已104岁，身居长安，出入宫廷，又一直与僧侣往来，不可能不相晤会。而且孙氏唯一知交道宣律师，又奉命参加翻译玄奘带回来的佛经工作。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遣使至天竺，学取熬糖新制法。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日本惠日，第三度来华，交流医学。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使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等国，采求异药——指木香、益智仁……等。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拂菻国遣使，来献底也伽——类似于鸦片一类的药物。

除此之外，《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各地进贡的药物竟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如西州、凉州、夷州、黔州……等地区。

在客观上国内外交流的频繁，主观上孙氏的刻苦钻研，细心观察与善于总结吸收，他的成就是势所必然的。孙氏对治疗疗肿的丰富经验和满意疗效，也是善于吸收赵饶四味方、齐州、荣姥方和衢州、韩光方的结果（以上三者俱见《要方·丁肿痛疽·丁肿》）。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孙氏生活的年代里，印度医学是可以脾脱全世界，同时也是佛教的发祥地。中国儒家，强调要学习和精通六艺，印度的佛门也一定要学习和精通“五明”。所谓“五明”，是：一声明、二工巧明、三医方明、四因明、五内明。其中三医方明，就是要求每一个僧侣都要懂得和精明医学知识，所以当时的印度医术就领先于全世界。正因为当时中、印两国的佛教僧侣频繁往返于长安与天竺间，大量的医学也伴随了大量的佛经书带入我国。所以古印度吠陀医学的理论，在两部《千金方》中也大量的引进。

又如《翼方·禁经上·持禁斋戒》的“五戒者，一曰不杀，二曰不盗，三曰不淫，四曰不妄语，五曰不饮酒嫉妒”，索性把佛教的“尸罗”全部照录下来。

其中吸收印度医学的最多者，更显示在方剂方面。粗糙的统计一下，如取用耆婆方者就有万病丸、治恶疮方（内含大白膏方等十多首）……等。

此外，还搜集了阿伽陀国、大秦、及波斯国的悖散汤（即朱乳浦虚破气方）、古天竺摩揭陀服菖蒲方……等，还有西州续命汤、蛮夷酒、匈奴露宿酒……等等。

孙氏本为庄老道教中人，所以对吐纳、导引，早就精通掌握，但他还是虚怀若谷，去学习古天竺的瑜伽功夫。例如《要方·养生·按摩法》中的天竺国按摩术，并详细地介绍其“十八势”操作过程。

总之，孙氏在优越的客观条件、幸运的环境际遇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吸取上下古今、国内国外医学精华，不仅仅是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这样虚心学习，开放进取，善于选择地吸取而并没有被外来医学所俘虏而吞噬。相反地坚定立足于以《内经》为核心的传统医学思想来改造吸取得来的事物，加以溶解利用成为真正中医化的巧妙方法与精神，使中医的学习方法和立场态度发生了一种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拂菻国，古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

西州，今在吐鲁番东。

凉州，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

夷州，今贵州省石阡县。

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

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

衢州，今浙江省衢县。

尸罗，全名尸罗波罗密，意译为“持戒”。六度之一。

阿伽陀国，在古天竺东北，可能是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

大秦，古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

波斯，古伊朗国名。

（2）疫疠与新病种

用医与药来消灭疾病，同时也是因疾病的挑战——疫疠流行、新病种的出现来推进医学技术的发展。这个矛盾与统一，在地球上永远循环不息地演变着，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就可以看到在孙氏一生中（541—682年）疾病时疫向医学的挑战情况：

梁·太清元年（547年），旱疫，扬、徐、兖、豫……几州尤甚。

又·二年（548年），旱疫。

隋·开皇六年（586年），出现蛟龙病，病发似癫痫。

又·十二年（592年），长安大疫。

又·十八年（598年），东征军征途中发生瘟疫，只能班师归来，死者十之八九。

又·二十年（600年），蠼螋疮出现。

又·二十一年（601年），知道浮肿病，必须忌盐。

隋·大业八年（612年），大旱疫，死者甚众，山东尤甚。

又·十三年（617年），洛阳出现传尸病。

唐·武德元年（618年），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多死。

又·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大疫。

又·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泽州大疫。

又·贞观十六年（642年）夏，谷州、泾州、徐州、戴州、虢州五处大疫。

又贞观十七年（643年）夏，泽州、濠州、庐州三处大疫。

又·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卿州大疫。

又·永徽三年（652年），山西绛州僧，死后解剖，有遍体肉鳞患虫。

又·四年（653年），天花从西东传。

又·六年（655年），楚州大疫。

又·永淳元年（682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

考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以前，就已发现痲疯（破伤风）

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一带地区。

兖州，今山东省邹县东南。

豫州，今安徽省亳县一带。

关中，即今陕西省。

关内，指今陕西终南以北，甘肃陇坻以东，宁夏东南一带。

河东，今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统称。

泽州，今山西省阳城县西。

谷州，今河南省罗山县。

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北。

戴州，今河南省考城东南。

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县南。

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

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

卿州，待查，但知为在四川境内。

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县。

起，麻风、大花、梅毒、结核、乙脑直到今天的爱滋病，开始起是默然而至，医生束手无策，病者坐而待毙。然后经过医家的摸索、探讨、实验、研究、了解到总结，作出有效措施，得到制服，终于丰富了医学内容。

孙氏一生中的几度疫病流行，他不会不知，更其是几次发生在居住之处——长安及其附近，说不定他还投身其间地参予工作。几个新病中还有两例是亲自遇到的，孙氏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不积极应战吗？当然要应战。这也是有助他发挥智慧而添增经验与才智。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周围左右，不论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种种事物，都有巨大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3.本身和周围的环境“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见《要方·序》）17个字，是决定孙氏投身医界，刻苦研究，终而成为百代名医、千古国手的关键。

本身疾缠，更能体会到医生所无法体会到的体会。尽管医生有高明的五诊（望、问、闻、切、查）而这不属于五诊的另一个“主观感觉之诊”是永远也想不到、得不到的。所以有病医生的心得，更高出于一般。况且孙氏自己的病病种多、发病频而各科俱备，更使他真正的“心得”比任何人更洞察与深入。

光是“药”而没有人的“机体”，不可能发生“作用”，必须还要经过一个“人的反应”而才有作用产生。各种反应，医生仅仅观察到明的、显的，但内在的、不暴露的反应，只有病人自己知道，说得更贴切一些，只有有病的病人才能真正有切肤之感。所以一个老年医生比青年医生、多病体弱的医生比身强力壮的医生对病人的体贴、同情要多得多，就是这个原因。否则为什么高明的针灸大夫，开始学习甚至业务水平已很高的医生在自己身上去扎针？以上是孙氏本身的因素。

孙氏在86岁之前，隐居山林，扣除18岁前未习医的童年，则整整68个春秋的努力读书习业，韬光养晦，心无二用地为业务知识打下结实的基础。这个有利的条件，漫长的岁月，是历来医学史上所没有的，只有孙真人被他独占，所以业务那得不精。

当86岁时，正是李世民执政第一年的贞观元年（627年），当年这个“贞观之治”，确是百业俱兴，而且李世民对卫生事业也十分重视，诏请孙氏入京授爵（孙氏的接受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登门拜访甄权，主持甄权完成《明堂经图》，组织苏敬、李勣编纂《新修本草》……整顿调整了在武德七年（624年）设置的太医署的组织，使更能发挥其工作效率，……等等等等，都是对医学事业的有力扶持，间接就是给孙氏一个鼓舞。

当109岁那年的孙思邈，高宗·李治接替了太宗·李世民，虽然年号改为永徽元年（650年），但对医学政策，继承不变。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医政药政的法令，更促进了医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孙氏118岁时，又蒙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孙氏的固辞，那属另一个问题）。132岁那年，高宗避暑九成宫，召孙氏同去。并授丞务郎直长尚药局。当133岁时，孙辞疾请归，虽然请归没有恩准（这又是对孙氏的恩宠），但却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

这样的躬逢盛世，位列公卿，优渥倍加，在古今医界中人物，能有几人？其实孙氏隆恩待遇的受惠，远远不及其才能的得以发挥的价值。

《要方》杀青于孙氏111岁，时在永徽三年（652年）。计历30年，上溯30年，约展卷动笔于唐·武德五年（622年）左右，那末《要方》的写作地点，前五年在太白山，后25年在长安。至于《翼方》则全部在长安写成。

你别漠视这个不为人们注目的写作场所，它对写作内容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野在市就有三个截然不同之处：其一，孙氏纵然是博学之儒，但毕竟家道清寒，那时那能有三筐五车、左图右史的大量藏书。只有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才有能力拥有丰富的书籍集中在这里，而且孙氏更出入大内及尚药局、太医署，供你驾舟在学海中遨游。其二，太行山世外洞天，交通闭塞，1300年前的乡野，更无信息可言。如其两部《千金方》而在这样环境中写的话，大量的新方新药，国际情况，构通交流，定然付之阙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不能不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名著，但后人“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见《医籍考》引《画漫录》语）之讥，为什么？因为在茅山写的。如其两部《千金方》而完成于太白山，不蹈陶弘景覆辙，才怪哩。其三，野居草泽，纵然孙氏身怀绝技，知名度也无从高起，而且山径荆路，交通不便，何来大量求医者。一旦身寓闹市，而且孙氏以半官半医的高贵身份，求医者当然趋之若鹜，就以“余尝手疗六百余人”（见《要方·痔漏·恶疾大风》）来论，而且这六百余人仅仅是麻风一个病种，推而度之，病员之多可以想象一般了，如在太白山有没有招来如此之多的病者。我们必须知道，医学著作的灵魂是临床，抽去了临床，还有什么好书可以写出。所以两部《千金方》的成功，可以武断的说，写之于长安，有其决定性的作用。

杜甫在七律《蜀相》中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纵然你有多大的本领，天不假年，也是徒然。而孙氏则享年141岁，也是为他事业的成功作出了有力的保证。

十一、本章结语

认真研究孙思邈医学思想的源流及其对我国医学发展的影响，尽管这里所探讨的没有完整，仅仅单独在医学技术方面的一隅，但对中医学派、发展及总结唐代以前医学、药学都有其重要意义。

纵然 1300 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高的，总的概念，是“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且有超长时间临床经验的高水平、高品德的医家和学者，但总还觉得是皮毛之相。虽然徐大椿的“……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因之徐氏就作出“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的评语。但徐氏在一片批判声中却又笔锋一转，用钦佩的语气来说：“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以上俱见《医学源流论》卷下）。虽然徐氏的评议比较深入了一步，不过距离抉隐钩玄的程度，似乎还有一些不够之嫌。

孙氏的医学思想，虽然很简单，但有时还出现矛盾，诚如某学者称孙氏为“唐代医学方面百科全书式人物”，倒也十分贴切。

总之，他钻研是认真的，医术是高明的，医德更是无可否认的高尚纯洁，事业也是成功的，而且相当成功。

他是熔儒、释、道、医于一炉的人物，而且这四者除佛学以外都是造诣可达到极深的境界。合三教于一身，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寻常的事，且看《北史·周高祖纪下》：“十二月癸巳（指武帝建德二年），集郡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辩论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这件事发生于孙氏 32

岁那年（573 年），就可以证实这个时期，朝野一致地实行三教并存局面，而且还维持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也即鲁迅所谓“佛教初来时，便大受排斥，一至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见《华盖集》补白二），孙氏恰巧生逢其时地在这个三教同源机运成熟时代。

我们不妨逻辑孙氏在医学方面的思维方法、立场观点、理论渊源、工作方式以及作风态度等等，予以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他医学思想的概貌。他的医学思想可用四句话来概括，是：“以医为体、以道为用、以儒教来作指导思想、以佛学来拾遗补缺”。

医学是一门实用的不可以搀有丝毫虚伪的科学，一定要通过它的特殊手段来处理，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不可能凭儒家的忠孝仁恕、道家的清净无为、佛家的五大皆空来使二竖丧胆而逃、病魔退避三舍。只有不折不扣地运用正确的医学特殊手段来拯人于病痛之中。所以孙氏的医学理所当然的立足于《内经》、取药于《本草》、法承于《伤寒》、补充于历代先哲。现在我们把这四者，分别加以讨论：

1. 以医为体

首先要明了“体”与“用”的含义与关系。范缜在《神灭论》中解释谓：

《华盖集》，鲁迅著作之一。

范缜（450—510 年），字子真，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为南朝齐梁时唯物主义哲学家与无神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明白指出，一个含灵机体是靠精神——灵魂来主宰，机体与精神一旦离“异”了，也就是分开，即就是这个机体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谁都知道纯洁的精神——灵魂可以指导出这个机体的纯洁行为，丑恶的精神——灵魂也可以指导出这个机体的丑恶行为。《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有体”，其疏谓：“体，谓形质之称。”

在道家则称为形与气，《许旌阳灵剑子》解释为“形之所依者气也，气之取用者形也，形气因依而成身体”。故而气即是用，形即是体。

有许多学者，把孙思逸在医学方面的儒、释、道三教浓厚色彩，过于突出，使立本之医反而稀释冲淡，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妨用以下一个故事来比喻，倒也十分恰当。《辍耕录·三教》：“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哉。”所以几干部中医书籍，都没有儒、释、道三者的参予，照样还是很好的中医文献。尽管很好的三教书籍没有医学内容者，始终难入医门而承认它是医学著作。所以孙氏的医学思想，也是以医为五谷，三教为黄金白璧而已。

孙氏的医学校心思想，始终是医学，尽管与道教占有同等比例，但他还是永不离题，事实上也不允许、不可能离题。且看他一开口就声明“神农医黎民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歧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见《要方·序》）。或谓，孙氏医学的核心是医，为什么在《要方·养性》中“房中补益”，《翼方》最后两卷“禁经”的理由很简单，房中术虽属养生，同归于医；“禁经”是当时作为治病手段之一，不是医是什么？

徐大椿尽管对《要方》有不满意的微言，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见《医学源流论·千金外台论》）。所以足够证明孙氏在医学道路上走的路子，完全循着《内经》、《神农本草经》的大道上前进的。至于偏攻偏补、主温主凉、崇脾崇肾及用什么治疗方法手段，却是技术性的问题。

正因为孙氏对传统医学的基础扎实，深入精通，所以能够去其糟粕——两部《千金方》中否定或删削了些实用价值不高的或无效的方和药，例如否定了大豆汁的解毒，删去了许多治痢下方，不介绍十水丸（参阅本章·六·药王·（六）亲自实验）和许多药物（见《翼方·目录·有名未用及唐本草退二十味》）。采取保存精华，以创新的精神来推陈出新把医学水平推进了一步，徐大椿也不得不在抨击声中叹服“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见《医学源流论·千金外台论》）。

正因为孙氏能循规蹈矩，不走歧路，同时又能开拓新疆的对中医学学术承前启后地贡献，所以得到“后世或能窥其（指两部《千金方》）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见《郡斋读书志》）的至高赞誉。

2.以道为用《（新）辞源》解释“用”字，是“与体相对”。意即是一

论者。《神灭论》为他的代表作。

《许旌阳灵剑子》，作者，旌阳县令，许逊著，许为许昌人。

《辍耕录》30卷，明·陶宗仪撰。记事多为元末明初。

个无形的东西使有形的物质生存与活动。这个有形的物质是“体”，依赖了这个无形之物而生存与活动，这个无形之物当然是“用”了。

《诗·大雅》：“执豕于牢，酌之用匏”，《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前者是使用或施行，后者是功能或作用。这“以道为用”的意思，就是用道家思想来指导或支配医学的思想。

一部《黄帝内经》本身，就是道与医的混合产物，说得更明白一点则就是由道教孕育出来的医学。否则为什么《道藏》独独把它和《千金方》两种医籍搜编于内，其他许多名医文献拒之门外。更有意思的是王冰把本来编次在第九卷的“上古天真论”，重作新的安排，置在第一卷、第一篇，于是道教气息更足了。虽然有人认为又名启玄子的王冰是撰有《天元玉册》、《元和纪王经》、《昭明隐旨》的道士、所以特别尊道而这样做的。我不然，且看与道教无缘的张介宾《类经》，不是也把“上古天真论”放在第一卷、第一篇吗。他如李念莪的《内经知要》展卷第一句就是“上古天真论”。

中医是强调继承的，所以以一位“以医为体、以道为用”的孙真人来继承中医学，当然道家气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的跨灶于《内经》，也是势所必然的。

我们再爬梳一下两部《千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有：

《要方》

第一卷 治病略例

第二卷 妇人方上

第三卷 养性（全卷）

《翼方》

序文

第十二卷 养性（全卷）

第十三卷 辟谷（全卷）

第十四卷 退居（全卷）

第二十二卷 飞炼（全卷）

第二十九卷 禁经上（全卷）

第三十卷 禁经下（全卷）

还有许多散在性的见于各章各节中，为数亦属可观。所以说孙氏的医学特点是“以《内经》《本草》等传统理论与道教牢牢结合为中心”的医学，并非耸听。

3. 以儒教来作指导思想

孙氏毕竟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莘莘学子出身，从小就打下了儒者的基础，不折不扣的学者。例如儒人、儒士、儒者、儒户、儒生、儒门、儒家、儒术……等等。一个读书人而业医，更以“儒医”作标榜。因为儒医也者，毕竟比所有一般的医生要高人一等。因之孙氏则不折不扣的是一介“儒医”。

不过单单凭识字知书，甚至十年窥豹管、一夕破萤囊的饱学之士，也不

《类经》32卷，明。张介宾编纂。

李念义（1588—1655年），名中梓，字士材，明·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生乎著作丰富，有《内经知要》2卷外，还有《医病机沙篆》、《医宗必读》等21部书。

一定是“儒”。且看李林甫写得一手好文章；秦桧在宋·政和间（1111—1117）登第。但他俩连《尚友录》中都没有他一席之地，别说是“儒”字了。

所谓儒，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要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其二是一必须投身于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中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是最有权威性的标准。

我们且看两部《千金方》中孔孟之言比比皆是（参阅第三章、鸿儒），就可以证实这点。

此外，孙氏还把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见《论语·为政》），儒家的治学思想全部继承下来，付之终身实际行动其“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不粹其内”（见《要方·序》）的精神。

不过孙氏也偶然出现了与儒家学说有矛盾之处，他在接受和奉行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有些儒家思想被否认了、违叛了。如对“攻乎异端，斯书也已”（见《论语·为政》）视之而不见地偏偏“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本传》）、“兼好释典”（见《旧唐书·本传》）。还把儒教认为异端的四百四病学说、四气合德学说（见《要方·序例·诊候》）、迦摩罗病（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乌场国青消石（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以及许多外来学说与方药，并不视为“异端”而大量运用。

他对反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的见解，予以有力地还击，并高举“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见《要方·序》）的旗帜来唱反调。更有辣味的是公开对愚民政策的抨击，谓：“圣人之法，要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见《翼方·妇人》）

这种矛盾，如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标准和现代的评语来说，是“孙真人的头脑，十分清醒”。

我们再致细精读一下仅仅 1500 字左右的两部《千金方·序》文，更可发现把整个儒教思想充溢其中。儒教的核心，就是“仁义忠恕”和“德治仁政”。现在再看孙氏手笔，如“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下以救贫贱之厄”……，都是“仁义”的具体表现。“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也是说出“忠恕”、“忠孝”的心里话。还有与医学根本毫无关系的“德治仁政”，竟然也在“先以先王镂之于玉版”、“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等言语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终于使人不能不佩服孙氏的妙笔。最后用“余缅寻圣人设教”、“深垂圣贤之本意”来画龙点睛地突出他医学思想中的伦理道德。

孙氏的临床手段，当然以医与道合一的方式手段，但他的主导思想，毕竟以儒教为核心，因之他的医德医风也就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正是 20 世纪医生所缺少。现在美国正掀起一个学习雷锋热高潮，雷锋图像也到处可见。有些东南亚国家，把孔教作为国教来教育人民，处处可以嗅到曲阜的空气。礼失而求之于野，再联系到现在的医德医风，能不使人遐想而深思。

4. 以佛教来拾遗补缺

李林甫（？—752 年），小字哥奴，为唐·玄宗时宰相，为人刁恶，“口蜜腹剑”，典故就出在他身上。

秦桧（1090—1155 年），字会之，宋·江宁（江苏南京江宁县）人。《宋史》列入“奸臣传”。

《尚友录》，明·廖用宾撰。为古代的《人名大辞典》。其特点是无品德的人，一概不被搜入。

上面谈过，孙氏本身，对佛教的修养，远远不及道教，因之佛学在孙氏医学思想领域里，似乎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仅仅几处的“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见《要方·大医精诚》）等语中，才嗅到一些佛门的气息。这是佛门（耆那教）五戒、又称八关斋戒的八戒与大乘戒律的十戒之中第一戒，都是戒教生的。

通过以上讨论、分析、简化、归纳，最后可以作出这样的定论，是：在技术方面，以医学与教道混为一体的学说作为核心。

在医德医风方面，以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手段。偶而微乎其微的有些佛学思想的渗入。

马克思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也谓：“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反杜林论材料》）所以要探讨每一个人的思想，首先要对当时及其前的想领域作一番考察，了解其思想背景的渊源，才能探赜索隐。

上面“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医学思想探讨”中不是已探讨过吗？何事再来重复？不，上面仅仅是局限在孙氏医学方面的，这里才统盘地把孙思邈思想探讨一下。当然医学思想还是本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不是重点。

马克思（1818—1883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

恩格斯（1820—1895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的亲密战友。

第三章孙氏思想总探讨

一、思想背景

(一) 远景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前 221 年）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不单局限于哲学，凡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军事、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所以济济多士的百家争鸣，到最后则以孔孟为首的儒家，独占了鳌头。

岁次庚辰（公元前 221 年），当时剩下的最后一个齐国告亡，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永远巩固其政权，采纳了法家思想与手段，企图通过法来实践其“一世”、“十世”、“百世”到“万世”的统一政权之梦，所以傲然自称为始皇。

正因为有梦求其万世之业的雄心，他最早懂得“人，是事业的本钱”道理，所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自己长生不死、永远健康。在嬴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巡狩到海上时，东望飘渺的蓬莱，更使他作成仙登天遐想，因之即使韩终入海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后文，乃又遣派徐福率领 3000 名童男童女，营造大船，耗费了大量黄金，东行求仙。后果如何？据说不过帮助了日本国的建国开业。

嬴政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以淳于越点燃了导火线，接受李斯建议，颁布了“挟书之律”而掀起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焚书坑儒大役，重重打击了儒家。所以秦始皇心中只有法家，但方士们可在他眼里尚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 206 年，刘邦起义成功，建立西汉王朝。他毕竟是出身平民，所以对儒家很不重视。加之文帝·刘恒（公元前 179—前 157 年在位）、景帝·刘启（公元前 156—前 141 年在位）和文帝皇后、景帝母亲窦太后（？—公元前 129 年）笃信道教。甚至道士陈平、阴阳家张苍，都位居丞相，而且还是很有权力的丞相。所以西汉之初，极度提倡“无为而治”的道教学说，大有占居了支配一切的地位。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以窦太后仇视儒术，把反对黄老、推崇儒术的窦婴（？—公元前 131 年）、独崇孔孟的田蚡（？—公元前 131 年）罢去了官，“鲁诗学”的开创者儒家申公（？）撤职赐归，申公的两个学生赵绾（？）、王臧（？）都下狱而死。

上面谈到的所谓方士，乃吐纳、练丹、自谓力能呼风唤雨、鼓吹成仙登

秦始皇（公元前 259—前 210 年），姓嬴名政。先后灭六国，中原统一，自号始皇。

嬴政，即秦始皇。

李斯（？—公元前 208 年），战国末。楚上蔡人。秦国相。

刘邦（公元前 256—195 年），秦末沛县人，灭秦立国，曰汉，即汉高祖。

陈平（？——公元前 178 年），汉·阳武人。初从项羽，后归于刘邦，官右丞相。佐孝文帝平吕乱后，即弃官修道。

张苍（公元前 256—前 152 年），汉·阳武人。从刘邦起兵，以有功，封北平侯。

天、可以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起源于战国时齐、鲁一带沿海地区，因秦始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加温而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代出有名方士，如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在位）时，侈言“设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的新垣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有倡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为饮食器，则益寿”的李少君（？）；有使武帝在一如现代电视机萤光屏前会见亡妃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黄金可成，河决不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的奕大。直到三国（221—280年）时，曹操（155—220年）要杀他，他却遁入壁中隐身而去的左慈（？）……。纵然他们后来有的被诛（奕大）、有的夷其三族（新垣平）可悲下场，但在他们走运得志之际的受宠当朝，毕竟是使人垂涎三尺的。

当时黯然失色的儒家，当然看清了这个来龙去脉，知道要靠近当局政权、非创造一套与方士可以经得起周旋而又能取胜的神秘学说不可，否则怎能在方士口中分得一瓢羹。所以认为邹衍用以推断自然命运和王朝兴亡的“五德终始”学说，最为接近、合式而可行。邹氏凭他的一套“深观阴阳消息”本领，周游魏、燕、赵……等国，备受诸侯们的尊敬和礼遇。他们把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祥度制”，在两汉讖纬学说中作为重要的核心。这样的学说十分适合统治者的口味，使得凡尘里的皇帝和天上的上帝更加缩短距离而紧密地连系、甚至混为一体。邹氏“阔大不经”的“谈天”，使皇帝的神秘性越浓厚，子臣百姓也就更加服帖就范，他的统治地位就越巩固。而且这种学说，确实比方士们在幻想中寻求一切的要现实得多。所以儒家尽量地吸收邹氏的学说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幸运的是这只救活了已经三面无气的妙奕，真能使儒家坎坷命运也从绝处逐渐地走出了低谷。

道教一向是接近于方士，不，应该说方士是从道教中衍化出来的终产物，所以道教却没有遭到像儒教那样深灾浩劫，这又是儒家对道家的向往另一个原因。

汉·对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对儒家来说是命运转折点的一年。三个抑儒崇道有权力人物最后一个人窦太后死了，压在儒家头上的大山搬走了。

紧接着的翌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示重视儒教体现。事实上武帝早六年之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执政之初，就已颁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也上过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思想的“天人三策”。说明“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举中标，深为武帝欣赏而采纳。

由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武帝虽然已尊敬儒教，但仍然不忘其求仙的迷梦。翌年（公元前133年），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并建立太一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北巡，祭桥山黄帝冢，至缙氏祭中岳太室，又东巡海上，与方士傅东及间使求神仙。征和三年（公元前89年），武帝再至蓬莱，欲浮海再求神仙。

从武帝起，阴阳五行学说，经过经师们的加工、美化和鼓吹，这空气愈来愈浓厚了，简直笼罩着所有一切。他们一套“属木的一定是青色而居东；属火的一定是赤色而居南；属土的一定是黄色而居中；属金的一定是白色而

居西；属水的一定是黑色而居北”，“少阴为西；大阴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的固定不移的老生常谈，但使人惊奇的是人们总是听之不厌而趣味无穷。

后世称当时的儒教为“两汉经学”，就是在儒生与方士的结合而成。这样，儒家也利用统治者来推销他们有利于自己的说教。统治者有什么需要，儒生们就及时地供应什么。这些供应品，表面上似乎都是早就出于有据可稽的先圣先贤的谶言，但实际上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移植过来。但方士呢？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之后，物极必反地即式微萎缩而憔悴下去。为什么？原来儒生们也已学会了方士一套技巧而在文学方面更高出一筹胜于方士而取代了方士。方士们为维持其个人利益，不能不相率归到儒生的队伍里来。所以董氏在复兴儒学来说，是一位大功臣。但从此而后的儒学，已经不是秦时代孔孟的儒学，而是渗入了阴阳家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儒学了。

王莽，更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的人，更明确地说，他是靠阴阳五行手法来达到他野心的。所以用阴阳学说来定了南北郊之社，还进一步用五行学说来定郡神的祭祀。他高举着记述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生克系统中的《礼记·月令》作为红宝书。竟然征求精通《月令》的人建筑明堂，也古为今用地把殷周一套古代礼仪表演一番。

汉光武·刘秀，以“赤伏符”受命，又以《西狩获麟谶》来战胜了公孙述（？—36年）而得以坐到王位。所以他对阴阳五行的谶纬更极度的信仰和膜拜，甚至是依赖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之后明帝·刘庄（58—75年在位）、章帝·刘烜（76—88年在位）虽非昏王庸主，但对谶纬之说也十分崇拜的。客观上有了这样的温床，阴阳五行之说那得不鸿运亨通而兴盛不衰。

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入之后（详第四章·居士·一佛教），从此即儒、道、释三者成了鼎立之势。今后戏剧性的融合、颉颃、斗争、缓和、冷战、再融合、再颉颃……一幕一幕地不断表演下去。

汉代人思想中，满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天文、地理、宗教、政治、军事、教育、包括医学卫生在内的各门科学及一切日常琐事中如小到出门、理发、洗澡……，没有不用这套方式来作指导的。例如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就是为反映当时外戚专权所服务。但这套学说只能在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时才能通行无阻，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时就不行。最好例子是：有符节令（掌管符玺的小官）睦弘，在西汉·元凤中（公元前80—前75年）他见到泰山上大石自行竖立，上有铭文。弘即以“五德终始”来破译出为“当有匹夫而天子”的谶言。于是上《当求贤禅帝位》书，终于在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妖言惑众罪把这个不懂什么是“与虎谋皮”的书呆子头颅掉落下来。所以统治者的尊孔、崇道、信佛，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为自己巩固

王莽（公元前45—后23年），字巨君，为东·西两汉之间，另一个新皇朝的建立者。

刘秀（公元前6—后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称光武帝。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为东汉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著有《洪范五行传论》11篇。内容为宣扬“天人相应说和谶纬学说。

睦弘，汉·鲁国濰人，字孟。

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北五里，又称岱宗，为五狱中的东狱。

政权来服务的。且看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李世民诏萧瑀的书信中，有“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徵，何其谬也。（当时，宋国公萧瑀，因与房玄龄不合，请出家为僧。既而后悔，再请还俗。十月太宗以瑀反复而怒，乃诏书谓：“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徵，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自请出家，寻变违异岂具瞻之量乎”贬商州刺史）这就是执政者的自白。他既然看得很明白，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不断在佛教方面做了许多“功德”？则不言可喻了。

多人执笔的《黄帝内经》，开写于春秋战国，而最后定稿或补充完成于汉代，所以阴阳五行作为重要指导思想，这是势所必然。现在撇开《内经》不谈，只要观察一下当时医学与五行之间的客观环境，就可以了。且看：

《汉书·翼奉传》：“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臟六体。五藏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阴阳失节，害及身体。”

《汉书·礼乐志》：“人亟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

《汉书·五行志》：“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胜青祥，唯金诊术。……及人谓之疴，疴病貌，言深也。”

《汉书·沟恤志》：“水行地上，湊润上彻，民则病湿气。”

《后汉书》中的《易纬·律历志》，用24节气来推算疾病，例如立春的“晷长一丈一尺六寸，当至不至……民瘼瘵；未当至而至，多病燂疾痰”。24个节气，在“当至”与“不当至”的推算下，有48型的病变。

您想医学在四面八方上下阴阳五行学说的包围下，你不谈，可能吗？因之有人曾提出这阴阳五行是过了时的迷信，现代中医不应该再奉为圭臬。是的，在一般情况下送入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当然必需抛弃，你不抛弃，时代的潮流也会替你冲洗刷掉。且看从古代到近代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宠儿骄子，而现在已“今安在哉”了。但真正上古的神农氏种稻获粮，缵祖

氏养蚕织帛，夏禹用疏导来治水，孔子以仁恕来育人，为什么到现在20世纪甚至21、22世纪还是用着它，中医用阴阳五行就是同一个道理。绝对不能以被讖纬学说污染过的阴阳五行与讖纬同时抛弃。李后主 纵然是昏庸亡国之君，但后人还是承认他是大词人；宋徽宗 也是亡国天子，大家还是尊之为大书画家，一手瘦金体在书坛上奉为珍品。董其昌 也不以是典型的恶霸地主而取消了他大书家的尊称，这就叫唯物辩证法。也有人提出，《伤寒》、《金匱》也是此时的作品，为什么仅有阴阳的精神而丝毫没有沾到一点讖纬的色采？的确！我们更要知道，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或某一个运动中，必然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众醉独醒的冷眼人物，在这一群真痴子、假痴子（瞞了

良心投机取巧的人物）如痴如狂一片浪潮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罢官于东汉·永平五年（62年）的经学家尹敏 精通讖纬学说而不信讖纬，明帝

萧瑀，字时文，善属文，好经术。为人耿直，卒后谥称贞。

李后主（937—978年），即李煜，五代南唐后主。

宋徽宗（1082—1135年），即赵佶。

董其昌（1555—1636年），明·松江人，字玄宰，号香光。为自成一家的书家。

尹敏，字幼季，为东汉经学家，南阳堵场（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博学广识，精于讖纬而不信讖纬。

要他校订图讖，拒绝而丢官。

又如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一个极端反对讖纬的，可惜当时在讖纬学正泛滥之际，有谁来支持和响应。幸而被后来南北朝时欣赏他的观点而欣起几次不彻底的反讖纬运动，这是后话。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伤寒》《金匱》不是著作而是：“伤寒论，即古汤液论（是否即搜入《医籍考》三十七卷中的《汤液经法》？待考），盖上古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引明·戴启宗《活人书辩·文定公吴澄序》原文）吴氏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方剂并非仲景手订而是当时在临床上普遍取用的前人或当时各家之方，十分准确。试阅《要方》中屡见一点也没有仲景气息的“仲景曰”（见《要方·序例·治病》等多处），同时在《要方·伤寒上》、《要方·伤寒下》中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大承气汤、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苳连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白虎汤、三物备急丸……40多首方剂，赫然与《伤寒杂病论》中完全相符。试问孙氏既然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而同一书却把《伤寒论》中40多首方剂，一药无讹地节录下来，更证明吴澄之言非虚语也。所以敢说仲景仅仅是把临床上的常用方加以搜集、筛选、整理加以六经辨证的系统化而已。

再如叶梦得：“孙真人有千金方两部，……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见《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要方）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尽”，《郑堂读书记》：“晁氏称议者，颇恨其独不及伤寒”，李梴：“著千金方三十卷，独于伤寒不及”（见《医学入门》）……。以上众口一辞的认为《要方》没有仲景的伤寒理论而引为遗憾，所以孙氏言不及仲景的伤寒论而竟然有40首伤寒论方，更说明仲景的伤寒诸方并非手订者而是当时时行的常用方。

所以有人又认为撰《伤寒杂病论》的人，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家（不是理论家）而头脑又十分清醒的儒医。他果断地排除讖纬学说的干扰，凭自己一套六经辨证的方法，搜集筛选出确实具有稳定性有效方剂而纂成《伤寒杂病论》。全书实而不华，诚如何颢的评价为“用思精而韵不高”（引《太平御览·何颢别传》原文）。编纂者并引用《书·太甲上》的“若虞机张”而署名张机，意思是凭我们手里的弩机，扫除一切疾病。古人大多有名有字，作者慨叹着儒教以讖纬的渗人而陷于变色，希望孔子再出而整顿一下。医学也必须出一位孔子样人物来振作医学风气。因为孔子名丘，于是联想到《诗·小雅》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医家必须也出一位值得景仰的孔丘。但古人更其是儒者，圣人之名应讳而不能直呼，及取其字的仲尼，于是仲景之号也产生了。当然，这个冷癖的大胆设想，恐怕很少有人附议的。但再冷静地思索一下，有五个尚没有满意解答的问题存在，这个怪论也没有武器来攻破。五个问题是：

第一，《史记》上所有名医，包括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都有传记，为什么知名度压倒群医、医中之圣的张仲景只字不提？张仲景之名，不见于晋前，而在王叔和以后？至唐代以后而才声名大噪。

唐前所见，第一为王叔和《脉经·序》（约公元3世纪）；再见于皇甫谧《甲乙经·序》（稍后于王叔和）；三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281

戴启宗，字同父，为儒而知医者，著有《活人书辩》。

—341年间)；四见于《诸病源候论》(610年)。即使《甲乙经》、《太平御览》中提到一些事迹在王仲宣(粲)、何永(粲)两人传里,但王、何两人的“本传”中却无一字谈及张仲景者。

至于见之于唐前正史者有两,前为《隋书》、后为《晋书》,而且《医籍考》称为“梁有张仲景”,使人又多一个疑窦。

其二,好多史学家遍查了各种史料,东汉时期的各任长沙太守名单中唯独没有张机或张仲景其人。在建安时(196—220年)的长沙太守为张羨、张恻父子。故而也有人认为张羨即张机,但除想当然之外,一无证据可凭。

其三,张仲景第一次出现于正史上的为《晋书》,《伤寒论》第一次出现于《隋书》,在这两书之前,为何未见一言?考《隋书》成书于636年,《晋书》成书于646年,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张仲景之名,最早在646年时亮相。

其四,《甲乙经·序》和《太平御览·何颀别传》却谓张仲景用五石汤来治疗王仲宣,为什么《伤寒》、《金匱》中偏偏无此一方?

其五,自战国至秦汉,大名医很多很多,为什么独独张仲景称之为“圣”?所以张仲景的却有其人与否?还是一个“谜”。

(二) 近景

上面说过张衡反对讖纬,但在当时没有市场,幸而在南、北朝时代有几个统治者倒有所赏识,也掀起过几次不彻底的反讖纬运动。

隋(581—618年)统一中国后,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文帝杨坚对于讖纬,也索性作一次希望肃清的运动,也派遣人马四出搜索讖纬以及有涉讖纬的书籍,集中起来学秦始皇的付诸一炬。私人收藏者,查出之后处以死刑。这次革命的行动是成功的,除了《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易纬鉴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封验》、《易位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与《易位坤灵图》号称八种《易纬》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毁掉。后经明、清两代人的苦心搜集缀辑,才又看到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所以17年后成书于大业六年(610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作期间,正是废制讖纬学说律令风行火动的高峰,因之全书中也没有五行学说。但真正要肃清这种影响,也谈何容易。后在仁寿四年(604年),杨广杀了父亲杨坚之后,改元大业之前,还听了章仇太翼讖言“修治洛阳还晋家”之后,十分相信而到洛阳去“避冲”。(章仇太翼,幼称神童,长而博学,尤精占候算历之术。进言杨广谓:“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并示以纆语“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采纳其言,于11月至洛阳。)

隋皇朝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了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并利用了它来作为统治工具。那时立足于儒门的王通在他的《文中子》里,就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道、释两教来共同维护统治。可惜“三教归一”的思想尚未实现而王通本人即以短命而归道山,翌年隋皇朝也宣告覆灭。不过这种思潮还继续影响着后人,直到孙思邈身后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还徘徊着,而且还没有完全消失,柳宗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的其中之一。

王通(584—618年),字仲淹,王勃的祖父,隋·绛州龙门人。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

唐皇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三教待遇上的丰薄也作了明确的调正。所以武德八年（625年），也就是尚隐居于太白山的孙氏84岁那年，高祖亲临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为：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高宗在乾封元年（666年），也就是已入京的孙氏125岁那年，高宗东巡至泰山封禅，驾曲阜祀孔子。临亳州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后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考核的依据。

唐朝前叶，是与西汉初期同样，是尊重道教的，虽然唐太宗亲为高僧玄奘所译的75部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但对道与释之间还是把法码

多加于道的那边的天平盘上。

虽然在贞观九年（635年），那时孙氏94岁。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到长安。三年后并建大秦寺以译经传教。但终以追随者寡而难以持久，全盛时代也仅有21位教士。虽然影响极微，但基督教则已悄悄地跨进了中原大地。

之后，武则天（684—704年在位）执政之后，就执行了“尊佛抑道”政策，一手改变了儒、释、道的位置。但那时孙氏早就在则天掌政之前已归道山。

国子监，为当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亳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北。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二、孙氏思想分析

自西汉以来直到孙氏年代，儒、释、道三者、就交替着彼兴此伏、我盛你衰的局面，而且任何一个局面，都是短暂而难以稳定。在已经就十分紊乱的浮沉中，加之以当时有很多的多头政权各不统一地为政。如 400 至 403 年中，就有东晋（马司

氏）、魏（拓跋氏）、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后凉（沮渠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燕（慕容氏）和西凉（李氏）十个政权同时并存。408 至 411 年中，也有十个割据小王朝，唯后燕与后凉已亡，代之以北燕（冯氏）与夏（赫连氏）。所以各处都不能相同。

此外，由道教蜕化出来的方士，由儒教分流出来的讖纬，甚至在某一个短期中比道教儒教更风云变色，凭三寸如簧之

舌，一夜间赐爵封侯，一席话即尚取公主，群魔起舞，翩跹朝野，百丑毕呈，千年遗笑，所以学术、宗教方面的紊乱，也不言而喻。而孙氏能在此五光十色、人妖不分的学术界、宗教界中目不眩色、行不迷路、众醉独醒的走完了漫漫长达 140 多年人生长途始终循着正道通衢上行程，是很不容易的。

（一）本立于儒

他以“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见《旧唐书·本传》）、“通百家言”（见《新唐书·本传》），而成为“圣童”，所以儒教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毕竟就先人为主，并打下了根深抵固的基础。

加以家境贫寒（见《要方·序》）：“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更容易磨炼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穷儒特性。在孙氏之前，已有不少家贫如洗而磨砺志气的读书人，终成大儒者，如匡衡（约公元前 65—后 7 年）凿壁、荀悦（148—209 年）偷读、阚泽（？—243 年）佣书、车胤（晋）囊萤、孙康（晋）映雪，……这都是孙氏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对象。

又以“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见《旧唐书·本传》）。考周宣帝，指宇文赟，戊戌（578 年）六月即位，改年号为大成元年。己亥（579 年）二月，即禅位于太子宇文阐。所以宣帝执政仅仅八个月。证明孙氏在 578 至 579 年之间在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指杨坚，他辅政之君，是静帝宇文阐，当武帝建德二年（573 年）时，太子宇文赟纳杨坚之女为妃，杨坚即有了政治资本。宇文赟执政后（578 年），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宇文阐即位（679 年），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权倾一时，百官折服。辛丑年（581 年）杨坚灭周称帝，改国号为隋，自称文帝，改元为开皇元年。所以“隋文帝辅政”，是指 578 至 580 年的三年中。这也证明直到 581 年，孙氏还在隐居。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诏孙氏入京之前的武德九年（626 年），孙氏一直隐居不出。所以孙氏在前半生（85 岁入京之前）的岁月，安心于韬光养晦隐居于太白山，这种逃尘避世，君子独善其身的生涯，更有助其学问的长进和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术的提高。

同时“善谈庄老”（见《旧唐书·本传》）、“善言老子庄周”（见《新

唐书·本传》）、“居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的深究道理、炼丹修养，甚至撰写了不少道教著作。但并没有妨碍于儒教，相反，这两者有时还有相互相成的效益。

孙氏 85 岁之前，身处乡野，是前半生，读书、修道及习医，属于耕读性的智力投资阶段。86 岁入京后的 56 年，应诏王室，身寓京畿，除了学无止境的还在消遣性的发挥其才能阶段。没有前半生，就不可能有后半生的才能供你发挥。没有后半生，前半生的辛勤也只能付之东流。所以两个“半生”，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明显界限，但又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当然，更有两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天假其年，如其 80 岁而逝世，则《要方》还没有动笔，唐太宗也无法请他入京。其二，不遇盛世，不遇明君，也是老死窗牖，至多在《道藏》中读到他写的没有两部《千金方》在内的几部道教著作而已。

他儒家思想反映在言语、行动及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每谈及读书，必提四书五经。平常语言用字，来之于四书五经者更多。对仁、恕、礼、义、忠、孝、恻隐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思想，在言语或文字中也不断地反映出来。

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之远庖厨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思无邪”、“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孔孟精神，都能毫不含糊地一一履行（参阅第三章鸿儒·六儒家思想）。

孙氏由于本立于儒，所以对晚节也十分重视。“愿坚晚节于岁寒”的晚节，犹同各种赛跑最后的终点冲刺，是终身最重要宝贵的一个环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不叹保持晚节之难。但不知孙氏之难比一般人更难，因为他有两个别人所没有的诱导你失节的条件。要越过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孽障，没有牢固的儒家思想是难以做到的。这两个魔障是：

其一，是超高寿。老，历来就没有标准的，老、耆、耄、耄的解释，因书而异，但在习惯上来说，60 岁以上者为老。假定享年 90，则有 30 年的晚年来保持晚节。现在孙氏 140 多岁，他的晚年为 80 多年，两三倍于别人。有人把人的晚节为铁链，任你铁链多牢固，只要几百个环中一个环坏了，整个铁链即全部报废。你想他的高年愈高，不是难度更大吗。

其二，是荣华。荣华是好事，但在它的阴影之下，就孕蕴着骄傲、自大、衰颓、腐朽、堕落与失节。考孙氏晚岁荣华，63 岁时，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86 岁时，唐太宗诏诣京师，授以爵位；118 岁时，唐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132 岁时，唐高宗避暑九成宫，伴驾避暑，授以承务郎直长尚药房；133 岁时，上书辞疾请归，又赐以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宅。一个医生而享受如此待遇，真是皇恩隆厚，古今能有几人，不可谓不荣华到极顶。但孙氏依然全身书气，一领青衿，不参予国事政治，不介人是非之门，守身如玉，归真返朴地著书、立说、读书、治病，直到全受全归的羽化。就是身后，也是罄室羞囊，一无遗物可以作陪葬薄殉（参阅第二神仙·六身后）。

（二）志归于道

孙氏在 85 岁以前的前半生，除读圣贤书、习岐黄术之外，就是研究黄老

之学。单单凭“善谈庄老”、“善言老子庄周”，一言泛泛之词，而且从来文人墨客之善谈庄老者，代不乏人，所以无法证实为道教中人物。“善谈老庄，隐于太白山习道，兼精阴阳医术推步，……著有千金要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等书留世”（见《续仙传》），虽然写得比较深入一些，但也难以证实孙氏是道教中有地位的人。不过能称“真人”及撰写及疏注道教中不少书籍，以及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等等，才是证实孙氏的确是在道教人物中的佼佼者。

86岁以后的后半生，虽然没有看到他修道炼丹事迹的纪录，但两部《千金方》中的大量道教语言和思想，可以证明他还是沉浸于道教之中（参阅第六章大医·十一孙氏学术思想探讨。第四章居士·五孙氏在三教中佛教思想最少。（三）权测孙氏在道学上佛学上造诣的深浅。第五章真人·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成篇累牍的著作，固然是研究作者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总不及日常生活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更能忠实地暴露其隐蕴内心深处的真正思想。孔子提出“察言观色”（见《论语·颜渊》）来分析对方的心理与思想，的确是很好手段。那末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孙氏的某些言语。

道教是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可以说，它是道教学说中的中心思想。现在对照一下孙氏的思想：

《要方·序》：“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肇落，万物淳朴，无得尔称。”他的思想基础，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原夫神医秘术，至蹟参于道枢”（见《翼方·序》），道枢一个词目，没有找到出处，但宋时曾慥有《道枢》一书（搜入《道藏》641—648册），内容俱谈道教哲学。

“阳道强坚而易歇，阴道微软而久长”（见《翼方·禁经·受禁法》）。孙氏非但点出了道有阴阳柔刚，而且更进一步延伸道教另一个重要教旨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引《汉书·文艺志》），以柔制刚的思想。

孙氏又谓：“不惧于物，合于道数”（见《要方·养性·养性序》）和在鄱阳公主邸宅答卢照邻问“高医愈疾，奈何”时，也谓“太上畏道，其次畏物，……”（见《新唐书·本传》）。尽管他言的地点不同，表达的形式各异（一为手书，一为口述），但意思完全一致，认为“道”是最最重要的。

对道的评价，孙氏也作过实事求是的论断，谓“万年无穷，当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证实孙氏对“道”的认识，是相当透彻深入的。

“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又是道教重要思想之一。“绝圣弃智”的效果，老子认为可以“民利百倍”，庄子认为可以“大盗乃止”。老子又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事实上“无为”与“道”是有其联系的。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该以“无为”为主。所以孙思邈的“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育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见《要方·序》）一语，如其没有对“绝圣弃贤”，“无为而治”有大彻大悟的认识，是无法说得出来的。孙氏可能认为这深邃的语言，或许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索性开门见山他说明“是圣人为无为之事”（见《要方·养性·养

性序》)。

道教既谈到了“无”，从而又联系到“无”与“有”的矛盾统一。老子曾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见《道德经》）现在孙氏的“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由此观之，形质既著，则痾瘵兴焉。静以思之，惟无形者可得远于忧患矣”（见《翼方·禁经》）。这正是孙氏进一步深入浅出地阐明这个道理。而且孙氏的“无我”思想也和《关尹子》的“惟无我无人，无道无尾，所以与天地冥”同一个思想。

道教接受了《书·大禹谟》：“满遭损，谦受益”的精神而发展为他们又一个重要思想——祸福倚伏论。认为事物发展到极度时，就是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老子总结为“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伏”（见《道德经》）。

孙思邈的“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率于外，其于过分内热（作热中来领会）之损，胡可胜言”（见《翼方·退居》）以及答卢照邻问“人事奈何”的“心小、胆大、行方、智圆”（见《新唐书·本传》……等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发出的心声。

又一个道教重要特点，是在生活上要求“寡欲”与“知足”。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止之足常足矣”（见《道德经》）。慾不等于欲，但慾是欲的内容之一，“欲”在道教中认为最可怕的字眼之一，诚如《太清经》：“谓贪爱情欲，深广如海也”所指出，欲海无边，不知古今来多少人沉溺其中。不过“寡欲”、“知足”并非目的，仅仅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道”的最终目的。

“修炼之士，当先入静”（见《云笈七签·灵响词序》）、“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见《庄子·人间世》）。因为奢欲无厌、心不知足的人，永远也静不起来，虚不起来的。

通过静和虚，才能达到最后目的的成“道”。诚如严遵所谓：“静为虚户，虚为道门”（见《道德指归论》）。它们的关系和联系，是“寡欲一知足一静一道”。孙氏对这一点，也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因资料太多，只能略举一二，如：

“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醯醢兼陈，看有若无”（见《要方·序》）。

“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见《要方·养性·养性序》）。

“（居处）更不能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见《翼方·退居·择地》）。

“一物不得在意营之”、“衣服但粗纆，可御寒暑而已”（见《翼方·退居·养性》）。

“邀名射利，聚毒攻神”（见《翼方·补益·叙虚损论》）。

听其言而识其人，窥其行而知其志，因为它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思

《关尹子》1卷。周·尹嘉撰。书中多佛教及神仙方使家，并杂以儒家言。故后人认为是宋代之作而伪托于周。

《太清经》，见《道藏》。

严遵，梁·秭归人，少善庄老。撰有《道德指归论》8卷。

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由此而知孙氏始终是不越雷池一步地在儒家“克己”和道家“无为”中走着。

（三）业从于医

从“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推究孔穴”（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至140岁《翼方》脱稿，120多度寒暑，沉浸在临床治病、龟手传方、立言撰书中，当然是医林人物，而且还是有名的重要人物，当然是医业中巨擘了（参阅第六章大医）。

三、小 结

我们通过了以上的全部了解、认真考证、客观分析，知道孙氏的形象，不难肯定是：本立于儒、志归于道、业从于医的典型古代德高望重高级知识分子。但内在的思想却比较复杂、矛盾错综，我们透过两部《千金方》的论述来寻找出他的思维轨迹，是：既无能摆脱历史的遗留和当时的情况唯心论普遍泛滥的世界观，但也能蕴含着不少众醉独醒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他的哲学观点，虽然孔孟的儒家思想基础打得早、打得结实，但还没有比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更深。所以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就舍儒而就道。即使以医学来说，技术性领域全部被道家所占领。只有思想性的才是儒家天下。引以为万幸的是，孙氏能用儒家的积极性来制服他道家的消极性，得以鼓舞他的工作，否则完全用“为无为”的道家思想来指导，《千金方》也不成为《千金方》，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修炼、养生、求长生术的道教书而已。

他终身高风亮节，忠于医学事业，是由于他忠实服膺于儒家的社会伦理的结果。但有时也无力自制地有“惚兮恍兮”、“湛兮似或存”（见《道德经·上篇》）的思想出现。正因为他对道教感情之深，所以他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大医必须“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见《要方·序例·大医习业》）。即使闲来无事的消遣，也要“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见《翼方·退居·养性》）。孙氏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为何其他书都不去遣闷，而独独垂青于道家书？当然不言可喻了。

后人对他的“疾病与梦”、“房中补益”、“禁经”等，非议较多，也正是他的思想被道教——可惜不是正途的老、庄之道而是经过张道陵、袁天罡等人修正以后之道所占据了整个领域所致。

也不可否认，他思维中主要的还是唯物观念，但也不能不看到他还混杂着唯心观念和迷信思想。这种乍左乍右，时而唯物时而唯心的摇摆不定，正是他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加上自己的思想方法三者的消长起伏。同时更应该进一步看出掺杂了讖纬的两汉经学，也能使孙氏唯心观念的滋长，秦汉以后的老庄学说，也是使孙氏朴素唯物思想产生了影响。

唯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在孙氏思维中还是十分牢固的，如“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所

以能够这样说，纵然孙氏的思维是多色彩性，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属于朴素唯物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孙氏思想中朴素唯物的观念占着主导地位。

自古以来，包括医家在内的文化人，百分之百都有名，有字、有号、有别署。到了晚年，还署一个“××老人”、“××老人”。如其为道教中人，则更少不了一个“××子”、“××子”。直到解放后的今天，在各种登记表格里还有“曾用名”一栏。而孙氏则在141年中只有“思邈”一个名，在古今文化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更显示出他的超凡脱俗！

我们把孙氏作出一个总评，觉得十分困难。只有借用许叔微的话，是“唐

许叔微（1080—1154年），字知可，宋·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以京试落第，乃业为医，为宋代一大名医。撰有《普济本事方》10卷。23门、300余方。

有孙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见《普济本事方·序》）。

第八章 年 谱

出生 岁次辛酉，公元 541 年，西魏·文帝·大统七年。

当时在中国并列着三个偏安的政权：

西魏：文帝、元宝炬。建都长安。

梁：武帝·萧衍。建都金陵，年号大同，当年为七年。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建都邺，年号兴和，当年为三年。

孙氏出生于西魏境内，距长安不太远的北方铜川市、耀县东北 15 里的孙家源村。该地是关中通往陕北的要道。秦为内史地（即京都咸阳的直豁地），汉置祿栩（汉景帝二年改为祿栩县），唐称华原（见明·嘉靖三十六年乔世宁《耀州志》：“孙家源，即真人籍里”记载）。

孙氏出生月、日及家庭状况，以无记载可稽，待考。唯家境偏于贫寒，可从《要方·序》中“吾幼遭风冷，屢

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一言可以反映出来。

当年为陶弘景卒后第五年。

甄权也出生于许州扶沟，今为河南省、许昌、扶沟县。

1 岁 壬戌。公元 542 年，西魏·大统八年。

名医高僧昙鸾，逝世于汾州石壁谷云玄中寺，享年 68 岁。

4 岁乙丑、公元 545 年，西魏·大统十一年。

南齐·姚僧垣，于梁·大同十一年，从领殿中医师转领大医正。

5 岁丙寅、公元 546 年，西魏·大统十二年，梁·中大同元年。东魏·武定四年。

三月，梁武帝讲《三慧经》于同泰寺。

四月，同泰寺塔失慎焚毁，武帝认为“此魔也”。遂拟重建十二级浮图。后以侯景之乱而罢。

6 岁 丁卯、公元 547 年，西魏·大统十三年。

旱疫，以扬、徐、充、豫几州尤为严重。

7 岁 戊辰、公元 548 年，西魏·大统十四年。

旱灾加瘟疫。

孙氏开始识字读书。“七岁就学，诵千余言。”这里的千余言，当然不是指七岁那时，仍用以后指今后的儿童时代。

9 岁 庚午·公元 550 年，西魏·大统十六年。

针灸术传人日本国。江南连年大旱及蝗灾，尤以江、扬两处更为严重。百姓流亡，草根树叶食之皆尽，途中白骨成堆。巢元方 出生。

11 岁 壬申，公元 552 年，西魏·度帝元年。

当时各地天灾人祸，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但西魏尚能偏安无事，所以孙氏的童年并未达到流离失所而能安于求学。

江东大疫大饥，死者达十之七八。

是年梁·元帝·萧绎患心腹疾，乃诏诸医，议治疗方药。咸谓至尊之体，宜用平药，独姚僧垣认为“脉洪而大，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搓理”。

姚僧垣（499—583 年），字法卫，吴兴武康人。

江，泛指长江以南一带地区。

巢元方（550—630 年），随·京兆华阴人，大业间授太医博士，与吴景贤等奉诏撰《诸病源候论》50 卷。

元帝从之，进药后，果下宿食而愈。

以《针经》赠日本钦明天皇。

14岁 乙亥·公元555年，西魏·恭帝二年。

“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见《旧唐书·本传》）。多少年龄称童？古无定律。《后汉书·汪延传》：“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号为任圣童。”又《后汉书·张堪传》：“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现在把12与16折中计算，假定为14，似最适合。因为早于12岁，孙氏仅仅读书五、六年，不会显示出他的才华。迟于16岁之后，则独孤信已被宇文觉所迫害，两人无法相晤。15岁丙子。公元556年，西魏·恭帝三年。

北齐·天保七年，蝗灾。

16岁 丁丑。公元557年，北周·明帝元年。

正月，西魏宇文觉废恭帝，灭西魏，自立为天王，改国号为周，即史书上称为北周。

北齐·天保八年，自夏至9月，大蝗灾。17岁戊寅·公元558年，北周·明帝二年。

攘那拔陀罗同阁那邪舍，共译印度的《五明经》成中文，其中一部份为医学。

北齐·天保九年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灾。

18岁 己卯·公元559年，北周·明帝三年。

孙思邈开始习医。“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见《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

20岁 辛巳·公元561年，北周·保定元年。

北齐·太宁元年，皇太后病，徐之才一药而痊，赐采帛千匹，锦四百匹。

此时孙氏已很博学，大有“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引《文选·左思咏史诗》语）的气概。故《旧唐书·本传》谓之：“弱冠善谈庄老”。因之也知道在那时已开始研究道教了。

也是这个时期，孙氏自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见《要方·序》）典，《潜夫论·赞学》：“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尚，《国语·晋语》：“其为人也，刚而尚宠”，韦注：“尚，好也。”高，为形容尚字，兹，为助语词。这是说孙氏在青年时代，已经嗜好于高深的古典文学了。

童年的智慧加勤奋，在这里已得到了收获。但更可这样说，这时的耕耘，为今后获得更大的成就。

21岁 壬午·公元562年，北周·保定二年。

吴人知聪，携药书及《明堂图》等160卷，至日本交流。

23岁 甲申·公元564年，北周·保定四年。

山东大水成灾，民多饥死。

24岁 乙酉·公元565年，北周·保定五年。

北齐，河清三年3月，兖、梁、沧、赵等州大水成灾。

12月，北齐阳南大疫。

25岁 丙戌·公元566年，北周·天和元年。

姚最写成《本草音义》。

《五明经》，为专事讨论明相、明心、明念、明思、明意五明的经书。

26岁 丁亥·公元567年，北周·天和二年。

北齐·天统三年，山东大饥荒。

27岁 戊子·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

北齐。天统四年，太上皇高湛病，徐之才为之治疗而痊。

33岁 甲午·公元574年，北周·建德三年。

五月，政府下令，诏毁禁佛、道两教，斥为佛教不净。于十五日起，尽毁境内寺庙佛像。

文宣太后病，召姚僧垣诊治，姚谓：“窃以忧惧”，故即逝世。34岁 丙申·公元575年，北周·建德四年。

徐之才卒，享年79岁。

36岁 丁酉·公元577年，北周·建德六年。

正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举兵攻北齐，大破齐军。周军入邺，北齐亡。所有50个州、162个郡、380个县皆入于周。周武帝下令废止北齐境内佛教、寺庙四万所，尽赐王公为第宅。沙门300万皆勒令解散还俗。

37岁 戊戌，公元578年，北周·宣政元年。

6月，武帝卒。当病初时，召姚僧垣诊治，姚谓：“万无一全”，不久固死。

《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正是这个时期。

考周宣帝宇文赟，为武帝宇文邕子，于本年6月即位。至大象二年（580年）5月，卒。所以《旧唐书》的“周宣帝时”，确切的说起来，是从578年6月至580年5月的两年间。

《旧唐书·本传》：“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赴误为起）”。这个辅政时间，大约为宣政元年（578年）至大象二年（580年）止的跨越三年间。考这里的隋文帝，应该称杨坚。

38岁 己亥，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

根据“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要方·解毒并杂治·解五石毒》）。所以证实孙氏在这个时期里，正在修道炼丹。

《续仙传·隐化，孙思邈》的“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也就是此时。39岁 庚子·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

姚僧垣《集验方》脱稿。

40岁 辛丑·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

二月，杨坚废静帝，改国号为隋，北周灭亡。

把太医署归属于太常寺管谿。

42岁 癸卯，公元583年，隋·开皇三年。

姚僧垣，卒，享年84岁。

44岁 乙巳，公元585年，隋。开皇五年。

七月，河南诸州水灾。

45岁 丙午·公元586年，隋·开皇六年。

《要方·肝脏·坚症积聚》报导了本年3月8日发现蛟龙病。

48岁 己酉，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

刘祐写成《产乳书》。

释·那连提黎耶舍，卒。他生前曾设病人坊，收容男女患有麻风者。这是中国第一个麻风病防治机构。

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则合家逃避，病人多妄死。公义乃设置“署月厅”，专收疫病患者，并予治疗，甚至廊房皆满。这是中国第一个急性传染病医院。

49岁 庚戌，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

长安大疫。

52岁 癸丑·公元593年，隋·开皇十三年。

春，政府下诏禁绝讖纬学说，凡收藏讖纬及涉及讖纬的书籍者，治罪。从此讖纬学说即敛迹而式微。

57岁 戊午·公元598年，隋·开皇十八年。

5月，禁畜猫。理由是“猫鬼蛊毒魔鬼。”很可能是猫得了狂大病。假定确是如此，则在卫生行政方面又一个英明措施。

9月，东征军在征途中传染疫病，不得已班师而归，死者十之八九。

64岁 乙丑，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

《要方·胆腑·万病丸散》：“太乙神丹，……余以大业中，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鸟、玄武大获曾青。”由此可知孙氏在605年到617年之间，尚在修道炼丹。同时更悉孙氏此时还作一次西北之游，到过四川。

巢元方在大业间，授以太医博士。

杨上善在大业间，授以太医待御。

66岁 丁卯·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

日本遣小野妹子来，中国医学由此即大量传入日本。

67岁 戊辰·公元608年，隋·大业四年。

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等来华学医。68岁己巳·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

吐谷浑一带地区，多瘴气，樊子盖献青木香，用以预防和治疗。

诸葛颖《淮南玉食经》及《目》165卷，约写成于此时。可惜此书，不久即佚。

69岁 庚午·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

政府命太医博士巢元方编撰、吴景贤监修的《诸病源候论》脱稿。

71岁 壬申，公元612年，隋·大业八年。

大旱疫，山东尤甚，人多死。

《宋高僧传》及《佛祖历代通载》的“南山律师道宣传”中俱谓：“处士孙思邈，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西阳杂俎》也谓“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恐为“道宣律师”之误）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考道宣于16岁时（612年），受具戒于终南山白泉寺。此时孙氏尚隐居终南山而相识结友，因一为鸿儒一为高僧，所以友谊较深。之后，道宣先于孙氏被召进京，孙氏在贞观元年进京，与道宣又得朝夕相见。贞观十六年（642年）道宣又回终南山丰德寺，就此又与孙氏分手。

《独异志》：“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为终南山之误）修道时，大旱，……”的祈雨故事，与《西阳杂俎》道宣介绍孙氏祈雨事，可能都在这个时期中（参

岷州，今甘肃省南部。

飞鸟、玄武，这两地俱在今四川省中江县东南。

杨上善，生歿待考，仅知为隋代人。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但已佚散7卷，仅存23卷。

阅第四章居士·三方外之交)。

74岁 乙亥·公元615年，隋·大业十一年。

正月，增添秘书省官120员，王府学士500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驿道乃至蒲博

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书1.7万余卷。内医学方面的《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也在这批工作中写成，故《旧唐书》谓“隋炀帝作”。

崔知悌，诞生。

75岁 丙子·公元616年，隋·大业十二年。

杨上善，卒。

76岁 丁丑，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

洛阳，出现传尸病。

77岁 戊寅·公元618年，隋·大业十四年。

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自称高祖皇帝，建都长安。隋皇朝宣告灭亡。

随着唐皇朝的建立，政府机构的调整建设，置尚药局及太医署。署下属有四科，为：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

甄立言在武德年间(618—626年)，升任太常丞。

80岁 辛巳·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

孟诜诞生。

81岁 壬午·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

孙氏曾被蠮螋刺伤。“凡蠮螋虫尿人影处，便令人病疮。……余以武德中六月得此疾”(见《要方·备急·蛇毒》)。

82岁 癸未·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

日本僧惠济、惠光，来中国留学。

在中国留学15年之久的日本药师惠日、倭汉直福田等回国。

《要方》在此时开写。

85岁 丙戌·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

8月，高祖禅位于太子李世民，即太宗，改年号为贞观。李渊称太上皇。

太医署中增置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杨玄操写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

86岁 丁亥·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

太医署置司医、医佐，分掌疗众疾。

太医署减置医博士助教一人。又置医师、医工佐之，掌医生《本草》、《甲乙》、《脉经》。减置按摩博士一人，又置按摩师，按摩工助之。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除人八疾。

甄立言，卒。

夏，山东诸州，大旱。

“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见《旧唐书·本传》)。从此孙氏即脱离隐居生涯而居住长安。寓长安光德坊的鄱阳公主官邸，一直到他羽化。

贞观间，孙氏与马德逸、谢季卿奉旨校完《明堂经图》。

蒲博鹰狗，为各种赌博的名称与种类。

崔知悌(615—685年)，唐·鄱陵(今河南省、鄱陵)人，他是宦而医者。

贞观间，孙氏的病例，见于两部《千金方》者，有六、七例（详见第六章大医，七临床）。

京畿蝗灾。

87岁 戊子·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

8月，河南、河北大霜。年荒。88岁己丑·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

9月，诏诸州治，置医学博士及学生。

《旧唐书·本传》：“（唐）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传授，有如目睹。”考本年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中，又诏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隋书》，至贞观十年（636年）书成。在这8年撰写期间，孙氏发挥了顾问的作用。

89岁 庚辰，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

孙氏患唇痛。《要方·丁肿痛疽》：“余以贞观四年，勿口角上生丁肿”。

11月，诏废鞭背刑。因太宗读《明堂图》后，知人五脏皆系于背之故。

巢元方，卒，享年80岁。

90岁 辛卯·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

秋，孙氏患左中指指疔，见《要方·备急·被打》：

“余以贞观五年7月15日夜，左手中指，触着庭树，至晚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色如小豆色，……”

91岁 壬辰·公元632年，唐·贞观六年3月。

太宗至九成宫避暑，10月回宫，孙氏伴随。92岁癸巳·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3月，孙氏面部丹毒。《要方·丁肿·丹毒》：“余以贞观七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内疼痛。比至晓，头痛目眩，额左上角上如弹丸大肿痛，不得手近，……几致殒毙。”

5月，太宗又幸九成宫避暑，孙氏伴随以往。

8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

9月，山东四十余州大水。

在鄱阳公主官邸，遇卢照邻。《旧唐书·本传》：

“癸酉（应为癸巳）之岁，……思邈自云，开皇（应为文帝）辛酉（为文帝大统七年（541年））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以实足年龄计，则为92岁，但古人都以虚龄计算）（参阅第一章生死之谜。）

93岁 甲午·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

3月，太宗至九成宫，10月回宫，孙氏伴随。

7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

94岁 乙未·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

5月，太上皇李渊卒。

95岁 丙申·公元636年，唐·贞观十年。

关内、河东灾荒，大疫。

96岁 丁酉·公元637年，唐·贞观十一年。

7月，京师大雨，水浸入洛阳宫。

9月，黄河泛滥，溢坏陕西、河北，毁河阳、中潭。97岁戊戌·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正月，松、邳二州地震，坏人庐舍，压死者众。

松州，今上海市、松江县。

98岁 己亥·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

从高昌传入酿葡萄酒方法。为中国酿酒中，又添

增了一个新品种与技术。100岁 辛酉·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

正月，文成公主（？—680年）由李道忠（600—653年）送到吐蕃，出嫁于吐蕃弄赞。奩赠中有医药书籍多种，由哈祥马哈德娃和德日马廊吉两人译成藏文。

3月，泽州大疫。

101岁 壬寅·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

夏，谷州、泾州、徐州、戴州及貌州五处大疫，死者无数。

达摩乌长国，遣使献龙脑香。

道宣律师回终南山，卓锡丰德寺。102岁癸卯·公元643年，唐·贞观十六年。

夏，泽、濠、庐三州，大疫。

103岁 甲辰·公元644年，唐·贞观十八年。

庐、濠、巴、普、彬五州，大瘟疫。

106岁 丁未·公元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

政府遣使至天竺，学习熬糖新法。

107岁 戊申，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

卿州大疫。

使方士那罗迺波寐于金飙门造延年丹。

108岁 己酉，公元649年，唐·贞观二十三年。

5月，太宗李世民卒，享年50岁。

6月，李治即位，即高宗，改年号为永徽。

8月，晋州大地震，死伤5000余人。109岁 庚戌，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

雍、绛、同……等九个州，大旱、蝗灾。

齐、定……等16州，大水灾。

4月，晋州大地震，余震至6月方息。

“贞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脂上，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内，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永徽元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奇病下·金疮》）。这是两部《千金方》中最后记载的一个病例。

110岁 辛亥，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

10月，晋州又地震。

111岁 壬子·公元652年，唐·永徽三年

孙氏《千金要方》脱稿。

高昌，今在新疆吐鲁番县。

那罗迺婆寐，无考。

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

雍州，今陕西、甘肃二省及青海交界处。

绛州，今山西省、绛县西南20里。

同州，今陕西省，大荔、澄城、合阳一带地区。

定州，今河北省，满城以南，安国、饶阳以西。

12月，山西绛州僧，死后解剖，有遍体内鳞蛊虫。

112岁 癸丑，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

《唐律》于医学，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造畜蛊毒以毒药药人，医违方诈疗病，医合药不如方，妇人怀孕犯死罪，拷决孕妇等刑法，及禁止道士、女冠、僧侣、比丘尼等人，不得为人疗疾。

天花从西东流，遍于海内。

《要方·序》：“白首之年，未曾释卷”，孙氏正是指这个阶段的求学情况。

《翼方·针灸上·取孔穴法》：“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这是孙氏在《要方》脱稿之后，再读《伤寒杂病论》的记载。

从现在起，他酝酿或开始撰写《翼方》。

113岁 甲寅。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

闰5月，麟游大雨，漂溺死者3000人。

6月，恒州大水，滹沱泛滥，漂溺5000余家。

河北诸州，也大雨成灾。

12月，倭国献琥珀、玛瑙。

114岁 乙卯，公元655年，唐·永徽六年。

3月，楚州大疫。

6月，日本药师惠日，三度来华。

115岁 丙辰，公元656年，唐·显庆元年。

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诸国，采取木香、益智仁……等名贵药品，可惜未至而返。

9月，括州暴风雨，海溢。

116岁 丁巳，公元657年，唐·显庆二年。

5月，逐天竺方士娑婆归国，但未及行而死于途中。前者天竺道士娑婆寐，自言有长生术，太宗信之，使人四出采药，但无法炼成，太宗一怒而逐之。118岁 己未，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

诏监门左长吏苏敬、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太子洗马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太医令季瑰、太常丞吕才、太史令李淳风、礼部主事颜仁楚等23人编纂的后人称为《唐本草》的《新修本草》脱稿书成。这是世界第一部药典，计正文20卷、目录一卷、连同图、图经等共54卷。

《旧唐书·本传》：“显庆四年，高宗召见孙氏，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这是见之于传史有记录的

唐高宗李治第二次召见。

121岁 壬戌，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

正月，政府在调整体制时，改尚药局为奉医局。

126岁 丁卯，公元667年，唐，乾封二年。

拂菻国，遣使献底也迦。为含有鸦片的药物。

麟游，今陕西省，麟游县。

滹沱，河名，出山西繁峙县东，东流至河北平原，在献县与滏阳河汇合为子牙河，至天津。

倭国，即日本国。

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东南。

127岁 戊辰，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

京师、山东、江、淮大旱且饥。

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

128岁 己巳，公元669年，唐·总章二年。

7月，冀州大雨，毁屋14390间，毁田4496顷。

李勣卒，享年75岁。生前著有《脉经》，但已佚。

9月，永嘉、安固诸县，大风海溢，漂没6000余家。

《新修本草》约在此时（669—677年）间传入日本。

129岁 庚午，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

40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

132岁 癸酉，公元673年，唐·咸亨四年。

7月，婺州暴雨，水泛为灾，漂溺居民600家，诏令赈济。

133岁 甲戌，公元674年，唐·上元元年。

孙氏以老病，请退休。高宗召见，并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见《旧唐书·本传》：“上元元年，辞病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矣。”

135岁丙子，公元676年，唐·仪凤元年。

8月，青、齐……等州，海水泛滥，漂溺居民5000家。

136岁 丁丑，公元677年，唐·仪凤二年。

4月，河南、河北大旱，诏赈济。138岁己卯，公元679年，唐·调露元年。

2月，东都大饥。

139岁 庚辰，公元680年，唐·永隆元年。

9月，遣使赈济河南、河北诸州大水灾。140岁辛巳，公元681年，唐·开耀元年。

8月，河南、河北大水。诏许灾民可往江、淮以南就民。

《千金翼方》脱稿。

141岁 壬午，公元682年，唐·永淳元年。

孙氏2月15日，晨起，沐浴。衣带整齐，端坐而羽化。颜色不变。

《续仙传·隐化·孙思邈》的描写是“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严其衣冠，端然而坐。谓子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得升无何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来往。俄气绝”。

遗有一子，名行。天受中（690—691年），官凤阁侍郎。

孙，名溥，官萧县丞。

冀州，今在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辽河以西一带地区。

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

安固，在四川省境内。

青州，今山东省、潍坊市一带。

唐代中书省称为凤阁，统领管理主书、主吏等事宜。侍郎为一般高级官员的副职。